

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

BLUE BOOK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2005~2006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权威机构·品牌图书·每年新版

THE DEVELOPMENT REPORT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2005~2006)

主编／景体华

副主编／陈孟平　陈　维　游霭琼　魏书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盘点年度前沿资讯　预测时代变幻风云

- “皮书”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几年推出的大型系列图书，它们由一系列权威研究报告组成，在每年的岁末年初对每一年度有关中国与世界的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现状和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和预测。
- 该系列图书的作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为主，均为国内一流研究机构的一流专家，他们的看法和观点体现和反映了对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和未来最高水平的理解和认识，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 同时，每册图书均附有数据库光盘（SSDB），该光盘既是电子书，又是数据库，安装后可通过电脑阅览，输入任意字词，均可快速查询检索，阅读、研究更为方便快捷。

权威机构·品牌图书·每年新版



www.ssap.com.cn
中国皮书网 www.pishu.cn



ISBN 7-80190-965-8/F · 326　定价：48.00元（含光盘）

3A 设计艺术工作室 ● 装帧设计／孙元明

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

BLUE BOOK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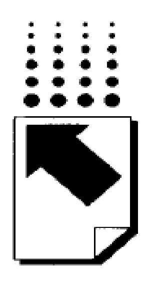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2005~2006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THE DEVELOPMENT REPORT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2005~2006)

主编／景体华

副主编／陈孟平　陈　维　游霭琼　魏书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
2005～2006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主　　编／景体华
副 主 编／陈孟平　陈　维　游霭琼　魏书华

出 版 人／谢寿光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
邮政编码／100005
网　　址／http：//www.ssap.com.cn
责任部门／皮书出版中心
　　　　　(010) 85117872
项目经理／范广伟
责任编辑／范　荣
责任印制／盖永东

总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开
印　　张／26.75
字　　数／431千字
版　　次／2006年3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90-965-8/F·326
定　　价／48.00元（含光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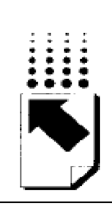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蓝皮书
编辑委员会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编委会

前　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调整等十项重要内容中，区域发展问题被放到了重要位置。加强区域统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提上了实施日程。编制打破行政区划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已经启动。目前，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区域规划试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改革开放 20 多年以来，以深圳等经济特区为基础，浦东开发为引导，珠三角、长三角已迅速跃升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两极”。在 2003 年之前，珠三角的增长速度一直一马当先。2003 年是新世纪珠三角增长的峰值，但是，也就在这一年，长三角的经济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了珠三角，接过了“领跑者”的接力棒。2005 年，长三角和珠三角虽然雄姿依旧，但是在国家宏观调控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却双双出现大幅滑坡。首先看长三角：2005 年前 3 个季度，在全国 GDP 增长速度同比仅回落 0.1% 的同时，长三角区域 GDP 增幅同比回落却达到了 2.6 个百分点。其中：苏州和宁波同比回落了 2.5 个百分点，南京同比回落 3.1 个百分点，而杭州和上海同比大幅回落 3.6 个百分点。再看珠三角：实际上珠三角 2004 年已经从峰值开始下滑。2005 年前三季度珠三角 GDP、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都有所回落。从 GDP 增幅来看，除了佛山同比上升 2.7 个百分点外，其余 8 市均表现出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广州、深圳和中山分别下降 3.5、3.1 和 4.5 个百分点。从目前来看，长三角仍然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领跑者”，其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的比重还在进一步上升。2005 年前三个季度，长三角区域 GDP 占全国的比重达到 22.7%，同比提升了 0.6%；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达到 35.8%，同比上升了 0.8%；到位外资占全国的比重达到 41%，同比提高了 5.9%。只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贡献度的绝对值下降，占全国



的比重同比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但是，无论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不能再按照原来的成长轨道走下去了，必须调整增长方式的“变轨”之势已经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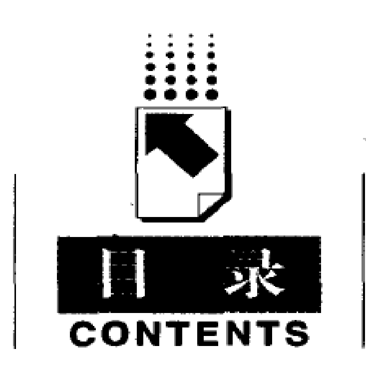
在区域发展进入国家发展战略视野的同时，区域经济正面临着一种大的思路调整，并且必将快速地进入一个大的转换期。

从国家层面来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提出了建立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明确指出依靠物质资源投入量增加实现的“传统增长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十一五”将转向通过持续地提高经济活动的品质实现经济增长。“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确定了具体的主要目标：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 201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时期末降低 20% 左右。应该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就是提高经济活动品质，完成以上目标的根本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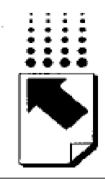
长三角和珠三角如何在快速发展中迅速转轨，如何在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继续成为活跃的“增长极”；京津冀区域将以什么样的战略构思，激发出后发优势，改变我国区域发展“南高北低”的不平衡状况，开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这是各区域决策者和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今年这本《中国区域发展报告》的主题。但愿本书能以鲜活的新思维给区域增长方式转型决策以智力支持。

景体华

2006 年月 1 月 20 日



目录
CONTENTS



长　三　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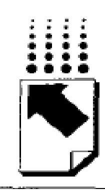
珠　三　角

其他经济区

大　事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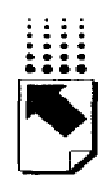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　录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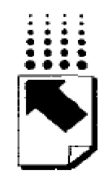
The Changjiang Del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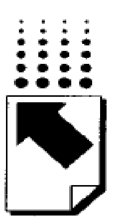
The Pearl River Delta

Other Economic Zones

Chronicle of Events



综　合　篇



我国三大经济圈的发展状况与趋势分析

○ 邓丽姝　魏书华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在2004～2005年期间，经济继续保持稳步发展。2004年，三大经济圈以占全国10%点多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41%的地区生产总值，对国家经济的支撑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三大经济圈的经济运行在近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值得引起关注，其深层次原因，是三大经济圈未来经济发展走势的关键性影响因素。

一　三大经济圈战略调整与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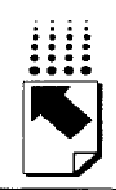
（一）三大经济圈经济增长态势①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经济发展仍然保持原有格局，长三角经济增长速度在2003年首次超过珠三角后进一步巩固了"领军"地位。三大经济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的比重进一步上升。

1. 生产总值方面

从地区生产总值角度看，长三角为28775.42亿元，大于京津冀（14118.51亿元）和珠三角（13572.24亿元）之和。在长三角，上海地区生产总值为7450.27亿元，是我国经济总量规模最大的城市，作为长三角的核心城市显示出绝对优势；苏州为3450亿元，也是我国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杭州、无锡、宁波均超过2000亿元，南京也接近2000亿元；常州、南

① 由于资料限制和数据完整性的要求，对三大经济圈经济发展近况比较采用的是2004年数据；同样，由于数据取得的原因，未使用经济普查后的调整数据。对京津冀经济圈的范围界定按照国家发改委的划分标准进行了相应调整，即在原河北省七市的基础上增加了石家庄市，为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的石家庄、廊坊、保定、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八市。



通、嘉兴、绍兴、台州均超过1000亿元。在珠三角，广州和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超过4000和3000亿元；佛山、东莞均超过1000亿元；其余城市均在500亿元以上。在京津冀，北京作为首位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超过4000亿元；次位城市天津则接近3000亿元；石家庄、保定、唐山作为河北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均超过1000亿元；而秦皇岛、张家口、承德均在500亿元以下。由此可见，长三角整体发展水平最高，京津冀虽然总量上略大于珠三角，但经济圈内部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珠三角则相对均衡（见表1～表4）。

从人均生产总值角度看，珠三角最强，其次为长三角，京津冀则落后于前两个经济圈。珠三角平均为42499元；广州、深圳、东莞超过50000元，按常住人口计算深圳最高，为59271元；珠海、中山、佛山等3个城市超过40000元；惠州、江门在20000元以上；肇庆最低为13920元。长三角平均为35040元；上海、无锡、苏州均超过了50000元，其中苏州最高，为57992元；南京、杭州、宁波等6个城市超过30000元；镇江等4个城市超过20000元；南通等3个城市在10000元以上。京津冀平均为20263元；北京最高，为37058元，天津也超过了30000元；河北8市只有唐山在20000元以上，张家口和承德则低于10000元，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城市介于1～2万元之间（见表1～表4）。

2. 三次产业方面

三大经济圈均以二、三产业为主，从二、三产业增加值来看，对比情况与地区生产总值相似，长三角具有绝对优势，珠三角和京津冀则基本持平，珠三角的第二产业增加值略高，京津冀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则略高。

从三次产业结构看，长三角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最高，其次为珠三角，京津冀最低；第三产业比重则呈相反态势，由高到低依次为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长三角三次产业结构为4.6∶55.9∶39.5，16城市全部为“二、三、一”的产业结构，一定程度上显示出长三角经济相对依靠第二产业发展的特征，核心城市上海和南京、苏州、杭州等次级中心城市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不足；珠三角三次产业结构为4.4∶53.3∶42.3，各城市中广州、肇庆呈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京津冀三次产业比重为8.5∶47.3∶44.2，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产业结构由2003年的“三、二、一”转变为2004年的“二、三、一”。各城市中，核心城市北京以及秦皇岛为“三、二、一”结构（见表1～表4）。

3. 三大需求方面

投资方面，从主要经济指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看，长三角具有明显

优势，为13637.93亿元，高于其他两经济圈之和，京津冀则高于珠三角。从绝对量看，上海和北京两大城市投资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3084.66亿元和2528.3亿元，在所在经济圈占有较大比重。

消费方面，从主要经济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三大经济圈由高到低仍为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上海、北京、广州作为核心城市均对所在经济圈表现出较强的拉动作用。

出口方面，长三角和珠三角出口额较高，分别为2083.06和1824.29亿美元，外向型经济较发达；京津冀则相差甚远，仅为487.92亿美元，且85%集中在京津两市，外向型经济不发达；但京津冀在实际利用外资上增速最快（见表1～表4）。

4. 核心城市的比较

长三角的核心城市上海，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其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实际利用外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在三大经济圈核心城市中均处于首位，表现出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对经济圈的带动力。但作为区域核心城市，上海的服务业有待进一步发展，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珠三角的核心城市广州，人均生产总值为各核心城市之首，呈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出口等指标不逊于北京，也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

京津冀的核心城市北京，在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上逊于上海，处于第二位。服务业相对发达。但人均生产总值低于上海和广州。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出口、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与广州相差不大，但地区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落后于其他核心城市，呈现出工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态势（见表5）。

5. 三大经济圈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

三大经济圈在我国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04年，三大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41%，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占全国的41%和54%，人均生产总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9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占到1/3，进出口总额、出口分别占3/4，实际利用外资占4/5。与2003年相比，相关指标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对我国经济的支撑作用越来越重要（见表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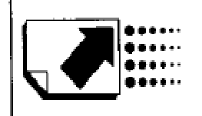


表1　2004年长江三角洲主要经济指标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亿元）			产业结构（%）			人口（万人）	人均生产总值（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上海	7450.27（13.6%）	96.71（-5%）	3788.22（14.9%）	3565.34（12.9%）	1.3	50.8	47.9	1352.39	55090	3084.66（25.8%）	2454.61（10.5%）	1600.26（42.4%）	735.2（51.6%）	65.41（11.8%）
南京	1910（17.3%）	70（5.2%）	1005（20.7%）	835（14.9%）	3.7	52.6	43.7	583.6	33050（15%）	1201.88（26%）	711.44（18.5%）	206.39（40.3%）	104.6（36.5%）	15.12
镇江	781.16（14.7%）	34.11（6.6%）	460.56（15.7%）	286.49（14.2%）	4.4	59.0	36.7	267.21	29235（14.7%）	320.5（35.1%）	192.05（14.2%）	34.79	15.19	12.2（50.8%）
无锡	2350（17.4%）	51.80（2.1%）	1353.50（19.4%）	944.70（15.5%）	2.2	57.6	40.2	447.19	52825	1114.13（24.7%）	579.21（18.9%）	218.46（51.9%）	110.22（50.5%）	19.48
常州	1100.61（15.5%）	51.24（2.7%）	647.7（17.6%）	401.67（14.1%）	4.7	58.8	36.5	348.96	31665（21.1%）	588.6（31.8%）	324.05（15.5%）	69.05（31.5%）	47.16（33.6%）	5.36
苏州	3450（17.6%）	77（-0.5%）	2268（20.4%）	1105（14.5%）	2.2	65.7	32.1	598.85	57992（16.1%）	1554.80（10.3%）	625.10（18.8%）	1032.01（57.2%）	507.74（55.6%）	95（39.6%）
南通	1226.06（15.6%）	148.89（5.3%）	664.16（19.5%）	413.01（14.1%）	12.1	54.2	33.7	773.79	15806（16.1%）	605.17（35.0%）	384.25（16%）	67.93（31.5%）	43.49（32.4%）	11.04
扬州	788.13（14.7%）	79.79（6%）	419.87（17.3%）	288.47（13.5%）	10.1	53.3	36.6	454.29	17359（14.5%）	330.05（33.6%）	228.01（15.2%）	24.18（19.5%）	13.51（25.4%）	7.52

续表 1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亿元）			产业结构（%）			人口（万人）	人均生产总值（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泰州	705.20（14.7%）	82.70（4.5%）	380.50（18.7%）	242.00（12.5%）	11.7	54.0	34.3	502.77	14014（14.8%）	306.24（32.8%）	200.69（15.5%）	12.56（42.6%）	9.54（50.4%）	4.17（133.8%）
杭州	2515（15%）	139.1（5.1%）	1332.9（16.7%）	1043（14.3%）	5.5	53	41.5	651.68	38858（13.7%）	1205.18（19.7%）	704.34（15.2%）	244.96（34.4%）	151.75（38.6%）	14.1（39.8%）
宁波	2158.04（15.5%）	123.50（5%）	1230.21（16.6%）	804.33（15.8%）	5.7	57.0	37.3	552.7	39045	1095.7（31.1%）	595.63（14.2%）	261.13（38.8%）	166.90（38.2%）	21.03（21.8%）
嘉兴	1050.56（16.5%）	77.88（5.4%）	635.05（18.3%）	337.63（16.2%）	7.4	60.5	32.1	333.94	31506（16.2%）	633.7（20.6%）	325.34（14.7%）	79.25（38.8%）	51.06（41.2%）	10.22（28%）
湖州	590.69（15.4%）	64.81（8.2%）	323.69（18.5%）	202.19（12.9%）	11	54.8	34.2	257.21	22966	365.47（36.4%）	208.34（14.3%）	16.97（39.4%）	14.48（43.2%）	6.11（13.7%）
绍兴	1313.87（15.3%）	92.22（3.5%）	786.73（17.1%）	434.91（14.7%）	7	59.9	33.1	434.72	30254	624.95（16.8%）	335.43（14.9%）	86.62（945.3%）	66.09（45.8%）	8.23（10.9%）
舟山	212.04（17.0%）	38.21（10.2%）	91.30（21.9%）	82.53（15.5%）	18	43.1	38.9	96.91	21855（17.5%）	127.87（30.5%）	87.52（16.5%）	10.11（62.9%）	8.14（50.8%）	0.225（32.1%）
台州	1173.79（13.6%）	96.70（0.1%）	686（14.2%）	391.09（16.4%）	8.2	58.5	33.3	555.92	21177（13.0%）	479.03（24.1%）	302.92（15.5%）	47.89（45.6%）	37.99（43.3%）	3.03（40.3%）
合计	28775.42	1324.66	16073.39	11377.36	4.6	55.9	39.5	8212.13	35040	13637.93	8258.93	4012.56	2083.06	298.245

资料来源：各市关于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以下简称“统计公报”）。

注：南京、无锡、常州、扬州为实际到账外资；括号内数据为比上年的增长速度（以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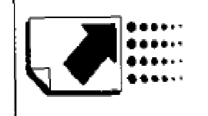


表 2　2004 年珠江三角洲主要经济指标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亿元）			产业结构（%）			人口（万人）	人均生产总值（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肇庆	548.51（13.2%）	151.04（5.7%）	195.51（18.6%）	201.96（13.7%）	27.54	35.64	36.82	394.05	13920	144.71（26.1%）	193.91（13.3%）	19.03（21.7%）	12.40（12.9%）	4.82
佛山	1653.70（16.3%）	82.31（3.8%）	959.15（20.9%）	612.24（11.9%）	5	58	37	350.89（1.9%）	47500（14.5%）	565.40（33.4%）	542.19（14.6%）	216.90（31.7%）	138.30（35.3%）	17.25（40.8%）
广州	4115.81（15.0%）	115.50（5.4%）	1817.71（17.2%）	2182.60（13.8%）	2.81	44.16	53.03	737.67（1.72%）	56300（13.7%）	1321.96（12.5%）	1675.05（9.7%）	447.96（28.2%）	214.73（27.1%）	24.77（64.8%）
东莞	1155.30（19.6%）	27.70（-9.6%）	640.60（24.5%）	487.00（14.8%）	2.40	55.45	42.15	161.97	71328	433.89（35.9%）	389.04（15.1%）	645.18（24.0%）	351.92（26.1%）	30.34（18.4%）
惠州	685.14（15.1%）	83.00（4.5%）	390.96（14.2%）	211.19（21.7%）	12.1	57.1	30.8	293.22	23642（13.1%）	297.61（30.3%）	212.75（17.1%）	166.35（26.7%）	87.39（22.3%）	6.32
江门	834.56（12.2%）	73.97（3.5%）	413.15（14.6%）	347.44（11.2%）	8.9	49.5	41.6	385.53	21000	197.88（22.82%）	311.57（12.1%）	78.40（33.5%）	50.74（38.9%）	5.12
中山	610.14（18.7%）	30.51（1.8%）	396.49（22.5%）	183.14（13.8%）	5.0	65.0	30.0	139.45	44005（17.3%）	291.29（11.2%）	178.84（16.4%）	156.21（19.0%）	99.95（21.1%）	5.10（38.8%）
珠海	546.28（13.8%）	18.63（3.6%）	311.44（15.1%）	216.20（12.7%）	3.4	57.0	39.6	133.20（4.2%）	41800	179.6（27.3%）	179.89（13%）	218.13（30.0%）	90.40（30.8%）	4.70（23.8%）
深圳	3422.80（17.3%）	14.18（-19.8%）	2108.14（21.3%）	1300.48（11.3%）	0.4	61.6	38.0	597.55（7.2%）	59271（7.8%）	1090.14（14.9%）	915.45（14.2%）	1472.83（25.5%）	778.46（23.6%）	23.50（10.4%）
合计	13572.24	596.84	7233.15	5742.25	4.4	53.3	42.3	3193.53	42499	4522.48（20.6%）	4598.69（13.6%）	3420.99（26.1%）	1824.29（25.7%）	121.92

注：因资料限制，除广州、肇庆、东莞、中山、珠海为“实际利用外资”外，其余城市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广州、深圳、惠州、珠海为常住人口，其余城市为户籍人口；东莞人均生产总值按户籍人口计算。

资料来源：各市 2004 年统计公报。

表 3　2004 年京津冀主要经济指标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亿元）			产业结构（%）			人口（万人）	人均生产总值（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北京		4283.3（13.2%）	102.9（1.9%）	1610.4（16.7%）	2570（11.6%）	2.4	37.6	60	1162.9	37058（11.9%）	2528.3（17.2%）	2191.8（14.4%）	946.6（38.2%）	205.7（21.8%）	30.8（43%）
天津		2931.88（15.7%）	102.29（5.1%）	1560.16（19.8%）	1269.43（11.7%）	3.5	53.2	43.3	932.55	31550	1258.98（20.3%）	1052.70（14.1%）	420.19（43.2%）	208.65（45.4%）	24.72（51.4%）
河北		8836.9（12.9%）	1370.4（6.7%）	4703.4（14.8%）	2763.2（12.5%）	15.5	53.2	31.3	6808.75	13017（12.2%）	3215.3（28.8%）	2522.9（15.8%）	135.3（50.7%）	93.4（57.6%）	19.8（27.0%）
河北环京津城市	石家庄	1633（14.1%）	230（6.5%）	794（17.6%）	609（12.3%）	14.1	48.7	37.2	917.5	17798	716.7（32.0%）	533.1（16.7%）	36.6（30.1%）	28.8（23.5%）	3.52（33.8%）
	廊坊	604.8（12.5%）	92.6（8.5%）	325.4（13.8%）	186.7（12.5%）	14.8	54.4	30.8	389.8	15566	266.0（18.3%）	138.3（14.6%）	10.1（26.5%）	4.4（48.5%）	2.2（16.7%）
	保定	1110.9（14.5%）	178.01（4.8%）	544.16（19.8%）	388.71（11.8%）	16	49	35	1088.28	10208	472.1（37.3%）	367.9（16.3%）		7.56（57.5%）	2.23（-16.3%）
	唐山	1626.33（14.9%）	213.39（5.8%）	915.02（18.0%）	497.92（14.0%）	13.3	56.7	30.0	710.07	22965（14.3%）	461.00（42.1%）	359.70（17.0%）	18.16（76.2%）	8.98（100%）	4.13（100%）
	秦皇岛	453.44（12.8%）	47.43（6.4%）	187.43（16.7%）	218.58（11.0%）	8.9	42.5	48.6	275.82	16500	141.8（20.9%）	135.08（14.7%）	22.05（30.8%）	16.09（59.9%）	2.0（32.5%）
	张家口	400.16（13%）	58.22（13.5%）	194.66（16.6%）	147.23（9.0%）	14.3	48.8	36.9	449.82	8890（13.1%）	129.0（33.6%）	138.69（11.0%）	3.63（48.4%）	1.71（44.0%）	0.37（69.7%）
	承德	300.6（15.8%）	55.0（13%）	151.8（16.9%）	96.4（15.5%）	17.8	50.6	31.6	361.7	8294	151.0（39.6%）	102.96（12.3%）	2.5（82.0%）	1.2（94.4%）	1.01（34.3%）
	沧州	774.1（15.3%）	123.8（17%）	388.4（16.4%）	261.9（13%）	14.4	51.8	33.8	679.36	11395	245.3（40.5%）	192.15（16.2%）	6.78（58.7%）	4.83（62.2%）	0.83
京津冀地区		14118.51	1203.64	6671.43	6245.87	8.5	47.3	44.2	6967.8	20263	6370.18（23.4%）	5212.38（11.1%）	1502.09（40.6%）	487.92（26.7%）	71.81（40.6%）

注：石家庄市人口数为常住人口数，人均生产总值相应按常住人口计算；因资料限制，以河北省进出口总额代替河北 8 市之和。

资料来源：2004 年北京、天津、河北统计公报以及《2005 河北经济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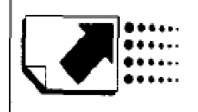


表4　2004年三大经济圈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亿元）			产业结构（%）			人均生产总值（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长三角	28775.42	1324.66	16073.39	11377.36	4.6	55.9	39.5	35040	13637.93（24.3%）	8258.93（14.9%）	4012.56（44.9%）	2083.06（47.4%）	298.245（15.6%）
珠三角	13572.24	596.84	7233.15	5742.25	4.4	53.3	42.3	42499	4522.48（20.6%）	4598.69（13.6%）	3420.99（26.1%）	1824.29（25.7%）	121.92
京津冀	14118.51	1203.64	6671.43	6245.87	8.5	47.3	44.2	20263	6370.18（23.4%）	5212.38（11.1%）	1502.09（40.6%）	487.92（26.7%）	71.81（40.6%）
合　计	56466.17	3125.14	29977.97	23365.48	5.5	53.1	41.4	30732	24530.59	18070	8935.64	4395.27	491.975
全　国	136515（9.5%）	20744（6.3%）	72387（11.1%）	43384（8.3%）	15.2	53	31.8	10502	70073（25.8%）	53950（13.3%）	11548（35.7%）	5934（35.4%）	606（13.3%）

表5　2004年三大经济圈核心城市主要经济指标比较

地区	核心城市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亿元）			产业结构（%）			人口（万人）	人均生产总值（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长三角	上海	7450.27（13.6%）	96.71（-5%）	3788.22（14.9%）	3565.34（12.9%）	1.3	50.8	47.9	1352.39	55090	3084.66（25.8%）	2454.61（10.5%）	1600.26（42.4%）	735.2（51.6%）	65.41（11.8%）
珠三角	广州	4115.81（15.0%）	115.50（5.4%）	1817.71（17.2%）	2182.60（13.8%）	2.81	44.16	53.03	737.67（1.72%）	56300（13.7%）	1321.96（12.5%）	1675.05（9.7%）	447.96（28.2%）	214.73（27.1%）	24.77
京津冀	北京	4283.3（13.2%）	102.9（1.9%）	1610.4（16.7%）	2570（11.6%）	2.4	37.6	60	1162.9	37058（11.9%）	2528.3（17.2%）	2191.8（14.4%）	946.6（38.2%）	205.7（21.8%）	30.8（43%）
	天津	2931.88（15.7%）	102.29（5.1%）	1560.16（19.8%）	1269.43（11.7%）	3.5	53.2	43.3	932.55	31550	1258.98（20.3%）	1052.70（14.1%）	420.19（43.2%）	208.65（45.4%）	24.72（51.4%）

表 6　三大经济圈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比重

单位：%

年份	地区生产总值	三次产业增加值			人均生产总值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进出口总额	出口	实际利用外资
		一产	二产	三产						
2003	38	14	37	50	295	34	33	77	73	89
2004	41	15	41	54	293	35	33	77	74	81

（二）三大经济圈经济增速有升有降

1. 长三角

与 2003 年比较，2004 年长三角的地区生产总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实现全面增长。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的增速降幅超过 10 个百分点，出口增速也在减缓（见表 7）。

表 7　2003、2004 年长江三角洲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年份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亿元）			产业结构（%）			人均生产总值（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2003	23796. 1	1219. 45	12992. 26	9584. 39	5. 1	54. 6	40. 3	29159
2004	28775. 42	1324. 66	16073. 39	11377. 36	4. 6	55. 9	39. 5	35040

年份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2003	10975. 18（38. 9%）	7186. 07（10. 9%）	2769. 88（56. 1%）	1413. 36（50%）	257. 93（43. 5%）
2004	13637. 93（24. 3%）	8258. 93（14. 9%）	4012. 56（44. 9%）	2083. 06（47. 4%）	298. 245（15. 6%）

从 2005 年上半年数据看，长三角 16 城市中有 13 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11 个城市的工业产值、11 个城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 个城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主要指标增速比 2004 年同期有程度不同的下降。其中核心城市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尤其明显。上海的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等指标增速全面回落。浙江 7 市增幅减缓势头也较明显，尤其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增速下降幅度较大（见表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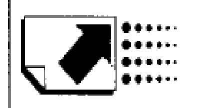


表8　2005年上半年长三角主要经济指标与2004年同期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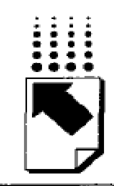
地区			上海	南京	无锡	常州	苏州	南通	扬州	镇江	泰州
地区生产总值	绝对值（亿元）	2005年1～6月	3930.64	1140	1292.42	603.19	1961.01	711.63	432.26	439.96	387.6
		2004年同期	3417.75	902.81	1094.92	507.40	1630.36	585.61	365.63	376.72	329.89
	增速（%）	2005年1～6月	10.3	16	15.6	15.3	15.7	15.9	15.2	15.1	15.2
		2004年同期	14.8	18.2	17.6	16.0	18.0	16.1	14.7	14.2	14.7
工业增加值	绝对值（亿元）	2005年1～6月	1977.94	454.11	621.28	289.70	1133.31	265.95	189.08	176.11	167.79
		2004年同期	1654.03	395.77	490.47	237.87	861.78	194.12	149.95	140.29	139.50
	增速（%）	2005年1～6月	11.7	23.0	23.4	23.1	23.5	28.4	25.6	25.5	25.3
		2004年同期	18.3	21.8	25.1	23.9	26.0	25.5	23.1	20.7	23.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绝对值（亿元）	2005年1～6月	1607.59	618.51	600.59	337.72	952.42	386.68	206.98	203.88	196.82
		2004年同期	1396.23	478.92	479.73	256.68	790.58	294.34	152.08	150.59	151.91
	增速（%）	2005年1～6月	15.1	29.1	25.2	31.6	20.5	31.4	35.9	35.4	29.6
		2004年同期	25.9	23.1	26.3	28.2	20.1	48.8	48.3	27.5	3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绝对值（亿元）	2005年1～6月	1409.3	418.64	335.00	184.76	358.16	216.26	128.99	105.57	113.17
		2004年同期	1215.08	350.48	281.59	158.31	298.87	185.13	111.51	91.05	97.52
	增速（%）	2005年1～6月	10.9	19.4	19.0	16.7	19.8	16.8	15.7	16.0	16.0
		2004年同期	12.2	19.2	20.0	16.7	19.6	17.3	15.8	15.0	15.5
出口	绝对值（亿美元）	2005年1～6月	426.62	66.76	70.47	27.37	322.18	26.45	9.04	9.07	6.1
		2004年同期	337.39	44.74	46.34	21.17	218.19	18.82	5.42	6.74	4.35
	增速（%）	2005年1～6月	26.4	49.2	52.1	29.5	47.7	40.6	66.9	34.7	40.0
		2004年同期	54.5	31	45.4	35.6	69.8	29.7	11.1	23.9	50.1

注：除上海外，其余江苏省各市均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续表 8

地区			杭州	宁波	嘉兴	湖州	绍兴	舟山	台州
地区生产总值	绝对值（亿元）	2005 年 1～6 月	1300.46	1129.2	531.65	313.35	670.99	103.81	600.07
		2004 年同期	1142	972.3	452.85	267.45	583.09	86.62	519.77
	增速（%）	2005 年 1～6 月	11.5	12.5	14.2	14.4	13.7	15.2	13
		2004 年同期	16.2	16.1	17.6	17.2	15.5	17.7	16.3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绝对值（亿元）	2005 年 1～6 月	2439.1	2136.06	938.68	479.79	1452.45	113.28	756.58
		2004 年同期	1990.95	1582.58	702.33	352.44	1100.4	81.57	568.92
	增速（%）	2005 年 1～6 月	20.4	25.2	30.2	32.5	26.6	30.4	24.1
		2004 年同期	33.2	30.3	34.3	35.9	33.6	31	29.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绝对值（亿元）	2005 年 1～6 月	454.81	548.3	288.94	194.24	313.73	70.95	194.75
		2004 年同期	450.67	469.9	286.83	158.38	307.83	51.72	190.01
	增速（%）	2005 年 1～6 月	0.9	16.7	0.7	22.6	1.9	37.2	2.5
		2004 年同期	29.5	56.5	40.3	50.2	14.5	19.6	28.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绝对值（亿元）	2005 年 1～6 月	413	327.4	175.51	116.58	187.30	48.44	168.47
		2004 年同期	343.72	285.9	155.42	102.12	165.29	43.16	146.04
	增速（%）	2005 年 1～6 月	14	14.5	12.9	14.2	13.2	12.2	15.4
		2004 年同期	18.3	14.0	16.8	14	15.1	17.6	16
出口	绝对值（亿美元）	2005 年 1～6 月	89.8	103.1				4.4	
		2004 年同期	64.6	74					16.8
	增速（%）	2005 年 1～6 月	39.1	39.3				32.2	
		2004 年同期	33.3	37.3					42.2

资料来源：各市统计信息网。



2. 珠三角

与 2003 年比较，2004 年除实际利用外资外，珠三角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实现全面增长。从增速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出口等指标出现小幅下滑（见表 9）。

表 9　2003、2004 年珠江三角洲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年份	地区（亿美元）生产总值（亿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亿元）			产业结构（%）			人均生产总值（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2003	11453.10	547.84	5962.10	4943.16	4.78	52.0	43.16	36797
2004	13572.24	596.84	7233.15	5742.25	4.4	53.3	42.3	42499

年份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2003	3749.44（27.3%）	4048.28（14.1%）	2713.87（28.1%）	1451.39（28.9%）	169.34（12.7%）
2004	4522.48（20.6%）	4598.69（13.6%）	3420.99（26.1%）	1824.29（25.7%）	121.92

与 2004 年同期相比，2005 年上半年珠三角部分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工业产值、出口等指标增速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各个城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的增长幅度普遍出现剧烈下滑。核心城市广州以及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增速减缓趋势更为明显（见表 10）。

3. 京津冀

与 2003 年比较，京津冀 2004 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实现全面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等反映三大需求的指标增速出现小幅回落（见表 11）。

二　三大经济圈的发展状况评价与趋势判断

（一）长三角：在战略调整中将继续巩固领先地位

1. 长三角经济发展面临战略转换

长三角经济增长从 2004 年出现小幅下滑，2005 年下滑趋势进一步显现，

表 10　2005 年上半年珠三角主要经济指标与 2004 年同期对比

地区			广州	深圳	佛山	惠州	中山	东莞	肇庆	江门	珠海
地区生产总值	绝对值（亿元）	2005 年 1～6 月	2103.21	1894.76	1024.50	356.3	341.30	327.31	201.13	433.01	292.35
		2004 年同期	1865.54	1525.11	741.73	299.1	281.22	195.63	236.36		254.42
	增速（%）	2005 年 1～6 月	11.1	14.0	19.5	14.2	15.1	18.0	9.4	11.6	12.8
		2004 年同期	16.4	17.4	16.0	13.6	18.8	17.3	11.4		12.0
工业增加值	绝对值（亿元）	2005 年 1～6 月	3053.55	1252.9	568.46	139.2	1031.8	831.51	31.71	150.57	143.04
		2004 年同期	2592.14	791.3	399.34	115.5	784.25	673.33	58.00		119.67
	增速（%）	2005 年 1～6 月	15.1	17.0	29.1	16.1	19.4	21.2	15.4	14.9	15.3
		2004 年同期	22.2	24.5	20.1	16.5	30.0	22.3	17.8		13.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绝对值（亿元）	2005 年 1～6 月	507.89	462.67	337.85	123.0	119.4	70.23	68.16	95.3	98.1
		2004 年同期	504.82	447.14	253.16	105.1	124.32	55.79	57.76		77.4
	增速（%）	2005 年 1～6 月	0.6	3.5	33.5	17.0	-3.96	25.9	18.0	14.8	26.7
		2004 年同期	26.1	16.7	52.1	25.0	20.04	69.1	40.0		3.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绝对值（亿元）	2005 年 1～6 月	914.12	515.90	301.04	119.8	105.76	106.63	97.36	166.94	106.23
		2004 年同期	800.86	446.97	259.62	100.8	86.42	80.99	87.75		87.12
	增速（%）	2005 年 1～6 月	14.0	15.4	16.0	18.8	18.30	15.5	14.6	11.30	16.6
		2004 年同期	12.4	15.9	14.4	16.2	15.48	14.3	11.8		14.8
进出口总额	绝对值（亿美元）	2005 年 1～6 月		758.25			85.53	151.22	7.79	41.95	112.8
		2004 年同期		639.65			72.06	134.99			97.3
	增速（%）	2005 年 1～6 月		18.7			18.7	11.9	11.9	14.7	16.0
		2004 年同期		26.8			23.7	24.1			29.9
出口	绝对值（亿美元）	2005 年 1～6 月	118.34	412.71		36.0	55.78	83.30	5.27	27.68	46.4
		2004 年同期	96.22	324.4		30.6	45.27	70.91	4.7		38.4
	增速（%）	2005 年 1～6 月	23.1	27.6		17.5	23.3	17.3	11.6	21.3	21.0
		2004 年同期	29.8	22.0		27.4	24.74	23.2	14.4		34.4

资料来源：各市统计信息网

注：东莞为一季度数据；广州为工业总产值，中山、东莞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肇庆进出口、出口总额为 1～5 月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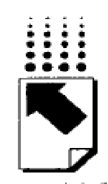


表 11　2003、2004 年京津冀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年份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三次产业增加值（亿元）			产业结构（%）			人均生产总值（元）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2003	11750.07	997.3	5396.3	5356.08	8.5	45.9	45.6	17042
2004	14118.51	1203.64	6671.43	6245.87	8.5	47.3	44.2	20263

年份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2003	5164.16（26.3%）	4691.25（15.9%）	1068.14（28.5%）	385.06（29.7%）	51.07
2004	6370.18（23.4%）	5212.38（11.1%）	1502.09（40.6%）	487.92（26.7%）	71.81（40.6%）

其根本原因在于高投入、高能耗、低技术、低效率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三角主要是以制造业基地的区域特征而崛起，且低端制造业仍然占据很大比例，其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低成本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所带来的成本和价格优势。在国家宏观调控、资源约束日益突显等相关产业环境和区域环境发生变化而导致制造成本上升时，区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不利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长三角进行战略转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长三角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首先在于创新能力的提升。长三角以制造业为主导，无论是内生型的还是外生型的，只有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才能获得核心竞争力，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提高附加值，实现可持续发展。另外，进行市场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培育自身品牌，也是增强创新能力的重要内容。

长三角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也在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与优化。长三角作为先进制造业基地，其产业结构优化不但在于提高制造业的创新水平和附加值，优化在产业链分工、产业间分工、产品分工中的地位，更要借助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发展服务业，使得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与自身制造业水平相比，长三角在相关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上存在不足，相应地也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建立在发达的制造业的基础上，并在创新能力、要素供给等方面对制造业起到支撑作用。长三角的核心城市上海，如果能在保证高端制造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地发挥区域服务中心的作用，并与杭州、苏州等次一级中心城市形成合理分工，长三角的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必将加速。

总之，如果长三角能正确地迎接挑战、把握机遇，进行战略转型，则在经历一段调整与阵痛之后，将会进入新的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

2. 长三角的扩散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进入战略转型期的长三角，从另一个角度看，意味着其聚集效应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其他区域的扩散效应将进一步显现。长三角的资本等经济要素已开始向安徽等地扩散。长三角下一步的发展将面临着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同时进行。即聚集更高级的经济发展要素，发展更高端的产业，经济增长的知识含量进一步提高；同时转移不再具备发展优势的产业，一些发展要素向其他区域外溢。扩散效应是长三角经济发展到现阶段所面临的必然选择，只要以更高级的聚集效应加以衔接，则会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这实质上是吐故纳新，经济、社会全面升级的过程。

3. 长三角仍将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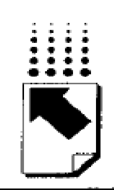
现阶段长三角是我国发展基础最雄厚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正是因为长三角是我国的经济先发地区，决定了其必将首当其冲地面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挑战。对此，长三角已经有所认识，开始了向科学发展转轨的思考。上海“十一五”规划调低了经济增长速度，确定“十一五”时期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以上，而“九五”时期为11.4%，“十五”时期预计为9～11%。市场的力量是理性的，政府的力量是强大的，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下，长三角的这一战略转型将一步步展开，并一步步取得成就，长三角仍将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二）珠三角：增长方式转换与拓展发展空间

1. 珠三角面临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转换

珠三角与长三角几乎同时走过经济增速下滑的相同轨迹。粗放型的外源型经济增长模式必然制约珠三角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珠三角以外向型的高新技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的加工型产业为主导，经济的内生性不强，建立在自主创新能力和自有品牌基础上的核心竞争力薄弱。受国家严格控制土地利用及紧缩银行贷款的宏观政策影响及国内外竞争的多重挤压，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这意味着珠三角与长三角一样，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时刻，需要尽快将主要以成本为依托的比较优势升级为主要以知识为依托的竞争优势。

珠三角的这一战略转换，首先应提升内源型经济的竞争力。发展外向型



经济，应以提高经济内生力为目标。珠三角在现有经济基础上，应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保护和激励自主知识产权、培育自有品牌。其次应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竞争力。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珠三角应提高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由此优化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位置，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珠三角应进行市场创新和组织创新，培育自有品牌，提高品牌竞争力。

2. 依托区域支撑，优化区域协作，是珠三角进一步加快发展的突破口

珠三角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与香港"前店后厂"的分工协作。与香港的一体化整合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都是珠三角赖以发展的重要形式。香港以其发达的服务业和国际城市的地位，成为支撑珠三角发展的服务中心城市。在现有的经济基础和CEPA实施的新环境下，珠三角与香港如果能实现更高层次和水平的分工，则对于珠三角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以及香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珠三角的产业高端化，如果能进一步借助香港的服务平台，开拓市场、培育品牌、优化管理、进行资本运营，则能取得较大的进展；同时，香港的服务业如果能进一步与珠三角形成合理分工，向珠三角进行梯度转移，则会有力地促进珠三角的相关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与泛珠三角其他区域的经济协作则为珠三角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广阔的领域。这将主要涵盖以下层面：丰富珠三角的经济发展资源，拓展市场，进行产业链延伸和产业转移从而优化产业结构。珠三角对泛珠三角其他区域的扩散效应将逐步显现。这既是珠三角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其向更高层次提升的契机。

3. 珠三角仍将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

珠三角依托创新的制度发展起了较发达的外向型经济，经济发展中充满了活跃的分子，这一活跃的基因将传承下去。珠三角在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等由小到大、由内向外的区域圈层中将继续逐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珠三角仍将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

（三）京津冀：把握机遇，推进南北平衡

1. 京津冀面临区域发展战略的确立和初步实施

京津冀经济圈的一体化发展启动较晚，是三大经济圈中经济联系较为松散的一个。因此与其他两个经济圈不同，京津冀不存在战略调整的问题，而

是面临区域发展战略的确立。在区域经济日益重要的趋势下，京津冀各方及国家层面日益认识到促进京津冀整合、实现协调发展的意义并开始积极推动，如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关于京津冀区域发展“十一五”规划的编制正在进行，有关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探讨日益丰富，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已开始实施，等等。京津冀的区域发展战略正在酝酿之中，并呈现出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双向良性互动的势头。

京津冀区域的发展起步较晚，如果能从一开始就进行更为先进、合理的战略选择，则会实现较强的后发优势。这一后发优势的基础，首先在于北京创新能力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的发扬，这是京津冀依托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其次在于津冀先进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优化发展，这是京津冀确立和依循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主力。

2. 滨海新区和曹妃甸工业区将成为京津冀区域新的重要发展引擎

滨海新区的进一步开发开放已被纳入国家战略，这不但对天津、对京津冀也是重要的利好。滨海新区的加快发展，意味着外向型经济、先进制造业和物流等相关产业的加快发展，对天津及其周边区域将起到有力的带动作用，并通过垂直和水平分工与北京形成有效分工协作和竞争，进一步凸现和强化北京的优势。滨海新区从而将发挥天津和京津冀新增长极的作用。

曹妃甸工业区作为临港重化工业基地，承接了北京钢铁业的产业转移，既发展了自身，也为优化北京产业结构做出了贡献。通过港口的进一步建设和产业的进一步集聚，曹妃甸工业区必将成为京津冀乃至我国北方重要的重化工业发展基地。

3. 抓住机遇，京津冀将实现较快发展

京津冀经济圈正处于历史性的战略机遇期，尤其是我国向以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转变，为京津冀下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使京津冀有理由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京津冀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拥有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北京，天津的科技创新水平也较高，只要科技创新能有效地与一、二、三产业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相融合，京津冀区域发展的道路将是可持续的、富有成效的。各方只要能够在产业、科技等经济社会的各方面实现合理的分工合作，有效竞争，形成发展的合力，京津冀必将凸显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对我国区域经济战略调整的深层思考

○ 景体华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充分肯定了“十五”的成就，全面分析了我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从战略全局出发，明确提出了我国在新世纪第二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应该说，这是综观大势，推进我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宏伟战略部署，同时也是一个新时代、新起点的纲领性动员令。

一　如何解读历史新起点

（一）视角转换：从全球战略的高度看新起点

2001 年月 12 月 11 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我国对外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同时，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显著加快。

从 2002 年起到 2004 年，外贸进出口年平均增幅达 31.5%，总额由 6208 亿美元跃升为 11548 亿美元。在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后，预计 2005 年将达到 14000 亿美元。2003 年，我国进出口额大幅度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增量或总量的主要推动力量。2000 年以来，我国的进出口增幅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特别是进口增幅有了大幅度提高，2003 年，我国进口增量占到了全球进口增量的 1/3 以上。这一年，我国外贸进口吸收了美国出口增量的 22%；德国出口增量的 28%；日本出口增量的 32%。同时，我国进口贸易的增长也大大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发展。据商务部统计，2003 年，韩国对我国出口净增 220 亿美元，拉动韩国经济增长 4 个百分点；新加坡对我国出口净增 35 亿美元，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在 3 个百分点以上；马来西亚对我国出口净增 71 亿美元，对其经济增长的

贡献为7个百分点。除此而外，据海关统计，2003年我国进口初级产品增长47.7%，占当年进口总额的17.6%。今后，进口初级产品将成为我国进口结构的一大特点。显然，这将为发展中国家扩大对我国的出口提供巨大的商机。我国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已经对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中少数最不发达国家进口产品实行零关税制度，努力带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①]

可以看到，虽然我国入世时间并不长，但是，在20多年改革开放的动力驱动下，目前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贸易大国。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提高很快。统计表明，从1980～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之间。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15%左右的外贸依存度一路上扬。商务部统计，200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2004年伴随着外贸进出口总值的大幅度攀升，外贸依存度达到了近80%，成为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应该说，这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必须注意的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飞跃式增长是和我国在全球资本的加速流动中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转移同步进行的。就是说，我国逐渐参与了全球的产业结构大调整，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没有这后一过程进行支撑，贸易大国的进出口增长都不可能实现。

据商务部测算，我国GDP虽不到世界的4%，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达到10%以上；对外贸易虽不到世界的6%，但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已达12%左右。我国正在和平崛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正在作为参与者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明显互动，说明以往“立足本国”的发展理念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理念需要进行根本转换。“全球因素”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影响因素已经急速到来。新起点意味着：我国开始进入用全球战略眼光谋划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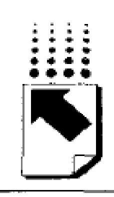
（二）新问题

1. 在国际产业布局中，我国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

在经济全球化中，“世界工厂”的搬迁，很多产业链的价值链的中、低端迁移到了我国，使我国在短短的20多年间成了制造业的大国。

---

① 《进出口总额过万亿美元：一项世界新纪录》，《经济日报》2005年10月10日第二版。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外贸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如果我们仔细调查一下我国出口强项的利润情况的话，就高兴不起来了。2004年我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有3.51美元；出口60亿双鞋，每年出口的鞋类产品约占世界销量的60%，但是，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仅有2.5美元，利润空间极小。但是，通过生产链的转移，主要资源消耗和污染链也相应转移到我国。转移国不但卸掉了消耗资源的担子，同时也不用再为污染的治理而付出。

2. 生产的资源成本过高难以为继

虽然我国早就强调要从粗放式生产转向以提高质量、减少消耗为特点的内涵式增长，但是，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时，引资区很少考虑如何以内涵式增长来进行生产，投资方要的是低成本，资源的消耗根本不予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粗放式生产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有所增强。这种趋势给我国造成的高消耗和高污染带来严重的恶果。

2004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们通过大量的对比分析，得出了一个让人们触目惊心的结论：我国是世界上生产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以2001年为例，我国单位产出能耗比单位产出能耗较高的美国高出2.3倍，比单位产出能耗较低的日本高出5.1倍，比韩国、马来西亚等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58%。钢铁消耗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资源消耗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这份研究，我国单位产出的钢铁消耗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9倍，是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家的两倍以上。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不到世界的5%，但煤炭消耗约占世界的30%，电力消耗占13%左右，钢材消耗占25%，水泥约占50%。我国是世界上单位生产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世界上生产过程中浪费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测算：近20年来，我国以能源消费翻一番为支撑，实现了GDP翻两番的目标[①]，这一经济成长的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没有走出粗放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面临能源以及其他自然资源不足的困扰。国家宏观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指出，根据前两年经济运行的经验，我国GDP年度增长超过9%，季度增长超过9.5%时，资源等各方面就会面临较大的压力；煤、电、油、运都会出现紧张，资源品市场供求失衡；货币信贷扩张过快，通胀和金融风险的几率加大。分析各方面数据表明，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资源背景下，若要实现

① 《切实转变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经济日报》2005年7月4日第四版。

GDP的9%以上的增长，必须有25%左右的投资增长；16%左右的工业增长；再加上200~300亿美元的净出口支撑。而长期这样下去，国内和国际市场都难以承受。①

应该说，目前的“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是以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支撑的。生产方式是粗放型的，贸易方式也是粗放型的。生产和出口部门已经清醒意识到，靠低端产品的制造的低价优势扩大出口规模，以量取胜的生产和外贸增长方式，在新的世界环境下已经难以为继。种种贸易争端且不说，我国成为世界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产品的主要生产国、贸易大国的同时，也必将成为最大的资源消耗国和环境污染国。显然这不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所能接受的，因为我国公民既不能用掉多代子孙的应有资源，也承受不了污染的困扰。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我国的资源进口也越来越多。我国已经成为国际用油大国，21世纪的能源紧张形势，使很多国家在惊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也注视着国际资源品市场中我国需求的迅速加大。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不再是只有本国人关心的事。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束，越来越显著。为了支撑较高的速度，正如温总理所说，“近年来，我国石油、矿产等重要资源进口越来越多，对国外市场依赖程度越来越大。过多地进口资源，不仅耗费大量资金，而且会加剧国际市场供求矛盾，带来一系列经济、政治、外交方面的问题。”② 世界各国的关注将使我们更理性。

21世纪是全球能源紧张的世纪，我国不能不从长远角度更深刻地考虑未来的经济发展。为了我国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我们也必须控制和降低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

3. “制造业大国”面临的尴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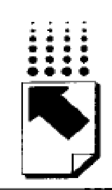
“制造业大国”当然不能永远甘心充当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但是，事实上我国重要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都遇到了发达国家的技术阻断。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流被高端国际竞争截住了。

以上海宝钢为例。2005年9月17日《中国矿业报》报道：上海宝钢集团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已经为全球钢铁业界所认可。随着进入全球钢铁业核心竞争圈的步伐，宝钢越感到“向国外购买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困难”。显然，

---

① 《瞭望》，第27期。

② 《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经济日报》2005年7月4日第四版。



国外相关企业和技术公司已经开始对宝钢实行技术限制。实际上，宝钢所遭遇的技术“买难”，是我国大型企业在提升国际竞争力中都会遇到的问题，虽说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是当产品处于低端，我国企业还不足以成为世界上领先企业的竞争对手时，世界向我国的技术转移流量尚较为充足。然而，一旦中国企业产品结构升级，竞争层次递升，技术流量就会收缩，特别是核心技术则被阻断。宝钢在 2005 年我国大型企业排行榜上居首位，目前已经从技术引进、技术跟随过渡到局部“领跑”的阶段，如果不能在重大原创技术的研发和集成上取得根本突破，打破行业高端技术“买难”的话，我国的钢铁业将永远不能成为世界第一。

仅此一例还不足以说明技术流阻断在我国发展中的利害关系。据新华社报道，我国的医药生物技术领域，几乎所有药物专利均为发达国家所拥有；DVD 行业，大批企业因交不起国际专利费而倒闭；汽车制造领域，真正的国产车仅占 10%……

实践证明，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我国不甘心仅仅把“世界工厂”搬过来，成为一个中、低端产品的制造业大国的话，我国企业由对国外的技术依赖转向原创技术的自主研发与创新就是必由之路。从我国目前的发展情况来说，紧紧抓住对国家经济、科技、国防、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集中攻关，大力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在引进基础上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闯出一条以自主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之路，已经时不我待。

(三) 新起点的“国家战略”

2005 年 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时强调：科技进步和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在我国的发展中，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8 月胡锦涛总书记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行了调研，反复强调，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应该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已经从科技发展层面提升为我国未来的重大国家发展战略。

这一“国家战略”要求今后 15 年我国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四个支撑，即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提高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

从以上战略性的应对思路可以看出，建立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不是仅仅靠维持目前的增长方式，从身边点滴节约与环保就可以实现的。生产方面由于不恰当的组织而导致的不合法生产、过剩生产、高能耗生产等造成的浪费；忽视由于投资失误、决策失误而导致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而正是这些"浪费"，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是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最大障碍。应当明确，要实现建立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首先要做的就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型、粗放型向集约型和效益型的转变，实质上是站在更高层面调整经济结构的问题。这是推进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根本举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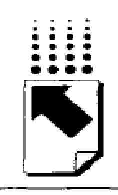
从经济运行上说，全国进入了"微调期"。但是，从调整的思路上说，正在经历一个大的转换。依靠物质资源投入量增加实现的"传统增长方式"已经不能适应。通过持续地提高经济活动的品质实现经济增长提上日程。"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确定了具体的主要目标：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 201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时期末降低 20% 左右。应该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就是提高经济活动品质，完成以上目标的根本途径。

二 "京津冀"区域发展新机遇

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在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调整等十点重要内容中，把区域发展问题放到了重要位置上，而且京津冀地区作为中央级层面上的先行试点区也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改革开放 20 多年以来，以深圳等经济特区为基础，浦东开发为引导，珠三角、长三角已迅速跃升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两极"。以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国家级战略开发重点，京津冀区域将以什么样的战略构思改变我国"南高北低"不平衡状况，开创我国发展的新格局，不仅天津要运筹，北京也要深刻思考。

观察家认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是继 20 世纪 80 年代开发深圳、90 年代



开发浦东之后，又一个区域开发的重大战略举措，将掀起沿海经济开发、开放的第三波高潮。他们认为，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天津滨海新区将与浦东、深圳一起，形成中国沿海北部、中部、南部三大具有相似战略功能的"极点"。正如深圳对于珠三角经济带、浦东对于长三角经济带的战略牵引作用一样，天津滨海新区也将牵引"京津冀"城市带成为振兴环渤海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我们认为，可以这样展望，但天津滨海新区牵引的战略途径却不能重走深圳对于珠三角经济带、浦东对于长三角经济带的老路。在天津滨海新区的新一轮开发、开放，以及对"京津冀"的发展牵引中，北京不是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重要主力队员。北京在战略上不仅要"助力"，也要"借力"，并且要以这一"助"、一"借"，在支撑"京津冀"快速崛起、振兴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同时，完成自己的腾飞。

三　对发展先行者难题的思考

（一）珠三角

1980 年，国家正式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 4 个经济特区，1988 年又增加了海南省。在经济特区的带动下，珠三角成了我国最先快速发展的地区。珠三角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胆、最成功的尝试，就是在与港澳以及东南亚紧密联系，着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直接参与了国际产业链的调整与循环。但是，这种模式的三个倾斜，却在战略上出现了急功近利的偏颇。

（1）引资主要是来料加工模式，相当于"世界工厂"或"世界工厂某车间"的搬迁，既没有紧紧抓住引资的本地消化与孵化再创新，也没有考虑国内需求与市场，以外向型经济步入了国际产业链条之中。

（2）"世界工厂或车间"的搬迁，承接的是国外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在我国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下，依赖从农村走出来的大量廉价劳动力，维持低成本，以"赚我国人工的钱"崛起。

（3）在生产上，依赖粗放的增长模式，发展轻工业。多为低投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高消耗、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形成了依靠政策优势与地理优势，以低成本为基础的产业集群。

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急功近利"，却支撑起了珠三角地区快速地崛

起。由于全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有三个在广东省，广东创造了持续25年的经济高速和快速工业化；深圳也由一个边陲小镇一跃而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工业都市。但是，近年来在政策与地理优势逐渐弱化的情况下，能源不足、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贸易摩擦不断等困扰开始出现。这四大困扰的制约突显，使得珠三角的发展速度已经不能再“一马当先”，逐步形成了落后长三角之势。

2004年初，“民工荒”以对低工资的警示，敲响了对珠三角模式的警钟。外资投资的热点也从珠三角向北、向西转移。随着对人流与资金流积聚力的弱化，珠三角的转型迫在眉睫。

2003年11月，广东率先提出了“泛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合作概念。2004年6月，相关地区政府领导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泛珠三角区域的范围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个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内地9省（区）的区域面积为全国的1/5，人口的1/3，经济总量的1/3。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显然，泛珠三角区域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十分突出。

“泛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合作十分重要。但是，对于珠三角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全球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中，加速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国际产业链的大调整中再创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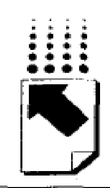
（二）长三角

珠三角突进在前，长三角崛起在后。但是，长三角的优势恰恰在于克服了珠三角的某些偏颇。

首先，长三角没有走单纯外向型经济的路子，而是以开放型经济，广泛引资，同时克服了“重引进、轻消化吸收”的弊病，以面向国内外两大市场为动力，实施外资在本地的进一步孵化与植根。

其次，在“世界工厂或车间”的搬迁中，注重承接国外产业的某些中端技术链，从而在整个价值链中也不再是以最低端为主。

再次，不再是主打轻工业，更注重装备制造业，价值链分工中得到提升。低投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增长模式亦有所改变。一个高于珠三角产业集群，层次不同的新的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形



成，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强劲支撑和竞争力的源泉。

长三角同样抓住了全球制造中心向中国转移的机遇，但是由于时间靠后，起步点提高，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分工亦愈加明显。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看，如果要做鞋或玩具，就会把工厂设在珠三角；如果是做芯片等技术型的产品，工厂将会设在长三角。要改变这种定格态势难度较大。

但是，“长三角制造”也没有走出粗放增长方式所带来的重复同构、产能过剩的困扰。“十五”期间，“长三角”由一个单纯的经济地理概念逐渐变成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整体经济区域。然而，从行政壁障中走出到构建区域的产业分工梯度层次，还有相当的难度。目前，同质竞争现象愈演愈烈，制造业结构雷同已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最大难点和障碍。数据显示，92%、86%、78%，这3个数字分别代表目前江苏、浙江、上海之间产业同构的比例。水泥、钢铁、化纤等产业在“过剩危机”的压力下，小企业纷纷倒闭，大企业如履薄冰，长三角的经济数字开始全面下滑。

珠三角、长三角蹒跚的脚步，记录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崛起历程。现在来看他们是怎么走的，从总结的角度可以敞开地“说三道四”，从战略高度完全应该清楚，不能再重走他们走过的路。但是一定不能忘记，我们今天的新起点正是通过他们的实践总结出来的。

四 “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战略转型

近年来，京津冀经济区域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和珠三角、长三角相比较而言，对外开放相对滞后，区域合作进展不大，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带的形成。当前，在经济全球化新态势下，京津冀经济区域的改革开放和进一步开发正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1. 高起点

所谓不重走珠三角、长三角过去20多年的路，是因为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我们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为了应对各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并以重大战略构想，破解发展难题。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是在战略思路、制度、体制、机制全面建设上的落实。正因为如此，“十一五”京津冀区域发展的起点就是总结珠三角、长三角20多年改革开放经验、更上一层楼的新起点。

在这个起点上，我们将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积极参与全球产业

结构的大调整。但是我们将不再是“世界工厂”的高消耗、高污染的价值链低端的迁入地。在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将得到大幅度提高，我们将摆脱资源的高消耗、高污染，从“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向“制造业强国”和“贸易强国”迈进。

这一高起点，决定了京津冀区域崛起的基本思路和途径。

2. 以新理念引导投资北上

国际产业转移的步伐正在加快。外商投资出现了北上西进的趋势。如何引导外商投资北上，参与京津冀的开发与建设，从理念上说，以下三点是基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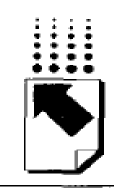
（1）要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高度，明确现代服务业的战略地位。抓住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机遇，注意引进先进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目前发达国家首先转移的是服务业的低端，我们在引进时可以通过优惠政策有所选择。

（2）从趋势来看，已经在我国落地的制造业，为了扩展中国市场，与这些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进入较快。充分调动企业这支主力，积极引进，并在消化吸收上下功夫，进行再创新。

（3）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靠引进是不行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是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是科技竞争力的源泉。在当今世界科技革命迅速发展，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越来越快的情况下，原始创新对于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已经日益重要。京津冀区域除了技术引进，还要注意向原创型技术创新升级，特别是对国家经济、科技、国防、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前瞻性的重大战略性产业上，建立国家或区域创新工程，培育良好的制度环境，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开放式攻关体，集中攻关，在有可能在技术革命上出现突破的领域，比如生物技术，采取整体跟进，局部突破的战略，逐步摆脱战略产业受人钳制的局面。我国航天工程的创举，在战略产业的发展上很值得总结、学习。

众所周知，京津冀区域全国顶级的科研院所、大学多，京津冀区域的国有大企业多，也是事实。如果能够整合京津冀区域产学研的实力，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一两个战略领域，通过自主创新掌握世界前沿核心技术，造就几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名企业和品牌，京津冀区域对国家崛起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将插上腾飞的翅膀。

京津冀区域有实力进入国家队，成为原始创新的主力队员。当然，要做



到这一点，改革、制度与机制创新的难度都很大。在启动阶段，政府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应该看到，抓住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在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型向自主创新型的转变中，如果京津冀区域的步子迈得更大些、更有力些，必将掀起改革开放的北方潮。

3. 新思维：产业大融合与“类航天创新工程”计划

首先要注意的是，新型服务业正在对生产方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新型服务业的服务活动，服务产品寓于服务之中，技术服务提升产品。这种产品不仅仅是制造业产品，农业产品也需要科学与技术服务。所以现代服务业正在走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大服务。

产业融合发展意味着部门间业务的交叉、市场交叉，不仅打破了原来的分工界限，相互介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在新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上，创造了更有效的作用方式和路径。

产业融合正在加速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在这一变革中，新型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正逐渐成为主导和支配经济增长的力量。如果我们以前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往往找不到其实现的具体途径的话，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融合，其蓬勃发展的实践，正在详细地诠释这一论断的实现路径。

目前，从产业结构上看，由于北京的第三产业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所以京津冀区域是第一个实现“三二一”结构的区域。应当抓住这种优势，在产业融合上下工夫，率先走出新型工业化的中国道路。

通过什么路径来实现这种愿景？建议借鉴法国的“竞争力极点”计划和我国的“航天创新工程”。

法国是经济实力居世界第 5 位的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竞争加剧。出于提高世界竞争力考虑，法国政府正在推行“竞争力极点”计划[①]。

所谓“竞争力极点”计划。是指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企业、培训中心和研究机构以合作伙伴的形式联合起来，共同开发创新项目。以期在核心因素方面加强比较优势。这是一种在危机意识下制定的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从“竞争力极点”计划实施的具体情况来看，该计划确实抓住了目前提

---

① 《法国力推“竞争力极点”计划》，《经济日报》2005 年 9 月 30 日第八版。

高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法国领土整治和发展部际委员会2005年夏天向67个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项目授予“竞争力极点”标签，比如欧洲空中客车总部所在地图卢兹市及周边地区就被命名为航空工业的“竞争力极点”。该委员会承诺，自2006年起，3年内，政府将为项目提供15亿欧元的资金支持，以提高法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对项目的选择十分重要，王牌产业是首选。王牌产业依托创新“极点”将使其竞争力发挥到极致。同时也要考虑有潜在竞争力，有培育前景的地区，因为这毕竟是围绕创新项目，企业、培训中心和研究机构的一种合作联动与集聚，是产业的高度融合。

据报道，欧盟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内，将欧洲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竞争力和知识经济领先的地区。2005年3月的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会议，对法国的“竞争力极点”计划给予充分肯定。法国推出的“竞争力极点”计划是要为整个欧洲工业创新提供一个以科技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样本。

法国有“竞争力极点”计划，我国有“航天创新工程”。我国的航天工程，就是集中了全国多个科研机构完成百多项自主创新，多个企业完成几十万个构件的情况下，完成了“神六”载人航天，走在了世界前列。

京津冀区域为什么不可以培育一个以科技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类航天创新工程”计划呢！没有突破性的战略设想，也就不会有突破性的战略行动。五中全会为我们的战略构想提出了纲领性指引。

4. 京津双核的“不同梯度、协同竞争”

在京津冀经济圈中，北京和天津为双核。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京津将形成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双高地。北京主要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将成为中国的国际管理和控制中心型的国际节点城市；天津以现代制造业和国际航运物流疏散枢纽为支撑，成为区域性的节点城市。两大城市各以不同产业为主导，在产业融合上的空间相当大。应该说“不同梯度、协同竞争”将是京津双核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的主旋律。

高起点、新的战略思路，不仅会掀起改革开放的北方潮，珠三角、长三角的战略步伐也会有大的变化。预计区域战略的调整，改变的将不仅仅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也将支撑我国综合竞争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观

○ 黄海峰　马弘毅

中国实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呈现出不同的转型特点。从中国经济区中，东、中、西“三大部”分别实施的梯度推移非均衡发展战略中，一些区域的地区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是区域之间经济关系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区域之间经济差异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为此，研究中国区域经济的现状和相关理论，将有助于探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政策选择。

一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概况

中国经济近20年持续高速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以满足人民需要为主要内容，以大工业为手段，大规模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新阶段。[①] 中国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模，促进了区域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之间的产业转换，呈现出多层次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推动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②]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基本特征：

1. 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根据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划分，将全国划分为三个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② 梁水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成就、问题及战略》，《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第20~21页。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其中，第二、三产业单位半数以上集中于东部地区，单位拥有量自东向西呈递减态势。东部地区拥有法人单位近290多万个，占56.3%；中部地区119.3万个，占23.1%；西部地区106.6万个，占20.6%。2004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中，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占72.5%、16.8%和10.7%。东、中、西部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分别占全国的76.4%、14.2%和9.4%。在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的建筑业总产值中，东部地区19736.0亿元，占63.7%；中部地区6281.7亿元，占20.3%；西部地区4980.7亿元，占16.1%。以上数据，说明了这三个区域经济呈现出较大的非均衡发展，具体可见图1。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制造业及资源型行业得到重点发展，忽略了第三产业、基础性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区域经济创新性的发展，许多区域中行业的竞争力下降，各个区域行业发展也出现了雷同化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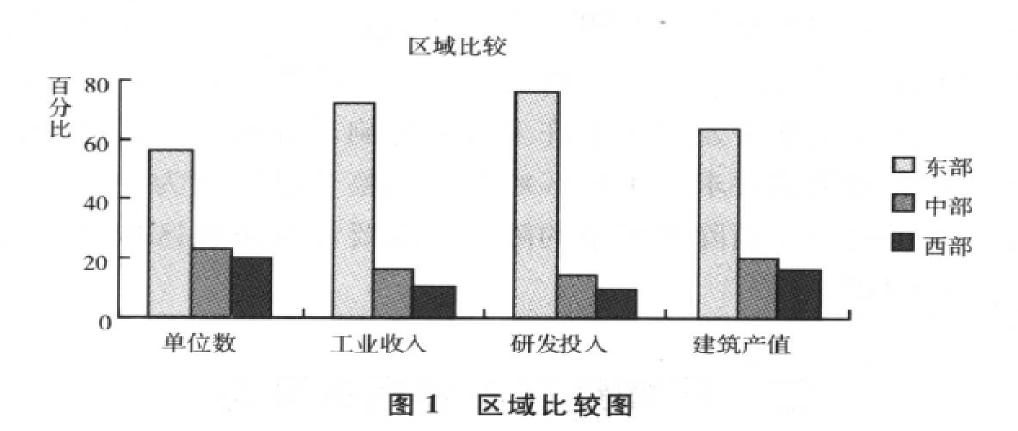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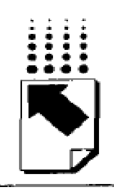
图1　区域比较图

数据来源：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经济网，2006年，http://www.ce.cn/new_hgjj/pucha/index.shtml.

2. 区域经济的互动性较差

中国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区域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GDP占到全国总量的37%，其中长三角地区占全国GDP的比重超过了20%，这些区域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极，的确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宏观发展。① 其中，长三角经济区域是目前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域则分居其次，形成了长三角以投资推动和私营主导下

① 沈叙健："2005年长三角16城市峰会"大会发言，2005年10月。



的高科技及知识密集产业；珠三角是以外资推动和出口拉动的劳动力密集产业，环渤海是以内需拉动和国企主导的资本密集产业这三种不同的区域经济特征。但是，由于区域之间的经济互动性较差，针对区域间技术成果扩散滞后，资源信息缺乏共享，良性竞争机制尚未健全的发展障碍，各区域地方政府已经采取部分措施，推动了“泛珠三角9+2”计划、“振兴东北”计划和“长江卫星经济区”开发模式。

3. 区域经济的差距扩大

中国区域经济在非均衡发展过程中，造成地区间的经济差异日益扩大，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地、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拉大。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西部虽然增长很快但与东中部还有很大差距；从人均生产总值来看，相对差距在缩小但绝对差距在扩大；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差距不但很大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变化趋势一样，且状况更为严重；西部城镇化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经济发展外向程度来看，西部外贸依存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在利用外资上表现出很大的差距。尽管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性始终客观存在，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针对中国区域经济技术转移、扩散、产业升级的要求，中国区域经济的整合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为了进一步消除发展中的障碍，需要尽快正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问题。

二　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理论

在本文中，将根据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借鉴区域平衡增长论、区域不平衡增长论和区域阶段发展论，提出具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特征的相关政策。

1. 区域平衡增长论

区域平衡增长的主要涵义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行业和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增长，主要包括赖宾斯坦（H. 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纳尔森（R. R. Nelson）的低水平陷阱论、罗森斯坦和罗丹（P. N. 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论，以及纳克斯（R. 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按照罗森斯坦、罗丹和纳克斯的观点，平衡增长是通过国民经济各部门同时大规模投资来实现的。平衡增长战略通过一定规模投资打破发展中

国家的贫穷恶性循环，为部门和行业的发展创造较好的外部环境，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外部经济效益和各部门之间相互关联和补充的性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①]

2. 区域不平衡增长论

区域不平衡增长论认为增长过程在实质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论有佩鲁（Perroux）的增长极发展理论、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和赫希曼（A. O. Hirschman）的依附理论。这些理论均强调，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区域发展之间的差距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因为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所产生的"极化效应"或"反吸效应"和"报酬递增"，将促使资本、劳动和产出在一定区域的循环积累，而其所产生的"涓滴效应"或"扩散效应"以及政府的转移支付只能将区域差异保持在一定限度而不足以促进区域收敛。因此，不均衡增长理论认为，"只要总的发展水平低，市场力量的自然作用在任何时候都将增加国内和国际不平等"。[②] 要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依赖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周密的经济政策，如在落后地区建立"增长极"和"增长中心"以启动这些地区的发展，培养其自我发展能力，然后利用市场力量实现这些地区的积累增长。

3. 区域阶段发展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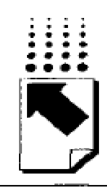
（1）倒 U 形理论（Reversed U-Shaped Theory）

1965 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J. G. Williamson）把库兹涅兹的收入分配倒 U 形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区域经济差异的倒 U 形理论。他通过分析 24 个国家的国际横截面数据和 10 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认为国内不同发展阶段区域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地区间收入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大致呈倒 U 形。他指出，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间增长的差异将会扩大，即趋于不均衡增长。随着经济增长，区域间不平衡程度将趋于稳定；当国民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区域间增长差异则趋于缩小，即倾向于均衡增长。

图 2 中的 A 点是经济起飞期的起点；A ~ B 阶段为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少数区域由于拥有优势区位或某种优势资源而得到优先发展，区域差距呈扩

① 焉香玲：《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哈尔滨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 年第 1 期，第 34 页。

② G. Myrdal（1957），*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London：Duckworth，p.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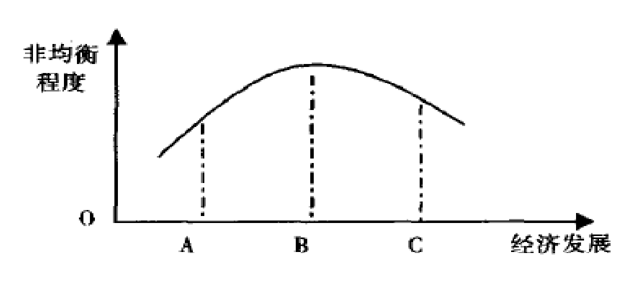


图 2　倒 U 形模式图

资料来源：J. G. Williamson（1965），Regional Inequalities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No 13：p. 1 ~84.

大之势，但在接近 B 点时，区域差距扩大速度放慢；至 B 点，国民经济开始转向成熟，区域差距会递减。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倒 U 形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成非线性变化。

（2）钟形发展理论（Bell Shaped Theory）

1980 年，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阿朗索（W. Alonso）提出了“钟形发展理论”，引入了描述经济发展过程的变化次序模式—钟形模式（参见图 3）。在发展初期，国家的增长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即使在某一区域内，以各人口组所占财富比例来衡量，社会不平等也很突出。由于某一个或几个城市增长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长早期的特点。在经济发展过程的某一点上，增长达到转折点，社会与区域不平衡和地理集中的趋势达到高峰，而转折期意味着全国经济一体化。在国民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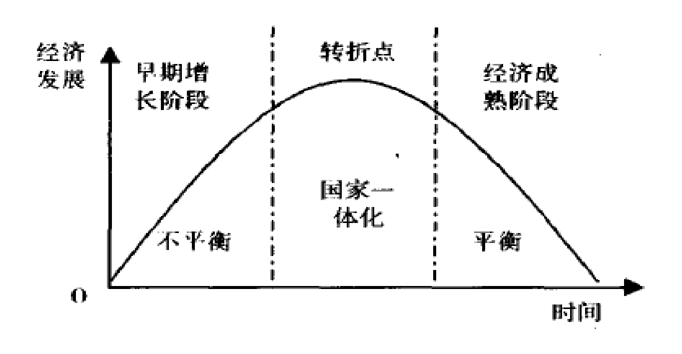


图 3　钟形模式图

资料来源：W. Alonso（1980），Five Bell Shaped Curves，*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Vol. 45：pp. 5 ~ 16.

资本和劳动力更具流动性，从而导致区域增长趋于平衡，城市化更为普遍，不局限于少数大中心。国民经济成熟期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社会不平等减少，区域收入趋于平等，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人口规模增长。

4. 对上述理论的评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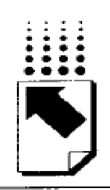
在区域经济理论中，区域平衡增长论与区域不平衡增长论似乎是尖锐对立的两种发展战略，但实际上它们的差别是表面的。平衡增长强调产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发展会带来外部经济效应，着眼于投资结构合理安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于经济长期协调发展是正确的，但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期缺少实施平衡增长的资源条件这一关键性因素，从而脱离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经济发展就是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的对立统一运动过程，将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论与区域发展阶段论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威廉姆森（J. G. Williamson）、库兹涅茨（S. Kuznets）的倒U形理论、阿朗索（W. Alonso）的“钟形发展理论”、赫希曼（A. O. Hirschman）的依附理论都认为区域差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而变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收入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但发展到某一点之后，区域收入差异又明显开始缩小。在经济起飞初期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距，此时完全靠市场的作用不能消除区域差距，必须进行政府干预，而经济发展到成熟期时，产业基础和资源条件给平衡增长创造了条件，市场机制最终消除区域差异，这实质上是一种有时间变量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它将均衡成长与不均衡成长统一于同一过程，并通过扩展效果和滞后效果的互动实现。根据梯度推移理论，其梯度形成原因在于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换言之，区域经济发展从区域差距开始，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最终又将消除梯度差异。

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区域经济状况，正处于区域差异较大，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正在不断扩大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政府应该继续保持对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干预，制定合理的区域政策来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为经济走向成熟期奠定基础。

三　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战略选择

弗里德曼（J. Friedmann）认为，“区域政策处理的是区位方面的问题，



即经济发展‘在什么地方’，它反映了在国家层次上处理区域问题的要求，只有通过操纵国家政策变量，才能对区域经济的未来作出最有用的贡献”。[1]从区域经济的理论演进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的区域政策在宏观层面上进行了不断转型。具体而言，其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先后经历了三种不同的战略：①均衡发展战略（1950～1978年）。即充分利用沿海，实现国家工业生产力的均衡布局。新中国刚成立时农业比重大，工业生产严重不足，属于现代工业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10%左右，并且70%集中在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带，许多产业之间不配套，根本不能形成产业链。为了迅速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产业布局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国家利用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全国的资源，重点对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这一战略持续了约30年时间。②非均衡发展战略（1979～1999年）。即优先发展沿海，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富裕。上世纪70年代末，从国际上看，中国的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和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导趋势，中国与美、日、俄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得到改善；从国内看，中国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借鉴各国区域开发的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调整。主要表现在政策目标由过去的追求区域平衡发展转向以效率为中心的区域的非均衡发展；开发的重点区域由过去的中西部地区转向沿海地区；政策工具由过去的单一的指令性计划下的国家投资转向投资主体多元化，特别是地区开发的制度创新和差别性的地区开放政策，体现了国家的非均衡发展思想，这一时期大约持续了20年，根据区域政策重心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以经济效率为重心的发展阶段（1978～1990年）。在这个阶段政府认识到原有经济体制下生产力均衡布局思想的束缚，由于区位条件、产业基础、投资效率等因素的差异及资源因素的约束，使得全面均衡发展的状况不可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实现。按照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区域的发展也应该是有层次、分阶段逐步进行的。在现有资源前提下，政策选择先行发展具有绝对优势或具有相对优势且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重点地区和重点部门，优先发展那些具有较强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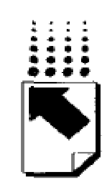
---

① J. Friedman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The Story of a Collaboration,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Vol. 24 No. 3: pp. 386～395.

优势的地区，以取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增长速度，并通过这些地区的发展及其扩散效应，来带动其他区域的共同发展。其二，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的发展阶段（1990～1999年）。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战略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随着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差距的逐步扩大，1990年以后，梯度转移的区域发展战略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内陆地区与周边国家发展的贸易关系而产生的新的机遇；能源与原材料供应的不足迫切要求加快中西部的资源开发；各地方政府受经济利益驱使而造成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日益严重等问题，使得区域政策的宏观背景已发生转变，政府在考虑经济增长提高效率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公平问题，并开始着手从总体上解决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关系，根据全国统一市场和从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出发调整政策，以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实行地区倾斜与产业倾斜政策相结合的方式，在继续发挥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增长优势的同时，逐步促进中西部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③注重公平的协调发展战略（2003年～至今）。即通过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东西互动拉动中部，逐步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发展。经过20多年的对外开放，顺应全球制造业转移的趋势，以及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东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仍然在逐步拉大，解决东西部的差距，实现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政府制定区域政策的立足点，也即区域政策的重心放在了区域之间的公平问题上。

总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在动态的均衡—非均衡—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框架下，经历了四次调整。第一次调整是在1980～1992年对广东和福建实行特殊和灵活的政策和措施，其结果使珠三角成为优势区域；第二次调整于1990年的浦东开发，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重心地带；第三次是始于1999年底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收效甚微；而在2003年，东北三省和华南经济圈成为优先突破的区域，收效较为显著。[①] 针对中国区域发展的特点与区域政策重心的演变，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为此，本文提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应该遵循的四

① 见颜鹏飞、阙伟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区域协调型经济增长极》，《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个发展观。

第一，协调发展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十一五”规划的六大重点之一，政府应该维持并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宏观区域发展战略，使协调发展战略不仅符合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客观要求，而且更符合中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水平的需要。为此必须突破地区发展战略的误区，改善发展全国的区域意义上的发展战略，更好地从宏观上处理区域发展关系，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

第二，和谐发展观。政府应该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区分不同区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在兼顾整体协调发展的前提下，提出各自的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通过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可持续发展区划方法，做好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区划，从而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社会的和谐，并根据国际社会责任理论，建立各个区域之间的区域、社会和个人的相关责任体系，引进国际上标准化管理体系，来制止区域间的恶性竞争，努力做到“十一五”建议指出的“切实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第三，互补发展观。政府应该实行新的区域经济战略布局，促进区域经济整合，积极构建泛长三角、泛珠三角及大环渤海都市圈，重点寻觅和培育区域协调型增长极，明确经济中心，打造经济区，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有效发挥中部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使区域之间优势互补，统筹各区域整体发展，逐步形成东中西经济互补、南中北经济联动、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

第四，循环发展观。政府应该使区域发展战略着眼于未来的中国区域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紧密联系世界经济变化的客观趋势，适时进行调整和修改，并全面系统考虑区域政策的制定，使区域政策的制定更加市场化和地方化，同时注重产业内部升级和循环模式的构建，一方面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另一方面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要遵循区域经济理论指出的区域经济发展始于区域差异并将最终终结区域差异的特点，使区域战略与政策能保证区域经济循环增长。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经济发展必须经历不同阶段，而在每个阶段区域之间的互动与发展以及区域差距是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国家的政策变量要符合自身的发展特征与所处阶段，简单地说，现阶段应该坚持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着眼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和谐、互补与循环四个发展观，

逐步控制区域差距，促进区域经济整合，加强区域间互动，为经济向下一个阶段的平稳较快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Rostow, W.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iedmann, J. (2001):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The Story of a Collaboration,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Vol. 24 No. 3: pp. 386 ~ 395.

Alonso, W. (1980): Five Bell Shaped Curves, *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Vol. 45: pp. 5 ~ 16.

Myrdal, G. (1957):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London: Duckworth.

Williamson, J. G. (1965): Regional Inequalities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No 13: pp. 1 ~ 84.

Hirschman, A. (1974):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A Reader, Cambridge*: MIT Press.

安虎森：《区域发展理论研究》，东北朝鲜民族教育出版社，1996。

罗勇：《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化学工业出版社 & 环境科学与工程出版中心，2005。

梁水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成就、问题及战略》，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3 年第四期。

唐靖庭、程传海：《二元结构下的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开放导报》，2004 年第二期。

权衡：《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97 年第六期。

焉香玲：《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哈尔滨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 年第一期。

程保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三大战略比较研究》，《经济评论》，2001 年第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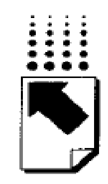
李新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转换的政策取向及效果研究》，《经济经纬》，2003 年第一期。

江浩：《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进和布局调整》，《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5 年第三期。

刘乃全、郑秀君、贾彦利：《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政策演变及整体效应研究》，《财经研究》，2005 年第一期.

颜鹏飞、阙伟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区域协调型经济增长极》，《云南大学学报》，2004 年第四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other4349/4456/20010228/405437.html），检索日期：



2006年1月4日。

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new_hgjj/pucha/index.shtml），检索日期：2006年1月4日。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中心）

区域旅游合作

——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的比较与对策研究

○ 邹统钎　张昕玲　宋　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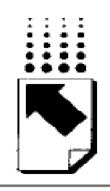
一　京津冀——长三角地区旅游合作现状比较

上海和北京作为中国的两个超级大都市，自身的旅游发展速度都很快，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却相差较大，长三角旅游合作明显优于京津冀。

长三角经过二十年的合作，旅游发展走向了良性循环，而京津冀地区的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据统计：2004 年京津冀两市一省的生产总值为 1.6 万亿元，尚不及长三角的一半；2004 年长三角地区接待境外游客的数量是京津冀地区的 1.8 倍，接待国内游客人数是珠三角的 1.6 倍；创造的旅游收入则是珠三角的 1.3 倍，京津冀地区的 3 倍。其原因主要在于长期以来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不畅，北京对京津冀地区的拉动效应未能充分发挥（见图 1、2）。

（一）京津冀地区旅游合作滞后

京津冀地区旅游合作较为滞后。区域合作的概念已经提出数年，直到 2004 年的“5·18”“中国三大旅游圈论坛”上，京津冀才初步达成了“京津冀无障碍旅游共识”。“共识”的内容包括：在区域间、政府间、企业间建立无障碍旅游合作机制，力求资源共享；为发挥各自优势，不断加强合作，建立旅游磋商机制，每年定期不定期就大家共同关注的旅游发展问题进行磋商；逐步打破旅游市场中的种种壁垒等。但是其合作还主要是重形式、重研讨，许多观念还停留在地区旅游行政管理层面上，缺乏具体的、可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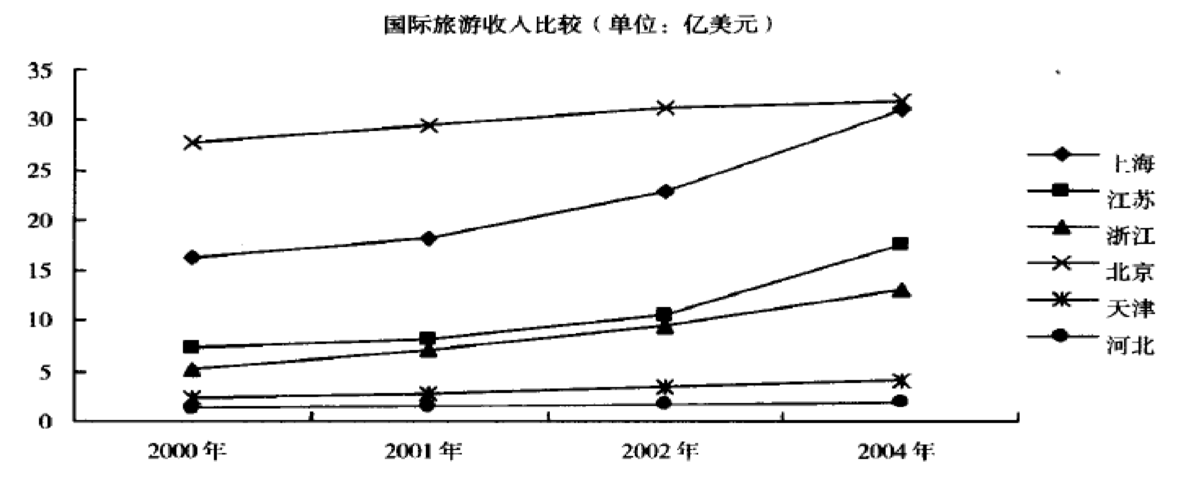


图 1　京津冀 - 长三角地区国际旅游收入比较（2000 ~200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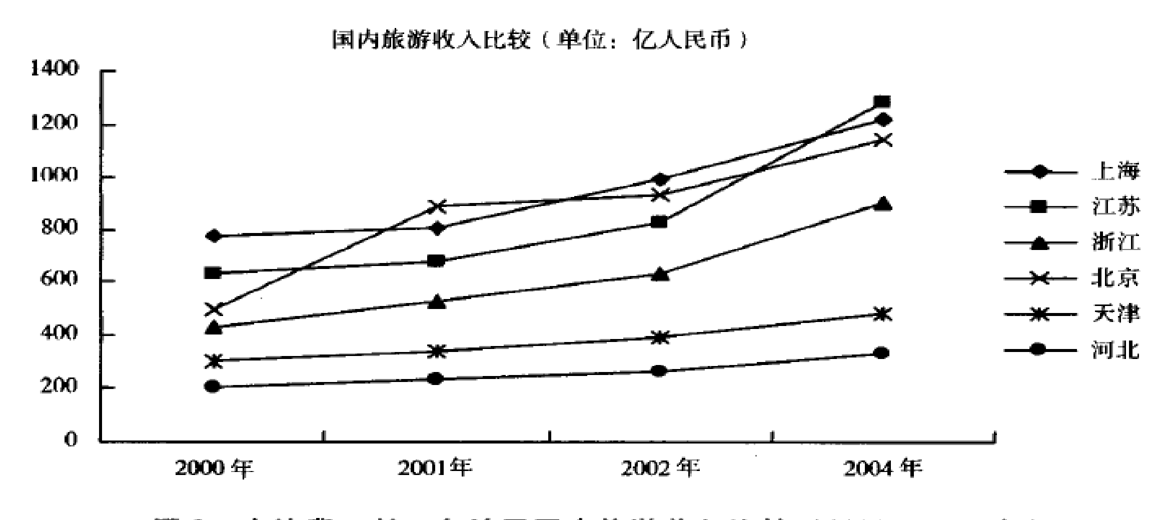


图 2　京津冀 - 长三角地区国内旅游收入比较（2000 ~2004 年）

性的政策、措施和手段。京津冀各地区旅游发展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见图 3、4），形成区域内北京旅游独大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速度发展缓慢，京津冀三方各自为政，优势无法互补，劣势无法克服，使整个区域内旅游资源严重浪费，无法从整体上形成合力。京津冀三方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正积极促进京津冀地区旅游合作的展开，今年 8 月 25 日，在河北廊坊举行了“京津冀 - 港澳台（3 +3）旅游合作大会”，与会各方都积极表达了合作的愿望，希望凭借“京津冀 - 港澳台（3 +3）旅游合作大会”这个平台，使京津冀旅游圈的合作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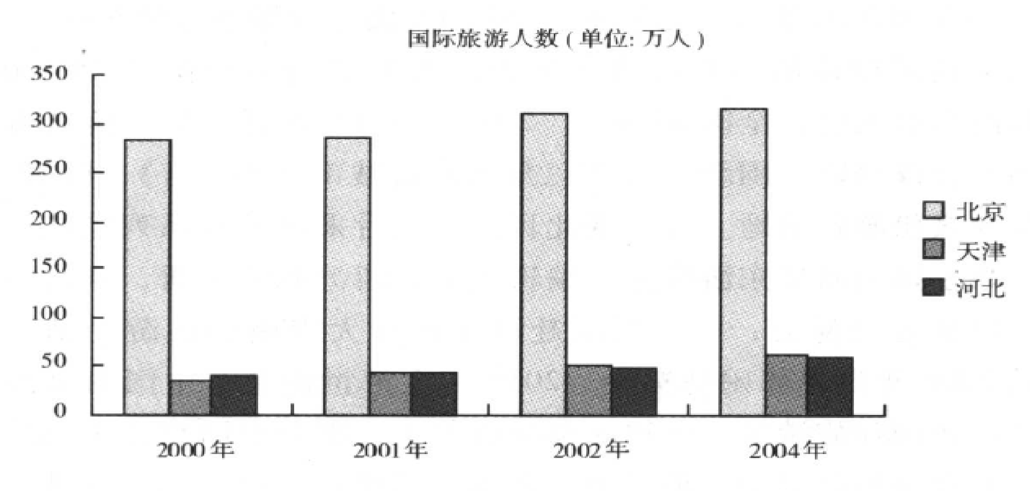


图3　京津冀地区国际旅游人数对比(2000~200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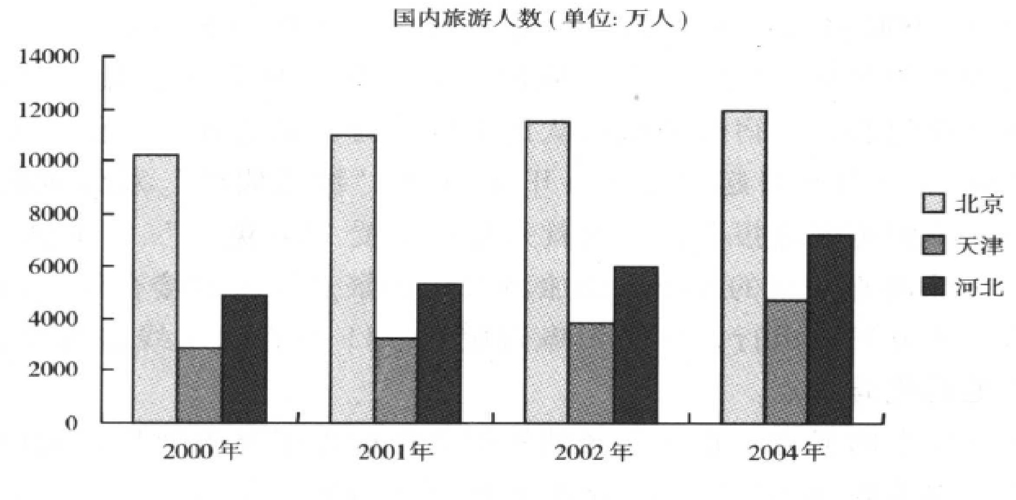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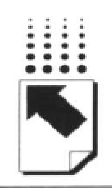


图4　京津冀地区国内旅游人数对比(2000~2004年)

(二)长三角地区旅游合作成效显著

长三角地区旅游合作效果明显强于京津冀地区。长三角是当前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也有着中国旅游"金三角"之称。长三角旅游经济圈以上海为中心,以独具江南特色、兼具现代都市风貌和历史文化底蕴的丰富的旅游资源为依托,以良好的旅游服务和方便的旅游交通为基础,构筑了中国最具吸引力、发展潜力最大的旅游经济圈,率先实现了旅游资源的重新整合和旅游功能要素的配套,一跃成为中国旅游业最大的经济产出地,旅游经济发展展示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在中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中,长三角占25%,



拥有 48 个 4A 级旅游景点，几乎占了全国 4A 级旅游景点数的 50%。到 2002 年，长三角地区接待的海外游客和国内游客数分别占全国的 25% 和 30%，三地的旅游总收入已占全国 63.4%。2003 年 8 月 16 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四次会议商定，围绕《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合作宣言》共同把长三角打造成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为实现此目标，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三地旅游部门联手推出新华东游线路，编辑出版苏浙沪旅游手册，联合组团参加国际和国内旅游交易会，联合组团赴海外进行大规模的旅游促销，携手开发、促销 2006 年世界休闲博览会、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南京国际梅花节、中国苏州国际旅游节、无锡太湖旅游节等，配合中国烹饪王国旅游年主题活动，联合推出苏浙沪三地名菜、名点、名厨；上海大众旅行社、大世界旅行社等 7 家旅行社通过与汽车租赁公司的合作，率先推出区域旅游合作第一个项目——苏浙沪自驾车"神舟之旅"。另外，长三角地区已有 6 个城市的集散中心、600 多家景区与旅行社加盟到这一旅游销售网络之中。6 家集散中心实现资源共享、统一采购、联网售票，即使只有一名散客单独报名，也能使其享受门票、住宿的最低团队优惠价，为自助游客人提供了方便和实惠。从 2005 年 4 月 9 日起，南京市开通 11 条"绿色假期"双休旅游直通车线路，市民不但可就近报名，开通首月还可享受"五免一"的实惠。"绿色假期"双休旅游直通车的推出，由旅游公司和景点景区直接合作，目的就是让广大市民更方便地出行，享受无障碍旅游。11 条直通车线路都是开往苏、浙、皖各地的优秀景点。

经过近年来的努力，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取得了显著效果，无论是国际旅游还是国内旅游都迅速发展，旅游人数明显增多（见图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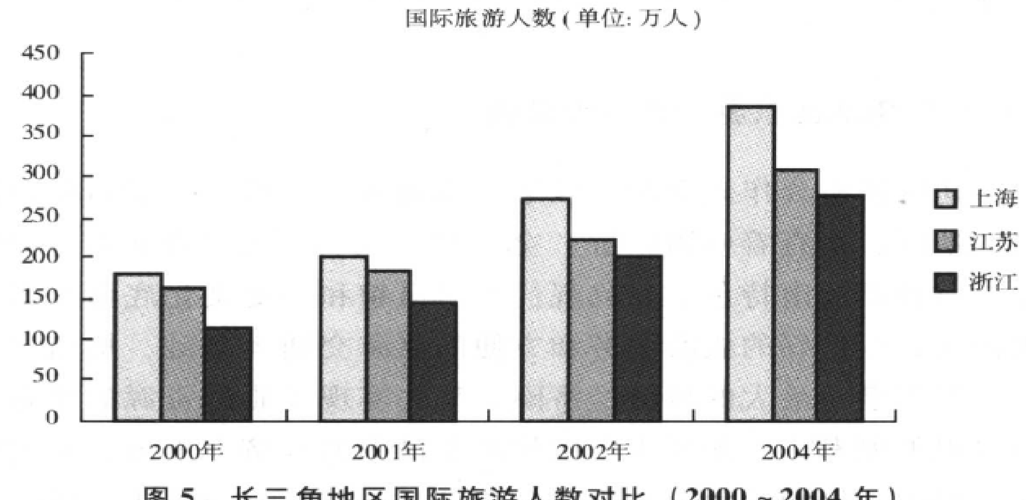


图 5　长三角地区国际旅游人数对比（2000～200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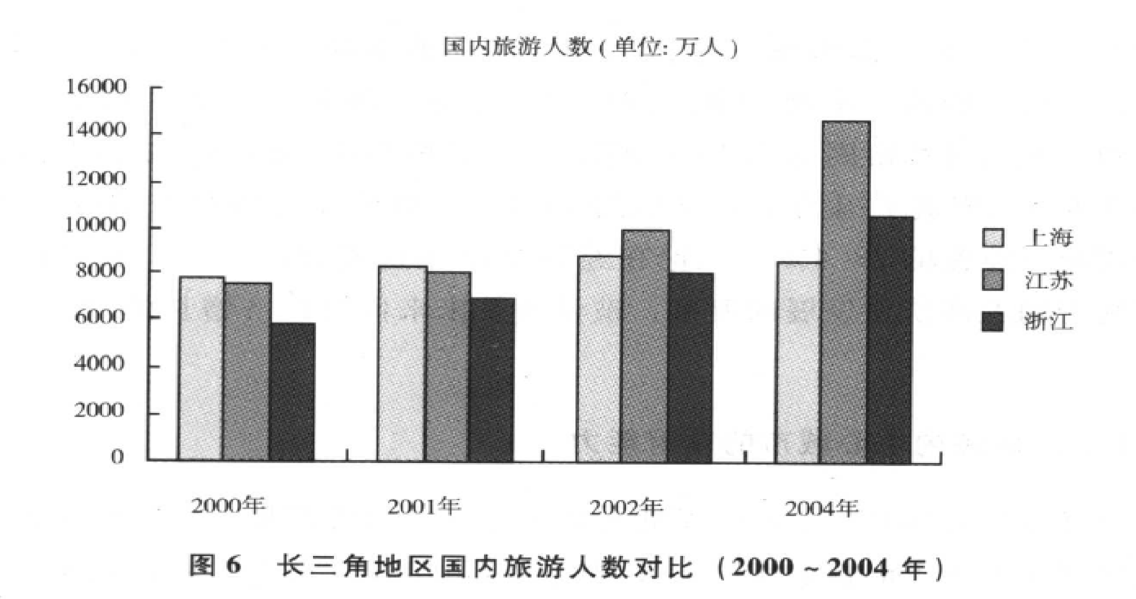


图 6　长三角地区国内旅游人数对比（2000～2004 年）

二　京津冀——长三角旅游合作条件比较分析

（一）区域旅游合作的经济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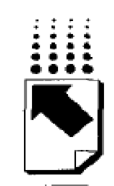
根据经济发展周期理论和世界各国的旅游业发展经验，经济对旅游业的发展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对人们思想观念更新影响重大，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长三角地区，这是京津冀地区旅游合作态度不积极、效果不明显的重要原因。

1.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重叠、缺乏分工协作

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展目前还处于自然发育阶段，大都停留在民间自发和理论说明这一层面。这是历史的、行政的和地方经济利益等原因造成的。从全国来看，京津冀地区在总体实力上处于较低层次，在发展上处于后发层次，无论从目前的总量还是从对经济发展的投入上都与长三角有较为明显的差距，2002 年京津冀仅吸引外资 40 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 7.75%，而江浙沪为其 4.37 倍。京津冀区域内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大，地区间协作联系也是比较松懈的，京津冀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出区域整体性运作、协作联系的特征，北京和天津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从而造成了产业结构重叠、资源配置低效、市场建设无序等一系列问题。

2. 长三角地区以上海为龙头的经济一体化已经形成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劲的地区之一。目前，已有 16 座城市



被列入“长三角”都市圈，包括上海，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浙江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和台州。长三角都市圈的这 16 座城市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 1%，人口占全国的 5.8%，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18.7%，贡献了全国财政收入的 22%和全国出口总额的 28.4%。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发展速度上，长三角地区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典范，被认为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

(二) 区域内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

主导型的合作共生、协同发展是旅游合作的重要类型。上海充分发挥了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周围城市协作、共生发展；而北京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较差，没能形成区域城市间的合作共生机制，严重影响区域旅游合作开展。

1. 北京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空吸”现象

虽然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的概念已经提出很久，但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京津冀三地都是在相对独立发展，北京对两者的辐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在很多时候是聚集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形成了“空吸”现象——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旅游发展相对迟缓，甚至在河北省内还存在着 32 个贫困县、3798 个贫困村，这些地区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到 272.6 万，三地旅游产业的发展尚未融合成为一个整体。

2. 上海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龙头效应

上海和北京作为中国的两个超级大都市，自身的旅游发展速度都很快，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却相差较大。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其快速发展带动了相邻的江苏、浙江等相关地区的快速发展，其周边各个主要城市也主动和上海接轨、协调，主动接受上海的辐射和带动，“长三角”在上海的带动下，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三) 政府管制与制度限制

政府管制与制度限制对旅游合作能否顺利进行影响重大。京津冀地区政府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对区域旅游合作限制过多，同时北京市政府对合作态度不积极，造成旅游合作难以顺利开展。长三角地区将市场和政府作用充分发挥，形成“以市场为主导，以政府为指导”的良性机制。

1. 京津冀区域合作中政府的作用：缺乏市场响应的政府推动

在区域合作中，与企业行为、民间资本力量相比京津冀地区地方政府明显处于强势地位。在资源配置、项目选择、资源整合、产业链形成等方面，政府干预过多，没能充分发挥市场自发配置资源的作用。“大市场”、“小政府”的目标，与这一地区现状相距较远。因此，通过加强市场作用，改变政府的过多干预与限制是当务之急。

2. 长三角区域合作中政府的作用：市场主导，政府疏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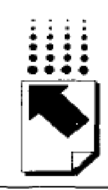
在当前转型社会时期，市场和政府两股推动力量，应该是相辅相成，并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但最终还是要依赖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由市场来引导区域内旅游产业发展与合作。而政府应该是完善市场体系，制定旅游业市场规则，引导旅游市场准入，缩小区域差异，构筑大区域化的基础设施网络和共同保护生态环境，政府部门的作用有的地方要强化，有的地方要弱化，政府是否能够准确定位非常重要。长三角区域合作中，政府职能经历了以下转变：一个是市场发挥了主导作用；二是市场的整合力量比政府的整合力量还要有效；三是政府的力量对资源的配置可以起到双向的作用。这正是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旅游资源吸引力

资源的价值与互补性是旅游合作的一个重要前提。长三角地区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各地旅游资源自身吸引力都较强，且各具特色。但京津冀地区，北京的旅游资源吸引力远远超过津冀两地，造成合作基础薄弱。

1. 京津冀地区旅游资源互补性差

北京，燕、蓟重镇，辽的陪都，金、元、明、清的故都，地上和地下文物非常丰富，为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有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故宫、北海、天坛、颐和园、十三陵、万里长城和中国猿人遗址等重要革命和历史文物。依托这些旅游资源，北京市的旅游业一直保持较高的发展水平。天津的旅游资源相对薄弱，著名的景区资源缺乏。河北省旅游资源多且全，包括宫殿、湖泊、草原等，但是这些旅游资源开发不利，经济效益欠佳。因此京津冀旅游业呈现“众星伴日”的格局，太阳很亮，星星光芒却被掩盖。



2. 长三角地区旅游资源互补性强

长三角地区具备了很多文化、旅游方面的资源。有海派文化，江苏文化，浙江文化。同时，长三角的旅游资源是全国甚至是世界性的资源。上海拥有世界著名的城市旅游资源，并且上海的城市旅游不断创新。东方明珠、外滩、城市景观以及新兴的主题公园等形成了上海的优势旅游资源。上海周边以杭州为代表的城市，旅游资源丰富并且闻名遐迩，例如西湖、周庄、无锡太湖影视基地、苏州园林等等。因此旅游业呈现“众星伴月”的格局，交相辉映、共同发展。

（五）区域交通状况

可进入性、可畅通性是区域旅游合作的重要设施基础。京津冀交通问题主要体现在城际交通网络不够发达，难以充分满足游客迅速、便利、安全、经济的要求。长三角也存在此类问题，但行动比较积极，正在大力开展地区现代化公路、水路交通畅通工程。

1. 京津冀地区对外交通发达，内部交通不畅

综合运输网络以北京为主中心（陆路及空路）、天津为副中心（水陆）。京津冀地区一直是国家交通建设的重点地区，经过50年的大力建设，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初步形成，是我国陆路交通网络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但城际交通网络不够发达，城市之间的交通网络与联系是综合交通体系的一部分，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许多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线路大都不能充分满足游客迅速、便利、安全、经济的要求。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方式单一，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客货运输缺乏选择与必要的竞争，这集中体现在北京同河北省城市间的交通及河北省内交通的问题。这是制约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的重要因素。

2. 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发达的现代交通体系

长三角目前交通规模不足。但2004年，由交通部牵头，江浙沪两省一市联合编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化公路水路交通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长江三角洲区域公路网总里程将由目前11.8万公里达到30万公里左右，公路密度大体上接近欧洲发达国家水平。而长三角高速公路网作为区域路网的骨架网，里程将由目前的3779公里达到规划里程1.18万公里，其中上海850公里、江苏5700公里、浙江5250公里，基本连接10万人口以上城市、主要港口及机场，使长三角都市圈内中心城市“三小时互通”，所有

地区“20分钟上高速”；而上海与长三角以外周边地区实现“五小时沟通”，形成以上海为中心、覆盖长江三角洲的“半日交通圈”。这充分表明长三角发展区域路网的决心，将成为促进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的重要因素。

三　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对策研究

（一）转变政府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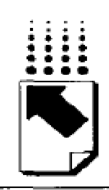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就要不断解决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政府来讲，北京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众多世界级旅游资源，政府合作积极性不高，往往以“老大”的姿态出现。但仔细分析北京市的旅游资源，主要是以观光为主的名胜风景，重游率较低。世界旅游业发展的趋势向度假旅游与观光旅游并重转变，同时向“区域大旅游”方向转变。而河北与天津的资源正可以作为优势互补资源。因此北京市应该转变传统观念，率先举起区域旅游合作的大旗。天津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同样要在区域旅游中积极主动。三方积极合作才能发挥协同效应。

（二）倡导“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原则

制度经济学认为，政府管制制度在决定国家经济绩效和社会文化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政府不予干预（亚当·斯密）和政府过多干预，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应该采取“政府引导调控，市场主导”的原则。

政府不应直接管理区域内旅游企业，应由旅游行业协会对旅游企业进行自律性行业管理。在这种格局下，政府、行业组织、旅游企业都要面向市场，由市场重新调整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关系，旅游企业与行业协会的关系，政府与旅游企业的关系，以形成符合市场规律的相互协调的有机的市场运作关系。政府最重要的是为旅游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经济政策环境。北京、天津、河北政府都应在区域旅游合作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北京作为京津冀地区中心城市，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旅游市场，有着极强的旅游消费能力，而这个市场的需求又是北京自己所不能满足的，为了北



京本身的发展，也为了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北京必须首先开放市场，给予周边地区更多的机会，以市场来带动周边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同时，北京政府应为旅游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减少政策性因素对旅游企业发展的限制，减少政策性条例对旅游企业开展自发性区域合作的限制，利用政策鼓励旅游企业间、各地政府之间建立良好旅游产品开发、宣传等方面的合作，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对首都旅游圈来说，涉及到北京这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级区域政府间的协调机制作用发挥的前提下，中央政府的协调必不可少。因此，应加大中央对京津冀区域合作的政策支持力度。

（三）建立三方“合作共生”机制

共生又叫“互利共生”、“合作共生”。是两种生物彼此互利地生存在一起，缺此失彼都不能生存的一类种间关系，是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高度发展。共生的生物在生理上相互分工，互换生命活动的产物，在组织上形成了新的结构。在旅游产业合作上的共生机制表现为各地资源互补、分工合作，最终形成一个统一联合体，产生 1 + 1〉2 的协同效应。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已经有一个经常性协调机制，而“京津冀”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稳定的合作机制出台。因此，应在政府政策、产业项目、基础设施、港口码头等各个方面制定全面的合作机制。通过互相开放市场，促进区内旅游者和旅游业资金、资产、人才等的自由流动。建立专门的区域旅游合作机构，主管政策制定及建立监督机制，确保合作的稳步进行。合作机构最重要的作用是为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取消限制性因素，充分调动各个旅游企业的主观能动性，遵循市场优胜劣汰法则，才能达到区域旅游合作的真正目的，达到无障碍旅游的目标。

（四）统一规划、整体宣传

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①整体的性质不是要素具备的。②要素的性质影响整体。③要素性质之间相互影响。因此，我们应将京津冀地区作为一个系统，研究它的整体特征、整体结构、各要素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统一规划、整体宣传。

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需要统一规划。首先对北京、河北、天津三地的旅

游资源进行全面普查、资源评价及市场分析，聘请专家实事求是地做出长期旅游发展战略规划，切实指导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发展。

北京区域合作应加强战略观念，不能局限于本地区的发展，看不到跨区域旅游产品的吸引力。2008年奥运会，北京应在对外宣传北京的同时，考虑到周边合作推广的问题，北京不只代表北京，而要代表中国。旅游本身就是开放性的行业，所以市场也应该开放。在这一点上，地方旅游企业比较积极，北京政府应尽快出台实质性的措施，加强统一宣传力度。

（五）实施“畅通工程”

系统的可进入性与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对系统整体作用的发挥起到积极的保障作用，如同血液循环。因此，“畅通工程”是京津冀旅游合作的重要基础，应尽快规划、落到实处。

北京市有责任改善市内交通拥挤状况。北京到河北省各城市间的交通有待进一步改善。通过公路、铁路建设，同时设立城际列车、旅游专列等，将北京到河北各城市、河北省城市之间、天津到北京、天津到河北各城市之间连成“交通网络”、“旅游网络”，使得游客在京津冀区域内自由、便利流动成为现实，积极促进区域旅游业发展。

参考文献

各城市相关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湖南统计信息网，http：//www. hntj. gov. 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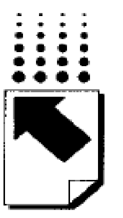
首都经济圈区域协调发展研究，http：//biz. icxo. com，2004－05－19。

卓勇良、黄建华：《长江三角洲：政府改革与区域合作》，《江南论坛》，2003年第3期。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京 津 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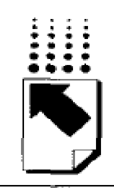
天津滨海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课题组长　肖金成
执笔　汪阳红

天津滨海新区位于京津冀城市圈和环渤海湾城市带的交汇点，面积达2270平方公里，是为带动天津及京津冀经济圈经济跨越式发展而着力培育的新的经济增长极。其发展潜力及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带动作用的充分发挥，必然受到它所依托的天津母城区和京津冀地区及其腹地经济发展态势、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在全国所处经济地位等外部环境的影响。

一　滨海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分析

区域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依次发挥作用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是以均衡的速度发生在区域内的所有地方，而是首先以较大的强度出现在增长极上，然后以不同的渠道向其周围地区扩散，进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深圳、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浦东都在各自的经济区中扮演着增长极的角色。具有明显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功能优势的滨海新区，无疑最有条件成为京津冀经济圈的增长极。与其他两个经济圈相比，开发开放起步较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京津冀经济圈目前正处于极化效应更为明显的阶段。极化效应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源向增长极不断集聚的过程，也是资源向增长极流动的“洼地效应”的形成过程。但是，极化效应或“洼地效用”的形成，除增长极自身所具有的优越的区域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灵活的管理体制、健全的法律制度、通畅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内部优越条



件外，还需要区域内其他地区具有相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高的经济竞争能力，以及较高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以便为增长极经济的先行起飞提供丰裕的资源和必要的产业配套能力。尽管外资的引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增长极发展资金短缺方面的不足，但是相对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的形成却往往是外资所力不能及的，而且过于依赖外资所产生的受世界经济变化和国际资本市场波动影响大、自主创新能力低等方面的负面效应也不能忽视。

（一）京津冀经济区中不利于滨海新区发展的因素

天津滨海新区在京津冀经济区中的增长极地位尚未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所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竞争力和经济一体化水平较低。

1. 天津滨海新区所处京津冀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竞争力较弱

一个区域内城市的竞争力越强，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表明该区域的经济活力愈强，经济发展水平愈高，同时意味着该区域内的要素流动性越强。这样，该区域不仅能够为其增长极提供丰富的发展资源，而且整个区域富有活力的市场竞争环境不但能为其增长极吸引众多的区域外部资源，而且对增长极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也是有利的。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巨大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三大经济区之一，区内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特大型中央直辖市和秦皇岛、唐山、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和沧州等大中型地区中心城市。由于开放时间较晚、政策优惠程度较低和区内经济一体化进程较慢等方面的原因，该经济区与以深圳、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无论是在区域竞争力方面，还是在产值和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方面，都逊色不少。表1对三大经济区主要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进行了比较。

从表1可以看出，京津冀经济区除北京和天津两大都市的竞争力较强、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外，其余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人均收入水平均比较低，从而该区域整体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另据专家分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三个城市圈的核心竞争力分别是48.34、25.78、18.56，基础竞争力分别是31.83、16.52、17.44，辅助竞争力分别是7.05、6.89、5.92，综合竞争力分别是58.46、31.45、28.04。上海2003年实现的地区总产值为6250.81亿元，北京和天津相加只有5988.81亿。上海2003年地方财政收入为899.28亿元，北京和天津相加只有797.06亿元。珠江三角洲是中国80年代经济高

速发展的引擎，而长江三角洲为拉动90年代的全国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相比之下，京津冀地区对全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就不是那么明显，其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无论从资源、市场供给方面，还是从竞争环境形成和区域经济活力提升方面，京津冀地区相对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竞争力对滨海新区经济发展和地区经济增长极地位的确立是不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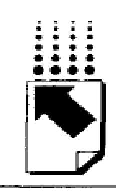
表1　三大经济区主要城市综合竞争力和人均收入水平比较

	城　市	城市综合竞争力	排　名	综合人均收入水平	排　名
珠三角经济区	香　港	827.5	1	1	1
	深　圳	203.03	3	0.34	3
	广　州	141.55	6	0.28	5
	东　莞	87.87	7	0.23	7
	中　山	46.07	20	0.16	12
	佛　山	42.1	24	0.16	13
	慧　州	39.29	25	0.11	27
	珠　海	38.8	26	0.2	8
长三角经济区	上　海	368.39	2	0.34	4
	苏　州	66.99	8	0.13	16
	杭　州	60.18	11	0.16	11
	南　京	53.45	12	0.12	22
	无　锡	52.31	13	0.11	26
	常　州	24.69	31	0.09	33
	南　通	17.17	36	0.08	42
	扬　州	1.8	55	0.06	74
京津冀经济区	北　京	165.17	4	0.27	6
	天　津	66.84	9	0.16	9
	秦皇岛	13.25	39	0.05	85
	唐　山	3.46	53	0.06	79
	廊　坊	1.8	54	0.06	78
	保　定	-7.54	78	0.05	88
	沧　州	-16.02	102	0.03	136
	张家口	-24.09	132	0.02	184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2. 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较低，面临的问题更为突出，制约了滨海新区经济的发展

从大的范围来看，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从局部地区来看，区域



经济一体化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协作联动、产业组合重构、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提供平台，有利于区域内资源的整合和专业化分工协作，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使资源突破行政区划限制自由流动。这一点对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目前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相对缓慢，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较多，制约了滨海新区经济的发展。

京津冀地区由于行政区划意识还比较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还比较高，加之该地区国有经济的比重较大、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等方面的原因，跨行政区进行产业结构大调整和资源整合的机制尚未形成，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相对较慢。北京和天津作为该地区两个特大型中心城市，由于联合观念的缺乏、行政地位的对峙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域壁垒和特定时期形成的财政、投资、金融体制等方面的制度障碍等方面的原因，在争做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老大”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工业主导产业趋同现象。2001 年，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制品制造业均是两市工业总产值前十位的产业。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虽然已经形成了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格局，但新兴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地方财政和人员就业对第二产业的依赖性还比较强，因而与该地区其他城市的产业差异性还没有完全展开。天津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和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同北京以外的该地区其他城市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总量上，产业结构雷同现象比较突出，难以形成具有层次结构的产业聚集。这一状况直接导致了资源难以在该地区范围内的合理流动，限制了市场机制下所形成的产业集聚效应的产生。如果说较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强的地区综合竞争力为资源向发展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潜在经济增长极聚集提供了可能性，那么较高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就为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创造了条件。因此，京津冀地区经济一体化水平的现状必然使得完全具备增长极条件的滨海新区的发展受到限制。例如在环黄渤海 640 公里长的海岸线上，从南到北密集地分布着天津、秦皇岛、京唐和黄骅四个港口。尽管这四大港口目前的吞吐能力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却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扩资和重复建设。作为滨海新区功能经济区之一的天津港是我国北方地区最大的港口，吞吐能力和区位等方面的优势明显，完全有能力为该地区承担更大的海洋运输任务。但四大港口之间的恶性竞争却带来了港口吞吐能力的闲置和资源的严重浪费。

3. 京津冀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滞后，经济发展活力不足，对滨海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民营经济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支生力军，它对活跃市场、积累资本、改善经营机制、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配套能力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民营经济受行政机制的束缚相对较少，民营资本的趋利性要求必然使其投资按照市场原则向地区增长极聚集，从而促进地区增长极的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应该说，我国目前最具经济活力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超常规发展。相比之下，京津冀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大，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最活跃的民营经济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由下而上打破行政区划的空间限制，进行跨行政区域的行业集聚和整合，从而造成了滨海新区目前以外国资本和国有资本为主的资本格局，使得新区经济活力同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逊色不少。表 2、表 3 对京津冀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

表 2　2001 年两地区私营企业统计表

地　　区	私企户数(户)	从业人数(人)	注册资金(万元)
北　　京	124133		16330213
天　　津	40472	463637	4240388
河　　北	73595	1645098	4074870
上　　海	176384	1509218	18621165
江　　苏	225475	2913180	14106172
浙　　江	208826	3471060	167938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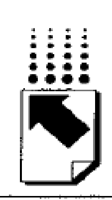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2000～2001 年中国私营经济年鉴》，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第 50 页。

表 3　2002 年两地区乡镇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指标比较

单位：亿元

地　　区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集体单位	私营企业	个体企业	
北　　京	804.4	228.2	375.2	87.97
天　　津	858.8	477.4	538.4	152.54
河　　北	1417	2529.6	5794.5	766.92
上　　海	2627.2	989.5	217.7	167.49
江　　苏	4946.5	4841.2	3603	421.1
浙　　江	13037.9	2860.4	2024	784.07

资料来源：《2003 中国统计年鉴》第 450、451 页。



表中资料清楚地表明了京津冀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落后程度。相比之下，近年来上海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其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增长极对国内外资金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地区的产业配套能力。而在生产专业化分工日趋细致化的今天，一个地区的产业配套能力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我国内外资金的集聚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地区发达的民营经济所形成的较高的产业配套能力。有资料表明，90%以上的计算机零部件、80%以上的手机部件、将近100%的彩电部件都可以在珠江三角洲地区1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以比其他地区低30%的成本采购到。相比之下，京津冀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滞后，地区产业配套能力和生产专业化水平不高，对滨海新区外部资本的引进和生产成本的降低产生了不利影响。

4. 腹地经济发展落后，是制约滨海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腹地不仅能为增长极提供经济发展需要的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也为其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产品和服务市场，以及较为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上海、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江苏、浙江、广东等腹地经济的发达。相比之下，滨海新区的腹地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在资源供应、市场供给、产业配套等方面制约了新区经济的发展。表4清楚地表明了滨海新区和上海浦东两增长极腹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表4 2002年两增长极腹地经济发展和进出口及外商投资情况比较

-	腹地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进出口总值（万美元）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万美元）
滨海新区腹地	北京	3212.71	28449	2670211	172464
	天津	2051.16	22380	2285020	158195
	河北	6122.53	9115	682908	78271
	山西	2017.54	6146	359739	21164
	内蒙古	1734.31	7241	266538	17701
	甘肃	1161.43	4493	103829	6121
上海浦东腹地	上海	5408.76	40646	7225129	427229
	江苏	10631.75	14391	7448888	1018960
	浙江	7796.00	16838	4635482	307610
	江西	2450.48	5829	199678	108197
	安徽	3569.10	5817	420473	38375
	福建	4682.01	13497	3032918	383837

资料来源；《2003中国统计年鉴》，第65、669页。

从表4可以看出，滨海新区腹地的经济发展要比上海浦东腹地落后不少，不但从资源供应、产业配套、市场供给方面制约了滨海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了滨海新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天津港作为一个拥有各类泊位140余个的北方大港，2002年的货物吞吐量为12906万吨，而同期上海港、宁波港、广州港的货物吞吐量分别达到了26384、15398、15324万吨，而且天津港货物吞吐量中散货的比重较大，价值高的集装箱的比重较小。2002年作为我国北方第一大港的天津港集装箱吞吐量为241万TEU，上海港和广州港则分别达到了861万TEU和271万TEU，而主要以山东为腹地的青岛港2001年的集装箱吞吐量就已经达到了260万TEU。同南方大港和北方的青岛港相比，天津港发展受其腹地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二）京津冀经济区中有利于滨海新区发展的因素

京津冀地区同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一体化进程都逊色不少。但这一地区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作为两个特大型中央直辖市的所在地，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优势也是很明显的，这对滨海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京津冀地区资源、人才、科研方面的优势为滨海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无论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资源、人才和科研优势方面无法与京津地区比肩。也就是说，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有京津地区这样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区内资源聚集竞争力远远高于其他两个经济区。在人才和科研资源方面，京津地区聚集了中国最顶尖的高等学府、科研机构和科技精英。北京地区有503个市级以上的独立科研机构、62所高校，天津有40所高校和国家级研究中心，位于京津塘高速路沿线的东方大学城也已进驻了13所高校。如果从整个环渤海地区看，人才优势更是明显，珠江三角洲有大学100所，长江三角洲有大学200所，而环渤海地区有大学300所。北京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用知识型职业（办公室职位比重、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指数）、创新能力（高科技就业比例、科学家和工程师占总从业人员比例、每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量、研发民间投资额比例）、向数字经济的转型等5类15个指标，对我国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新经济指数进行了测评。结果北京的新经济指数分值为97.0，远远高于上海

(73.30) 和广东 (60.0)，天津的新经济指数也达到了59.1，位居全国第四位。另据《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的研究结果，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人才竞争力指数分别为0.569和0.577，两地的科技竞争力指数分别为0.321和0.285，而北京、天津的人才竞争力指数分别为1和0.598，科技竞争力指数分别为1和0.549。这说明以北京和天津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的科研人才优势是很明显的，未来将成为我国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核心区域。这为滨海新区传统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供了契机。在自然资源方面，京津冀地区较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优势更为明显。区内有大港油气田、渤海油气田、华北油田、开滦煤矿、峰峰煤矿、迁安铁矿等大型矿产企业。据预测，到2010年包括华北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松辽油田和中原油田在内的渤海湾油区的原油供给能力将达到5500万吨，约占全国的31%。[①] 作为该区腹地的山西、内蒙古、陕西三省区是我国最大的煤炭产区，探明储量约占全国的64%。如果通过节水工程的开展和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缓解该地区严重的水资源危机，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对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撑作用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滨海新区重化工业和冶金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撑。

2. 京津冀地区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产业结构优势为滨海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京津冀地区尽管从经济总量上无法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比拟，但其毕竟是我国最具经济活力和经济实力最强的三大经济区之一，而且从人均经济指标来看，差距相对较小甚至占有优势。表5从人均GDP、人均需求等方面对三个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比较。

表5　2002年三大地区人均经济指标对比

区　域	人均GDP（元）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元）	人均出口贸易额（美元）
京津冀地区	23721	11303	10900	1043
长三角地区	25262	8252	8480	1220
珠三角地区	36440	13512	10509	4280

资料来源：景体华主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9页。

① 石宝珩：《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石油工业出版社，1999，第6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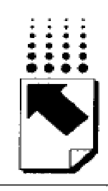
从表5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同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差不大；其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同珠江三角洲地区差距不大；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高于其他两个地区；人均出口贸易额同长江三角洲地区差距不大。这说明京津冀地区具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一定程度上为滨海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代表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发展潜力的大小以及经济竞争力的强弱。京津冀城市群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京津冀城市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比为4.0:42.3:53.7，而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次产业之比分别为5.8: 51.9:42.3和5.6:49.3:45.1。京津冀城市群三次产业的排序为三、二、一，而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则呈现为二、三、一的产业结构。表明京津冀城市群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升级换代快，具有较高的产业优化度。

具体来说，北京作为首都和全国的文化中心以及该区域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城市，独特的政治资源和丰富的智力资源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使其不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具有全国优化程度最高的产业结构。2002年北京三次产业构成依次为3.1%、34.7%和62.2%，且其产业结构仍处于不断优化的过程之中。电子、电器、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在产业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并日益成为主导产业群。天津作为该区域的另一个核心，良好的经济基础和较强的人才、科技竞争力，使其近年来的后发优势非常明显，1994~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4%，“九五”期间增幅居省市区第三位，跨入了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行列。区域内唐山、廊坊、保定等几个城市也有一定的工业基础，而且廊坊、秦皇岛、保定三市的产业构成也呈现为三、二、一结构。因此，从经济实力和产业发展上来说，京津唐地区已经具备了加速经济一体化进程、提高整体经济水平的良好条件。这为滨海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3. 广阔的腹地及其丰富的资源和快速的经济发展为滨海新区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滨海新区腹地主要包括西北和华北地区，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到2002年底，华北和西北地区总人口达到了24111万人。2002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省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2001年为100）分别达到了110.4、112.5、109.6、111.7、112.1，居民消费水平指数（2001年为100）分别为112.7、104.7、110.8、113.5、129.3。作为滨海新区重要腹地的华



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幅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速度高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腹地空间的大小、资源禀赋的丰裕程度、社会购买力的高低、经济发展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从资源保证和市场开拓等方面影响经济增长极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潜力。滨海新区由于其优越的区位条件而拥有广阔的腹地，尤其是西部大开发给西部地区所带来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为滨海新区经济的腾飞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二　滨海新区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分析

（一）滨海新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机遇

中国经济的持续较高速发展和被普遍看好的良好发展前景，以及人们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发展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为与国际管理接轨较早、接轨程度较高、具有良好发展基础的增长极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具体说来，滨海新区目前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协作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出现了加速迹象，为作为该地区潜在经济增长极的滨海新区提供了发展机遇

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协作问题已经被讨论了多年，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经济协作、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一直十分缓慢。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活力和经济竞争力的日益增强，以及同两地区发展差距的不断拉大，京津冀地区已经意识到了加强区域经济协作的迫切性。2004年2月12～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召集北京市、天津市、秦皇岛市、承德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廊坊市、沧州市、唐山市发展改革部门负责人，在廊坊市共同召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会议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发展与合作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并研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达成了“廊坊共识”。会议指出了加强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以往协调发展中所存在的体制、机制、观念等方面的障碍；提出了市场主导、政府推动的区域协调发展原则，以及各市发展改革部门的定期协商制度和省市长高层定期联席会议制度；要求启动京津冀区域

发展总体规划和重点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共同构建区域统一市场体系，联合开展港口、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建设，协调区域内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问题，积极引导和支持区域内行业及企业间的经贸、技术合作。“廊坊共识”的达成和逐步得以实施以及由此带来的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必将使滨海新区从良性互动、竞争合作的区域发展格局、平等有序的竞争环境、及时顺畅的信息沟通和现代化区域交通体系的形成中获益，从资源在区域内的优化配置和产业整合中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从而更好地发挥经济增长极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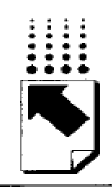
2.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所带来的巨大奥运经济效应将为滨海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契机，使其同该地区其他城市一道共同分享举办奥运的好处

2008 年奥运会的举办对京津冀地区的协作联系深化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为加强区域内的各种合作提供了契机，使加快区域内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合作与分工成为可能，从而有利于区域内各地区优势资源的充分利用和资源在区域内的优化配置，有利于解决诸如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区域发展的共同问题。“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将使北京的环保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据估计，从 2002 ~ 2008 年的 7 年间，奥运投资和消费将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864 亿元。[①] 同时，通过区域经济的传递效应，该区域内其他地区也将在产业优化度提高、产业结构整合、资源合理配置等方面获得长足的发展。只要努力创造条件，抓住机遇，滨海新区以其优越的区位条件、雄厚的产业基础和良好的制度环境，在吸引投资、参与奥运经济建设、分享举办奥运所带来的巨大市场、提升产业等级等方面应该而且能够有所作为。

3. 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加入 WTO 后政策性因素在吸引外资中作用的淡化和环境因素作用的加强，为政策优势不及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的京津冀地区和滨海新区今后加强外资引进提供了机遇

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世界范围内分工协作关系的密切，国际资本流动将更加频繁。根据国内外的一些权威机构预测，在未来的 5 ~ 10 年，全球的跨国投资将会持续增长。这将为我国吸引外资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从国内来看，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和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国内市场不断扩大。随着

① 刘淇主编《奥运经济研究》，北京出版社，2003，第 8 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社会经济运行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在许多方面加快了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步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入世将从更深层次上推动我国投资软环境的改善，中国已有足够的市场发展空间吸引外国资本的大量进入。这从总体上为我国今后增加外资引进提供了机遇。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到我国正式加入WTO以前，我国国内各地区之间在引进外资方面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性因素引起的，尤其是在区位条件相差不大的东部沿海地区更是如此。随着入世后中国市场的逐渐全面开放，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因素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优惠政策因素在吸引外资中的作用逐渐淡化，而诸如地区人力资源素质、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的规范性和行政效率、地区市场的成熟度和城市化水平以及产业配套能力等环境因素的作用在逐步强化。例如，中国入世后市场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将使那些主要以进入中国市场而非以获得廉价要素供给为目的的外国资本将投资集中在知识密集型和需要拥有大量无形资产的行业，这样，影响外商投资的主要因素就是地区人力资源素质；我国经济和市场成熟度的不断提高，将使外国投资者从单纯依靠政府优惠措施的承诺向更加关注政府承诺的有效性和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转移，以期得到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稳定的受益预期。这样，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的规范性和行政效率就在引资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京津冀地区和滨海新区在人力资源素质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地区城市化水平也相对较高，如果在提高政府行政的规范性和行政效率以及通过发展民营经济提高地区产业配套能力方面多做文章，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和入世后影响外商投资因素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包括滨海新区在内的京津冀地区在引进外资方面赶超先行开放地区将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此外，在“跨国并购”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以及京津冀地区和滨海新区国有企业比重偏高的情况下，利用“跨国并购”方式增加外资引进，不但有利于扩大该地区利用外资的规模，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且有助于推动该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通过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目前国内非国有企业尚不具备完全能力参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资本实力、企业制度、经营理念、管理手段、技术水平以及无形资产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引导跨国公司参与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对京津冀地区和滨海新区解决国有企业比重大、改革困难多等问题无疑是一次很好的机遇。

（二）滨海新区经济发展所面对的挑战

从滨海新区所处的外部环境来看，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的情况下，滨海新区在面临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 京津冀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的效果对该地区一体化进程和滨海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提出了挑战

滨海新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京津冀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进程，而在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大的情况下，该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和改革的成效。也就是说，京津冀区域合作与发展既要寄期望于国有企业的大踏步改革，又要催化这场改革运动的进行。由于国有企业受到了较多的行政干预，因而按照市场原则通过资产重组方式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受到了所有制结构和行政区划的制约。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京津冀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对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和滨海新区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挑战。表6就几个大城市工业总产值所有制结构进行了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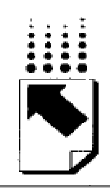
表6 工业企业总产值所有制结构比重[1]

单位：%

城市	内资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合计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其他类型企业		
上海	40.9	8.9	4.1	27.9	14.9	44.2
广州	40.9	7.2	5.5	28.2	33.4	25.7
深圳	21.8	2.0	0.3	19.5	41.3	36.9
北京	60.4	18.9	4.2	37.3	11.4	28.2
天津	51.8	15.6	16.2	20.0	7.1	41.1

表6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区的两大核心城市北京和天津的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分别高达18.9%和15.6%，远远高于以往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老工业城市上海（8.9%），更高于特区城市深圳（2.0%）。考虑到集体企业因素，北京和天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分别达到23.1%和31.8%，而上海、广州、深圳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

[1] 景体华主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14页。



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只有13%、12.7%和2.3%。与此相对应，北京和天津的国内民营企业和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偏低。说明京津冀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所遇到的行政体制障碍更大，困难更多。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对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协作和分工以及滨海新区区域经济增长极地位的确立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挑战。

2.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先发优势对京津冀地区和滨海新区的后发优势提出了挑战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窗口而先行获得了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优惠政策，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利用已有的经济基础使地区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并在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要素上都确立了自己的先发优势。这些优势集中表现在高效的政府行政管理、发达的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产业配套能力和完善的基础设施等方面。尽管京津冀地区比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发开放晚，但具有投资环境建设起点高、投资边际收益大、借鉴他人经验等方面的后发优势和人力资源素质高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具备了赶超先行开放和优先发展地区的条件，但这种后发优势和独特优势却受到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先发优势的挑战。一方面，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产业、资金对人才的吸引力度明显加大，对京津冀地区的人力资源优势提出了挑战。2002年，天津和河北的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分别只有18755元和14764元，而同期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则分别达到了26710元、21464元、25987元和30202元；另一方面，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较为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对外资依然保持较为强劲的吸引力，对京津冀地区依靠后发优势引进外资发展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挑战；再一方面，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经过了区域内各地单打独斗进行发展的阶段而进入了强化区域经济协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阶段，区域综合竞争力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这对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方面“雷声大雨点小”的京津冀地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对滨海新区能否真正确立地区经济增长极地位提出了挑战。

3. 滨海新区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对其经济发展的进程提出了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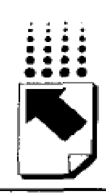
滨海新区只有尽快确立自己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增长极地位，才能获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区域综合竞争力的不断增强。而滨海新区区域经济增长极地位的确立，除了需要加强与区域内其他地区的协作与联系外，最主要的

是要解决好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尽管滨海新区经过10年的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非凡成绩，形成了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较为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济管理体制，但其自身在经济结构、资源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以及解决的程度如何，成为滨海新区经济发展实现新飞跃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滨海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累积起来的结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有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产业结构，带来了各次产业之间协调发展和适应产业发展的国际趋势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压力；以国有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为主、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所有制结构，带来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以增强地区经济活力的压力；管理体制和经济实力差别较大的新区内部地区构成结构，带来了加强区域协调发展、强化区域统一规划以增强新区整体系统功能的压力。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方面养成的痼疾，建区以来第二产业的优先发展和超高速发展所形成的经济对工业的过渡依赖症，现行管理体制所形成的日益明显的地区本位主义倾向，使得同扩大经济规模、增加经济总量相比，新区优化调整经济结构的难度陡然增加。但是，结构问题解决不好，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质量就难以提高，新区建设“现代化经济新区”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能不能痛下决心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发展速度解决好结构调整问题，是新区谋求经济进一步发展而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挑战。

滨海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同样遇到了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偏重大化工、大冶金工业的产业选择所带来的土地资源利用的低集约度，以及新区内部各区土地资源分布的极不平衡和土地资源开发的较高成本，使得在土地资源方面本来具有比较优势的滨海新区也同样面临土地资源紧张的问题，加之困扰整个华北地区的严重的水资源危机问题，以及地处渤海湾最里端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以重化工、大冶金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使滨海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样受到资源环境的制约。能不能真正转变发展观念和经济增长方式以谋求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正在谋求经济快速增长、致力于建设中国北方重要经济中心的滨海新区而言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行政管理体制问题是新区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新区目前的行政管理体



制存在严重的设计缺陷。尽管新区管委会被赋予了规划、指导、协调等职责，但由于不拥有对各行政区和功能经济区的行政管理权利，存在较为严重的“权责不对等”、“有责无权”问题，因而职责的履行效果也就难近人意。集权与分权问题处理不当，权力向各行政区和功能经济区分散过多，向滨海新区管委会集中不足，致使新区内部难以加强协作与分工，难以发挥系统整体功能，增强地区整体竞争力。能不能改变行政改革中一贯的“求稳”做法，对目前已经严重阻碍滨海新区进一步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对天津市及滨海新区来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课题组）

天津滨海新区在环渤海区域的地位、作用及趋势分析

○ 沈艳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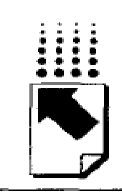
天津滨海新区成立于1993年，位于天津东部临海地区，总面积2270平方公里，约占天津市域面积的20%，拥有海岸线153公里。包括天津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三个功能区，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三个行政区，以及海河下游工业区。建设天津滨海新区，是天津市经济振兴所采取的重大举措。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开放，它不仅对天津自身的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带动京津冀、环渤海地区乃至我国全国经济发展，已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全方位的新一轮对外开放格局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滨海新区不单是天津的新区，也是环渤海地区的新区，通过滨海新区的带动功能，凝聚区域优势，不断增强对我国北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力和带动能力，就能有效地促进这一区域经济快速、持续和健康的发展。

一　滨海新区的发展优势

1. 独特的区位优势

滨海新区位于京津城市发展轴和环渤海湾城市轴的交汇点，地处东北亚区域的中心，是亚欧大陆桥最近的东起点，也是中国与蒙古签约的出海口岸，还是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内陆国家可利用的出海口。这里是全国有限几个聚集了港口、开发区、保税区、海洋高新技术区和大型临海工业区的地区之一，拥有京津、西北和华北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腹地，区域服务人口超过两亿。

滨海新区在建立之初就确立这样的意识，要利用改革开放的先试先行优



势，积极发挥其作为对外开放窗口和基地的辐射功能，把开放政策延伸到中西部腹地。滨海新区是华北、西北地区最直接的出海口，也是国外客商进入我国中西部的桥头堡之一，加上拥有的保税区在贸易服务领域的特殊优势，已成为中西部地区进入国际市场的“绿色通道”。

2. 丰富的资源优势

滨海新区现有可供开发的荒地、滩涂、盐田和少量低产农田 1199 平方公里，在我国人口稠密的东部沿海城市带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渤海海域石油资源总量 98 亿吨，已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32 亿吨，天然气 1937 亿立方米。原盐年产量 240 多万吨，占全国的 7%，以原盐为主要原料的氯碱化工在新区有近百年的历史，其加工工艺、产品规模和质量居全国前列。年产纯碱 75 万吨，占全国的 8.2%；烧碱 49 万吨，占全国的 6.3%，分别居全国第 5 位和第 4 位。海洋化工产品为中下游化工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原料。年直接利用海水 3.6 亿立方米。此外，滨海新区的地热资源丰富，年可开采 2000 万立方米。拥有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七里海）和我国蓄水面积最大的平原水库（大港水库）。

3. 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研发优势

滨海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幅高出浦东新区 3 ~4 个百分点，是目前我国经济最活跃、利用国际资本最多和投资回报最高的地区之一。已经成为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新区。新区拥有 42 家国家和市级科研机构，摩托罗拉、霍尼维尔、天津钢管集团等跨国公司及大型企业在新区设立了 39 家研发中心和 29 个博士后工作站。新区 55 万从业人员中，有专业技术人员 2.3 万人。京津两地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为新区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

滨海新区已经形成了七大主导产业，重点培植并正在形成电子通讯、生物制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新能源和新型环保六个高新技术产业群。滨海新区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开采与加工基地，海洋化工产品历史悠久，电子信息业和制造业产品全国领先，石油套管产量跻身世界四强。工业利润率达到 7% 以上，居全国前列。2001 至 2004 年累计利用外资 81 亿美元；截至 2004 年底，世界 500 强企业中有 67 家在新区投资兴办了 148 家企业。

4. 齐备的多功能优势

滨海新区聚集了天津港、国家级开发区、保税区、海洋高新区、出口加工区等功能区，十多年来与国内 30 个省市自治区签订经济合作协议近 2000 项，吸引投资 177 亿元。全国上千家企业为新区产业直接配套。保税区分拨

销售进口轿车占全国总量的45%以上。天津港近60%的集装箱和80%的货物来自全国各地。滨海新区产业传递、对外服务和辐射功能日益增强，区域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凸现并在不断扩大。

5. 综合的交通运输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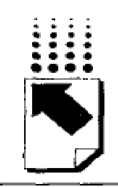
在海上运输方面，天津港年货物吞吐量超过2亿吨，已跻身世界深水大港20强之列，与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建立了长期贸易关系，是我国中西部重要的海上大通道。在公路运输方面。滨海新区现有12条骨干公路，其中国道主干线2条、国道3条，由中心市区通往新区的市级干线7条，总长410公里。京津塘高速公路将北京、天津市区、滨海新区连成一线。在铁路运输方面，天津是中国两大铁路动脉（京哈和京沪铁路）的交汇点，通过京沈、京沪、京九、大秦等国家主干铁路与全国铁路网相连。在民航运输方面，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是我国北方的最大的航空货运中心和距首都最近的备降机场，近三年来，共新增客运航线24条，旅客吞吐量完成了从100万人到200万人跨越，平均增长率达到25.4%，位居全国机场前列。天津机场目前正在扩建，总建筑面积增至12万平方米，其中的6万平方米和相应配套设施已在2005年7月开工。天津城市地铁，京津城际轨道客运专线，京津塘高速公路第二通道等，也将逐步引入天津机场。加速京津客货运一体化进程。

二　2004年以来的滨海新区发展现状

1. 提前一年实现阶段性目标

滨海新区按照统一规划、分区分步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的原则，充分发挥港口优势，比预定计划提前一年实现了“十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的阶段性目标。此后，天津市审时度势，于2003年初提出了滨海新区未来发展的新定位：立足天津，辐射“三北”，服务全国，面向东北亚，努力建设成现代化的世界性制造加工基地和国际物流中心。按照这一要求，滨海新区依托海港、空港和信息港，进一步扩大开放，广泛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提前一年实现了“十五”目标。

2004年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200亿元以上，超过“十五”计划的1200亿元目标；工业总产值预计完成2800亿元，超过“十五”计划的2400亿元目标；外贸出口完成125亿美元，超过“十五”计划的120亿美元目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55亿元，2001～2004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543 亿元，超过“十五”计划的 1500 亿元目标；实际利用外资预计完成 17 亿美元，2001～2004 年累计利用外资 81 亿美元，超过了“十五”计划的 80 亿美元目标；实际利用内资预计完成 40 亿元，2001～2004 年累计利用内资 90 亿元，超过了“十五”计划 60 亿元的目标。滨海新区进入了一个上规模、上水平，在高平台上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表 1　天津市和滨海新区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对比

单位：%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第一产业	全　市	4.5	4.3	4.1	3.8	3.6
	滨　海	0.9	0.9	0.7	0.7	0.6
第二产业	全　市	50.0	49.2	48.8	50.9	53.2
	滨　海	67.9	67.8	69.2	69.3	69.8
第三产业	全　市	45.5	46.5	47.1	45.3	43.2
	滨　海	31.1	31.4	30.1	30.0	29.6

数据来源：由《天津统计年鉴 2005》整理计算得到。

2. 正在成为环渤海区域经济新引擎

2005 年 10 月，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将天津滨海新区正式纳入国家规划战略。新一轮开发开放的热潮正在启动，滨海新区 11 年跨越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已形成的特有优势，正在释放出难以估量的巨大能量。最新统计显示，2005 年以来，滨海新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上半年经济增长 20.4%。1～5 月份工业总产值和利用外资等指标超过浦东新区，成为天津最耀眼的经济增长点。滨海新区 2005 年上半年的经济总量、工业生产、招商引资、外贸出口等主要指标完成进度好于往年，区域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上半年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15.7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20.4%；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1792.29 亿元，增长 31.3%；外贸出口达到 81.25 亿美元，增长 31.9%；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74.5 亿元，增长 15.8%；实际利用外资 12.95 亿美元，增长 29.8%，毫无疑问，滨海新区 11 年积聚的巨大发展能量正在释放。

3. 外商投资步伐不断加快

随着环渤海经济圈的迅速崛起以及天津滨海新区进入全国发展战略布局，滨海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更为迅速。据统计，2005 年上半年，滨海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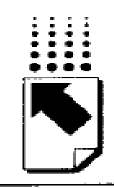
合同外资额达到25.87亿美元，同比增长14.3%，仅天津开发区就实际利用外资7.25亿美元，增长22%，主要招商指标在国家级开发区中位居第一。外商投资的大项目数量明显增多，其中500万美元以上项目123个，占项目总数的44%，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超过或接近1亿美元的超大项目有7个。在工业、物流等领域滨海新区更是涌现出一系列亮点。全年原油产量预计达到1300万吨，将成为继大庆、胜利后我国第三大油田。天津港随着15万吨航道投入使用，港口通航等级得到明显提升，2005年上半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1.19亿吨，同比增长22%，4、5、6月3个单月集装箱吞吐量连续超越40万标箱大关，创历史最高水平。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两项指标在全国分别排在第三位和第五位，天津港对外辐射能力进一步增强。

三　滨海新区在环渤海区域中的地位

1. 对滨海新区重新定位的理解

国家“十一五”规划已确立了“以北京－天津－滨海新区为发展轴，以京津冀为核心区、以辽东、山东半岛为两翼的环渤海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大格局”。2005年11月，经国家发改委协助重新修编的《天津滨海新区“十一五”规划纲要》，将滨海新区的功能重新定位为：立足天津、依托京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高水平的现代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宜居的生态城区。其中心涵义是，天津要调整以新区过去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浦东开发和世界的经验表明，一个经济引擎的形成和成长，需要有集聚区域和辐射区域的双向功能，需要依托一个强大的城市或城市圈。天津要贯彻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部署，一要携手北京，北京已经表示出这种强烈愿望。北京的优势是独有的，作为首都，它可以源源不断从全国和海外吸引各方面资源。京津联合是经济资源动员和行政资源动员基础上的强强结合，只有形成“京津双核”的互补优势，天津才可能发挥“第三极”的区域带动功能；二是要依托河北省，首先因为它具有劳力、资源等要素流动的地缘优势，其次不能低估它经济总量全国第六的近畿强省实力；三是京津冀的经济联系千丝万缕，当前的京冀经济互动已凸现效果，天津不能置身度外。主动依托京冀，吸纳京冀的经济能量，是天津市尽快壮大自我，融入和服务于区域的一条捷径。



2. 滨海新区必须做大做强比较优势，才能实现国家的功能定位

尽管天津滨海新区具备了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多种优势，但从国家战略高度来审视天津滨海新区的优势，可有这样一些挑剔的认识：第一，这些优势多是"比较优势，而非绝对优势，在环渤海区域其他省市同样存在，但会随时空条件、制度和市场竞争的变化而衰减甚至消失。"珠三角和长三角曾出现的产业转移、营商成本增加、劳动力外流失、产业同构等问题，需要我们引以为戒。第二，这些优势多为资源型硬优势，而非制度性软优势。硬优势多受到资源约束，如土地、油气储备等。软优势是靠制度构造，如市场准入、人才吸引、科技扶持、风险防范、民企成长和金融生态环境等，在香港统称为"营商环境"。浦东新区已开发开放了15年，仍申请成为"国家级综合改革试验区"，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创新和改革，不断完善自身的软优势。第三，这些优势虽较为集中，但普遍存在能级较低的缺陷，如港口距市区远、集装箱化率不高；土地开发成本大、腹地经济不发达等。这也是环渤海各省市长期"不服气"天津，竞争大于互补合作的主要原因。

发达国家经验和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表明，区域经济在时空上是按照"由点成线、扩线成轴、交线成网、扩网成面"的规律循序渐进展开。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都与良好的城市圈和城镇体系密切相关。每一个发达的经济区域不仅形成了作为增长极的一个或几个核心城市，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同时也形成了周边的城市群，发挥呼应作用。从现实上看，以京津为中心的首都经济圈最适合成为环渤海地区的核心，而滨海新区必将成为京津的联结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3. 滨海新区要在三个层面发挥服务带动作用

天津滨海新区要实现国家战略赋予的功能定位，应着力三个层面发挥服务和带动作用。其中，第一个层面是首都服务圈。天津靠近北京，有优势也有劣势，必须扬长避短。要充分利用首都的各项优势，积极主动地为首都服务好。要努力争取国务院各部委的支持，争取成为各部委的改革开放的政策试验区。新修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已分离了部分经济功能，向本部转移，天津滨海新区要积极迎合北京的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调整，在联合建设沿京津塘高速公路高科技产业带、扩大首都对外贸易、组建国际物流中心、加大港口和机场协作、扩大旅游业、建设京津快速交通、大环境的改善治理、协助办好2008年奥运会等方面，都需要天津滨海新区做好服务。

第二个层面是环渤海经济区。天津与周边的河北、山东、山西、内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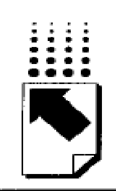
古、辽宁是近邻，不仅历史上经济从密，建国后还曾向这些省市输出过上百个大中型企业，产业关联度较高。这些省市在滨海新区注册的企业也不少。新区应主动出击，加强联系。从现实出发，山东半岛的经济发展自成体系，且发展势头良好，已提出要做现代制造业中心；辽东半岛是传统装备制造业中心，也会受到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扶持，滨海新区也提出要建设现代化制造、研发基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环渤海区域的经济整合，如何变恶性竞争为合作竞争，变产业同构为共生多赢，将是一个反复博弈的长期过程。

第三个层面是“三北”腹地。这是天津传统的服务地区。但建国之后，由于天津的城市和经济地位在不断衰减，至上世纪80年代，东北腹地已完全丧失、西北和华北腹地不断收缩。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下，东北亚已成为全球最活跃经济区域之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已先于滨海新区进入国家战略视野，为扭转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南快北慢”、“东高西低”的状况，需要天津滨海新区借助近邻中央的优势，积极促成国家各部门和各地区合作，把从天津港出发的大交通网络尽快构筑好，实施大通关，让相关内陆省份都能拥有高效便捷的“无水港”，才能提升滨海新区作为北方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体现其融入区域、服务区域、带动区域的真正价值。

四 “十一五”时期滨海新区基本发展趋势

1. 滨海新区的未来规划走向

滨海新区的未来规划是：一带、一轴、一核构成的梯形结构。所谓一带，即沿海岸带形成四个功能区：海洋经济循环示范区、海港物流运作区、石化产业区、滨海休闲度假区，这些也是除开发区、保税区、天津港之外，滨海新区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规划建设的海港物流运作区计划占地面积100平方公里，将成为未来中国北方的航运中心，国际货物大进大出的、具有自由港保税功能的物流基地，还将与海港、空港、信息港相结合，服务中国西部、华北。所谓一轴，指的是天津港——外环线——滨海国际机场——廊坊——北京中关村的京津塘高速公路带，沿线设置多个功能区。以天津开发区为龙头的、现代工业为基础的高新技术研发制造转化的产业和高新技术的聚集区；以无缝钢管为主导的现代冶金基地，制造小批量、多品种、高精尖的特殊钢材，瞄准世界现代冶金精品市场需求；天津空港新城，



在现在的基础上，提高客货吞吐量，进一步壮大以保税区为基础的空港物流区。所谓一核，是在滨海新区核心区，改造和新建 50 平方公里的现代化宜居生态的新城，提升新区的城市载体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

2. “十一五”规划目标

2005 年天津市的滨海新区工作会议提出，到 2010 年，滨海新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3000 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 万美元，工业总产值达到 7000 亿元，外贸出口总值达到 300 亿美元，成为技术领先、信息交汇、人才聚集、服务一流，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区。在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方面，到 2010 年，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达到 2500 亿元，形成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海洋化工产值达到 200 亿元，原油开采能力达到 2800 万吨，石油开采和石油化工产值达到 1500 亿元，形成化工产业集群；汽车制造业产值达到 1000 亿元；钢管和高档金属制品的生产规模达到 1200 万～1500 万吨，产值达到 1000 亿元，形成现代冶金产业集群；造船能力达到 100 万吨以上，建成我国现代化大型造船基地之一；力争使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50% 以上。在建设现代化国际物流中心方面，加快 6 大物流基地建设。到 2010 年，天津港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散货主干港和东北亚地区国际集装箱枢纽港，货物吞吐量将达到 3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1000 万标箱；新区物流业实现增加值达到 720 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的 60% 以上；新区口岸外贸值达到 1500 亿美元以上。

3. 具体应对措施

第一，要努力争取国家的支持。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与国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这里讲的国家支持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宏观定位的支持，要进一步明确滨海新区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极的意义。二是政策上的支持，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可以在滨海新区先行试点。三是争取国家一定程度的金融财税政策支持。

第二，是要在国家发改委指导帮助下，搞好新区的总体规划。建议国务院参照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做法，成立振兴环渤海办公室，负责规划、协调、统筹经济区的发展与建设。要求天津老工业企业东移到滨海新区进行改造调整，可以享受东北老工业改造的税收转移政策。滨海新区要区别于深圳、浦东开发开放的一个特点，就是要在创立阶段就发挥区域服务和带动作用。为此，天津市原有的规划要按照新的定位进行扎扎实实的调整，注意与不同层面区域发展的衔接。只有这样，天津滨海新区才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

融入和服务区域，有效地推动区域发展。

第三，规划建设滨海新区要有超前意识，坚持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路，综合考虑经济、社会、人口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要科学预测新区未来的人口规模，超前安排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预留出足够的城市发展空间，保持均衡的城市生态可持续循环。在这方面，即便是上海这样用地匮乏的城市，也保留了崇明三岛1200平方公里的生态涵养区，香港和日本更是如此。必须意识到，滨海新区的土地资源只是相对充裕，因肩负了多重的发展使命，必须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

第四，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试点。鉴于天津市和滨海新区已具备的条件，要尽快使渤海银行开业。加快筹备东北亚银行的进程，吸引更多的国内外金融机构进区，使区内的金融街尽快形成气候。培育资本市场，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配套发展。要积极利用国家批准的建立基金政策，为区内的基础设施和配套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在条件允许时，要积极开拓离岸金融业务。

第五，新区企业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要推动新区内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到周边城市建立产业链，到资源产地建立加工基地，形成原材料开发、产品加工、零配件供应、产品总装一条龙配套生产体系，使新区融入经济区的发展中。加快滨海新区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力构筑高层次产业结构，加快建设现代化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金融、物流、中介服务和旅游等现代服务业。

第六，加速大港口和大交通建设。目的要把港口这个滨海新区的核心竞争优势继续做大做强。新区要成为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不仅要加快加大深水港的建设投资，扩大集装箱吞吐量，还要注重疏港交通和区外交通的配套。要在统一规划下，加快环渤海大交通的网络建设，首先建成京津快速交通体系，尽快形成西部到滨海新区的铁路通道。不断提高港口和交通运输业增加值在滨海新区现代服务业增加值中的比重。

第七，滨海新区要加快实施建设“自由港”的构想。上海大小洋山港目前已经开通，但国家仅赋予实施“准自由港”发展尺度，已经是一个突破。天津滨海新区要充分利用区内土地资源相对充裕、可填海造地、利用已建成国家保税区和空港物流区的优势，争取国家的政策支持，进而带动天津港的体制创新，巩固和扩大“港区联动”的优势。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

“十一五”时期北京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的战略选择

○ 景体华 陈孟平 邓丽姝

一 “十一五”时期北京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面临的战略背景

（一）“十一五”时期北京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面临的国际战略背景

1. 知识、技术型服务业的新动向

当今，经济全球化是通过这样一种过程来完成的，即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进入全球生产链中，成为流动着的资金流、物流、信息流和人流，寻找效率最高的集聚场所。这种过程的表现之一就是“世界工厂”[①] 的变迁。这种过程的另一种表现则是不同行业、不同素质人群在不同城市或地区的集聚。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制造业的生产基地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和规模向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一直都为各国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所关注。敏感的媒体已经开始把中国称为新世纪的“世界工厂”。

“世界工厂”在世界范围的空间转移，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大变动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在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搬迁的同时，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特征是：

①在全球激烈竞争中，服务业的知识和技术含量迅速增长。其中依托现代信息与网络技术的生产性服务业，从服务内容到服务的深度与广度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的突进。信息革命为主导的技术革命引起的生产力变

① 周牧之：《鼎——托起中国的大城市群》，世界知识出版社，第 14～17 页，2004。

革，在第三产业服务的内容和方式上首先得到体现。知识密集型、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服务部门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出来，并且以强有力的增长率成为服务业中的主导力量，传统第三产业退居次位。

② 制造业引入新技术革命与设计、工程与科技服务、计算机和相关服务等核心技术环节的信息技术变革有着紧密联系。这些服务部门过去曾经是制造业的附属部门，随着市场化推进，这些部门逐渐地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服务业的高度市场化，从不断提高竞争力上来说，也大大刺激了这些部门掌控高新技术的驱动力。

服务部门的市场化，是有利于制造业的。目前，在新技术变革的潮头中，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特别是自主创新驱动型的制造业更是如此。有学者分析了新经济中服务业与创新的关系，指出：创新往往发生在小型服务企业内部；而且创新是通过服务部门向整体经济渗透和扩散，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1]。

制造业为了在市场中取得有利地位，需要通过自主创新的研发服务，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而研发服务也只有在产品的市场实现中才能体现出真正价值。也可以说，新技术革命在二、三产业的融合中找到了起作用的高效方式。随着高新技术服务对制造业作用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强，制造业的“服务化”趋势亦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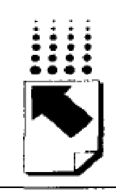
新型工业化需要发达的、高技术的、信息化的服务业给予支撑。城市化的进程也与服务业的集聚、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

③在“世界工厂”的大转移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的服务贸易增长显著加快。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制造业需要服务贸易的配套支撑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④ 发达国家服务业的转移是近年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近一年多，美国出现了继制造业外迁以来服务业大举外迁的又一新的浪潮，引起关注不说，各界激烈争辩是否应当通过保护措施加以限制尤其引人注目。上世纪70年代前后美国冶炼、造船行业的外迁；上世纪末制造业的外迁都没有引起美国朝野这么大的震动。本世纪的服务业由于关系到高新技术，所以外迁的舆论压力才这么大。实际上，服务业的外迁和其他产业的外迁一样，都是全球

---

[1] Martin Zagler (2002): *Service, innovation and the new economy, Structu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3 (2002) pp. 337 ~ 355.



化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虽然根据国际数据公司的跟踪研究表明，目前美国外迁的高新技术领域的服务工作，都是低水平的、需不断重复的工作，核心科研一类的重要工作则没有迁移到其他国家，而是在美国本土进行。但是，这新一轮迁移热潮仍需引起我们的关注。跨国界的通讯革命是这次服务业外迁潮的内在原因，无论从技术革命的本质和市场力量的角度来看，这一趋势都是不可阻挡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德·德鲁克就曾预言："在中国，最大的商机不是在制造业，而是在服务业"[①]。应该说，这是我国大力发展新型服务业的大好机遇。

2. 产业集群的新趋势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集群，继而形成产业带，其战略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它所表现出的现实意义。行业化在空间上的集聚，不仅要打破原来意义上的行业分割，区域分割，甚至正在打破国界。产业带形成了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区域经济大发展中，形成了区域经济竞争的新格局。

所谓产业集群，绝不是一种简单的企业集中，而是一种以生态链形式组成的产业空间的集聚，即产业的上、下游之间，整体与零部件之间，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相互依存、衔接与空间上的合理组合，进而共享知识、用户和专业技术人才[②]，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紧密型的产业带。也可以说，产业集群实际上是把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通过分工专业化与交易的便利性，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高效的生产组织方式。在这样的产业带中，主导产业的选择，以及与其带动的相关产业的合理结构与布局，将直接构造该区域的核心竞争力。

通常比较注意制造业的产业链集聚，对于服务业的集聚比较忽略。在知识和技术创新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以研发为主的自主创新知识产业的集聚也值得密切关注。

新型服务业以多种经济活动契合的群组高度集聚在中心城市或中心区域。目前在大都市的中央商务区（CBD）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服务业集群，比如有以金融商务服务为主导的集群；以旅游服务为主导的集群；以文化艺术或教育为主导的服务业集群等。

近年来服务业的集聚中出现了一个重要趋势。这就是以研发为主的知识

---

① 转引自周振华主编《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前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3页。

② 萧琛主译《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2003年9月。

型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的融合，形成以创新性服务业为中心、融合制造业产业链的新型产业集聚。可以说，这是新型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以研发为主的知识型生产服务业在产业链中的作用，在产业集聚中的不可低估的凝聚力，在我国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特别值得关注。

3. 现代服务业的网络化辐射

现代服务业是建立在当代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之上的一种新型服务业。新型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正是依靠当代的新技术革命。2002 年世界电子商务交易额比 2001 年增长了 73%；美国已经有 60% 的大学提供网上课程；60% 以上的企业通过网络进行员工培训和继续教育[①]。可以看出，依托新技术的新型服务业不仅技术密集和智力密集、位于价值链的高端，同时其辐射能量与服务范围通过网络化也在迅速扩展。

4. 产业融合与大服务

新型服务业正在对生产方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新型服务业的服务活动，服务产品寓于服务之中，技术服务提升产品。这种产品不仅仅是制造业产品，农产品也需要科学与技术服务。所以现代服务业正在走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大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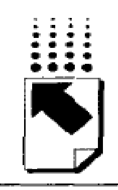
产业融合发展意味着部门间业务的交叉、市场交叉，不仅打破了原来的分工界限，相互介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在新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上，创造了更有效的作用方式和路径。这种影响之深不外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 公司之间不再讲求垂直整合，而注意不同公司之间的水平整合。② 企业之间有竞争，也有协同。新的竞争协同关系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③ 加快了各类产业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出现了产业的"柔性化"趋势。

产业融合正在加速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在这一变革中，新型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服务业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正逐渐成为主导和支配经济增长的力量。如果我们以前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往往找不到其实现的具体途径的话，以生产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融合，其蓬勃发展的实践，正在详细地诠释这一论断的实现路径。

5. "世界工厂"全球迁移与控制力集中

当工厂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大迁移时，全球经济活动的最高层管理与控制部门却正在向某些大城市集聚。区位条件好、基础设施齐全、便利，

① 转引自周振华主编《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总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 5 页。



环境友好，文化氛围浓厚的大城市将成为首选，并成为主宰着全球或地区经济命脉的世界级城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根据城市在全球经济和空间体系中的作用，把世界城市分为"全球金融节点"城市；"跨国节点"城市；"重要的国内节点"城市和"地区节点"城市。这些城市作为全球经济网络的节点起着重要作用。

然而，一个城市是否能够成为世界经济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不仅仅取决于该城市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要看其所在国家与联结、辐射地区的发达水平，以及所在"生态城市群"的禀赋。现代城市这种网络化的特点，是和全球化中城市的功能一致的。网络节点意味着其既是资源要素的空间集聚地，同时也是资源要素的集中配置地。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信息流都将通过这一节点进行流动并得到有效配置。这种功能决定了这种网络节点必须具有高效的现代服务业，因为现代服务业是有效地组织资源要素流动，承担大规模经济流量的产业基础。

（二）"十一五"时期北京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面临的国内战略背景

1. 我国经济结构的重大战略转型

在新世纪经济、科技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已经由对自然资源的拥有转变为技术创新。我国近期提出：在未来的15年中，我国必须在自主创新中促进经济结构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实现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型向自主创新型的转变。这是我国21世纪发展的重大的战略性转变。

在这一重大战略性转变过程中，自主创新实力的增强是转变的主轴。在产业链中，以研发为主的知识型生产性服务将越来越占据要位，并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占领产业前沿，提高我国的核心竞争力。

2. 国际服务业向我国转移的新趋势

包括现代服务业在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步伐正在加快。外商投资出现了北上西进的趋势。

从目前国际服务业转移的路径来看，在一些大型制造业企业进入我国之后，起初研发服务还是留在其本国内，近年来有些研发部门跟随企业逐渐进入。研发服务进入我国的首要原因是看到了我国这个居民消费快速升级，市场扩张活力强劲的消费市场。他们的多数制造业企业开始从来料加工，产品出口，逐渐转向产品也销向我国国内，甚至有的产品开始以我国国内的市场

为主。为了适应我国市场的消费需求，研发服务就要研究我国市场，并根据我国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消费品味和习惯开发出适应我国消费者的新产品。

2005 年 9 月 29 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了《2005 年度世界投资报告》，报告特别指出，外国直接投资的研发活动正在加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 2002～2004 年度全球 1773 个外国直接投资项目中，有 1095 个项目是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其中在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实施的项目就占世界总数的近一半，达 861 个。一半以上的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印度或新加坡开设了研发中心。愿意把中国作为未来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数量最多，其次的选择地才是美国，印度居第三位。

3. 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地位正在提升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指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继续推动东中西良性互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国家发改委已将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并正在开展区域规划的编制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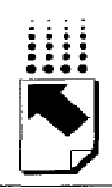
4. 天津滨海新区新一轮开发启动

2005 年年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天津考察时指出，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环渤海区域及全国发展战略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走好这步棋，不仅对天津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施全国总体发展战略部署、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宏伟目标，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十一五”规划中，天津将滨海新区定位为立足天津，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的现代化制造研发基地、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成为天津现代化国际港口大都市的标志区和生态宜居海滨新城。力图使天津滨海新区继广东深圳、上海浦东之后，在未来十五年的战略机遇期内，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带动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南快北慢”的局面。

5. 唐山曹妃甸有望成为河北“第一经济增长点”

地处河北省唐山市唐海县的曹妃甸，“面向大海有深槽，背靠陆地有滩



涂”，区位优势明显。它的开发建设不仅能为“北煤南运”和矿石进口等构筑起最为经济、最为便捷的海上通道，而且对于带动整个华北地区工业布局调整和产业升级，增强京津冀区域综合经济实力，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曹妃甸已经成为首钢搬迁的目的地，2005年10月，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在唐山市曹妃甸工业区正式揭牌，这标志着首钢搬迁、曹妃甸钢铁项目建设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今后，首钢、唐钢将强强联手，在曹妃甸工业区建设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钢铁联合企业，一座生态型现代化的“钢城”不久将崛起于渤海湾。首钢搬迁至河北唐山市曹妃甸之后，不仅每年能使北京减少1.8万吨可吸入颗粒物，而且可为北京节省5000多万立方米宝贵的水资源。

按照河北省的战略构想，未来五年内，在曹妃甸，将有总投资1000多亿元的项目陆续上马，成为河北省“第一经济增长点”。曹妃甸，这个渤海湾西岸曾经沉寂多年的小岛，五年后，作为国家“十一五”重大项目集群、未来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将建设4个25万吨级的矿石码头、两个30万吨级的原油码头、16个10万吨级的煤炭下水码头。煤炭码头建设将构筑我国“北煤南运”第三大通道，便于“三西”（内蒙古西、山西、陕西）煤炭运至南方市场。依托原油码头，在这里配套建设我国北方最大的原油战略储备基地，并将建设1200万～1500万吨炼油厂和100万吨乙烯工程。发电厂装机容量达到460万KW，对北京直接供电，对稳定京津唐电网运行发挥重要保障作用。曹妃甸，将成为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也将成为京津冀、环渤海乃至三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为此，河北省在积极争取国家对曹妃甸工业区建设的支持，争取国家将曹妃甸工业区列为京津冀和环渤海区域发展的重点，列入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发展规划，为“十一五”期间更快更好地开发建设创造条件。

二 “十一五”时期北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思路

（一）“十一五”时期北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理念

1. “十一五”时期北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指导思想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态势，以及天津滨海新区新一轮开发和河北曹妃甸

工业区的崛起，北京应当高度关注，积极应对，以我为主，调整战略；力求同赢共好。

应对滨海新区新一轮开发和河北曹妃甸工业区的崛起，“十一五”时期北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整合发展、分工合作、有效竞争、互利共赢。

2. “十一五”时期北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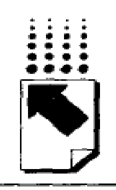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态势，以及天津滨海新区新一轮开发和河北曹妃甸工业区的崛起，北京应该先求强再求大，有所为有所不为，扬长避短，借竞争促创新，通过合作博弈求“同赢共好”。

经济全球化的新态势，以及滨海新区的新一轮开发和河北曹妃甸工业区的崛起，是北京所依托的区域尤其是京津冀经济圈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突破区域竞争力提升困境的重要契机。北京应紧抓这一历史性机遇，将自身发展融入区域发展中，将区域发展的机会转化为增强自身竞争力的机会，推进合作，积极竞争，与区域发展实现有效互动和融合，使制约北京城市能级提升的区域不利环境成为有利于北京城市能级提升的坚实区域支撑，实现国际化都市的北京与其所依托的区域同步腾飞。

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和新趋势下，城市的经营必须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打造核心竞争力是出发点和落脚点。北京利用滨海新区新一轮开发和河北曹妃甸工业区的崛起所带来的发展机会，关键在于借此增强核心竞争力。应充分“扬长”，发挥自身优势，借助滨海新区和曹妃甸工业区强化自身优势；应努力“避短”，讲求发展的效益和效率，与滨海新区及曹妃甸工业区互为补充。

（二）“十一五”时期北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思路

面对天津滨海新区新一轮开发和河北曹妃甸工业区崛起的态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与现代制造业融合的知识型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发达国家中低端现代服务业开始新一轮国际化转移的大背景下，北京应将发展定位调整为打造有别于天津一类的“区域型节点城市”的国际性节点都市，充分利用“首都优势”和人才、科技、信息等比较优势，通过“借力”和“助力”滨海新区新一轮开发与曹妃甸工业区的崛起，在产业方面，在进一步向外转移重化工类传统产业和承接国际化转移的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以自主创新为重点的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做强高端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积极推进现代服务业与滨海新区以及北京的现代制造业的融合，形成相关产业集群；在空间布局方面，整合东部发展带次区域资源，将顺义、通州、亦庄等三个重点新城捆绑在一起，将各自为政的行政管理体制转变为一体化的高效的准政府性管委会，力求京津冀在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发展中实现“同赢共好”。

1.“助力”求同赢共好——通过助力滨海新区和曹妃甸工业区的发展，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北京在区域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随着天津滨海新区跃升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已成事实，以及曹妃甸建设的加速，作为京津冀经济圈中另一个核心——北京，应该助力于滨海新区的新一轮开发和曹妃甸工业区的崛起，以此来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北京在区域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力求实现京津冀同赢。这种“助力”，既可体现在进一步加强京津、京唐间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也可表现为北京和滨海新区以及曹妃甸工业区区域优势的互补，又可以是北京与滨海新区及曹妃甸工业区之间的合作。

首先，以加强交通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拓展京津、京唐走廊，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进一步降低生产要素和资源在滨海新区、曹妃甸工业区和北京东部发展带间流动的商务成本，以此在促进滨海新区和曹妃甸工业区加快开发的同时，巩固北京在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发展的战略地位。

其次，让北京的首都优势与天津滨海新区及河北曹妃甸工业区的港口优势互为补充，让北京的知识经济优势与天津滨海新区的制造业中心和国际物流业中心优势互为补充，让北京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以研发为主的知识型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和滨海新区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海洋化工业以及具有比较优势的电子信息业、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等产业之间互为补充，让北京的高端制造业优势与曹妃甸工业区的电力等清洁能源优势互为补充，形成优势互补，力求总体提升京津冀经济圈在全国经济中的区域竞争力。

再次，滨海新区新一轮开发和曹妃甸工业区的崛起，也为京津冀之间的合作开拓了新的空间，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相互合作：包括产业合作、市场合作、生态环境合作三部分。产业合作中，产业内部上下游的合作和产业间的横向合作，如人才、技术和资金等，在促进滨海新区开发和曹妃甸工业区的崛起的同时，也加强了北京在京津冀经济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市场合作中，区域市场开发方面的合作，如共同培育和做大区域市场，以及区域市场整合方面的合作，如地方性人才、技术、资本市场的跨行政区整

合，在降低滨海新区开发和曹妃甸工业区崛起中的交易成本的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北京在京津冀经济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生态环境合作，一方面是指地处流域上游的北京与位于九河下梢的天津滨海新区生态环境紧密相连，北京加强对大气、水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的治理，减少北京发展成本的外在化，既改善了首都的生态环境，也降低了滨海新区的开发成本；另一方面，也体现在首钢炼钢项目向曹妃甸工业区的搬迁，不是污染的转移，而是按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打造清洁生产、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态型现代化“钢城”。

2. “借力”疏压——通过借力滨海新区的开发和曹妃甸工业区的崛起，进一步打造北京的竞争优势

按照国务院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北京需要加快发展的是与首都城市性质相适应的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的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而亟待有合适的空间向外转移不利于首都发展的传统型产业，特别是污染严重的重化工产业。这就需要借力于发展空间相对广阔的滨海新区和曹妃甸工业区来为这些产业创造置换空间。这样，可以效仿“首钢”型传统产业外迁模式，推进不符合北京城市功能、缺乏比较优势的重化工类等传统产业跨行政区转移。一方面，转移出去的传统产业所腾出的发展空间，能够用来扩展、壮大北京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端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强势产业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滨海新区与曹妃甸工业区内得到拓展、提升的重化工一类传统产业，可以吸引部分原本在或准备到北京就业的外来流动人口前往谋职，以此可以有效缓解北京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快首都产业结构转型和城市功能布局优化、调整，提升和壮大北京的“首都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进而使北京在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发展中占据支配“龙头”乃至整体的中枢位置。

“借力”滨海新区新一轮开发和曹妃甸工业区的崛起，还可体现在进一步利用位于渤海湾枢纽港群海洋运输体系中心、跻身世界港口十强之列的天津港和30万吨级深水良港－曹妃甸港，以及以货运为主的天津滨海机场，拓展北京的出海通道，完善以北京为主要节点的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内陆海空一体、国际国内便捷联系的区域交通网络体系。此外，缺水的北京还可以借力于滨海新区和曹妃甸工业区正在发展、且准备扩大直接利用规模的海水淡化项目，引淡化海水进京，缓解水资源紧缺的压力。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环京津贫困带的现状与发展战略研究

○ 杨连云　李宏民

如果说首都北京是中国的心脏，那么河北省就是中国的胸膛。在祖国的心腹、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2个贫困县（约1065万人口），3798个贫困村，其中有272.6万贫困人口（含低收入人口；贫困标准为625元/年，低收入标准为825元/年）。这32个贫困县全部位于河北省境内，面积8.3万平方公里。分布于张家口和承德的燕山与坝上、京广铁路以西的太行山区（保定市范围内）、沧州的黑龙港流域。截止2003年，冀北地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区）共计26个，省级扶贫工作重点县6个。其中京津以北连片的贫困县有张家口的尚义县、康保县、沽源县、张北县、赤城县、崇礼县、怀安县、万全县、阳泉县、蔚县以及涿鹿县赵家蓬区；承德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县、滦平县、隆化县、承德县；北京西南有保定的涞源县、阜平县、顺平县、唐县、易县、涞水县、曲阳县；天津南部有沧州的献县、海兴、盐山县、东光县、南皮县、孟村回族自治县、肃宁县。

从1994年开始，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河北省通过开发式扶贫、产业化扶贫、对口扶贫、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多种形式，不断加大环京津贫困带的投入，提高了这一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十年来，该地区的部分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但是由于没有采取保护生态和经济发展双赢的有效措施，没有找到协调这一区域发展的有效途径，现在该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和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依然十分严峻，受自然灾害及因疾病返贫的现象还时有发生。

一　环京津贫困带现状分析

1. 与京津地区的经济发展相比存在很大落差

改革开放初期，河北省的32个环京津贫困带的县域经济与京津二市的远郊15县基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但是在20多年后的今天，两者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形成了巨大的落差。2004年，环京津贫困带31个县的县均GDP仅为京津远郊15县区的16.3%，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仅分别为北京市的30.2%、16.0%、1.9%，为天津市33.1%、18.7%、2.3%。如表1所示。

表1　2004年环京津贫困县与京津两市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单位：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人均GDP
环京津贫困县	2163	123	5887
北　京	7172	6402	36833
天　津	6525	5384	31439

注：河北31个贫困县中未包括张家口涿鹿县的赵家蓬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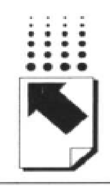
承德贫困县的农民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张家口各县也仅达到2000元。

2. 环京津贫困带的发展潜力要低于全国贫困县的平均水平

2003年，河北省环京津贫困带的县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分别为18415.9万元、3578.2万元和2546.3万元，仅为全国贫困县平均水平的73.8%、70.6%和91.7%。从这些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潜力的指标看，河北省环京津贫困带的发展水平远低于全国贫困县的平均水平。如图1所示。

经济发展潜力差还可以从金融机构的存贷差值看出来，环京津贫困带县均存贷差为29097.6万元，说明由于投资效益差，环京津贫困带的资金正通过金融渠道向外流出。

“环京津贫困带”已成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城乡差别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甚至与西部地区最贫困的“三西地区”（定西、陇西、西海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有些指标甚至比“三西”地区还要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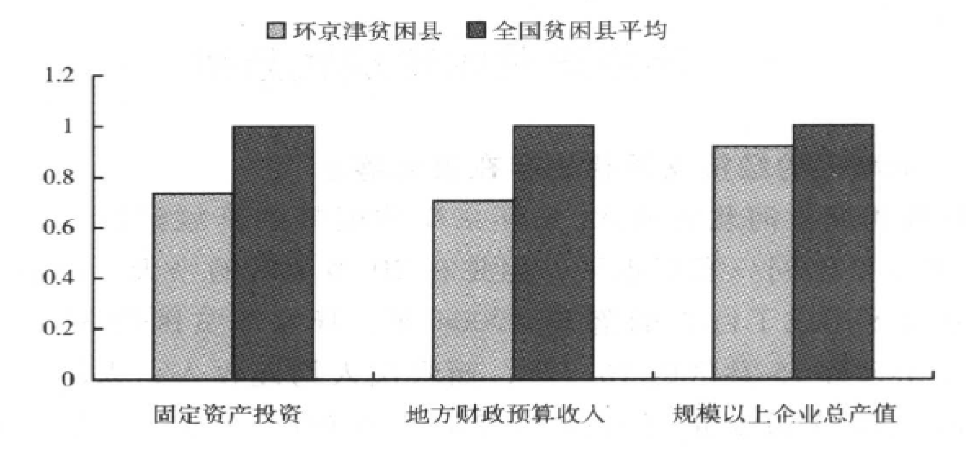


图 1　环京津贫困县与全国贫困县平均发展水平对比

注：全国贫困县平均水平为 1

二　环京津贫困带长期存在对周围地区的影响分析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和长期存在，产生了一系列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影响。

1. 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加剧了京津冀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欧洲的城市”与“非洲的农村”同时出现在半径 100 公里的区域内，像这样在首都周边还存在着大面积贫困带的现象在世界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巨大的经济落差，使首都周边地区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不可避免地造成低素质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城市贫困阶层和贫困居住区，不仅直接影响国际城市形象，也影响首都的社会安全。

2. 环京津贫困带的长期存在，必然影响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

从生态角度看，环京津贫困带内大面积存在的河湖干枯断流、水土流失和污染、土地沙化、草场退化和沙尘暴的频繁发生，已严重影响了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城市供水安全以及大气环境质量。天津、唐山频繁出现供水水荒，首都北京多次供水危机和应急调水，官厅水库失去饮用水质功能，强沙尘暴天气的增多，与环京津贫困带的贫困性生态问题有直接关系。

3. 环京津贫困带的长期存在，必然影响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和关注京津冀区域的发展，着手建立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优势互补的新型决策管理体制和机制，旨在

尽快推动京津冀实现经济一体化，使之发挥出带动我国环渤海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作用。但由于环京津贫困带的存在，使这一区域的发展受到严重的“短板”现象的制约。如果不制定特殊的战略措施和优惠政策，改变这一区域贫困落后的现状，不仅继续影响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也必将会影响我国北方经济的发展，影响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　环京津贫困带形成的原因分析

1. 贫困带所处生态和地理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

环京津贫困带多处于半干旱和半湿润过渡气候带，分别为沙化严重的坝上高原、石化严重的燕山和太行山区、盐碱遍地的黑龙港流域，这一带几百年来一直就是穷困地区。交通和教育基础脆弱，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多发的自然灾害，直接影响这一地区生产条件的改善和工业及农牧业的发展。对生产要素的聚集效应较低，即吸引人才和招商引资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较差。

坝上6县地处高寒区域，海拔1100~1500米，年均气温1.4℃无霜期一般在90~100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仅有300mm，年平均大风日数高达65天。草原沙化面积已达2200万亩，占坝上6县总面积的33%。人工草场和得到人工保护利用的草场只占草场总面积的8%。恶劣的自然条件与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干旱、风沙、霜冻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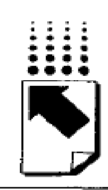
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退化的生态环境，导致全区有限的人口承载力难以适应现有人口的生存和发展。为维系区内众多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土地资源开发呈现出严重过度垦殖和超载放牧状态。区内全部现有耕地中，绝大部分是旱涝难保收的中低产田，水浇地和基本旱作农田只占耕地面积的25%；土地可持续纯收益下降。

燕山和太行山呈现八山一水（干河道）一分田的地貌特征，水土流失严重，燕山森林覆盖率承德25%，而张家口不到3%。该地区农业生产和交通条件很差，难以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规模经济。

黑龙港流域的沧州7个贫困县处于苦咸水区，是中低产田和盐碱地，而且随着地下水位的不断下降，该区的粮食产量呈低而不稳的状态。

2. 环京津贫困带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历史原因，环京津贫困带的基础设施还很落后。一是公路网络化程度低，高等级公路少。县市之间、县县之间、县乡之



间路网状况较差。张家口、承德地区有92个乡未通油路，433个村不通公路。尚义、丰宁两县至今未通高等公路。二是贫困地区电力严重不足，现在的用电指标多是90年代以前核定的，有少部分是1994年以后核定的。随着贫困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电力供需矛盾非常突出。

基础设施落后有其特殊的形成原因，环京津的许多贫困县建国后的许多年都被列入军事禁区，特别是张家口和承德在很长时间内国家对这些县的政策基本上是不修路、不输电、不上工业建设项目。因此，目前，环京津贫困带的基础设施落后是因为历史欠账太多。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交通水电等基础条件差、经费少、工资低且不能及时兑现，很难留住人才，县级和县以下教育、医疗等文化事业极其贫弱。与北京市山水相连的赤城县作为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的拍摄地真实的反映了张家口农村大多数学校缺少经费和教师的状况。

3.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这两个目标没有得到兼顾

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来自河北。在南水北调工程通水之前，河北将为北京和天津的用水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为保证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河北还必须随时为北京紧急供水。

作为京津的水源地，为了给京津提供充足和清洁的水资源，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保障官厅、密云、潘家口等几座大型水库的水源质量，环京津贫困带大规模压缩工农业用水，不断提高企业排污标准，关停了众多效益可观的企业。张家口有44%的地域划入了水源保护区，严格控制大型工业项目和化工企业。宣化老工业基地的萎缩、矿产采选业的滑坡和城市发展迟缓，都与所处的区位直接相关。承德也为此砍掉了200多个工业项目。作为京津的风沙源治理区，为了保护京津的大气环境而实施的封山育林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使得环京津贫困带的农业和畜牧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并且京津两市每年还要投入几千万元的资金和人力用于植树造林、控制水土流失。

问题是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以来处理京津与张家口承德贫困带资源环境关系的办法，不是把贫困带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使这些贫困地区与京津一起发展，而是实行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行政调控和行政命令，要求贫困县必须做出牺牲，而无偿地对京津提供资源。为保护资源环境做出的贡献和蒙受的损失基本得不到有效补偿，少有的一些补偿多属临时性的安抚，补偿标准没有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进行

科学计算，也没有形成制度固定下来，因而不能从根本上弥补贫困地区所蒙受的损失。这种行政调控式的资源分配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不仅使得贫困带的贫困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也无法调动起贫困县生态建设的积极性，使得这些区域贫困和生态恶化的趋势始终得不到根本缓解。形成了国家和京津要生态与市县政府要财政、农民要致富之间的尖锐矛盾。

4. 对环京津贫困带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扶持力度不够，而且缺乏协调不能形成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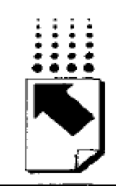
由于投入少，贫困县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太多，生态建设进展缓慢。比如张家口本来造林基础条件就很差，每亩补贴只有 50 元，而北京远郊县达 1000 元以上。

中央和省市政府制订了许多优惠政策，因为缺乏协调性，形不成政策的合力，因而扶贫总体效应差。不多的资金撒了芝麻盐，很难从根本上实现消除区域性贫困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双重目标。各自成体系的扶贫开发和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管理方式，导致众多的扶贫开发工程和生态建设工程达不到应有效果。多年来，区域的扶贫开发工作由各级扶贫办负责，区域生态环境建设或者由各级政府所属专门的项目办公室负责，或者由各级农业、林业、水利、环保等部门分头负责。这种封闭的部门分割的管理体制，使得区域的扶贫开发工作和生态建设工作缺乏统筹考虑，众多政策措施的作用互相抵消，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层次众多的分散管理方式，难以满足流域性生态环境建设和整治的需要。环京津贫困带分布在潮白河、拒马河、滦河、永定河和坝上内陆河、滹沱河等流域。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同一个流域的生态环境建设和整治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应该统筹考虑。但是由于目前环京津贫困带隶属于河北省四个地级行政区（承德市、张家口市、保定、沧州）和 32 个县（区）级行政区，众多的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实行的是从省级、市级到县级的分散管理方式，再加上区域与京津密切的资源环境关系，国家和京津两市也在区域内实施了多项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尽管管理部门很多，但由于缺乏统筹考虑，各自为战，生态工程的安排、建设和维护关系难以协调，不能适应流域性整体生态环境建设和整治的整体要求。而且在一些重大生态工程安排上，存在着重建设安排、轻维护和管理的问题，难以保证重点工程项目的实施和后期效果。

5. 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严重制约了贫困县的发展

河北省北部的市区处在工业化中期，县以下处在工业化初期，很多贫困



县全县没有一家利税超百万元的企业。京承张三角区空间一体化还处在多个地方中心低度均衡阶段。京津冀地区的空间一体化进程尚处于强中心出现，极化进程加快的发展阶段。核心城市北京和天津的能量极尚处于加快提升的阶段，其聚集效应还要加强，区域内梯度还要进一步加大。

在现有的行政区划和财政体制下，地方领导只是地方利益的代表。经济合作只能是共赢的过程。现实的经济发展是政府主导型的，只有外在制度安排形成的利益机制能够促使处于梯度高端的行政区领导为了自身的利益发自内心地关注区域协调发展，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城乡对各种资源的占有、分配和使用存在着巨大的不公平性，从来都是优先保证城市的生存和发展。这不仅促成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还造成了农村人民的医疗、社会保障和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各个方面相当落后的局面。“大树底下不长草”，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吸附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索取远大于给予。首都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确实存在着一种“孤岛效应”。它拉大了贫富差距，深层表现是彻底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发展，结果将把经济上的贫富差距，演变为多层次的区域冲突和对抗。因此，从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其后果来看，这种结构本身也是“城市本位”的体现。现在特别需要深入研究制定符合科学发展观、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关制度安排。

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多年来严重制约了环京津贫困带的发展，如果要实现大发展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提升自身的文化竞争力、制度竞争力和企业管理竞争力。文化竞争力的主要表现是现代市场经营理念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京津冀传统地域文化趋于保守，思想解放不够，谨言慎行的儒教思想、小农思想、计划经济思想以及极“左”的阶级斗争观念根深蒂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不高；制度竞争力主要表现是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政策、政务、市场、法制、人文、硬件等六大环境建设不到位，从而使制度安排的落后对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制约作用；企业管理竞争力方面，计划经济的思想和体制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四　环京津贫困带健康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建立健全区域内的市场机制、互动机制和合作机制，促进京津

冀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是落实《建议》的重要内容。

1. 建立"输血型"与"造血型"相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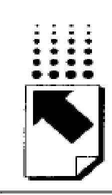
经济外溢理论认为，无论是环境破坏所造成的危害还是环境治理所带来的效益都会外溢到周边地区。环京津贫困地区只有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生态环境目标。要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有机结合，加快环京津贫困带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关键是消除体制障碍，建立长期而稳定的生态补偿机制。这一补偿机制不应是简单的财政转移支付等"输血型"补偿，而应是"输血型"补偿与"造血型"扶持相结合的环京津贫困地区发展权补偿，使外部补偿转化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使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双赢。

河北省针对张家口、承德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较多的实际情况，2003年省委、省政府专门制订了《张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计划到2007年向两个地区投入916.65亿元，改造交通、电力、水利、城建和生态环境，涉及项目77个，其目的就在于为张承地区的快速发展构筑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和良好的生态环境。预计到2007年，两市的基础设施状况总体上接近河北省的平均水平，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环京津贫困带经济发展战略，应该是跨行政区域的、各省市共同参与的协调性战略。它需要中央政府的高位协调与统筹规划，也需要京津冀的积极参与。只有各方的积极参与，才能实现环京津贫困带的经济发展目标与京津冀的生态环境目标的有机统一，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是制定有针对性的财政支持政策，所有大中型生态建设和水资源环境保护工程由中央和京津冀共同投资，适当提高对工程管护补偿标准的政策；加大国家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其次是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一方面确定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内容，包括水资源使用权损失补偿政策、限制传统工业发展权益损失补偿政策、生态工程管护费用补偿政策等特殊的资源环境保护损失补偿政策。另一方面多层次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包括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关补偿的评价标准体系、具体操作程序以及协调和监督管理机制，形成完善的生态补偿体系。过去北京、天津给予了河北省很多援助补偿。但这些援助补偿都不是以水资源补偿的名义，而是以其他项目来体现的。而且这些援助并不固定，这种补偿应该形成有效机制长期坚持下来。

建立由中央牵头的京张、京承水资源环境保护协调组织，协调两水库上游水资源环境治理项目的实施；争取建立水资源保护合作专项资金，支持两



库上游地区开展水资源环境治理和节水产业开发。

河北省张、承等市的关于京津冀生态环境一体化体系建议强调的是建立水资源的有偿使用机制。北京提出的协同治水还是希望区域内各方，在2001年国务院批准的《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和《京津风沙治理规划》框架内，进行在水资源保护开发和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合作。这一《规划》在河北省共安排城市污水处理、工业污染治理、工农业节水、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农业建设五大类、160个项目，总投资39.84亿元。

《规划》计划在承德地区的节水灌溉、河流生态治理等项目上总投资15亿，而实际上截至2004年底，承德地区只获得不到3亿元的资金。为了给北京提供安全的水，从1989年至今，承德市在潮河上游生态治理、水土保持、节水等方面的投入累计已经超过20亿元。

京津冀的水资源分配补偿问题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立健全合理的市场化的水资源配置机制，是区域合作的当务之急。京津冀地区可以借鉴像浙江义乌的水权交易形式，及早地建立水资源的互利机制。生态补偿涉量化公式的分析研究与演算，应该由水利和经济方面的专家来完成。

2. 按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需要，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提。环京津贫困带能否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中受益，能否实现高效的以产业为核心的市场化整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区域内合作的质量与水平。突破目前以行政区划为主的单一模式，向跨区域共同大市场为目标的经济区划实现重大转变，实现京津冀三方合作制度不断创新，这是河北省主动融入京津冀都市圈，实现产业升级，壮大自身实力的现实需要，也是提升京津冀地区整体形象和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所在区域内各级政府都应共同关注和积极参与，以在推进信息、市场、产业、科教、旅游和环境等区域一体化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没有一、二、三产业的大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大发展不可能有区域经济的大发展，在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更是这样。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核心是产业的转移与合作，对河北而言特别是地方特色产业集群的大发展。张承地区在与其他省市区的经济合作中一定要把产业发展放在突出的地位。只有产业发展才能给本地区带来巨大的社会财富。首先，从京承张三市产业的整合关系看，不能只着眼于生态环境的建设，只把张承地区作为北京的绿色食

品生产和供应基地，还应该同时加强占国民经济比重较高的第二、三产业间的协作关系。其次，从产业组织的整合进度看，一定要建立政府之间和企业之间的两套合作机制。今后应该加强政府引导的作用，统一规划，建设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区域内各城市发展的梯度性和互补性。必须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各自的战略调整。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对京津冀的产业结构调整，应该根据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行分类指导。河北省是农业大省和基础原材料大省，其发展除主要靠自身的努力以外，还需要通过“服务京津、建立统一市场”来实现，进一步满足河北省对资金、项目、技术、人才的需求。

北京和天津科技竞争力强，应该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传统产业转移出去，以缓解城市密度过大的压力，提高自己的产业结构层次和整体实力。2008 年绿色奥运，传统的冶金、建材、化工等工业企业只有外迁，这给河北带来了大力发展和提高这些产业的机遇。

而张承地区人均资本少、人均技术资源少、劳动力资源丰富，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用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走低污染、低消耗、高效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做大做强钢铁、建材、化工、制药、机械装备、能源、食品等主导产业，同时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旅游和信息等新兴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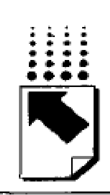
企业之间跨区域合作的另一种形式，是联合建立产业基地。如宣化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北汽福田签署生产汽车构件项目；北新建材集团、北京金隅集团星牌建材有限公司与张家口市合作开发新型建材（岩棉）项目；到张家口坝上四县投资风能发电的业主已经有 15 家，签订开发意向 28 项，开发协议共计 1258 万千瓦。

张家口、承德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全部经济工作必须以招商引资和扩大就业为中心。争取大项目是为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就业是为增加人均收入。

招商引资工作要注意五点：一要以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为前提；二要以效益好的大项目为中心；三要以专业化招商队伍为主体；四要以信息和网络为基础；五要以跨国公司和中央大企业及沿海发达省份的民营企业为主要招商对象。与京津的名牌大学和重点科研院所加强市校合作、校企合作。

3. 环京津贫困带各县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愤图强，强化自我发展

尽快改变环京津贫困各县的贫困面貌，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在经



济转型时期，服务到位（即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对经济社会进行管理）的政府是最为忙碌的政府。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最主要的还不是资源和硬件条件，1978年温州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水平并不比环京津贫困县强多少，从其发展的历史可以得出结论，文化竞争力、制度竞争力和企业管理竞争力是决定区域经济发展快慢的关键因素。应该以思想的大解放带来大开放、大招商、大发展。

现在环京津贫困带各县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方面与南方相比还是落后。主要表现在劳动者的解放、经营者的解放、所有者的解放三个方面都做得不够。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把分散的生产要素按生产要求集中起来并依照社会需求灵活地运作起来，把资本和劳动两者的积极性都充分地调动起来，让一切创造出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这是摆在贫困县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和根本问题。一要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保护所有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二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三要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要克服等靠要思想，强化内在动力，振奋自强精神。立足本地实际，明确发展思路，发挥比较优势，壮大主导产业，实现经济发展的新跨越。县域经济的发展，要按照“一特三化”（特色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思路因地制宜谋划立县立乡的大项目，没有增加财政收入的大项目和扩大就业的大举措县域经济不可能有大发展。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榜样。按照开发与保护并重、生态建设与脱贫致富结合的方针，谋划建设带动全局发展的重点项目，构建面向京津的能源基地、产业转移基地、农副产品加工基地和劳务输出基地。充分发挥运输通道和陆路商埠的优势，建设面向“三北”的物流中心和旅游服务中心。结合国家生态工程项目的实施，加快集约圈养型畜牧业和动植物繁种业的发展，壮大以奶肉果蔬和生态旅游为主的生态经济产业。

北京奥运为京津冀区域旅游和商务活动带来了巨大商机，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张家口承德要在支持奥运、服务奥运的同时，充分利用奥运经济创造的良好经济环境，加速形成国际投资青睐的“三小时经济圈”。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京津冀服务业区域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刘　重

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服务业的发展。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基本思路形成之后，京津冀区域的产业分工和协作的目标愈益明朗。在京津冀产业构成调整和变化的过程中，有必要对京津冀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加以客观评价，对京津冀服务业发展以及内部结构变化趋势，展开前瞻的分析和预测。

一　京津冀经济区服务业发展现状与特征

1. 京津冀经济区服务业发展水平

在现代经济中，服务业是增长最快的行业，现代服务业的兴旺发达程度已经成为衡量城市现代化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发达的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经济中心城市的显著标志之一。京津冀经济区是我国北方和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区。京津冀经济区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以及辐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服务业总体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2004 年京津冀经济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国的比重为 11.70 %。其中，第一产业占全国比重为 7.59%，第二产业占全国比重为 10.78%，第三产业占全国比重为 15.21%。

2004 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283.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3.2%，增幅提高 2.5 个百分点，为 1995 年以来最高增速。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102.9 亿元，增长 1.9%，增幅下降 1.4 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的比重为 2.4%；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1610.4 亿元，增长 16.7%，增幅提高 4.8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为 37.6%；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2570 亿元，增长 11.6%，增幅提高 1.3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重为 60 %。

2004年北京第二、三产业比重达到97.6%，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比重上升1.8个百分点。2004年天津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270亿元，比1990年增长11.2倍，平均递增12.5%；服务业占GDP比重由1990年的33.5%上升到43.3%，平均每年提高0.7个百分点。中心市区服务业比重达到87.3%。天津第一产业的比重为3.5%，第二产业的比重为53.2%，第三产业的比重为43.3%。河北省服务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38.48亿元扩大到2004年的2763.1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26年间增长了21.5倍，年均增长12.7%。同期河北省国内生产总值由183.1亿元增加到8836.9亿元，增长了12.3倍，年均增长10.5%。200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1.3%，比1978年提高了10.3个百分点。河北省第一产业的比重为15.6%，第二产业的比重为52.9%，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1.5%。

表1　2004年京津冀经济区产业占全国的比重

单位：亿元，%

	GDP	第一产业	比重	第二产业	比重	第三产业	比重
全　国	136515	20744	7.59	72387	10.78	43384	15.21
北　京	4283.30	102.9	2.4	1610.4	37.6	2570	60
天　津	2931.90	102.30	3.5	1560.20	53.2	1269.40	43.3
河　北	8768.80	1370.40	15.6	4635.20	52.9	2763.20	31.5

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统计年鉴。

2. 京津冀区域服务业发展梯度差

衡量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静态指标即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反映的是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另一个是动态指标即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反映的是服务业发展的快慢。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京津冀经济区服务业增长速度加快。

“九五”时期，京津冀经济区服务业增加值年均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其中，北京市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为11%，天津市为11.5%，河北省为11.1%。“十五”前四年，北京市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14.1%，天津市为14.1%，河北省为16.2%。但是，在京津冀经济区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同时，京津冀经济区服务业发展的也存在着梯度差。从人均服务业增加值

分析。1996 年北京人均服务业增加值 6744 元，2000 年为 10595 元，2004 年达到 12400 元。天津 1996 年人均服务业增加值 4718 元，2000 年为 7448 元，2004 年达到 12400 元。河北 1996 年人均服务业增加值 1677 元，2000 年为 2553 元，2004 年达到 4058 元（见图 1）。通过以上数据，我们看到京津冀经济区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存在着明显的梯度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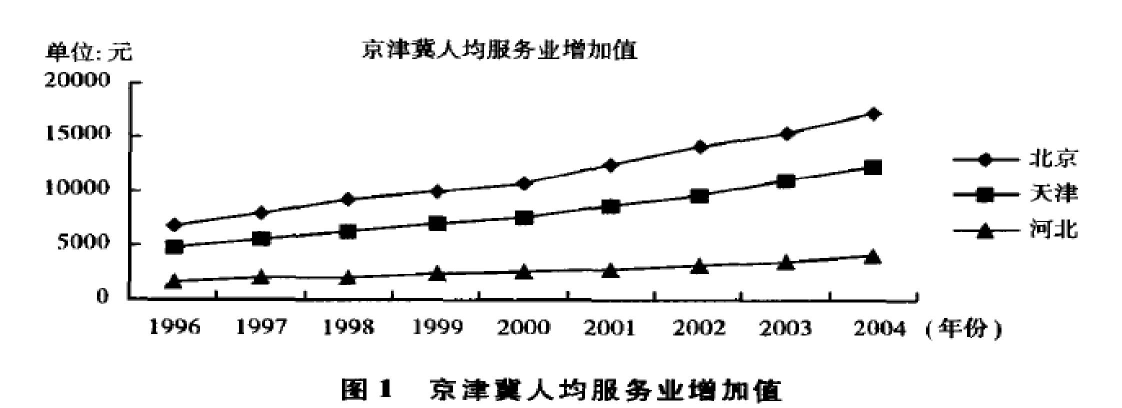


图 1　京津冀人均服务业增加值

资料来源：2005 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统计年鉴。

3. 京津冀经济区服务产业发展的不均衡性

京津冀第三产业的变化和发展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后工业化型。按照国际公认的定义，一个国家服务业的产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50% 时，就认为该国家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和服务业高度集聚区。北京服务业的发展和变化，基本反应了我国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变化规律。从第一产业来看，1996 年北京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为 5.2%，2000 年为 3.6%，2004 年下降为 2.4%。从第二产业来看，1996 年北京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为 42.3%，2000 年为 38.1%，2004 年下降为 37.6%。而第三产业 1996 年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为 52.6%，2000 年为 58.3，2004 年上升为 60%（见表 2）。北京国民经济中三次产业的比重由 1996 年的 5.2∶42.3∶52.6 演变为 2004 年的 2.4∶37.6∶60。2004 年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比 1996 年提高了 11.4 个百分点。

第二，发展中工业化型。天津是一个特征比较明显的发展中工业化型。这种类型表现为：①在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呈下降趋势。1996 年天津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为 6.4%，2000 年为 4.5%，2004 年为 3.5%。②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基本上同步增长，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变化不大。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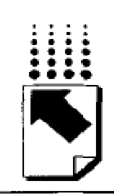


表 2　京津冀产业结构比重变化

单位：%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北京	天津	河北	北京	天津	河北	北京	天津	河北
1996	5.2	6.4	20.3	42.3	53	48.2	52.6	40.6	31.5
2000	3.6	4.5	16.2	38.1	50.0	50.3	58.3	45.5	33.5
2001	3.3	4.3	16.4	36.2	49.2	49.6	60.5	46.6	34.0
2002	3.0	4.1	15.6	34.8	48.8	49.8	62.2	47.1	34.6
2003	2.6	3.6	15.0	35.8	50.9	51.5	61.6	45.5	33.6
2004	2.4	3.5	15.6	37.6	53.2	52.9	60	43.3	31.5

资料来源：2005 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统计年鉴。

年天津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为 53%，2000 年为 50.0%，2004 年为 53.2%，这种现象说明天津在产业结构中工业发展潜力和需求依然强劲。天津国民经济中三次产业的比重由 1996 年的 6.4:53:40.6 演变为 2004 年的 3.5:53.2:43.3。

第三，欠发达工业化型。这种类型表现为：①第一产业下降速度缓慢，而且比重较大。1996 年河北第一产业为 20.3%，2000 年为 16.2%，2004 年为 15.6%。②第二产业增长强劲，第三产业增长较慢。1996 年河北第二产业比重为 48.2%，2000 年为 50.3%，2004 年则达到 52.9%。

河北国民经济中三次产业的比重由 1996 年的 20.3:48.2:31.5 演变为 2004 年的 15.6:52.9:31.5 。这说明，河北第三产业的发展已经明显落后于第二产业。2004 年，河北省服务业实现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31.3%，不仅与 60.7% 的世界平均水平差距甚远，也明显落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 37% 的平均水平，比 31.9% 的全国平均水平还落后 0.6 个百分点，在 31 个省市区中仅高于河南与黑龙江两省，居第 29 位，与北京市相差 28.7 个百分点。比天津市低 12 个百分点，比辽宁低 9.8 个百分点，比山东、山西、内蒙古分别低 0.9 个百分点，比东部沿海省份平均水平低 6.7 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比重为 25.9%。

4. 京津冀服务业的结构性矛盾

京津冀区域的服务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依然存在着不均衡的结构性矛盾。北京服务业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超过英克尔斯现代化标准（即 45% 以上）的要求，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首都和重点城市服务业（比重一般在

60%～80%）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但仍明显低于东京、华盛顿、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的水平。1997年东京服务业的比重已达到82.6%，华盛顿为79.8%，纽约为85%；1998年汉城为82.3%，澳门为90.3%；2000年香港为86.7%。

2004年天津市第三产业占整个GDP的比重为43%，而北京、广州、上海这一比例分别是60%、53%、48%。从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看，天津分别低于北京、广州、上海17、10和5个百分点。天津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依然偏低，内部结构仍以传统服务业为主，多半是零售、餐饮、旅游等传统服务业，而金融保险、信息与科技、会展、中介服务等新兴服务业比重偏低，发展比较分散，没有形成集聚发展态势。能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的服务产品不多，商品集散功能减弱。

2004年，河北省服务业增加值总量居全国第7位，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两大传统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26.2%和24.9%，分别居全国第2位和13位；而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科技、居民服务业等行业在内的其他行业仅占34.9%，分别居全国第19位、25位和19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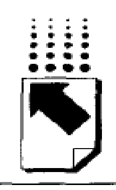
二　京津冀区域服务业未来发展的趋势预测

1. 技术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发展迅速

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升级。在三次产业出现结构性变化的同时，服务业内部结构也在不断地变化。具体表现为，服务业从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向以资本密集型为主，并正在进一步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为主的服务业转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革命，生产中的生产要素不再只有土地、劳动力、资本，而更多的是技术和知识要素，并且它在生产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且越来越重要。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产生和传递主要是通过信息业完成的。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比较优势将逐渐弱化，信息比较优势将成为服务业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对社会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京津冀区域服务业的未来发展要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出现的新趋势，大力发展知识、技术高附加值服务业。

2. 生产性服务业仍将占据主导地位

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这决定了第一、第二产业在社会发展中不



可动摇的基础作用，从而决定了生产性服务的主导地位。生产性服务业是社会化分工的结果，是从企业内部的生产服务部门分离和独立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特征是：服务对象是作为生产者的企业而不是作为消费者的个人。生产性服务业提高了产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和增长效率，生产性服务作为产品生产或其他服务的市场化的中间投入，具有高人力资本、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特征。现代经济结构中，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是互动的，制造业整体水平和产品品质的提升，依赖于服务附加值的投入，制造业产品中追加服务价值的大小，决定了该产品的质量和档次。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支撑制造业的循环架构，帮助制造业增强作业连续性，提高生产率，降低可变成本，促进规模化生产。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市场经营的难度和风险加大，产前服务，如研究开发服务、设计、市场调研和可行性研究服务等；产后服务，如广告服务、营销服务、包装服务、运输服务等将需求强劲，发展迅速。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而且还呈现出加速增长趋势，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服务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3. 国际外包服务的全球化趋势渐强

在经济全球化和企业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的形势下，近年来发达国家的企业纷纷将其经济活动外包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承接外包业务的合作伙伴，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被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外包体系中。从服务外包的输出国来看，全球服务外包的最大输出国是美国，占市场份额的70%，其次是日本和一些欧盟国家，占市场份额的30%。从服务外包的承接国来看，早期承接外包业务只有印度、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及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国家，现在承接外包业务的国家已经呈现出全球化趋势，其中既有加拿大、爱尔兰等经济发达国家，也有新加坡、中国台湾等新兴经济体，还有印度、中国、俄罗斯、菲律宾、马来西亚、墨西哥、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因此服务外包的全球性现象也正在引起全球各国政府和企业的广泛关注，服务外包成为全球化趋势。

4. 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愈趋融合

所谓产业融合，就是各产业边缘地带的碰撞。当前，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出现了融合发展的势头。这种融合更多地表现为服务业向制造业渗透，特别是与生产过程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作用于制造业的生产流程。生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密切，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界限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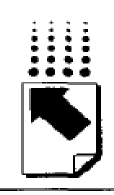
来越模糊，两者间并非简单的分工关系，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趋势。这是因为一个制造业的生产与产前、产后服务是一条链子上的不同环节，而不是截然分开的两块。现代制造业在重视生产环节的同时，更加重视产前产后服务。产前服务除研究开发外，还包括人员培训、经营管理、会计服务、信息服务等能够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服务；产后服务则包括运输、仓储、通信等能够创造价值，满足最终需求的服务。随着现代服务业向生产领域渗透和融合，企业的经济活动由以制造为中心逐渐转向以服务为中心，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也是现代服务业的最终发展趋势。

5. 城市产业聚集和结构优化拉动服务业发展

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影响城市的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而且促进了城市功能的转型与优化，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比如，生产服务型企业的发展可促进中心商务区（CBD）功能的升级和形态的转变；促进信息共享、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导城市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优化。随着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转化，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内部分化，逐渐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由于城市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度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中心高度集中，制造业从中心退出，使得城市日益成为信息和服务的中心，城市的结构功能更加优化。由于生产性服务部门聘用的多为高技能、高收入的人群，他们的需求促使城市的消费水平和服务质量提高。城市的服务质量及管理功能的提高又将吸引更多的高技能人员，这为生产性服务部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供招聘的人员。

6. 专业化服务是服务发展的现代趋势

基于新技术变化基础上的产业分工格局发生了迅速而深刻的变化。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技术的发展，使许多重要的制造业部门技术升级的速度大大加速，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同时，技术系统的复杂性迅速增加，任何企业都难以独立掌握全部与其发展相关的技术和制造能力，这种变化促使每个企业都趋向更加专注于产业链条中某个或某些价值节点，即更细致的分工开始形成。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和市场不断扩展，产品的制造过程被分解成为一个个专业化的节点，大量的中间产品和加工过程独立出来，此时，联结这些节点形成分工网络的必要性就显现出来。因此，专业化服务是服务发展的现代趋势。



三　对加快京津冀服务业区域发展的建议

1. 制定构建京津冀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思路

北京特殊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决定了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并辅以现代制造业的经济发展战略。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创新发展思路，以“合理布局、完善功能、提升能级、突出特色”为原则，以制定“十一五”规划为契机，尽快制定京津冀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具体措施。通过加强区域规划，调整市区域用地结构，提高服务业用地比重，加快建设各具特色的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积极支持面向城镇的新型服务业发展，改变京津冀各自为战的市场自发状态，从整体战略布局上推动京津冀现代服务业发展；通过加强产业规划，确立产业定位，选准发展重点，加快发展以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现代商业等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

2. 积极推进京津冀现代服务业的市场化进程

良好的发展环境，是现代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进一步加快市场化建设，构建完善规范的现代服务市场体系。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突破体制障碍，积极推进非基本服务行业的资源配置由政府为主向市场为主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放开市场准入领域，降低市场准入标准，引入竞争机制，允许更多外资、民营企业参与京津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深化服务业企业改革，推进产权多元化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在市场性整合中扩大企业规模，扶持京津冀服务业龙头骨干企业的发展，做大做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京津冀现代服务业集团。进一步加快社会化建设，整合完善现代服务业的社会化服务。引导工业企业，将其核心竞争力之外的附属服务剥离为社会化的专业服务，扩大现代服务业的需求；积极推进后勤服务由内部自主服务为主向社会服务为主的转变，企事业单位尤其是政府机构，其后勤服务要面向社会开放。

3. 提高京津冀现代服务业行业水准和效率

大力推进京津冀服务业科技进步与创新，发展高附加值服务业，加大科技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含量和渗透，优先发展技术含量高、关联性大的现代服务业，积极运用现代经营方式、服务技术和流动组织管理手段，改造传统服务业，全面提升企业素质、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形成

符合现代服务业技术进步要求的新机制，有效整合京津冀科技资源，促进科技成果在现代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加快推进京津冀服务业信息化进程，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信息技术推广和使用为重点，逐步实施“数字京津冀”工程，加强信息技术对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产业的改造和提升。

4. 加快服务业人才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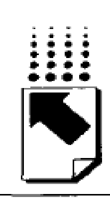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人的素质是关键。京津冀需要将服务业人才政策提高到与高新技术产业人才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从以国内外“猎头”为主转向建立更基本的人力资本自我积累机制，有计划地在现有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增设服务业紧缺的专业，建立多渠道人才培养机制，加快培养服务业所需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北京地区的教育发达，重点高校占全国的1/4，全国高校有300多个博士点，北京占全国1/3，硕士的规模占全国1/5。此外，中国工程院院士一半以上分布在北京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要为京津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撑。发挥北京人才积聚优势，加强京津冀岗位职业培训网络建设和服务业职业资格标准体系。

5. 扩大开放，推动京津冀生产服务业发展

京津冀各类服务业的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是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措施。那种只以为制造业领域的跨国公司掌握先进技术的想法是不全面的，在服务业领域，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在产品设计、技术诀窍、管理技术和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要大于在制造业方面的差距。而且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跨国流动会产生更明显的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因为服务业所有的业务都要通过对客户的服务来实现，很难进行技术保密，母国公司与海外子公司的技术水平基本相当，不可能像制造业那样，将“技术水平高”的业务留在母公司，只将“中低水平”的业务转移给海外企业。可以预计，服务业扩大开放将推动京津冀服务业加快发展和提高竞争力。

6. 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转移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跨国公司不断进行产业调整和产业转移，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跨国公司产业调整和转移的第一次浪潮是将产品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主要是将一些技术相对成熟的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去生产。跨国公司产业调整和转移的第二次浪潮是将产品价值链上的非核心业务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



区，全力发展核心业务。目前，跨国公司产业调整和转移的第一次浪潮尚未结束，第二次浪潮又相继到来。值得注意的趋势是：随着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布局和国际间产业转移战略，近年来跨国公司制造业向国外转移速度已经开始放缓，而服务业特别是以国际服务外包为主导的生产服务业越来越出现上升势头。

主要参考资料

刘重主编《现代服务业发展与预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麦特思：《服务运营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高斯：《美国商业服务外包方兴未艾》，华盛顿观察周刊（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第29期，2004年8月。

田贞余：《国际外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经济论坛》，2004年24期。

《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

拉胡·森、M. 沙伊杜·伊斯兰：《全球外包浪潮中的东南亚：趋势、机遇与挑战》，《东南亚纵横》，2005。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

京津冀区域科技合作：基于河北的分析

○崔 巍　颜廷标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区域经济一体化速度明显加快。如果说前几年讲区域经济一体化只是停留在讨论和研究层面的话，在“十一五”期间则进入了实施阶段。由于地域相近、文化同源等原因，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单元”已经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认为，科技合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点之一，如何推动区域科技的紧密合作，形成有效的互动已经成为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一　河北与京津间的实力落差较大，其深层原因来自科技

从近年来，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合作进程正在不断深入展开，相比较而言，京津冀区域则显得进展缓慢，甚至区域内部经济水平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如表1所示。

表1　2004年京津冀主要经济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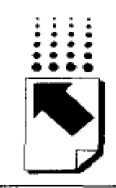
单位：亿元，元，%

地　区	GDP	人均GDP	财政总收入	三次产业结构
北京市	4283.3	37058	744.5	2.4:37.6:60.0
天津市	2931.9	31550	502.1	3.5:53.2:43.3
河北省	8836.9	13017	781.0	15.5:53.2:31.3

资料来源：《2005年天津统计年鉴》、《2005年北京统计年鉴》、《2005年河北统计年鉴》。

1. 从GDP增长的角度看

虽然河北在地方生产总值上高于京津，但以三省市人均GDP来衡量，



京津两市分别为河北省的2.84倍和2.42倍，反映出河北省与京津两市存在着较大的经济落差。从2004年地方生产总值的增速情况看，三省市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反差：北京为13.2%，天津为15.7%，而河北则仅为12.9%。这样的发展状况只能表明河北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京津的差距正在进一步增大，这是区域内部较为严峻的现实。

2. 从三次产业结构的角度看

北京的产业结构为2.4:37.6:60.0，第三产业已经基本稳定在60%的水平上，"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已经较为稳固。天津的产业结构为3.5:53.2:43.3，第二产业比重还呈持续上升趋势。而从河北的产业结构看其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15.5:53.2:31.3，与天津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可比性，反映出河北与天津均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天津较高的人均地方生产总值则更加说明了河北经济增长的质量相对较低。

实质上看，总量上的先进与人均上的落后以及产业结构水平偏低等情况正是科技支撑力不足的必然反映。其一，河北经济的综合竞争力不强，大中型企业所形成的产业链条处于较低的科技水平上，并由此进一步导致科技资源、人力资源等方面缺乏高效配置，最终深层次上决定了人均GDP水平的落后。其二，部分传统优势产业缺乏技术创新，竞争优势正在消失。河北省的优势行业主要集中于资源开发领域，在制造业中产值排名前10位的行业如：黑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选洗业等，由于过分的依赖资源而形成了较强的技术锁定效应，急需引进新技术进行产业转型与升级，由初级产品生产向后序商品的深加工转移。

总体来说，河北省是一个经济大省，但不是一个经济强省，其直接的原因是科技创新能力低，这是河北省诸多问题的集中指向。只有解决科技创新能力低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才能使河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一个良性的发展轨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京津冀内部经济水平持续拉大的不良局面，推动京津冀区域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第三驾马车"。

二　河北与京津从资源到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有利于科技合作的全面展开

所谓科技合作，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科技资金投入、科技人才、科技成

果、科技管理等方面，从合作类型上看则包括知识创新、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应用、科技服务、生态恢复和污染治理等重大科技问题合作等。根本上讲加强京津冀区域科技合作就是要推动京津冀三省市在科学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共同提升，达到科技资源的最优布局与成果转化效率的最大化。

1. 京津冀在科技资源领域存在着良好的互补性

京津两市是全国的人才高地，拥有多家著名学府和一流的实验室。就天津而言，共有7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0多家部级重点实验室、8个市级科研中心；9家国家级工程中心，15家部、市级工程中心，7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就北京而言，目前拥有各类中央及地方院所393家；在京工作的两院院士675人，占全国的49.8%；国家三大科技计划973计划、863计划、攻关计划（重大工程技术研究）每年在北京投入的项目和经费约占全国总量的四成左右，是全国名副其实的科技中心。京津的科技资源是河北所不具备的，同时也是河北发展科技所急需的。河北虽然有一些国家级的基地，但尚不能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广泛支撑。京津冀在科技资源领域上所存在的极强的互补性，为河北展开广泛的科技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京津冀产业梯度明显，产业结构呈明显的互补状态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京津冀的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北京市第三产业水平较高，且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达到了60%以上；天津市第二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而河北省第一产业水平较高，具有比较优势。可以说，三省市虽然都面临着发展产业科技、优化产业结构的问题，但重点不同，随着产业梯度转移的不断推进，三省市间以垂直分工为主的互补式合作还会持续存在，这为产业科技的相互对接与深入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3. 河北与京津在科技发展的定位、目标上呈长期的互补态势

如表2所示，从京津冀科技发展的定位与目标来看，既有相同的趋势即都要建成功能完善的创新体系，同时在中长期实现的程度上呈梯度推移，这为京津冀区域科技合作打下了长远的战略基础，同时也为河北省发展科技提供了重要的依托和保障。

整体来看，河北与京津进行全面科技合作的时机已经日趋成熟，科技合作的基础与条件均有利于三省市的深入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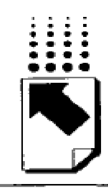


表 2　京津冀三省市科技战略定位情况简表

城市	目标定位	科技规划目标	最新的科技战略定位的相关研究或决策信息
北京	北京的目标定位主要有四个方面：国家首都即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世界城市即世界级服务中心；文化名城即文化、教育、科技创新中心；宜居城市。	把北京建设成为以知识创新为先导的全国技术跨越的创新源、以高度信息化为特色的全国创新、创业最具活力的地区，促进北京成为全国知识经济发展基地，推动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提出将首都创新系统建设成为全国创新网络的中心节点。北京是我国现实的知识创造中心（基地）。最有可能成为国际技术和知识创新中心。
天津	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港口大都市，我国北方经济中心，建设生态宜居城市。	创建国内一流的科技强市，建成支撑天津市科技和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形成完善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机制，科技和经济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显著增强。	到 2010 年把天津建成较高国际化程度的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到 2020 年，成为国际创新型城市；2050 年成为国际知识型城市。
河北	中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生产与加工基地；现代物资流转中心与贸易集散地；重要的人才培育中心与信息交流基地。	知识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形成与京津密切协作、流动互补的新格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明显增强；科技进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发达国家 90 年代末期水平。	到 2010 年，初步建成层次清晰、网络互动的区域创新体系；到 2020 年，知识流动能力显著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进入全国先进行列，技术创新环境有突破性改善。

资料来源：北京、天津、河北的科技发展规划。

三　在京津冀科技合作中河北着重解决的问题分析与合作思路

京津冀在科技领域有广泛的合作前景。对河北而言科技合作首先意味着通过合作加快对自身科技发展问题的改进，最终实现自身科技水平的全面提升。

就河北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而言，急需在合作中从四个方面进行改进。

其一，通过科技资源合作，弥补科技投入水平不足。在人才方面，河北虽然存量较大，但人才外流现象严重，高层次的科学研究与农业科技人才比重低、欠缺大，导致人力资源供给层次偏差。在资金方面，河北多年来的科技投入始终以政府为主体进行，然而科技投入需求的快速增长使得相对较弱

的财政实力无法实现持续支撑。因此，河北在与京津的科技合作中最为直接的受益来自与科技资源的共享。

其二，通过产业技术合作，提升科技投入产出效率。河北省产业基础相对较强，在进一步发展中应有较强的科研成果转化与推广能力。但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的资料显示，河北省科技创新的经济绩效在全国的排名由 2001 年的 16 位下降至 2002 年的 20 位，突出反映了河北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的现实。通过京津冀产业技术的合作，河北应加快产业科技创新的发展步伐，尽快使经济发展走到依托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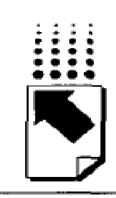
其三，通过创新体系对接，提升科技流动能力。河北科技的中介服务市场发展严重滞后，缺少一支结构合理、功能齐全、高素质的中介队伍。与此相应，河北的技术扩散与吸收能力也相对较弱，2001 年全省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在全国仅居 24 位，技术合同引进在全国居 21 位，明显反映出全省借"智"发展不足，缺乏在流动中利用外部科技资源的能力。通过京津冀区域创新体系的完善与对接，河北的科技流动能力必然得到不断的加强与水平的提升。

其四，以科技合作为主导，推动科技创新环境的改造。《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资料显示，河北的技术创新环境在全国的排位由 2001 年的 15 位下降至 2002 年的 19 位，反映出以体制创新为核心的环境建设不良。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京津冀科技合作的契机，加快改进的步伐。

综上所述，在区域科技合作的过程中，河北的主要思路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科技为重点，加快京津冀科技资源的流动与优化配置，积极推动创新环境的改良与优化，最终建成功能开放的科技创新体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就是要尊重市场的选择，把最佳的科技创新与最佳的市场需求结合起来；以企业为主体，就是要进一步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加快产业科技的创新步伐；从而达到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改善河北省科技发展环境的目标。

四　京津冀科技合作过程中河北的模式选择

京津冀科技发展差异较大，因此在科技合作中应根据不同的合作类型、特点，选择相对应的合作模式。具体而言，京津冀科技合作应着重考虑四方面特点：其一，京津是科技的辐射源而河北则主要发挥承接以及知识扩散的



作用；其二，京津冀三省市间的产业梯度是科技合作的产业基础，对于河北而言应积极在产业结构的互动过程中寻求深入的合作；其三，河北拥有广阔的腹地和较为丰富的资源，环京津区域应更着重于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等高技术领域的合作；其四，京津冀三省市政府间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搭建公共的平台和网络，一方面共同应对区域各类安全、公共卫生等问题，另一方面要为科技资源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搭建良好的交流平台和区域创新网络。

1. 以服务中介为中心的科技流动模式

要充分发挥河北省在京津冀区域中承接以及知识扩散的作用。首先，应以科技中介为中心，加大对京津科技辐射源的吸纳和承接，在全省构筑网络化的科技流动渠道，把河北转变为京津首要的科技“呼吸场”。其次，要加快河北成果转化基地和制造中心的建设，在吸纳京津科技辐射的同时，加强河北的成果转化和二次创新能力，依托制造业优势，实现高水平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制造功能。

2. 以产业梯度为依托的产业结构互动模式

基于京津冀三省市经济落差较大的现状，京津冀要建立良好的产业互动模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河北要发展制造业高地，就必须充分利用京津两市高新技术产业的优势，加快在产业科技领域与京津的深入合作，形成产业结构互动的良好局面。其二，要抓住产品创新的环节，强化河北省大中型企业的创新能力，积极推动京津冀企业在产品设计、集成、控制等方面展开广泛合作，实施不同的分工协作模式，这样不但可以优化人力资源、资金的区域配置，同时还可以逐步形成企业集群，发展“块状”经济。其三，加快第三产业如旅游业、文化产业的合作，通过产业结构的互动，不断把科技合作推上新的台阶。

3. 以环京津区位为优势的技术产业园区模式

京津两市是国内科技资源最为密集的都市之一。产业技术园区模式，就是要充分发挥京津科技资源优势，在“一线两厢”的发展框架下，以环京津区域为核心，加快环京津创业带的发展，努力形成分工合理、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布局，切实提高京津冀科技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实现科技合作对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支持力度。

4. 以创新体系建设为共同目标的政府科技合作模式

目前，京津冀的科技合作尚未达到高度市场化的程度，因此政府部门的

推动对京津冀的合作进程至关重要。京津冀三省市的政府部门，必须尽量消除在人才、成果项目、资金流动和市场交易方面的壁垒，积极推动要素的优化配置，鼓励各区域内企业间的相互投资、参股，为投资方提供便利条件，抑制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并最终建成高效运作的区域创新网络体系。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京津应着重落实两点：其一，推动信息资源的合作开发和共享，运用网络技术建立人才、技术、项目、市场等方面的资料库，促进区域内部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其二，推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组成不同的知识创新联盟，理顺科技链条在产生、流动、应用、扩散等各环节的关系，形成高效的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使科技链与产业链紧密结合，并最终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五　京津冀科技合作中河北的重点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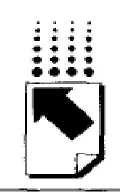
京津冀科技合作对河北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从河北自身的角度看，应以三个方面为重点。

1. 加快科技市场一体化，推动河北省科技的流动与吸纳能力

科技合作必须以市场为导向才能推动经济的高效增长。在加快京津冀科技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河北必须加快各类中介组织、网络服务平台的建设。其一，加快建设生产力促进中心，形成以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为龙头，各市县生产力促进中心为结点的组织网络体系。其二，完善省、市、县三级技术市场网络体系，健全科技市场管理机构，建设河北网上技术交易市场，加速技术成果的流动和转化。其三，以市场机制为引导，发展一批技术经纪、科技咨询、技术评估等技术服务机构。其四，建立健全行业协会，不断完善政府指导下的行业自律性管理体制，推动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发展。

2. 针对京津冀科技合作进行组织创新，增强科技承接与成果转化能力

河北省与京津科技合作的另一重点在于，实现京津冀创新联盟，形成京津冀协作创新体系。第一，建立与京津科技联盟与协作的高层次协调机构，加强同京津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合作，促进区域间科技创新的联系和互动。第二，推动企业积极与京津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建立研发机构，建立密切的技术依托关系；探索以科技项目合作为龙头、以产权为纽带、以市场为导向，公司化的合作新模式；政府要为企业同京津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合作建立平台，组织企业进京与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技术对接。第三，推动省属科研机



构和高校加强同京津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合作研发，提高知识创新能力。第四，有关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大技术问题，要面向京津、面向国内外招标，借"智"联合进行科技攻关。第五，政府运用法律手段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京津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技成果在河北顺利实现产业化，使河北成为其科技成果的主要集散地。

3. 加强重点机制建设，形成以创新体系为依托的科技创新能力

河北与京津的科技合作应以长期性、可持续性和高效性为目标，因此必须形成科技合作的良性运作机制。

一是构建环京津科技融通与资源共享机制。加速环京津科技创业带的发展建设，形成科技的融通市场，进而在"机构"、"渠道"和"市场"三方面，构筑科技融通体系的三个主体，分别从科技流动的来源、依托和取向三个环节，强化形成京津科技协作的内在融通机制。同时加强京津冀科技资源共享机制，一方面建立人才合理流动机制，以人才流动促进知识流动；另一方面推动科技成果在区域内有效地共享。

二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投入产出机制。一方面引导企业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通过加强与京津科技资源的对接，加强对技术开发机构的研发投入，扭转企业重技术改造、引进，轻研发投入的局面，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对部分可以广泛应用和推广的产业技术，选择一批资产规模大、科技实力强、带动作用突出的骨干企业，进行示范推广，完成科技从创新到转化和扩散的快速推移，加强成果转化与二次创新。

三是推动高技术产业化运作机制。从环京津创业带和高新区建设切入，形成河北高新技术的增长极；以基地建设为依托，加速区域内产业和要素的聚集；以产业化工程为纽带，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以重点工程为总调度，以高新区和基地为依托，以各类生产要素为优化配置对象，在重点技术、重点产业上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高度协调的运作体系，在推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两个方面形成秩序规范、服务完善、快速高效的运作机制。

六　京津冀科技合作中河北的政策措施

1. 加强京津冀科技合作的组织建设

要促成京津冀联盟组织机构的建立，推动河北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

主动与京津相关单位进行科技对接。针对与京津的技术合作开展工作，围绕与京津的联盟，在高校、科研机构、国家各部委以及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等，广泛开展科技合作的沟通与联络，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

2. 对内加强人才培养，对外借“智”发展，形成内外结合的科技人才投入

科技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竞争，科技的人力资源投入必将决定河北科技的发展水平。因此在京津冀的科技合作中，河北应充分发挥京津冀协作发展的区位优势，通过产学研合作的互动方式，加大省属高校、企业与京津“智囊”的合作研发力度，借“智”发展，实现河北科技人才投入的优化组合。

3. 促进京津冀区域官、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加强企业与各类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

一是推动河北的高校、企业与京津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如高校与企业合作委员会、合作工程研究中心、企业人才培养中心等，通过固定的组织形态将企业与高校等知识创新源有效地对接起来。二是推动生产力促进中心的发展，举办科技成果信息发布和技术、产品交易会，开展科技咨询、科企联姻等中介服务，实现科技成果与信息在区域内的高速流通。三是强化中试基地，加大在科学研究后期官、产、学、研的合作力度，提升科研成果的“成熟度”，为成果的推广、转化和应用开辟一条通道。

4. 实现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良好对接

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已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建立起要素集成、网络互动、系统开放、良性发展的创新体系，才能真正增强河北省的科技创新能力。因此在加强京津冀科技合作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河北省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并与京津实现有效的对接，从而把经济社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以技术的跨越带动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5. 改善科技发展环境，规范科技市场秩序

在科技合作的过程中，要以建设“高效政府、诚信河北”为总体目标，以优化政府行为为突破口，以市场化为方向，优化制度、政策、市场等环境，完善法律法规、科技评价等体系，形成规范化、秩序化且成本较低、信誉较高的科技发展环境。①要制定出台相应政策，主要包括：河北省民营科技发展促进政策、河北省促进产学研合作创新政策、河北省中介组织发展促进政策、河北省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政策、河北省科技人才培养与开发政策、



河北省风险投资优惠政策等，形成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平台。②进一步深化审批制度改革，简化审批手续，推行“一个窗口、限期办理、全程服务”的一站式办公，提高工作效率。③加强对专利、知识产权的保护，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取消各种不合理收费，降低收费标准，减轻企业负担，营造科技创新的良好法制环境。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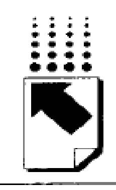
京津冀城市圈中的京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比较研究

○ 温晓红

一　问题的提出

2005年以来，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出现了一系列积极变化。国家发改委将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在“十一五”规划中，天津将滨海新区定位为立足天津，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的现代化制造研发基地、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河北省计划将唐山曹妃甸建成“大钢铁、大码头、大化工、大电力”为标志的重化工业基地和能源枢纽港；首钢搬迁等事件使京津冀区域成为2005年度被高度关注的焦点。其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滨海新区的开放和发展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无疑是区域发展的最大亮点。

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同处京津冀区域，形成京津冀经济圈独特的“双核”结构，对区域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BDA）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TEDA）是两个国家级开发区，分别是两市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区、开放型经济聚集区和经济增长点，同时也是中国北方地区最负盛名的京津塘高新科技产业走廊上的两个最重要节点和利用外资最为集中的地区。加上开发区的体制优势和政策优势，可以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协调发展是推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支重要力量。毫无疑问，滨海新区新一轮的开发建设将对作为其核心区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与之毗邻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生直接和重大影响。面对区域发展的新形势，为了把握发展机遇、谋求聚合中的“双赢”和



“多赢”，必须知己知彼，做好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借助一体化的活力和潜能推进两个开发区共同发展。因此，研究两个开发区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找出差异，有利于加强其在京津冀乃至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发展中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形成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本文将从总体发展水平、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对两个开发区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

二　BDA与TEDA的总体发展比较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于1991年筹建，1992年开始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工作。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被同时定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亦庄科技园，这使它可以同时享受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双重政策。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首批设立的14个沿海城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成立于1984年，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两大开发区建立的时间相差近十年。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巨大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三大经济区之一，依托所在城市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两大开发区均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全国49个国家级开发区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中均处于领先地位。

1. 主要经济指标比较

从经济规模比较来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优势明显。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规模指标普遍低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见图1）。2004年，BDA的GDP、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出口额均不到TEDA相应指标的四分之一，差距比较大；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分别为TEDA的一半和四成；合同外资额、实际外资额是TEDA的60%左右（见表1）。

从增长速度比较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起步较晚，但是发展速度非常快，在许多指标上增长均快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见表1括号内数据）。2000～2004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GDP由2000年的29亿元，增加到2004年127亿元，年均增长44.5%；工业总产值（现价）从2000年的83.88亿增长到2004年的680亿元，年均增长68.7%；税收收入从2000年的9.81亿增加到2004年的30.3亿元，年均增长32.7%；出口额从2000年的1.38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23亿美元，年均增长102.5%。同期，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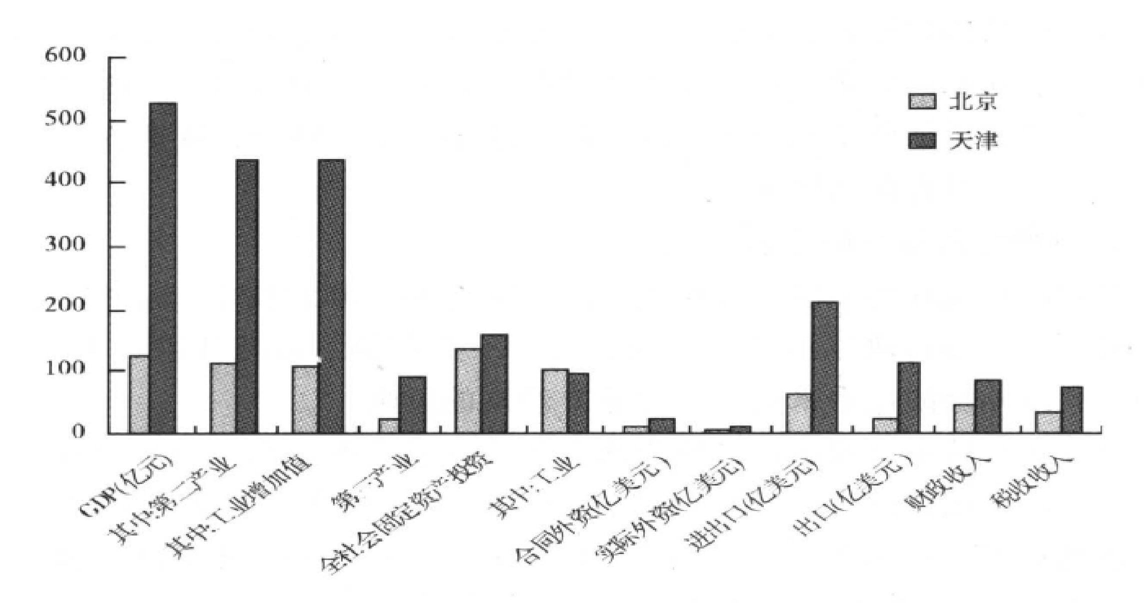


图 1　2004 年 BDA 与 TEDA 主要经济指标对比（单位：亿元）

经济技术开发区 GDP 年均增长 19.9%；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24.5%；出口额年均增长 36%。2004 年，BDA 的 GDP、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均高于 TEDA 相应指标增速 8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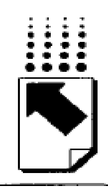
表 1　2004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单位：亿元

指标名称	GDP（亿元）	其中：第二产业（亿元）	其中：工业增加值（亿元）	第三产业（亿元）	产业结构（二产：三产）
北　京	127.07(33.1)	107.9(39.8)	107.2(40.6)	19.17(5.36)	84.9:15.1
天　津	530.22(25.3)	440.37(32.2)	435.9(32.4)	89.85(-3.7)	83.1:16.9
指标名称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其中：工业（亿元）	合同外资金额（亿美元）	实际外资金额（亿美元）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北　京	135.45(115.3)	102.87(519.4)	11.43(173.2)	5.72(116.9)	61.88
天　津	156.83(20.1)	95.86(82.8)	19.22	9.49	211.77
指标名称	其中：出口总额（亿美元）	财政收入（亿元）	税收收入（亿元）	年末全区从业人员（万）	人均 GDP（万元）
北　京	23.25(46)	41.35(14.4)	30.4(6.4)	8.3	18.76
天　津	111.75(62.3)	83.19(23)	73.39(20.9)	25.81	20.08

资料来源：2004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统计公报，数据经整理。

注：表中括号内数据为同比增长率，单位%。



从产业结构比较看，工业均居于主导地位。在以工业为主的发展方针指导下，目前开发区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BDA 和 TEDA 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结构分别为 84.9∶15.1 和 83.1∶16.9，说明在大的结构上两个开发区没有什么区别。

2. 对地方经济贡献比较

我们用开发区的 GDP、财政收入、工业产值、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出口额、利用外资额占地方 GDP、财政收入、工业产值、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出口、利用外资的比重来衡量其对地方经济的贡献。

两大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成为两市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和吸引外资的密集区。但是，比较而言，TEDA 对天津市经济的贡献要大大高于 BDA 对北京市经济的贡献，见表 2。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天津市经济中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天津市 60% 以上的高新技术产值、一半以上的出口来自 TEDA；三成以上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和实际外资额来自 TEDA。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全市 GDP、工业增加值和财政收入的贡献仅在 5% 上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BDA 对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出口额和利用外资影响较大（见表 2）。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 1/3，出口总额、实际使用外资额的 1/5 左右来自开发区。

表 2　2004 年 BDA 和 TEDA 对各自地方经济的贡献比较

单位：%

指标名称	GDP	其中：工业增加值	工业总产值	其中：高新技术产业	出口总额	实际外资金额	财政收入
北　京	3.0	5.6	13.9	34.0	21.9	18.6	5.0
天　津	18.1	30.3	31.6	63.4	53.6	38.4	16.6

资料来源：2004 年北京和天津市统计公报及开发区统计公报。

注：表中数字表示该指标占全市的比重。

三　BDA 与 TEDA 的产业比较

1. 高新技术产业比较

“以工业为主，吸引外资为主，出口为主，致力于高新技术”是国家开发区发展方针。国家级开发区对高新技术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都有相当优惠

的政策，因此，开发区对高新技术企业和外资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目前，两个开发区的工业总产值主要由这两类企业贡献，见表3。

表3 2004年BDA和TEDA高新技术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比较

单位：亿元，%

指标名称	工业总产值	其中：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其中：外商投资企业产值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	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占比
北　京	680	594.32	456	87.4	67.1
天　津	1822.14	1096.93	1774.99	60.2	97.4

注：资料来源同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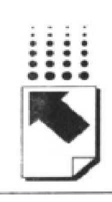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特点非常突出。截止2004年底，开发区经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累计376家，其中工业166家。2004年，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87.4%，增加值占全区工业增加值的84%，完成销售（营业）收入占全区销售（营业）收入的75.73%；产品销售收入占全区产品销售收入87.66%；实现利润占全区的65.22%；出口额占全区出口的94%。BDA起到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示范区的作用。

相比较而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在工业中的地位都不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2004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比例为60.2%。截至2005年3月，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有192家高新技术企业，300余家主营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型企业。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97.4%（见表3），说明外商投资企业中有很大部分为非高新技术企业。

对两个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的比较，可以从一个侧面判断各开发区产业的科技水平。显然，一个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的比例越大，其发展后劲也越大，对提升整个地区的技术水平越有利。比较而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该指标相当高，达87.4%，高于天津该指标27.2个百分点，见表3。这说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招商引资中更加重视入区企业的技术含量。

2. 支柱产业比较

目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初步形成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与新医药产业、新材料及应用技术和先进制造业四大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2004



年，四大产业工业总产值（现价）、销售收入（现价）分别占工业全区高新总量的 71.7% 和 78.9% 。其中，电子信息、生物技术与新医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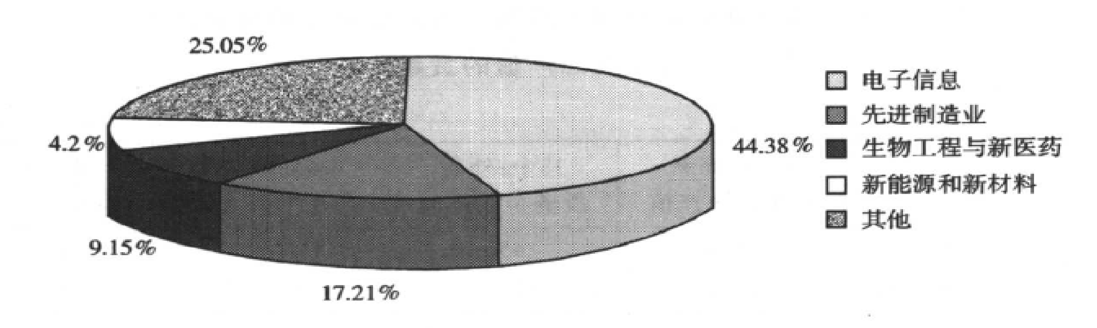


图 2　2004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产值分布

移动通信产业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第一大产业，同时也是北京市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2004 年，移动通信产业工业产值约 270 亿元，占全区工业产值的 45% 。作为开发区的龙头产业，由于产业规模大、产业链完善、集约利用资源等特色，开发区已经向国家信息产业部申报国家移动通信产业园，目前已经通过专家论证。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有北京“药谷”之称，已经初步形成了由国际著名制药企业、国家重大项目研发机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内企业为主体的具有创新能力和规模效益的北京生物医药研发和制造基地。2004 年，开发区该产业工业产值、销售收入、利润分别占全市的 37.4% 、38.7% 和 40.1% 。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已形成了电子通讯业、机械制造业、食品饮料业和生物医药四大支柱产业。2004 年，四大产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 91.9% 。其中，以移动通讯、新型电子元器件、视像设备、汽车电子和微电子为主体的电子通讯业产值占全区总量的 64.0% ；以汽车制造为核心的机械行业产值占全区总量 17.9% ；食品饮料占全区总量 5% ；医药化工占全区总量 4.9% （见图 3）。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两个开发区支柱产业有比较大的重叠，特别是电子通信、机械制造、生物医药。随着奔驰轿车项目的引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高档轿车方面将形成重要的产业基地。北京奔驰轿车项目一期计划年生产能力 2.5 万辆。目前，开发区已经将汽车产业列为“十一五”优先发展的四大主导产业之一。因此，汽车同时是两大开发区确定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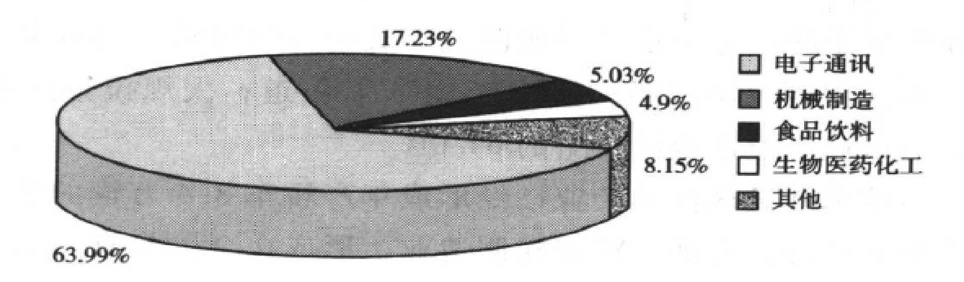


图 3　2004 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产值分布

3. 产业集群化发展比较

目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在全力推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汽车等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其中，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集群已经初步形成。

在电子信息产业，集聚了诺基亚、京东方、中芯国际等 100 多家电子信息类企业，形成了移动通信集群、显示器集群和集成电路与半导体集群。开发区电子信息类企业中，90% 是外商投资企业，电子信息类三资企业投资占全区企业投资总额的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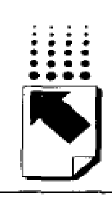
以首信诺基亚为龙头的星网工业园集聚了技术研发、移动通信系统、终端产品以及大量配套产品企业，正在打造世界级移动通信产业的生产基地。

随着中芯国际、京东方等超大规模项目的入区，微电子产业正在发展成为开发区的重要主导产业之一。作为北方微电子产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2004 年底，开发区已引进中芯国际、京东方等 9 家微电子企业及配套企业，项目总投资约 27 亿美元；形成 12 英寸 90 纳米芯片月产能 3000 片，砷化镓射频芯片年测试 19000 万片，2004 年实现产值 31.8 亿元、产品销售收入 37 亿元。

2004 年末，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技术与新医药产业集聚了北京同仁堂、德国拜耳、GE、安万特、松下电工、中国协和医学科学城等 90 多家企业，已经形成了从研发到孵化器、到生物制药和常规制药，再到医疗仪器和医疗设备的制造的比较完整产业链。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移动通信和汽车产业聚集效应比较显著，初步形成电子信息和汽车集群。

依托摩托罗拉、三星、现代、LG 等电子信息类大型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形成了电子通讯计算机设备制造和电气设备制造业产业群。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聚集了一大批国际著名跨国公司，三星集团超过 1/3



的在华企业聚集于此。电子信息产业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2004年，全年移动电话产量达到4880.60万部；基站351.14万信道；大规模集成电路4.78亿块。电子通讯业产值占全区总量的64.0%。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已经形成年产轿车8.4万辆的规模。以丰田和大众汽车为核心，发展交通运输制造业，形成在全国具有一定竞争力的轿车，特别是经济型轿车生产集群。汽车产业链不断完善，整车及配套企业已达75家。高达10亿美元的总投资，年产30万辆高级汽车的规模，丰田汽车将成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又一航母型企业。入区不到一年，“丰田效应”已经凸显，目前开发区已经有30余家专为丰田项目配套的企业。

四　外向型经济发展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级开发区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开发区积极吸引外资和港澳台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促进主导产业形成与带动产业发展，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

1. 利用外资比较

吸引外资的比较可以从规模和质量两个方面进行。

从吸引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和资金规模比较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具有明显优势，见表4。截至2004年末，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外商投资企业家数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9.8倍；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总额（含增值）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3.8倍；合同外资金额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7.8倍；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6.2倍。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28.3%，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占开发区企业总投资额83.9%。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24.6%，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占总投资额74.7%。相比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外资比重比天津开发区低，内资比重较天津开发区高。

以下从三个方面来对吸引外资质量进行比较。

第一，投资规模超过1000万美元的外商投资企业家数。2004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批外商及港澳台地区投资企业103家，其中投资规模超过1000万美元的企业23家，占22%；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年新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项目的165家，项目投资规模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有38家，占

23%。

第二，吸引500强企业投资项目数量。2004年末，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了全球500强企业中52家66个项目在开发区投资建厂；全球500强企业中有44家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投资企业达91家。开发区成为跨国公司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跨国企业的高度集聚地。

第三，截至2004年末，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项目平均规模1676万美元，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项目平均规模644.64万美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项目平均投资规模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2.6倍，见表4。说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较多外商投资项目属于资本密集型投资项目。

相比较而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的外商投资质量在总体上优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比表4中的各项指标，可以发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的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和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大大超过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家数几乎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十倍，但是，其他指标并没有成比例跟上。内资企业的情况也类似，见表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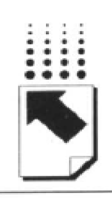
表4　2004年末北京、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及其投资比较

指标名称	外商投资企业数（家）	投资总额（含增值）（亿美元）	平均投资规模（万美元）	合同外资金额（亿美元）	实际外资金额（亿美元）	内资企业（家）	注册资本（亿元）
北　京	393	65.87	1676	25.85	19.46	1203	184.74
天　津	3844	247.8	644.64	202.89	121.16	9729	394.49
	9.8	3.8	0.4	7.8	6.2	8.1	2.1

注：资料来源同表2，最后一行数字表示天津该指标为北京对应指标的倍数。

2. 经济外向度比较

开发区出口额、进口额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可以反映一个开发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程度。开发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高新技术产值的比例，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外商投资企业总产值的比例，可以反映一个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动机。图4表明，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比较，在工业产值进口依存度基本相当的情况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总产值出口比例、高新技术产值出口比例、外商投资企业总产值出口比例均偏低，显著低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差距最大的是高新技术产值出口比例，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该指标比天津低36.3个百分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总产值和外商投资企业总产值有近一半出口，高新技术产值有近三分之二出口。从这几个指标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经济外向度比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要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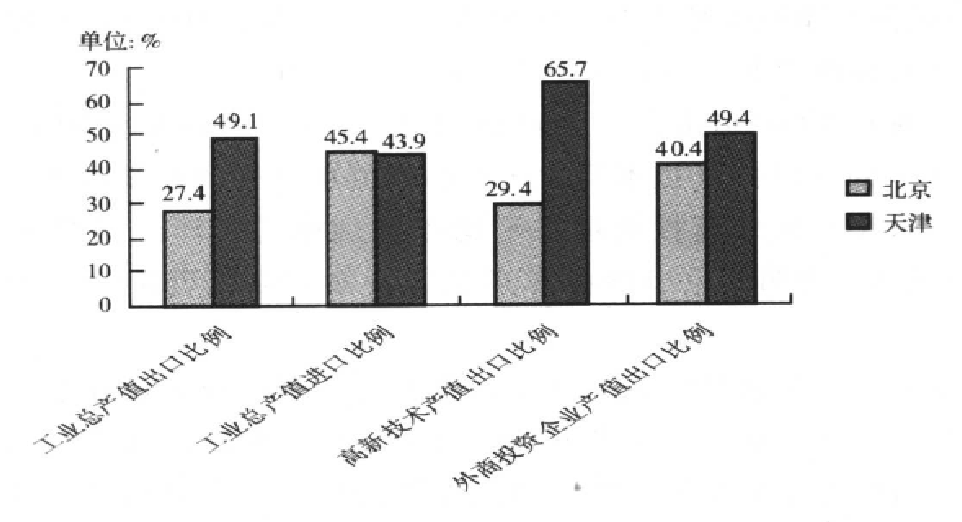


图4 2004年北京、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外向度比较

3. 对外贸易比较

外商投资企业是两大开发区进出口贸易的主体，外商投资企业占出口贸易总额、进口贸易总额的95%以上；并且已经形成了以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出口产品结构，见表5。比较而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出口规模远不及天津，但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出口产品结构优于天津，两项指标即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比重均高于天津，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例超过天津13个百分点。体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

表5 2004年北京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出口贸易及其构成比较

单位：亿美元，%

指标名称	进出口总额	出口总额	其中：机电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	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	进口总额	其中：外商投资企业进口额
北　京	61.88	23.25	22.55 (97)	21.84 (94)	23.02 (99)	38.63	37.6 (97.3)
天　津	211.77	111.75	104.69 (93.7)	90.11 (80.6)	109.55 (98)	100.02	95.36 (95.3)

注：资料来源同表2，括号内数字为对应指标占总量的比重。

五 结论与建议

1.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要特点、优势及不足

从前面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同为国家级开发区，两大开发区在发展导向上有许多共同之处：都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作为产业发展的方向；初步形成了产业聚集的导向发展，主导产业雏形初现；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外商投资企业在开发区经济中居主导地位，特别突出的是开发区主导产业的龙头企业多为外商投资企业。

由于两个开发区依托的两大城市政治、经济、科技等综合实力的不同，要素禀赋的差异使得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是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通过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若干指标的比较，可以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特点和优势总结如下：

（1）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开发区

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的特点不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导的特征非常突出。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占入区企业总数的23.6%，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该指标为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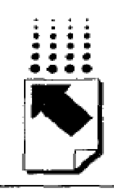
高新技术企业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业产值的主要贡献者。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相当高，达87.4%，高于天津该指标27.2个百分点。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主体是外商投资企业，其对工业产值贡献高达97%。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产品中94%为高新技术产品，超过天津该指标13个百分点。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万元工业产值能耗为0.05吨标煤、万元工业产值耗水1.5吨，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万元工业产值能耗0.094吨标煤、万元工业产值耗水吨2.06。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两项能耗指标均比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低许多，也说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总体技术水平、工艺水平高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2）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投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制造业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数量占外资投资项目总数的比例是16.8%，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该指标为2.4%。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项目平均投资规模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2.6倍。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高于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两者之比为87.4%:67.1%，说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中大部分为高新技术企业。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情况相反，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高于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两指标差距很大，比例为97.4%:60.2%，说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中有相当部分为非高新技术企业。

北京的科技资源及人才优势是吸引世界著名高科技公司纷纷投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最根本因素。同时，也说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招商引资中更加重视入区企业的技术含量，注重通过引进精品项目带动产业发展。

（3）高新技术产业呈现进口替代型特点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总产值和高新技术产值出口比例不到30%，显著低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说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生产的产品更多是针对国内市场，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较多属于进口替代型产品。以GE医疗为例，中国普及型CT机市场装机量的一半以上来自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呈现出口导向型特点，50%左右的工业产值出口，近70%的高新技术产值面向国际市场，加工贸易优势比较突出，加工贸易方式出口占90%以上。

（4）市场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为主

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外商投资企业总产值的比例，可以反映一个开发区外商投资的投资动机。虽然两个开发区98%以上的出口是由外商投资企业贡献，但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总产值中只有40%出口，比天津低9个百分点。说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的FDI类型多为市场导向型，他们更看中的是北京巨大的市场以及对全国的经济影响力和辐射力，开拓中国市场是外商投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要动机。

（5）专业技术服务业初显端倪

BDA和TEDA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不相上下，但是其内部构成有着很大的差别（见表6）。比较两开发区第三产业增加值的行业构成可以发现，明显区别在于：TEDA第三产业中占比重最大的是批发零售、餐饮业，而BDA第三产业增加值中分量最大的是服务业。对2004年服务业营业收入构成进一步细分发现，服务业收入99%以上来自专业技术服务业。这说明，

依托北京发达的现代服务业，目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没有必要发展出独立的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行业，企业的这类服务需求可以通过外包或第三方服务提供。相反，由于产业集聚效应以及专业化发展，产生对专业技术服务的大量需求，吸引了具有专业技术优势的中关村高科技企业和留学生创业企业进驻开发区，建立孵化器，承接国内外企业的研发外包等，这应该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别于其他开发区的重要特征之一。

表 6　2004 年 BAD 与 TEDA 的第三产业构成比较

单位：亿元，%

指　标	第三产业增加值	其中：金融业	运输邮电	批发零售、餐饮业	服务业	房地产业	份额合计
北　京	19.17		-3.22 (-16.8)	1.39 (7.25)	(20.00) (104.32)	1.0 (5.22)	100
天　津	89.85	15.88 (17.7)	5.68 (6.3)	34.19 (38.1)		13.46 (15)	77.1

注：资料来源同表 2，括号内数字为对应行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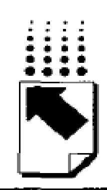
通过比较，也发现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问题：

第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优于北京市产业结构，但是，由于开发区目前经济规模偏小，在北京市经济总量中的份额还不够大，制约了其对北京经济的带动作用，特别是对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功能还不够突出。

第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相当多，但是平均规模较小。2004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平均工业产值 1.58 亿元，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该指标为 5.71 亿元。企业规模太小，难以产生规模效应，企业效益和竞争力将受影响。

第三，外向型经济发展不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总额仅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21%，工业产值出口比例低，外资企业对工业产值贡献较天津开发区低 30 个百分点。截至 2004 年末，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合同外资金额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7.8 倍；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6.2 倍。

第四，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主导产业存在同构趋势。主导产业有比较大的重叠，没有突出两地的资源优势，形成明确产业分工。



第五，从区域经济一体化角度看，两大开发区经济联系薄弱，行政区划的影响力大于市场力量，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差，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小而全”的产业发展模式，虽然京津相距仅130公里，两个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也没有形成产业联动。

2. 建议

（1）抓住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历史性机遇，形成“错位发展”产业战略

充分利用滨海新区新一轮开发开放带来的发展机会，关键在于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的准确定位，最大限度地发挥“首都优势”和人才、科技、信息等比较优势，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错位发展，争取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占据高端，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良性竞争格局。

依托天津市雄厚的工业基础、较低的运营成本和港口优势，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发展加工制造业上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国家商务部年度经济指标统计表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要经济指标历年均在国家级开发区中位居第一或第二，已成为中国北方加工制造业中心。天津滨海新区新一轮开发建设必将带动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将向这一地区聚集，无疑，作为滨海新区核心区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将迎来制造业发展的新机遇。

从短期看，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将加剧京、津开发区制造业领域竞争，可能会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制造业外资形成压力。北京发展制造业面临土地成本、商务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劣势，但北京拥有雄厚的科技资源和创新能力、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庞大的市场需求、充足的金融实力和具有相当实力的产业基础，这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优势所在，也是吸引国际高技术公司投资的魅力所在。因此，在发展定位上，必须扬长避短，坚持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发展定位，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世界级加工制造基地形成“错位”。

（2）做大做强优势产业

北京的城市功能和资源约束决定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主导产业必须符合耗能少、耗水少、占地少、运输量小、低污染、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要求。要积极吸收和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促进以移动通信为主的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汽车集群发展。根据目前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开发区具备发展移动通信、集成电路、显示器等电子信息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优势条件和能力，应

该引导资源向这些优势产业集聚，并向产业链的高端发展。以奔驰项目为龙头，带动关键汽车零部件及汽车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做大汽车产业。

（3）确立研发创新优势，向技术创新中心发展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产业竞争力的根本所在。高新技术产业可以在短期内形成规模优势，但是，如果没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有力支撑，从价值链看它也只能处于高新技术产业化利润低端。因此，在做大做强主导产业的同时，应利用北京研发资源，促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研发创新优势的确立，向技术创新中心发展。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大力引进国际先进技术，重点鼓励和吸引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入驻开发区，发展合作生产、合作研究设计，开发新技术、研制新产品，成为引进、消化和扩散国际先进技术和创新成果的重要基地。

在积极引入外资的同时，增强区内企业的研发能力。建立健全公共创新平台，加强孵化器建设，推动产学研结合，加大技术创新资金投入力度，鼓励企业创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及产品，打造国际名牌。

（4）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

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竞争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企业集中资源于核心业务，一些非核心业务正在从企业加速分离出去。开发区是高新技术企业高度密集区，产生了对专业技术服务的大量需求，比如研发、科技咨询、工业设计、产品鉴定、评价中心、实验中心以及通用实验室等等新型服务需求。目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服务业营业收入99%以上来自专业技术服务业值得思考。加快开发区以制造业为主向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转型是必然趋势，北京开发区可以通过招商引资鼓励和吸引跨国公司到开发区设立服务外包基地、培训基地等，也可以吸引中关村的高技术服务企业入驻促进以专业技术服务为主的知识型服务业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京津冀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与“十一五”发展构想

○卢 卫 石森昌

金融生态环境是一个仿生概念，由周小川博士（2004）最早引入国内金融领域。金融生态环境是指金融机构所处层面或区域的外部运行环境。金融生态环境，既包含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也包括整个金融市场得以成长的环境。与金融市场概念相比较，金融生态环境更强调金融系统与所处地区的制度、法律、政策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以及协调发展。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关系到金融机构贷款风险大小，直接影响金融机构支持地区经济的积极性。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由于地理与文化差异、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差异、中央政府主导的非均衡区域发展策略影响以及分权体制下各级政府行为的差异等，均是导致地区经济出现发展非均衡状态的诱因，由此也造成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差异。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不断强调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现阶段，加强京津冀金融生态环境的区域性整体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一 京津冀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现状评价

1. 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近年来，京津冀区域经济呈现快速、稳步发展的态势，区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2004 年京津冀经济圈 GDP 总值为 15894 亿元，是 1990 年的 9.3 倍；人均 GDP 为 17139 元，是全国平均的 1.6 倍，比 1990 年增长了 7.2 倍。

京津冀经济圈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比重呈逐渐缩小趋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1990 年的 17.5% 下降到 2004

年的9.9%；第二产业比重呈稳中趋升的态势，由1990年的48.6%上升到2004年的48.8%；第三产业比重稳步提高，由1990年的33.9%提高到2004年的41.3%。

2004年，京津冀经济圈的国内生产总值15984亿元，占环渤海经济圈GDP的41.7%，分别比山东、辽宁多1.3个和23.8个百分点；财政收入1398亿元，达到了环渤海经济圈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占环渤海经济圈总量的41.3%。这表明，京津冀区域在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 区域金融市场组织体系较为完善

京津冀经济圈目前已形成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并存的银行业体系；以全国性证券、信托公司或其在该地区机构为主体，地方证券、信托公司并存，各类证券中介机构为补充，共同发展的证券、信托组织体系；国有保险公司、多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和专业保险中介机构分工协作、共同发展的保险组织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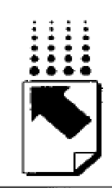
北京市作为国家首都，其发展经济金融的集聚优势无以替代。金融中央监管机构“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和四大国有银行总部均设在北京；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有四家设在上海。北京聚集了中国50%～60%的金融资产，是全国性金融管理和信息发布中心。

天津市作为历史上的北方金融中心，具有突出的区位和开放等优势，也是央行北方大区行的所在地。经过不懈努力，天津金融业已走出低谷，至2004年，天津市已有地方性政策性银行2家、国有银行4家、股份制银行11家、外资银行19家、信托公司2家、证券和基金公司2家、保险公司17家、保险中介机构33家。其中，中德住房储蓄银行、光大永明人寿、恒安标准人寿、渤海证券等全国性金融机构把总部设在天津，花旗银行、民生银行等8家银行分行在津开办了人民币业务。

比较而言，河北省的金融机构设置和集中度均较为逊色，一方面是受到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的限制，同时也受到京津两个经济中心城市的打压。但在同一个区域经济系统中，各省市之间经济金融发展拉开梯次，符合我国非均衡发展现实，也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

3. 区域金融市场体系完备，外部环境明显改善

目前，京津冀经济圈已形成货币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共同发展；大类比较齐全、市场层次不



断细化、运作日趋规范的金融市场体系。2004 年京津两地金融保险业实现增加值 728.32 亿元，证券市场各类证券成交额 20089.74 亿元，其中股票成交额 8669.29 亿元，债券成交额 810.31 亿元，基金成交额 95.54 亿元；京津冀经济圈全年保费收入 359.88 亿元，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84.66 亿元，人身险保费收入 275.22 亿元。

近年来，建设金融生态环境倡议受到京津冀各省市的高度重视，均有相应政策出台。2005 年 2 月，北京市开始落实《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推出的税收优惠、住房补贴、资金补助、经费资助以及资金支持等一系列措施，鼓励和促进金融产业发展。2005 年 5 月，天津市开始实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实施纲要》，提出要大力实施金融创新，加快集聚各类金融机构，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全面提升面向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功能，力争在 5 年内逐步建成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2005 年 8 月，石家庄市政府也提出《关于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全市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意见》，提出了 24 条具体的意见和措施，以求建立长效机制，确保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任务的落实。

4. 天津市的金融创新领跑全国

2004 年 2 月，由中国建设银行与德国施威比豪尔住房储蓄银行共同投资的中德住房储蓄银行在天津市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1.5 亿元，中方持股 75.1%，德方持股 24.9%。该行成立的创新意义在于，一是国内首家中外合资的住房储蓄专业银行；二是欧洲与中国两个最强的专业银行和合作；三是该行推行“先存后贷、低存低贷、固定利率”的贷款业务，最优贷款年利率仅为 3.3%，低于目前国内商业（按揭）住房贷款和公积金住房贷款年利率。

2005 年 9 月，渤海银行发起人协议在京签署。该银行成立的创新意义在于：它是国内首家在发起阶段就吸收民企和自然人参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首家在发起阶段就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是首家总部设于天津市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渤海银行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50 亿元，由发起人认购全部股份。其中，拥有 25% 股权的天津泰达投资控股公司为第一大股东，拥有 19.99% 股权的英国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为第二大股东；拥有 13.67% 股权的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是第三大股东；各拥有 11.67% 股权的上海宝钢集团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并列第四大股东。此外，天津信托投资公司通过集资信托方式吸收自然人资金参股 10%；天津商汇投

资控股公司以吸收民企入股方式参股8%。

2005年12月，天津市商业银行又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澳大利亚银行中排名第三的澳新银行（ANZ），以约定条件认购天津商业银行19.9%的股份，投资总额超过1亿美元。同时，澳新银行将设立500万美元的“未来发展基金”，专门用于支持天津商行的技术改进和人员培训。双方将在风险管理、零售业务、信息科技等领域有重点地分步展开合作。

天津市在短时间内接连有多项重大的金融创新举措出台，说明了天津市政府不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的意志和决心，也符合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赋予天津滨海新区的战略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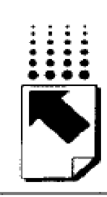
5. 金融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高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2005年完成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首次对全国29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金融资产质量进行了综合分析和排序，并对其中50个大中城市区域经济、金融、司法、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等若干方面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对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排名。该报告提出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九大解释性指标：法治环境、经济基础、地方金融发展、金融部门独立性、诚信文化、社会中介服务、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企业诚信和社会保障制度，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影响金融资产质量的金融生态环境（其对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的贡献弹性递减）的主要决定因素。

依据该报告的分析，全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分为五个等级，浙江、上海、北京、天津、福建、江苏等六省市的金融资产质量最优。说明京津冀“两市一省”的金融质量在2004年均有提高，北京、天津都处在Ⅱ级城市的位置，但天津市从B跳升到AA，变化尤为显著；河北省位于Ⅳ级，较2003年晋升了一级（见表1）。

表1　全国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金融资产技师测度排名

省市	等级评（2003）	等级评定（2004）	升降	省市	等级评（2003）	等级评定（2004）	升降
浙江	AAA	AAA	–	江苏	BB	A	↑
上海	AA	AAA	↑	云南	B	BBB	↑
北京	AA	AAA	↑	重庆	C	BBB	↑
天津	B	AA	↑	山西	C	BB	↑
福建	BB	AA	↑	贵州	C	BB	↑



续表 1

省 市	等级评(2003)	等级评定(2004)	升 降	省 市	等级评(2003)	等级评定(2004)	升 降
山 东	C	B	↑	新 疆	C	C	–
四 川	C	B	↑	河 北	E	D	↑
广 西	D	B	↑	安 徽	E	D	↑
甘 肃	C	B	↑	湖 南	E	D	↑
西 藏	D	C	↑	湖 北	E	E	–
广 东	D	C	↑	江 西	E	E	–
宁 夏	D	C	↑	海 南	E	E	–
内蒙古	D	C	↑	辽 宁	E	E	–
陕 西	D	C	↑	吉 林	E	E	–
河 南	D	C	↑	黑龙江	E	E	–
青 海	C	C	–				

二 京津冀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

1. 区域内融资结构不合理，风险集中

主要是金融领域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不合理，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占比过高。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发展的不平衡，既使银行业承担的责任过重，面临的风险过于集中，也使证券业、保险业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以天津为例，2003 年，天津市直接融资占全部融资比重不足 2%，2004 年仍不足 4%。资本市场急需加快发展。

2. 区域内金融组织体系和功能不够健全

经过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发展，京津冀区域内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等的种类和数量在不断增加、不断完善，与我国其他区域相比较（除长江三角洲以外）有一定的优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表明，环渤海经济区的金融资产质量整体上低于长三角、但高于珠三角。但与成熟市场经济体相比，京津冀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等还没有构成一个种类、数量足够丰富的完整的服务链或网络。已有的机构、市场或产品，也存在功能定位不够清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问题。

3. 区域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之间缺乏沟通，制度性壁垒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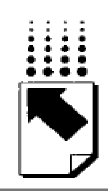
在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中，各金融市场之间、各金融机构之间、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之间、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资金流动、产品转换、信息传递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壁垒。金融市场之间关系方面，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资金流动渠道较少，产品互动不多。在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方面，提供的业务和产品趋同，不能进行合理的市场功能定位，证券业机构缺乏抗击市场波动的可持续盈利模式，自身业务发展所需资金的来源渠道十分有限。在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关系方面，一是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不能满足金融机构资金运作、风险防范的需要，二是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常常出现不理性行为，加大了风险出现的机率。在金融与其外部环境方面，法律体系、诚信体系等外部环境的不健全，影响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和金融机构的业务开展。

4. 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健全

即缺乏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金融文化。我国由于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阶段，信用体系、法律体系还有待健全，金融文化还不稳定成熟，还缺乏凝聚力、缺乏约束力，这些导致了金融行为的扭曲，滋生了大量金融违法事件，造成了较大的金融风险，为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留下了隐患。另外，金融文化的改善还需要金融消费者的配合。金融服务消费者也需要提高素质，加强理性金融消费知识的学习。环渤海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落后于长三角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金融信息化、电子化的基础设施虽有大量的投资建设，但企业资信评级系统和个人资信评级系统都未推出或试运行，在此方面，上海的工作领先了一步。

5. 区域内金融服务功能有待合理分工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纵向金融管理体制，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间并没有得到合理削弱。同时，由于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事实上形成了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在天津市金融创新不断提速，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陆续落户的形势下，虽然天津的发展并不对首都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构成威胁，但京津的金融经济发展如何适应国家区域经济战略的要求，将是“十一五”期间两市共同面对的问题。地方政府需要转变观念，在加强协调、优势互补的统一认识下实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共建。否则，就有可能错过扩充发展、共生多赢的战略机遇期。



三　推进京津冀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建议

1. 建立区域金融合作的新机制

在京津冀区域合作整体机制的基础上，形成区域内金融业合作与发展的定期不定期沟通和交流制度，如建立区域内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监管机构负责人对话制度，建立专业化、多样化的合作渠道，及时协商解决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中金融合作与发展碰到的问题。推进区域金融服务的便利化。切实消除“地方金融”的屏障，坚决取消各种形式的地方服务壁垒，营造区域整体金融服务格局。

就国际经验来看，成功的区域经济金融合作至少需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处于合作区域“龙头”地位的核心区要有足够的吸引力、辐射力和增长力；二是各省市间经济金融发展要具有一定梯度，资源优势互补；三是要形成利益共享、成果共赢的协作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已经具备了经济金融合作的条件和基础。环渤海地区经济、贸易与投资发展迅速，资本、商品、信息、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的流动不断加快，客观上要求加强区域间金融业合作，为资源配置和产业合作分工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和服务。

2. 尽快建立区域信用体系

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要健全地区社会信用基础。一是要积极推进本地区维护金融债权的法律和执法体系的健全，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和规范交易主体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体系，在立法上要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原则，特别是在企业合并、分立、中止等过程中，要突出和强化银行权益，切实保证债权人权利。二是建立健全区域内多种形式的信用征信和评价体系，区域内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整合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建立以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服务的信用评价机构，制定出统一的信用体系、规范标准和查询系统，提高域内信用数据的开放共享程度，使信用度真正成为银行在考察贷款申请者时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三是各方联合，加快区域信用体系和信用环境建设，重点探索建立覆盖全区、资源共享、信息完备、使用便捷的个人征信系统和企业信用系统。

3. 健全地方金融法制

加强地方性金融法制，是为区域内金融业的发展提供公平规范的法制环

境。在立法方面，可以根据本区域实际情况，联合或独立制定有关信用管理、房产抵押登记、金融债权保护、地方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有效保护金融资源产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有关当事人的金融行为。在司法方面，要积极推广简易诉讼程序，降低金融债权案件的诉讼费用，提高诉讼效率；要改进执行程序，提高金融债权的执行回收率；要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证金融债权得到公平清偿。

4. 要研究制定区域金融业发展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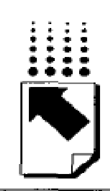
区域金融业发展政策要从区域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出发。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着力在优化区域金融机构、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等方面下工夫，不断提高区域金融经济的竞争力。

京津冀三地之间，一方面，要由本地区相关的财政、税务、工商管理、国土房管、规划、人事、公安等政府部门共同研究制定本地区金融产业政策，设立金融产业发展基金，降低金融机构的税费负担，减轻地方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包袱，出台鼓励金融机构在本地区开拓业务的便利化措施，完善本地区金融业发展的建设规划，切实加大对本地区金融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三方可以协调制定有关政策，以推动京津冀地区金融产业的共同发展。例如，天津金融业的发展可以定位于资金运营层面，即致力于建设面向港口经济和制造业的金融服务体系；而北京作为金融决策和调控中心的既有优势地位，在制定金融发展政策时也应充分重视天津作为北方经济贸易中心的重要地位，独立发展金融中心，也会造成资源浪费和功能缺失。

5. 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要深化区域内企业客户的市场化改革，使作为金融机构主要贷款客户的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建立财务预算硬约束机制。三省市可以在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规范公司治理结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方面加强合作。要引导区域内的民营企业改变传统的家族式管理模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内部管理，注重信用建设，提升自身素质。

鉴于目前经济活动中利用公司法人的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恶意转移资产、逃废债务的状况相当严重，应狠抓公司立法中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精神，对逃废债务企业的开办人、股东、投资人和发起人，采取司法、行政和经济制裁措施。通过提高注册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信用门槛，简化设立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的程序，调整公司、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的数量比例，



建立与现阶段社会信用水平和资产登记制度相适应的企业结构。

6. 继续加快金融机构的区域聚集度

对于我国需要建设几个金融中心，学界并未形成统一认识。事实是，北京和上海，都在国家批准的发展规划中明确了自己作为金融中心的功能。传统上，我国金融机构在地区间分布较为分散，未能如发达市场那样发挥金融集聚效应。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业务的发展与金融机构的集聚度密切相关。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集聚极大地促进经济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城市成为财富聚集和管理中心。例如，在面积不足 1 平方公里的纽约华尔街 - CBD 金融区，除集中了世界上最大的 380 多家银行外，美国 10 大银行中有 4 家、10 家最大生命保险公司中有 4 家、10 大金融服务公司中有 3 家的总部设于纽约；同时还集中了上百家保险公司、交易所及大公司总部。又如，占地仅 1 平方英里的伦敦金融城，汇集了英国主要的证券、保险和银行等金融机构。英国金融服务业的出口利润中大部分来自这一区域。香港 2006 年将正式取消遗产税，这将进一步促进香港成为重要的资产管理中心，使香港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加快金融机构区域聚集的现实意义在于，第一，按照我国入世的承诺，2006 年中国的金融业将面向全球完全开放，境外金融机构在国内选择落脚点的主要标准，就是要看当地的金融生态环境如何。第二，国家“十一五”规划对天津滨海新区——京津冀——环渤海区域的高度关注，必然影响国内外金融机构重新排兵布阵，一些先到者已经尝到甜头。第三，京津都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金融业则是现代服务业的一个标志。京津冀具有的政治优势、产业基础、规划导向政策以及未来面向环渤海、东北亚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对国内外金融机构落户本区域构成了综合吸引力。需要乘势而上，把握机遇。

7. 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

要发展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构建多类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利用区域经济发展优势，培育和发展区域资本市场；推动区域金融机构整合，借助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树立区域金融机构的优势；规范发展社会中介服务机构，要提升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和诚信水平；要从政策上鼓励和扶持与金融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一系列专业化的中介机构的发展，培植一批诚信水平高的专业化中介机构，形成良好的中介行业道德风范；要继续提高审计、会计、信息披露等标准，在向高水平国际标准看齐的

同时，结合我国行业和企业制度的特点，制定适合国情的审计、会计、信息披露标准；同时还需要在标准的执行方面进一步改进，努力保证审计会计准则不论在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中都得以真正严格执行。

8. 加大风险监测与外部监管

共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配合与协调，建立区域金融风险的信息沟通、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携手打击金融犯罪，确保金融安全。

为此可以考虑建立区域金融风险监测与监管系统。区域金融风险监测与监管系统由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机构、区域经济综合部门、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组成。人民银行要加强对金融风险的日常监测与评估，落实跨部门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增强工作预见性，及时提示金融领域存在的潜在风险。监管部门要认真履行机构监管职能，加强对金融企业的指导、监督与检查，督促加强内部控制，依法审慎经营。各经济综合部门应公开发布更多的宏观信息和产业信息，加大对产业、财政、税收、土地、环保等政策的指导力度，引导金融机构正确把握宏观经济和产业发展趋势，防止信贷资金投向重复建设项目或不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项目，降低金融机构决策的政策性风险。各级政府应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沟通与协作，帮助解决存在的困难。金融机构要建立内部风险监测与监管系统，以便及时防范和消除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风险。

9. 地方政府转变职能

地方政府在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作用，一是为金融业发展创造公平、公正的环境，二是强化金融政策扶持。在创造公平、公正的环境上：首先政府应当重视自身行政行为和工作作风，坚持依法行政，建设“诚信政府”；要尊重金融机构的依法自主经营权，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支持金融机构依法维护金融债权工作，旗帜鲜明地打击逃废金融债务等违法行为；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对金融活动直接和间接干预，把支持金融机构改革和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工作重点和评价政绩的考核指标；加快区域内社会信用建设步伐，建设“诚信社会”，支持全国和个人信用征信体系建设工作，推动本地区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建设，推动信用中介组织建设；加强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

（作者单位：天津市社会科学院）

京津唐城市密集区生态环境问题研究

○刘 薇　任 毅

京津唐地区是整个华北地区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河北省的环京津区域与京津一起共同构成"面向21世纪环渤海京津大都市群区"。为实现这一地区的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深化及加速实施"两环带动"战略，需要引导环京津地区城市化与城镇合理发展，协调和处理区域中各城市发展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合理配置区域空间资源，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一　生态环境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自然物质基础

生态环境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发展经济的自然物质基础，经济发展需要获得自然资源，受到环境状况的制约。生态安全健康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保证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要保障京津唐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顺利实现，必须加强京津唐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京津唐平原在地质、地貌、气候、土壤及生物群落等方面是一个完整的地域系统。对于人类来说，这个系统从来就有，京津唐人民山水相连，大都分布在海河、滦河流域，有着天然的联系。在京津城镇体系中，除了京、津、唐、保组成的平行四边形城市体系核心区外，还应包括京、张、承和京、承、唐组成的两个生态三角形，因为没有这两个生态三角形，京津城镇体系就没有生态保证。近年来，京津唐地区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认真贯彻落实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的方针，采取一系列政策和工程措施，以小流域综合治理为主，重点开展了"三北"防护林、坝上生态农业、首都周围绿化和太行山绿化、退耕还林等工程，加大了工业污染防治力度，取缔、关停了多家污染严重而又

没有治理前景的小企业；加大了流域水污染治理保护，地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但由于历史原因和产业结构不合理，该地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还存在严重问题。

二 京津唐城市密集区存在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一）普遍性问题

1. 水资源问题突出

就京津唐城市密集区而言，水资源供给量中仍以自产水资源为主。但京津两市由于地域狭小、经济发达、人口密度大，自产水资源有限，因此入境水量在水资源可利用量上占有很大比例。由于地理上的毗邻关系，京津唐地区的水资源分布均呈现出水资源短缺、总量不足，降水量年际变化大，地区分布不均衡，河流入境水量日趋减少，连续枯水段较为常见等特点。随着水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也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如水体污染严重、水环境恶化，地下水位下降、漏斗范围扩展，地面沉降，生态环境用水被挤占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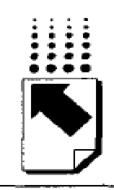
2. 沙尘暴

受特定地理环境的限制，京津唐地区的沙尘暴问题日趋严重，北京尤甚。据统计，近年来中国西北部主要沙源地沙尘暴的爆发频率有明显增加趋势，受此影响近年北京频频遭受沙尘暴的袭击。沙尘暴天气会造成严重的风害、沙积害、风蚀、环境污染和许多次生灾害，使灾区蒙受巨大损失。

北京风沙源区东西横跨近700公里，南北纵跨600公里，行政范围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五省（市、区）的84个县（旗、市），土地面积2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8.1万平方公里。位于北京上风向的浑善达克沙地、乌盟后山、河北坝上、山西北部等沙化土地是北京的主要风沙源，对北京地区的环境构成极大威胁。

3. 水旱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

由于历史上山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山区对京津唐地区的生态屏障作用难以发挥。由于植被破坏，山区雨季经常发生泥石流，造成洪水泛滥；由于植被破坏，裸露地面增多，春秋季节扬尘四起，蒸发量大，干旱化加剧，进而形成荒漠化。



京津周围山区土层瘠薄，土质疏松，在失去地表植被保护的情况下，一旦遭遇暴雨，极易产生水土流失。全区共有水土流失面积 17 万平方公里。北京市山区面积中，水土流失面积达 6640 平方公里，占山区面积的 62%，土壤侵蚀模数年平均为 1600 吨/平方公里，大量的泥沙随着河流进入平原河道、水库，造成淤积和水体污染。官厅水库建成后 25 年淤积泥沙 6 亿多吨，占库容的 1/4；密云水库现已淤积泥沙 1 亿多立方米，直接威胁着水库的安全，制约着京津两市的供水状况。另外，由于地表水源缺乏植被的涵养调节，多雨时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干旱年份旱灾严重。

4. 城市空气质量

城市空气质量问题在京津唐城市密集区较为普遍。由于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郊区乡镇工业迅速发展所排大气污染物的增加，加上不断开工建设项目的扬尘污染和不断发展的荒漠化，使城市密集区大气污染日趋严重。特别是近年来不断发展的机动车尾气污染，已成为大气环境中继燃煤废气污染之后的又一重点污染源。

北京市大气环境中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TSP。通过近年大力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市区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等主要污染指标均已接近或达到国家标准，夏秋季节甚至远低于国家二级标准，而市区颗粒物浓度却一直居高不下，在全年各个季节污染都比较严重。

天津市长期处于煤烟型污染中，但已呈现机动车尾气等废气污染日趋突出的新态势。主要污染物 SO2、NOx、TSP 与 CO 的日均超标率分别达到 3.3%、1.7%、31.7%和 1.7%。

唐山市是以建筑、冶金、电力为主导的资源密集型的重工业城市，大气污染很严重，TSP 一直是唐山市大气首要污染物。自 1985 年以来，年日均值一直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经统计 1995 ~2000 年大气中 SO_2、NOx、TSP 首要污染物的污染负荷，TSP 占污染总负荷的 35% ~45%。

5. 植被退化，湿地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

京津地区冬春大风日天数多，具备风沙产生的动力条件，而长期以来人类不合理的开垦种植，破坏了地表的原生植被，裸露的沙石又为沙尘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据北京 1995 年荒漠化土地普查与监测资料，北京现有沙漠化土地 24.0 万公顷，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集中于永定河、潮白河、温榆河三大河流流域内，已形成康庄、南口、永定河、潮白河、大沙河

五大风沙危害区。北京北部丰宁县小坝子荒漠化土地，近十年来，从原来占土地面积的4.3%增加到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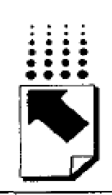
天津平原是由海退地而成，历史较短，由于濒临渤海以及长期以来河流的来回摆荡，形成了众多潟湖和泡塘、洼淀。天津有海岸湿地、内陆湿地、人工湿地。近年来，天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天然湿地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湿地景观呈现出人工化、破碎化、盐碱化趋势。近一个世纪以来，天津湿地面积呈现持续减少趋势，天然湿地面积已由上世纪初占全区总国土面积的45.9%减少到50年代的27.9%，80年代又降到7.5%，至2000年降至3.6%。湿地减少的原因，除自然因素外，河流改造、大范围修建水库堤坝等人工设施，使区域外来水量急剧减少，导致河流断流、地下水过量开采、地下水位下降，筑堤、分流等切断或改变了湿地的水分循环过程，使大片湿地因得不到水源补给而干涸。经济发展使城市的土地利用更加紧张，城市的拓展、工农业生产及交通占用湿地、开发区建设及石油开采占用湿地等更是现代湿地减少的主要原因。

唐山市境内有滦河、陡河、还乡河、沙河等较大河流，所辖乐亭、滦南、唐海、丰南境内有较长的海岸线。由于地理位置及水文、气象等条件，历史上形成了以丰南的草泊、油葫芦泊、玉田的后湖，乐亭、滦南、唐海、丰南的沿海滩涂等较大面积的洼淀、沼泽地、湖泊等。据史料记载，共有湿地面积200多万亩。然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观念错误，环保意识淡漠，受短期经济利益的驱使人们开始对这些湿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垦。湿地面积以每年10万亩的速度减少，截止到1998年，唐山200万亩的湿地全部消失。随之，以湿地为栖息地的野生动物及水生植物大量消亡，有些物种已彻底灭绝。到目前，这些湿地变成了农田、水产养殖区和工厂，严重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如地下水位快速下降，植被遭到破坏，土壤盐渍化、荒漠化、久旱无雨、空气干燥、风沙严重、虫灾鼠灾频繁，等等。

（二）地区特殊性生态环境问题

1. 天津地区——工业污染

天津是我国北方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国际贸易港口城市，是以轻工业为主，拥有机械、冶金、海洋化工、石油化工、电子、汽车等门类齐全的综合工业基地。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天津市的工业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工业污染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由碱渣、钢渣和粉煤灰污染组成。碱渣、化工渣



的存在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土地，阻碍交通，污染环境，而且影响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2003年天津市启动了全国首座综合性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中心，使固体废弃物污染问题有所缓解。工业污染也破坏了天津的近岸海域环境。据资料显示，每年有大量的陆源污水随河入海，近年来进入渤海的年污水量达28亿吨，占全国入海污水量的32%，其中天津市入海污水量10亿～11亿吨，使渤海成为了一个人工纳污池河和天然垃圾场。天津市滨海新区沿岸有28个主要排污口，每年有4亿吨以上的工业和生活污水排放入海洋。1997年监测结果显示，新区近岸海域水质超标率为17.9%，质量指数为0.73，水质主要受到无机氮、石油类、无机磷的污染。

2. 唐山地区－采矿生态破坏

唐山是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沿海重工业城市。地处环渤海湾中心地带，总面积13472km^2，人口704万。其中市区面积3874km^2，人口297.27万。唐山境内矿产资源品种多、储量大、质地优良、分布集中、易于采选。煤炭保有量62.5亿吨，为全国焦煤主要产区；铁矿保有量57.5亿吨，是全国三大铁矿区之一；石油、天然气、石灰岩、黄金等储量可观，在全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自然资源和历史沿革决定了唐山市目前仍然是一座以能源、原材料消耗为主的重工业城市，环境保护任务重、难度大。

（1）采煤塌陷。煤炭开采引起的地表塌陷，固体废物造成的土地压占、使矿区耕地大量减少，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干扰了矿区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煤矿企业为我国工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优质能源，但由于开采造成的地表塌陷，也对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和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塌陷使原平整的土地出现凹凸不平，造成水土流失、季节性或常年积水。唐山几个距市区较近的积水塌陷区现成为煤矿矸石、电厂粉灰、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的排放场，由于没有相应的治理环境规划与设计，加之部分工矿企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致使塌陷区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遭到严重破坏，变成又脏又乱、黑水溢流、飞灰蔽日、杂草丛生的荒芜景象。

（2）土地破坏。唐山市采矿业的大发展，严重地破坏了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主要表现在：①侵占土地。唐山地区地方矿山多建在耕地资源十分宝贵的山区，致使矿业和农业争地现象更为严重，导致农业耕地逐年减少。②植被破坏及水土流失。在近几年的矿业开发过程中，4县市（迁西县、滦县、迁安市及遵化市）共毁林达2100万株。唐山地区地方矿山多分布于地表地形为沟谷发育，且地形较陡的地区，受大陆性气候影响，年内降雨季节

性较强，多集中在七八月份，故地表降雨多汇集到沟谷中径流排泄，加之地表植被的破坏，造成以降雨冲刷及局部滑坡为主的水土流失。③采后土地存在的问题。由于植被减少，水文条件不佳，采后土地的壤质不断退化，并呈石化（板结、坚实），同时裸地扩大，相应地使温度场产生变化。温度的缓冲效果变弱，相对湿度和降雨量亦有明显变化，还有局部地区小气候的规律失常等。上述生态环境因子，综合效应影响作物、植被的生长发育和它们的正常更替，虫、鸟、禽兽对生态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植物繁衍不旺也影响了土壤的腐殖质回升。这些足以证明采后土地是处于生态恶化之中。

（三）京津唐城市密集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分析

1. 外部性是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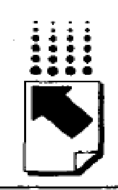
环境经济学认为，大多数环境破坏的原因是外部不经济性的存在。由于生态环境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机制扭曲，或根本就不存在市场，外部性的成本并未由利益主体均衡分担，因此人们在开荒种地、放养牲畜、挖山开矿、发展经济时没有或极少考虑到其生态环境的状况，尚未完全的市场也没能有效的控制消费者的行为，出现了市场失灵。在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应通过税收、管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制度改革来纠正市场失灵。

2. 环保投资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

环保投资是关系到生态环境污染整治效果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我国的环保投资也不断增加。但环保投资还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环保产业发展速度虽快，但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环保产业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开发能力弱，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等。此外，投入不足，投融资机制不健全，使得环保产业潜在市场还没有转化为现实的市场。京津唐地区的北京乘着奥运的东风，环境投入较大，持续增加。2004 年，全市环保投资 141 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的 3.3%。与之相比唐山地区 2004 年环保投资仅 8.5 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2.0%。环保投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背离，加剧了生态经济矛盾，不利于环境污染的治理。

3. 重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过程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采掘业、造纸及纸制品业，这些工业部门作为天津唐山地区经济的主体，工业经济效益指数均居于前列。但同时作为资源消耗型行业，经济



效益的取得伴随着资源的大量消耗和“三废”的大量排放，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预算远远多于轻工业部门，考虑环境效益之后的综合效益低下。天津唐山地区以资源消耗型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过程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非常突出。如何协调好这一矛盾，处理好经济增长近远期的关系、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从而保护自然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清洁环境，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协同持续发展，是该地区发展建设需要面对的切实问题。在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对各行业环境效益的考虑应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

4. 生态保护监管体制不健全

生态保护监管体制不健全是造成生态环境“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一套能够制衡各经济职能部门，协调区域开发、资源开发、农林牧开发等各行业发展计划及重大建设项目的综合决策机构，仍然按目前农、林、牧、水各部门分割管理经济，很难对整体性很强的自然生态系统实施统一有效保护。首先是对跨行业、跨区域的生态问题无力监控；其次是部门分割造成的多头管理对于某些团体的生态破坏行为制止不力；再次是各经济职能部门对于权属范围内的各类资源，既有保护的职能，更有开发的任务，在保护和开发相冲突时，为了经济利益和部门利益，不可避免地倾向开发，结果损害了环境和生态效益；最后是分散、各自为战的环境治理格局，造成项目重复、重叠，牺牲了资金的“捆绑”效应。

三　解决京津唐城市密集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路和对策

（一）解决问题的内因条件——树立科学的生态经济思想

遵循区域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强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证城乡发展的水源、绿色食品供应，协调流域上下游、开发与整治、人口与资源、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区域内生态环境整治为先导，搞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两大系统工程，加速建设科学合理的城乡布局和生产力布局模式，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要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战略意识，坚持环境保护基本国策，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处

理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以科技为先导，以机制创新为动力，紧紧围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重点地区的生态建设，大力改善生态环境；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和防治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加大重点城市、重点行业、重点流域的环境治理力度。

1. 明晰环境产权，调整资源价格体系

环境问题的根源从很大程度来说是环境资源的滥用。如果能构建完整的生态环境资源价格体系，使环境资源价值得到相对完整的体现，环境滥用的现象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因此经济政策的重点就在于明晰环境产权，利用市场机制，使资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使其价格正确的反映其全部社会成本。

2. 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大力发展生态工业，就是运用工业生态学的观念来改造现行的工业系统。从微观层面，按照清洁生产的理念来组织工业生产，促进原料和能源的循环利用；从宏观层次，要大力发展工业生态链和兴建工业生态园，在产业、地区、国家甚至世界范围内实施循环经济法则，使微观企业之间形成共生系统，尽量消除废弃物的产生。

3. 发展高新技术和环境无害化技术

循环经济的支撑技术体系是构筑循环性经济的物质基础，它已经成为当今技术发展的主要潮流。循环经济的技术政策中应包括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还包括环境无害化技术、替代技术、再利用技术、系统化技术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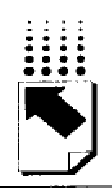
4. 开展绿色消费的教育政策

加强对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培养，绿色教育政策包括：逐步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工作制度，带动民众广泛参与环保实践；经常举办环境污染案例听证会，加强环境案件的社会影响；加强舆论宣传，强化环保意识；倡导绿色消费。

（二）解决问题的外部促进条件——制度机制创新

1. 生态功能分区定位确保安全

以完善生态功能为核心，大力开展造林绿化，提高森林覆盖率。在城市、城镇、村庄、库区等重点区域周围，加快森林生态圈建设，提高绿化、美化标准；在主要交通干线、河道、干渠两侧，沿坝、沿切、沿海地带建设高标准绿化带，形成生态防护林体系的骨干框架；在燕山、太行山大面积采



取飞、封、造相结合的形式营造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提高蓄水保土能力；在坝上高原地区营造乔、灌、草相结合的防护网，提高林网化标准，增强对农区、牧区的保护能力，加大首都周围绿化、太行山绿化等大型造林工程建设。

在大北京的规划中，按照生态一体化原则对生态进行了功能分区，在14个类型的区域中，将把握不同生态功能分区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因地制宜地解决各自的生态环境问题。与此同时，大北京的规划还提出在城郊地带建设大面积的环城绿色屏障，减少裸地面积，降低风速，为城市提供游憩功能。

2. 构筑京张承生态三角，建设京津冀北地区的生态屏障

为了保护城乡发展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屏障特别重要。特别是河北省的张承地区，是首都北京生态环境保护的天然屏障，在控制西北地区风沙危害防治水土流失和调节北京的小气候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至今开展的“三北”防护林、首都周围绿化和坝上生态工程等一系列生态工程建设，有效地缓解了本地区经济发展与京津生态环境改善的矛盾。但是，由于冀北地区土地荒漠化问题十分严重，森林草场退化十分突出，恢复建设生态屏障的任务十分艰巨。在未来几十年内，应该积极推广生态工程技术，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生态建设为辅，科学规划，确保质量，完善生态屏障，减少京津地区的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

3. 充分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治理工业污染

充分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就是根据环境经济学的原理，使用一切市场手段，通过经济刺激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而具体的操作过程有相当大部分是采取对直接排放的污染物进行处理，即投入治理资金。在实施经济刺激的同时，必须同时对治理费用投资给予足够的重视，积极开辟和疏通治理费用投资渠道，开发和推广高效率、高收益的治理设备、工艺和技术。对企业直接排放的污染物治理仍然是今后各级政府和政府环保部门的主要管理内容。在环境管理中除加强环境规划，鼓励建设集中处理设施的同时，也可以考虑排污权交易来避免一次性投资过大造成小规模处理设施的不经济，或在制定总量控制方案时，对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公平、合理地分配，从而充分发挥处理费用的规模效益。

4. 对资源型产业结构的调整应作为提高经济和环境效益的持久目标

在近百年的工业发展过程中，京津唐地区的唐山市始终是以能源原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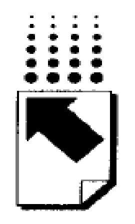
工业为其工业结构特征，不仅承受着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的巨大压力，价值和价格的背离也使得经济效益流失，产业结构初加工化过高同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突出。工业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成为制约工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出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提高环境质量的要求，都应将产业结构的调整作为一个持久的目标。不仅要努力提高加工工业在重工业中的比重，还应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和缓解唐山市工业结构过重的矛盾出发，充分发挥轻工业部门在利用劳动力资源、解决就业、面向国内外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和资本积累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唐山市农副产品种类繁多和质量上乘的优势，加快唐山市具有地方特色的轻工业的发展。这些工业部门技术水平相对来讲要求不高，环境影响程度弱，应成为县级工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重点，特别是在乡村企业中，这些部门应过渡为替代污染严重、效率低下的小钢铁、小水泥、小陶瓷的支柱产业，不断加大产品的商品化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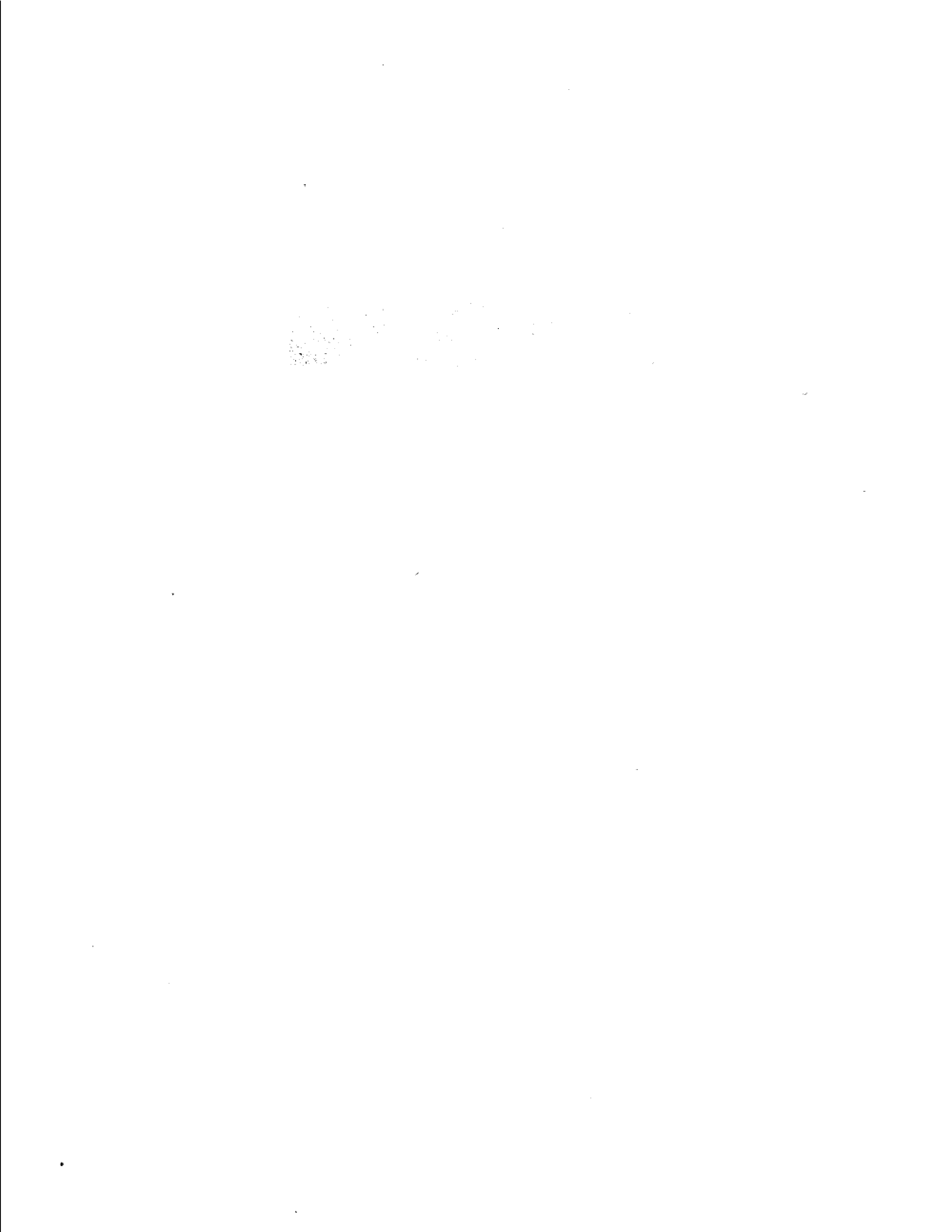
5. 加强区域环保一体化合作，建立稳定的资源补偿机制

环境问题区域化特征比经济区域化特征更明显，因此加强区域环保一体化合作就更加必要。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编制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和实施是政府履行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有效配置资源的手段之一，必须从整个区域协调发展的高度，按照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和环境容量的要求，整合经济社会发展资源，明确哪些地方能够开发、哪些地方不能开发，以及相应的开发方式和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整治工作，以实现高质量的、环境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京津唐地区还处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初级阶段，更加应当编制环境保护规划纲要，借鉴经验教训，从初期根本上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京津唐地区区域环境合作可以京津风沙源治理和水污染治理为突破口，联合行动，分摊环境成本。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长 三 角





2005长三角区域发展：增速回落中的艰难调整

○陈 维 胡 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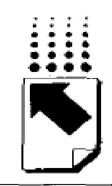
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在宏观调控背景下开始放缓，虽然全国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明显的下降，但原先强烈的加速度增长的趋势受到控制，而且宏观经济的各项指标，特别是投资增长和物价上涨势头被抑制。但在同时，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全国水平相比却有明显的下滑。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区域的长三角，作为连续十几年增长速度保持在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区域，其经济增长回落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关注，长三角经济增长开始进入调整期还是衰退期？长三角区域经济能否重振雄风，再领风骚？

一 2005年长三角经济整体滑坡

2005年前三个季度，在全国GDP增长速度同比回落0.1%的同时，长三角区域GDP增幅同比回落却达到了2.6个百分点，长三角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趋势。其中：苏州和宁波同比回落了2.5个百分点，南京同比回落3.1个百分点，而杭州和上海同比大幅回落3.6个百分点。从数据上看，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长三角区域越是大城市或主要城市，其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越是巨大。

从长三角经济增长减速的具体指标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制造业生产及其效益陷入"瓶颈"状态、吸收外资增势明显减弱、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慢。

2005年前三个季度，长三角16城市规模以上实现工业总产值4466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1%，增幅同比回落7.7个百分点。反映微观经济运



行趋势的企业景气指数也普遍走低。第三季度，长三角在主要的八大行业中，房地产业、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社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和工业等七大行业景气指数比第一季度下降，特别是房地产业剧降76.5点，降幅最小的制造业也下降了7.3点。

2005年上半年，上海实现生产总值3930.64亿元，增幅比上年同期下降3.3%。浙江省2005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也基本延续了上半年的颓势。前三个季度实现生产总值9016亿元，同比增长12.1%，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6个百分点，与上半年相差无几。江苏在整体上其经济增速在长三角地区算是最高了，但江苏的经济重要地区——苏南，在吸引外资、投资增长等经济指标上，与2004年相比也有明显的下降。

2005年前三个季度，长三角实现利润总额2073亿元，同比仅增长了3%，苏州地区工业利润增长22.8%，增幅回落达到20.6个百分点；无锡工业利润增长23.6%，增幅回落7.1个百分点；杭州工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略有下降；宁波工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5%，上海工业利润总额则同比下降14.6%。与此同时，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实到金额20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7%，增幅同比回落12.2个百分点。其中，南京下降了9.2%，杭州下降了3.4%，绍兴下降了13.9%，台州下降6.5%，上海吸收合同外资增长16.4%，增幅同比提高了13.3个百分点，但实到外资投入仅增长4.9%，增幅同比回落14.1个百分点。

长三角地区外资流入的减缓趋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长三角经济增长的动力，特别是对长三角制造业及出口将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对长三角区域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由于外资进入减缓，长三角一改多年来投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增速的局面，2005年前三个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9.5%，这个指标不仅同比回落了8%，并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6个百分点。2005年前三个季度，长三角区域过热的房地产业投资增速也由去年同期的35.3%下降到了20.8%，同样低于全国房地产业投资水平1.4个百分点。

二　对长三角发展减速原因解释的综述

在宏观调控背景下，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回落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对长三角经济增长减缓的原因及趋势众说纷纭。下面，我们把各种分析观点主要归纳综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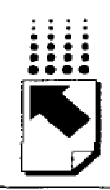
1. 认为长三角经济增速回落是一种理性回归

大部分观点认为长三角经济增速回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长三角经过十多年的连续高速增长，对各方面因素条件产生了强烈的调整适应的内在要求。或者说，当前长三角区域的发展观念、发展框架和发展基础已无法容纳更高水平、更好效益和更持续的增长，必须进行深层次的调整完善，而目前的增长回落则是长三角区域全面调整的一种体现。江苏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研究所所长顾为东博士是这样认为的："经济增长一定会遵循波浪式前进的规则，高速增长中往往积累着巨大的风险，只有通过减速、调整，才能将风险充分释放，从而再进入下一个加速周期。"

大部分专家学者都认同的是，目前长三角正处在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轨的关键时期，较为粗放的低端生产力逐渐调整转移，新的高端生产力正在集聚，但还未真正释放出其巨大的能量。因此，眼下的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一种"蝉蜕"中的"过程现象"。

从比较积极的方面来看待长三角经济增长回落的观点，更关注长三角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从指标上看，尽管长三角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它并没有让出全国"领跑者"的位置，长三角的发展仍跑在中国最前沿。2005 年前三个季度，长三角区域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的比重仍然在进一步上升。其中，GDP 占全国的比重达到 22.7%，同比提升了 0.6%；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达到 35.8%，同比上升了 0.8%；到位外资占全国的比重达到 41%，同比提高了 5.9%。只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贡献度的绝对值下降，占全国的比重同比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而这，恰恰证明长三角经济增长质量有所提高。并且，长三角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结构在向更合理的方向调整。与投资放缓相对照的是，2005 年前三个季度，长三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 14.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1.5 个百分点，总量占全国的比重提升了 0.2 个百分点。而且，零售额增速还高于 GDP 增速，这表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明显增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加了近 1500 元，增速达到 14.1%，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投资与消费"一降一升"，意味着长三角曾经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迎来转变的契机。这一格局的悄然变化，使得人们相信长三角目前的"减速"并非是经济运行的"滑坡"，而是正在步入一个"率先转轨"的过程，既是对以往的纠偏，也是意在未来的长远发展。

支持长三角经济增长质量上升的具体数据还有：2005 年长三角地区财政



收入稳步增长，市场物价逐步回落，城乡居民收入显著增加，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好转。

财政收入。2005年第一至第三季度，长江三角洲地区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收支增长基本协调。16个城市实现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437亿元，同比增长23.3%。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0.1%，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5个百分点。

市场物价。由于食品类价格涨幅逐步回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月下降，物价形势趋于稳定。2005年第一至第三季度，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居民的消费价格总指数均值为101.6，物价上涨1.6%，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6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2005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居民收入呈现稳步增加态势，16个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达到1164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近1500元，增速均值达到14.1%。16个城市中除嘉兴外，增幅都在两位数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居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居民消费支出也在快速增加，2005年第一至第三季度，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均值达到8225元，平均增长13.0%。

在长三角中心区域，一些地区已经开始酝酿不再把招商引资、GDP增长、财政收入水平等作为考核地方干部的最重要指标，取代它们的是社会和谐度、人民满意度、环境清洁度以及地方发展竞争力等指标。通过这样的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才能真正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经济环境建设为中心”。

更为重要的是，长三角作为一个区域经济体，开始真正从务实的角度进行区域经济的整合。作为我国首批国家级区域规划，长三角区域规划即将于2006年3月问世。同时，长三角16个城市之间已经开始对彼此间的竞争、合作与发展进行新的策略思考及整合。在2005年10月举行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峰会上传出信息显示，行政区划分割、城市间恶性竞争、产业同构、重复建设及区域污染等五大难题一直是困扰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最大障碍，但随着“长三角区域合作”概念和实践进程越来越深入，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变得不是那么“不可调和”了，长三角正在酝酿共同的应对之道。正因为有了区域合作背景下的共识，长三角的各种资源开始得到有效整合。目前，长三角区域在交通连接、旅游联动、生态环境治理协调、信息资源共享、人力资源流动等领域的合作正在逐步深入，向纵深拓展，有些已见明显

成果。同时，长三角区域的统一产权市场已经形成，长三角科技创新的科研设备仪器共享平台已经开始运作，《长三角综合交通规划方案》也即将出台。

因此，长三角16个城市在区域合作背景下进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化区域经济协作，将为长三角未来的长期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一个新的、更为坚实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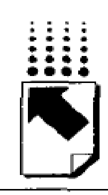
2. 认为长三角经济增速回落是宏观调控和结构转型双重压力的结果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长三角经济放缓有其内在的客观原因，但如果没有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的严厉实施，长三角经济增长将不大可能出现目前的回落态势。如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认为，长三角经济增长放缓“既是宏观调控预期目标的必然反映，也是多年来结构性、素质性矛盾的必然显现”。他认为，当前的发展状况是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的内部因素，是长三角的工业制成品主要以中下游为主，在目前买方市场环境下，销售价格上升不易，而原材料价格迅速抬高之后，长三角大量的企业只好牺牲利润，但这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再生产和投资信心；所谓的外部因素，则与宏观调控、国际市场情况变化有关，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煤电油运紧张和资源的短缺。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区域经济专家、环境资源学院院长曾刚认为：现在上海经济增长的下滑，是在宏观调控与结构转型的双重压力下出现的。这几年上海经济的拉动主要靠投资，而投资的方向则主要是以房地产业、制造业为主的“土木钢铁经济”，事实证明这条路到了该‘转弯’的时候了，要转向现代服务业。曾刚分析指出：上海“三二一”的产业发展顺序战略曾一度动摇，2003年后经济增长又过于依赖房地产。所以宏观调控政策一出台，上海的发展就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同时，上海房地产业的过快发展，房价的飙升，导致商务成本大幅度上升，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对上海制造业的“挤出”效应。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也认为：实际上，整个长三角GDP中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仍占了“半壁江山”以上，而金融、航运物流等附加值较高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则不尽如人意。从经济转型和长远发展看，现代服务业应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与上海所面临的产业转换和产业替代要求不同，江苏、浙江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制造业如何加快产业升级。江苏省省长梁保华就这一问题目前明确提出：江苏工业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2005年底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占工业比重要超过25%。要运用信息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提高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

长三角区域各城市面对当前的态势，也有清醒的头脑和自己的策略。上海市强调：要在不十分有利的经济形势下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就必须学会“在游泳中换气”，即既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又要保持较大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力度。

3. 认为长三角经济增速回落是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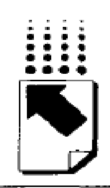
这种观点认为，从表面上看，长三角区域经济增幅回落是宏观调控的必然反应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代价。但在实质上，表明原先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导模式——拼土地、拼劳力、靠投资拉动的外延式增长方式，已难以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前行。这次长三角经济发展速度大幅回落与长三角经济发展属于典型的“东亚式的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模式密切有关。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刘遵义认为，经济增长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投入增加，另外一个来源是效率提高。根据刘遵义的研究，东亚的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的部分基本上是零，几乎全都靠资源投入。但资源是有限的，高投入维持不了很长时间。从这些年的情况和数据来看，长三角的经济发展，也是属于典型的“东亚式的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模式。当前长三角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和态势，从根本上说，是高投入、高消耗、低技术、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在新形势下的反映。如果继续沿袭这样的增长方式，在目前和今后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很大制约，不仅影响长三角制造业持续较快增长，而且制约了长三角经济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提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长三角区域规划综合组研究员、上海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也认为：对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发展现状评价，及与国际其他大都市城市群相比，基本上仍然是粗放型增长模式。长三角区域粗放型经济有三个特征：一是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二是能源消耗量大、三是劳动生产率低，追加土地用量成为部分地区弥补土地产出效率不足的简单扩张方式。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剑峰指出，以往外企在浙江省大量圈地建厂，只是将当地作为进口组装再出口的“中转站”，并未与当地产业链有效衔接。这样的引资方式无益于土地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且从长远看此类性质的引资并未给浙江经济带来太多好处，而且如果地区经济发展把重心放在这一基础上，那么会带来比较大的发展波动风险。从一些数据分析，在2004～2005年，整个长三角16个城市中原先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增幅

回落速度也较快，原因之一在于土地资源短缺或受到严格控制，造成一些地区出现有项目没土地的状况，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增长。2005 年来，长三角经济增长重点地区有往西扩往北移的趋势，同时江苏苏北地区增长速度大幅提高，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作为后发地区还拥有比较充裕的土地资源，大量项目开始向这些地区转移，导致其增长速度明显高于长三角区域其他的先发地区。

一些专家学者直言，即使中央不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按照上海和长三角区域这十几年的发展模式走到今天，也亟须进行根本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事实上，长三角经济发展中的根本性矛盾在于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摆脱粗放的格局"，江苏省统计局的一位分析师认为这是根本的原因。专家们分析指出，所谓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对长三角来说，其具体表现为：一是产业结构总体层次不够高，城市之间制造业结构接近，主导产业雷同，造成部分行业重复投资、过度竞争局面，而大城市及长三角整个区域的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水平普遍很低。二是技术创新能力明显不强，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很不充分，缺乏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及其市场性应用能力，国际制造业基地建设还处在初期的组装、装配阶段，尚未成为以研究与开发为支持的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引进多而消化更新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强势产业和企业很少，高新技术产品多处于"三来一补"型的低级阶段，附加值较低，出口效益不高。三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不够协调，高能耗、高污染的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偏高，造成整个区域资源供给紧张，环境污染加重，直接影响到整个长三角区域的投资环境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正在建设的项目没有钱，正在投资的项目没有地，正在生产的项目没有电。"这句话在浙江企业中广为流传。据调查，浙江现在可用于工业用地的耕地面积不足 400 万亩，按一年使用 50 万亩的速度计算，8 年后浙江的工业用地将告罄。同时，浙江还面临水资源短缺、矿产资源短缺、劳动力资源短缺等一系列增长瓶颈。浙江目前已是中国缺电最严重的地区，据估计，全国电力缺口一半在浙江。浙江从 2003 年起开始大规模对企业拉闸限电，此后两年拉闸限电的被限制用电总量占全国这一指标份额高达 54% 和 49.7%。大规模停电使得浙江企业单位的产品固定成本提高了 15% ~20%。同时，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对地区经济长期发展的影响已经严峻地表现出来，浙江土地利用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进一步加大，可用耕地最多只能再支撑 10 年，不少



工业投资项目和招商引资项目，因没有土地指标和土地资源而无法实施。同时，浙江的环境污染严重，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生态环境承载力已基本达到饱和。2005年初，国家统计局企调总队和浙江企调队对浙江596家企业的迁移问题做了调查。根据调查，这次被调查的浙江省596家企业中，已迁往省外的企业有196家，有意向迁往省外的企业74家，省内迁移的企业128家，省内意向性迁移的企业48家，外省迁入浙江的企业150家。总体趋势是企业向浙江省外迁移。浙江外迁企业最为关注的前三位引致迁移的因素是：土地资源，认同率为55.6%；电力供应，认同率为45.4%；原材料及能源供应，认同率为42.9%。一部分企业离开长三角的理由都很简单：土地、劳动力成本高，电力、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紧张。中小企业是浙江制造业的命脉，2004年浙江实现工业总产值24461亿元，其中中小企业实现总产值21601亿元，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88%。中小企业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面临土地紧缺、电力短缺、水资源短缺、资金短缺等方面的困难时，中小企业的处境则比较艰难。

在严峻的形势下，长三角16个城市认识到经济转型的重要性，都开始实实在在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从经济指标的纵向比较来看，近年来上海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全员劳动生产率、单位生产总值的能耗水平、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量、第三产业的比重、研究开发费用的投入比例、万人大学生数量等方面指标综合来看，上海正在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表明，上海与国际化大都市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特征还有很大的差距，上海的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仍属于粗放模式，上海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投资推动，依靠制造业支撑，依靠外来人口的增加，依靠经济总量的扩张。举例来说，尽管上海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已经从1990年的9620元/人提高到了2003年的70654元/人，上海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已从1990年的10370元/人提高到2003年的79206元/人，但是与国际化大都市比较，差距依然很大，例如上海2002年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东京的6.4%。目前，上海的人均生产总值已经达到5000美元以上，上海的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中，传统的那种粗放增长模式已经难以支撑上海经济继续高速健康发展。从商务成本来看，上海的房地产价格在过去几年中上升了2倍多，加上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不断提升，这使得上海的商务成本大大增加。显然，只有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只有效益型的经济发展道路才能消化如此高的商务成本。而且，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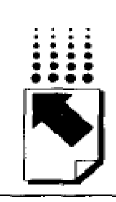
能源条件来看，上海本身能源很少，主要是从兄弟省市购进和从国外进口，能源运输目前已经占了上海运输能力的 1/5 左右。2003 年上海能源终端消费总量为 6698 万吨标准煤，如果经济增长方式不转变的话，那么到 2010 年，依据上海经济增长总量目标，上海将消耗 1 亿多吨标准煤。那时，煤炭和原油的供应、运输，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都将严重制约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由于基础原材料、能源价格将大幅持续上涨，上海经济发展的成本将更加巨大。因此，上海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转变产业结构，上海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4. 认为长三角经济增速回落都是房地产业惹的祸

从与长三角经济增速回落最有紧密现实联系的角度分析，部分学者把原因归咎于房地产业的大起大落。特别是对于上海与浙江而言，房地产业在最近几年成了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不仅是经济总量增长的有力引擎，还是地方税收大幅增加的重要来源。但随着宏观调控效应的显现，城市房地产业迅速走低，当然也拖累了整体经济的下滑。

从 2003 年开始，长三角区域各城市的楼市开始踏入飙升的通道。房价的高企和飙升刺激房地产投资的迅猛增加，拉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地方财税的迅速增加。房地产业已经成为推动长三角区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长三角各地的房地产业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都占到 20% 以上。2004 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13158 亿元，而江浙沪三地就占到了 28%，其中长三角 15 个城市在房地产业中的投资额是珠三角的 3 倍多。从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来看，据统计，在 2003 年中国 GDP 增长的 9.3 个百分点中，有 1.8 个百分点是房地产业直接贡献的。而在长三角区域，有关专家认为，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肯定超过 1.8 个百分点，在上海的一些中心城区，房地产业对区县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0% 以上。从财税角度来说，有关统计表明，正是楼市的飙升，才使得长三角区域各地政府地方财税收入中的 40% 以上来源于房地产业、建筑业以及出让土地的收益。2003 年，上海的卖地收入为 216 亿元，相当于上海市地方财政总收入的 24%，上海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 36%，可以说上海庞大的基建开支靠房地产支撑着。上海市卖地收入占 GDP 的比率低于香港 1998 年的水平，但高于香港其他任何一年（包括 1997 年）。从这可知房地产业对上海、对长三角区域各城市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的重要性。

然而，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是一柄双刃剑。以上海为例，房地产业一方



面支持着上海的经济和财政增长，另一方面又在削弱上海的竞争能力：高房价吓跑外来人才，高房价使商务成本急涨，一些企业开始纷纷迁离。在2001年时，上海仅有4%的住宅成交价格超过每平方米8000元，到了2003年就达到16%，而2005年第一季度已超过60%，在上海中心城区已经难觅10000元/平方米以下的住宅，导致生活和租金成本大升。上海甲级写字楼每年租金已飙升到286美元/平方米，超出新加坡的244美元。上海商务成本的急涨，导致一些企业从2003年起成批迁离中心城区和上海地区。

房地产业的明显降温被认为是长三角经济减速的重要影响因素。上海经济出现的下滑形势，除土地、信贷收缩导致的投资下降之外，与上海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业发展有着紧密联系，因此，房地产业市场的波动及其房地产业投资的放缓，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由于房地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和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因此当中国进行以抑制房地产投资过热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时，上海的经济增长就会面临较大的困难：一方面是经济增速下滑，一方面是财政收入开始吃紧，从而形成发展的窘境。

2005年上半年，上海房地产业实现增加值265亿元，同比增长4.5%，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5.5个百分点。浙江2005年前7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完成708亿元，增速同比回落20个百分点以上，商品房空置面积同比增长53%，其中住宅空置面积增长几近一倍。江苏在2005年前三个季度，房地产投资也比上年同期回落逾10个百分点，商品房空置面积大幅上升，同比增长35%，为200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房地产业的产业链很长，它的上游是建筑材料、钢铁、煤电和运输等产业，都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将导致整个产业链的生产过剩，产业发展进入低潮，经济将趋于萧条。因此，房地产泡沫带来的危害不仅仅限于行业本身，而且会严重影响到其他许多行业。一旦房地产崩盘，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可能发生严重危机。而以房地产业作为城市的核心产业的危险也在于此。

三　长三角经济发展走出窘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长三角需要经历一场经济增长方式的革命，这是长三角区域真正奠定可持续健康高效快速增长的基础，也是长三角区域真正发展成为世界第六城市

群的正确路径。在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更加严厉的约束面前，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增长模式确实需要深刻的转变。

这种转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 从长三角区域各城市的全面协调发展来考虑调整时期的增长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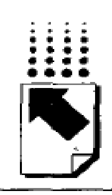
长三角区域各城市目前已认识到调整的必要性，但是忧虑在调整过程中因丧失市场和出口而造成地区经济发展的严重滑坡。然而，增长空间还是巨大的，而且是内在的。从长三角区域的各城市发展状况分析，目前的城市繁荣仅仅是局限于中心城区，各城市的庞大郊区和农村地区仍处于发展水平非常低下的状况，如上海的广大郊区农村、江苏的苏北地区、浙江的南部山区。当我们把目标从 GDP 总量及速度转移到对城乡全面协调发展的追求时，增长空间将被大大拓展：农村的城市化发展、农村的工业化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及城乡基础设施和教育、文化、商业、医疗等公共设施和产业的发展，都是长三角区域各城市、也是我国城市所面对的巨大的发展空间。对这一发展空间的开拓利用，一方面将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同时也为调整时期的经济增长寻找增长空间和增长内容，以利于在保持一定增长状态下加速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同时，发展目标的这种转变及其实践，本身就成为实践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内容。

2. 把经济增长从资源消耗模式转变为人力资本利用模式，从本质上实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长三角区域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其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不仅仅满足于从消耗资源到少消耗资源、从低效率到较高效率、从高污染到较少污染的转变，而是要着眼于时代特征——知识经济时代的思维竞争，着眼于中国特点——充裕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着眼于发展环境——全球化的开放竞争，把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增长基础从消耗资源转移到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对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上，即把经济增长基础主要放在对智力因素和资源的开发利用上。这一方面是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向着轻型化、高质量方向演变，同时也是上海及其长三角区域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必要基础。

3. 把创新作为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手段与标志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一方面是对增长所依赖的资源要素的变化，同时也是增长手段的变化。当增长依赖于物质资源要素的投入时，高投入就成为主



要的增长手段。而当把人力资本、智力要素作为增长所依赖的资源要素时，创新就成为主要的增长手段。创新是全面的，除了依赖于人力资本而强调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自主知识产权创新外，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还需要更多的创新：管理创新、观念创新、服务创新、体制创新、政策创新等，重要的还包括政府创新。只有依靠这种社会性的全面创新，各种创新的互动促进，才能真正营造创新环境，才能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并且为重要的科技创新创造基础和氛围。

4. 进一步加强区域协作，从经济一体化角度打造长三角整体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形成有机的经济体系

长三角区域的制造业发展规模和总量在全国领先，但是，长三角区域的制造业效率和竞争力与全国水平相差不大。主要原因在于长三角区域地区间的产业类同发展，地区间产业和产品恶性竞争，地区间产业发展缺乏分工协作，因此，长三角庞大的制造业总量是由相互分割的地区总量、甚至是由缺乏联系的众多企业生产量拼凑而成。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长三角地区也缺乏大企业，除了原先国家投资、计划扩张的大企业外，长三角缺少通过市场化运作及其分工协作配套而形成的大企业。因此，在长三角区域协作的大背景下，各城市应该从区域角度考虑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关键在于要形成各城市的产业特色和优势，通过优势互补的分工协作体系来显示这种优势，从而通过产业集聚进一步扩张产业规模和能量，并进一步突出产业优势。以产业优势为特征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和效益的，也是有竞争力的。通过以这种内涵为核心长三角区域整体产业结构的打造，将有效提升长三角区域经济的效率和竞争力，并且内在地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增长互动、共享发展的良好格局。

（作者单位：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

长江三角洲城市服务业发展环境和竞争力研究

○ 刘曙华　沈玉芳

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现代产业结构也呈现出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趋势，服务业在经济中的作用日趋明显。服务业日益发展成为联系全球经济贸易和企业跨国生产经营的桥梁和纽带，服务型经济成为促进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鉴于服务业竞争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一个城市（城市群）整体经济的发展在一个国家甚至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长三角地区城市怎样在产业化的区域和全球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研究就具有现实意义，而分别从服务业发展环境和竞争力的角度动态性考察服务业发展情况，从而全面了解各城市服务业发展的优势是一个城市谋求和获取服务业发展空间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一　长三角城市服务业发展态势及其国际对比

1. 长三角城市服务业发展状况

从1990～2003年，长三角服务业所占比重从27.2%上升到40.3%，上涨了13.1个百分点，同期上升幅度在全国最快。城市是区域发展的极核，也是服务业（第三产业）的主要聚集场所和中心，2003年长三角15城市三次产业结构为6.3∶56.1∶37.6[①]，长三角16个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见表1）。

---

① 2003年8月，浙江省台州市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四次会议上被正式接纳为第16个城市，本文没有包含其统计数据。

表1　长三角16个城市服务业发展状况（2003年）

单位：%

城　　市	上海	南京	杭州	舟山	无锡	宁波	镇江	扬州
服务业比重	48.43	44.59	42.09	39.55	39.45	37.69	37.45	37.33
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	56.6	54.65	62.79	64.73	49.09	47.35	52.34	48.11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33.5	30.65	37.27	31.84	30.72	37.58	35.6	33.28
城　　市	常州	湖州	泰州	南通	苏州	绍兴	嘉兴	台州
服务业比重	36.73	35.37	35.35	34.39	33.7	33.23	32.75	32.57
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	47.56	65.68	52.56	47.76	37.72	43.77	53.66	55.84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38.16	30.56	31.71	31.84	24.52	33.07	26.42	35.09

资料来源：《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统计年鉴2004》整理。

2003年长三角16个城市服务业占GDP比重的极差[①]为15.86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的极差为27.96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极差为13.64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的差异明显大于服务业比重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差异。单从数字上观察，上海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最高，湖州、舟山和杭州等城市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比较高，常州、宁波和杭州等城市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从整体上观察，长三角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明显滞后工业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 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

服务业的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一个城市和地区的竞争力大小，越是发达的城市，其服务业发展水平就越高。比较了长三角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差异，可知上海的地位十分突出，但与国际城市相比的差距十分明显（见表2），尤其是体现国际大都市特色的信息、咨询、医疗服务、法律服务、设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还有待提高。

目前，纽约、东京、伦敦和巴黎等国际城市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在80%以上和85%以上，服务业就业比重一般高于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上海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与国际城市的差距在30%以上，服务业就业

① 极差指所研究数据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的绝对值。

表 2　上海服务业发展结构与国际城市的比较

单位：%

城　　市	东　京	纽　约	伦　敦	香　港	上　海
年　　份	1996	2000	2001	2003	2003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82.8	86.2	89	84.7	48.4
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	77.8	85.7	89.8	85.3	51.9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 2004》、《香港经济年鉴 2004》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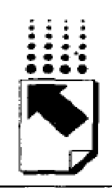
比重的差距在 30% 左右，尤其在 2003 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跌回 50% 以内[①]。上海与国际城市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差距更大，在国际城市服务业的内部，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服务业的比重在 25% ~40% 以上，金融保险业和社会服务业从业人数占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都在 10% 和 20% 以上，2003 年上海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只有 20.64%，这与上海要建成“四个中心”的目标是格格不入的。可见上海服务业与国际发展水平的差距十分明显，形成国际城市那样的产业结构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其他 15 个城市服务业发展速度很快，但与国际水平相比的差距更大，同时也说明了长三角城市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很大，发展的潜力不可低估。

二　长三角城市服务业发展环境和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的构建

1. 服务业发展环境评价指标的选取和体系的构建

服务业的发展是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叠加的结果，包括经济、社会、政策环境等影响因素，且其作用大小根据服务业的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别。在遵循全面性、客观性、可比性等原则，同时考虑资料的可获得性的基础上，建立了长三角 15 个城市服务业发展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有：GDP 增长速度（%），人均 GDP（元），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金额（元），人均固定资产投

① 2003 年上半年上海受非典疫情的冲击，服务业一度遭受打击，第二产业则相对加速增长。



资（元），人均储蓄金额（元），进出口总额（亿元），港口吞吐（万吨），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利税率（%），产品销售利润率（%），人均财政支出（元），人均贷款金额（元），城市化水平（%），城镇失业率（%），城市绿化覆盖率（%），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万人拥有公交汽车数量（辆），环境污染治理投入（亿元），每户拥有电话数（部），万人拥有医生数（人），每万人拥有床位数（张），宾馆酒店数（家），人均文教、科学和卫生事业费支出（亿元），万人拥有高校学生数（人），三种专利申请授权数量（项），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人），国内外旅游收入（亿元）等体现服务业发展环境的 29 个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城镇登记失业率进行同趋势化处理（即对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取倒数），消除指标之间变化趋势的不一致对结果的影响。

2. 服务业竞争力评价指标的选取和体系的构建

服务业的竞争力是一系列具体服务产业发展水平综合的结果，同样遵循以上原则建立了服务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有：服务业生产总值（亿元），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从事服务业的人数（万人），从事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比重（%），服务业增加值（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增加值的比重（%），宾馆酒店数（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中资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亿元），中资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亿元），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邮电业务总量（亿元），普通高校人数（人），各类专业技术人数（人），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亿元）等 16 个指标。

3. 评价模型的构建

全局主成分分析是采取对时序全局数据表降维的方法，在包含原有指标大部分信息的基础上，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指标归结为少数几个统一的公共主成分，并研究多个指标的内在结构关系和时间序列变化关系的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现在许多对服务业的定量研究仅局限于从静态的角度进行测算和评价，忽视了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服务业发展的动态性特征和趋势。每个城市服务业的发展都是动态变化的，且它们的发展速度因城市和时间不同而存在差异。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可对长三角城市服务业竞争力在统一性和可比性的基础上进行动态性评价。动态性的评价城市服务业的竞争力，可充分把握服务业发展中隐藏的规律并充分认识各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功能定位、优势和潜力。

三 长三角城市服务业发展环境和竞争力测算结果及其分析

1. 服务业发展环境得分的测算及其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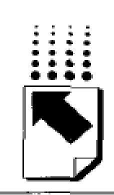
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根据2000～2003年服务业发展环境指标原始数据，计算出各城市服务业发展环境水平得分，再对这4年得分进行一次主成分分析得到总体发展环境综合得分（见表3）。

表3 长三角16个城市服务业发展环境得分及其排序（2000～2003年）

城市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总体发展环境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综合得分	排序
上海	1.840	1	2.062	1	2.220	1	2.785	1	3.322	1
南京	0.278	2	0.439	2	0.521	2	0.613	2	0.696	2
杭州	0.115	3	0.197	4	0.368	3	0.477	3	0.430	3
无锡	0.040	4	0.242	3	0.198	4	0.394	4	0.326	4
苏州	-0.027	5	0.057	5	0.160	6	0.317	5	0.186	5
常州	-0.127	6	-0.044	6	0.035	7	0.131	7	-0.002	7
宁波	-0.136	7	-0.046	7	0.167	5	0.288	6	0.093	6
舟山	-0.222	8	-0.172	8	0.029	8	-0.091	8	-0.164	8
镇江	-0.358	9	-0.273	9	-0.319	10	-0.228	11	-0.436	9
嘉兴	-0.390	10	-0.343	10	-0.271	9	-0.174	9	-0.443	10
绍兴	-0.444	11	-0.440	13	-0.338	12	-0.207	10	-0.540	11
扬州	-0.456	12	-0.395	11	-0.368	13	-0.560	16	-0.648	13
南通	-0.491	13	-0.550	16	-0.480	15	-0.442	14	-0.730	14
湖州	-0.513	14	-0.412	12	-0.320	11	-0.265	12	-0.569	12
泰州	-0.566	15	-0.507	15	-0.550	16	-0.532	15	-0.800	15
台州	-0.607	16	-0.485	14	-0.476	14	-0.348	13	-0.723	16

根据得分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可以把它们分为3大类：

第一类：上海各年得分遥遥领先其他城市，2000～2003年服务业发展环境得分分别是排名第二名（南京）为6.62，4.7，4.26和4.54倍，总体发展环境综合得分也是第二名南京的4.77倍，服务业发展环境十分优越，尤其是在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环境上突出（科教水平因子得分最高），优势主要集中在金融、外贸、信息、技术服务等方面。在2002年，世界排



名前50位的外资银行有80%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截止2003年9月，上海有外资银行57家，总资产额占全国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50%以上，资本实力非常雄厚，为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大量集聚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上海还有近200家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和中国总部，拥有许多现代物流中心，销售中心和国际贸易性公司等，都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二类：南京、杭州、无锡、苏州、常州、舟山和宁波7市在这4年服务业得分总体上是增加的，服务业发展潜力十分看好，但还有待创造条件使其得到释放。南京主要体现在人才优势方面（科教水平因子得分高），拥有各类高等院校48所和各类科研机构640多家，人才素质较高，有利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同时旅游业的发展环境也很好。杭州和苏州服务业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社会环境好，投资吸引力强。苏州和无锡在制造业上吸引外资的力量就优于服务业（工业发展水平因子得分最高），可以认为它们现在处于以第二产业为重点产业发展的时期，在产业上将以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并构筑与其阶段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舟山和宁波在临港型服务业发展上有竞争力。

第三类：剩下的8个城市服务业发展环境相比以上城市改善不是十分明显，服务业发展还存在许多瓶颈，地方科研院校少，技术和管理人才不足等严重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科教水平因子得分低）。因此，在服务业发展上应扬长避短，重点利用自身具有的比较优势资源侧重性发展服务业。比如，嘉兴由于紧邻上海与苏州，同时受两大城市产业“邻域渗透”辐射作用，因而在产业上可以采取制造业与服务业齐头并进发展的策略。

2. 服务业竞争力得分测算及其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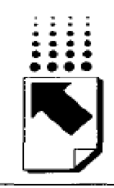
同样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对2000~2003年服务业竞争力评价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测算得到各城市服务业竞争力得分及其排序（见表4）。

长三角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上海一枝独秀，竞争力十分明显，2000~2003年服务业总体竞争力得分是排名第二位苏州的12.3倍，通过分析这几年其他15个城市服务业的竞争力提升也十分明显。上海是长三角16城市中唯一服务业比重超过50%的城市（在2003年比重有所下降，为48.43%），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3.5%，经济服务化特征开始凸现。服务业就业人员比重持续上升，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成为从业人员比率最大的部门，就业人员也呈现出服务性特点，同时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已超过分配性服务业比重，逐步成为城市服务业的主导产业。虽然在2003

年上海金融、商贸、物流、房地产、旅游和信息六大行业在服务业增加值中的比重超过了80%，但一些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还是过低，服务业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2003年现代服务业中所占比重最大的金融保险业（20.64%）占GDP的比重也只有10.1%，作为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保障，金融保险业业发展拥有旺盛的生命力。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异相比并不是很大，因此排名波动幅度不是很大。大部分城市都是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推动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它们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上的发展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南京和舟山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突出。南通、泰州和无锡的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最小，南通、绍兴、嘉兴和台州的服务业人口指标低，扬州、台州和湖州在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上存在投入少的瓶颈。舟山的独特的区位优势使服务业的成长力不错，三次产业比重与上海一样呈“三、二、一”格局分布，内部人口就业结构都在向服务业倾斜，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临港型服务业的发展上。

表4　长三角16个城市服务业竞争力得分及其排序（2000～2003年）

城市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总体竞争力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综合得分	排序
上海	2.421	1	2.653	1	3.435	1	4.257	1	3.549	1
苏州	0.070	2	0.063	3	0.266	4	0.681	2	0.289	2
杭州	0.068	3	0.074	2	0.371	2	0.552	3	0.291	3
南京	0.003	4	0.042	4	-0.110	7	0.436	4	0.105	5
宁波	-0.001	5	-0.148	5	0.342	3	0.430	5	0.163	4
无锡	-0.031	6	-0.250	6	-0.095	6	0.211	6	-0.042	6
南通	-0.168	7	-0.294	7	-0.069	5	-0.140	7	-0.175	7
台州	-0.223	8	-0.389	8	-0.274	10	-0.204	9	-0.292	8
绍兴	-0.282	9	-0.419	10	-0.247	9	-0.147	8	-0.303	9
常州	-0.344	10	-0.358	9	-0.274	11	-0.253	11	-0.337	10
泰州	-0.382	11	-0.490	11	-0.291	12	-0.337	13	-0.414	11
扬州	-0.414	12	-0.515	12	-0.426	14	-0.324	12	-0.466	12
嘉兴	-0.417	13	-0.776	15	-0.229	8	-0.212	10	-0.471	13
湖州	-0.437	14	-0.542	13	-0.446	15	-0.573	15	-0.542	15
镇江	-0.456	15	-0.572	14	-0.402	13	-0.419	14	-0.513	14
舟山	-0.623	16	-1.030	16	-0.702	16	-0.640	16	-0.842	16



3. 各年服务业发展环境和竞争力得分的差异比较

从2000～2003年各年服务业发展环境和竞争力得分可以分别得出16个城市发展环境得分的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见表5）。

表5　16个城市各年得分差异的比较

年份	发展环境得分				竞争力得分			
	极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①]	极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2000	3.044	-0.076	0.699	—	2.448	-0.129	0.587	—
2001	3.683	-0.184	0.813	—	2.613	-0.042	0.636	—
2002	4.137	0.053	0.948	17.87	2.771	0.036	0.668	18.53
2003	4.897	0.207	1.153	5.56	3.345	0.135	0.798	5.92

2000年和2001年服务业发展环境和竞争力得分的变异系数由于平均值是负数而无法计算出来进行比较。

从总体上看，各城市服务业发展环境和竞争力得分除部分年份外都有明显的提高，但提高的幅度不尽相同（见表3、表4）。从表5各年的标准差来看，15个城市的服务业发展环境和竞争力得分的绝对差异在扩大，但从变异系数来看，得分的相对差异都发生了巨大的缩小。

4. 服务业发展环境和竞争力关系的总体分析

把长三角城市服务业发展环境综合得分和竞争力综合得分进行对比分析可以认识各城市服务业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的潜力和趋势（图1），

上海、绍兴、扬州、台州、泰州和南通6城市服务业的竞争力综合得分高于总体发展环境综合得分，在服务业发展上，关键在于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对传统服务业上进行能量升级，延长服务业价值链，大力利用各自资源优势发展现代服务业。南京、无锡、常州、舟山4城市服务业的竞争力综合得分低于总体发展环境综合得分，可见服务业的发展很具有发展潜质，服务业成长力和发展活力也十分旺盛。根据专业化经济理论，只有当制造业发展到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更多地依靠服务业来支撑时，才会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杭州、苏州、宁波、镇江、嘉兴和湖州6城市目前在制造业上的发展潜力强于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其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应该是齐头并进的，这些城市可把重点放在现代制造业与其相关支撑性服务业的发展上。从长三角整体上看，上海以建设“四个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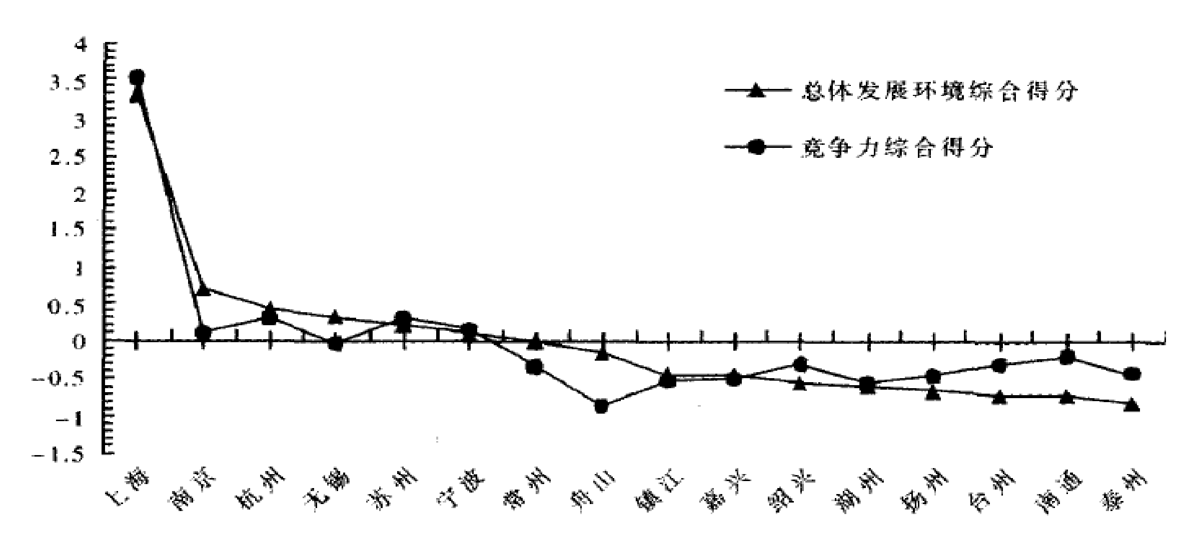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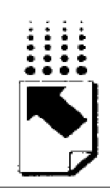
图1　长三角区域服务业总体发展环境和总体竞争力关系图

为目标，完全可以在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上通过降低制造业生产中服务投入的实际成本而支持其他城市制造业的发展和提升区域内部服务业的能级。

四　加快长三角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上海在服务业发展环境和竞争力上明显领先于其他城市，在整个区域服务业的发展中处于制高点的地位，在产业上的功能定位会对整个区域产业的布局和升级产生巨大的影响。鉴于处于价值链高端的现代服务业具有超地域辐射功能，同时考虑到其拥有的巨大优势，上海应注重创造条件发展以知识密集型为特征的现代服务业，其他城市根据产业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形成与其产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和独特产业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核心是产业的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必须在遵循产业演进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动态性的定位产业发展方向。在分析本区域服务业的发展方向时应分别从各个城市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多个视角对服务业的提升战略进行分析。

第一，从整体上看，上海更多的应承担起长三角地区甚至整个长江流域的服务中心和内地联结世界的桥梁和纽带的功能，以对内对外形成两个扩展面带动产业能量的全面升级。其他城市在制造业发展上可以充当核心作用，



促进各自优势产业的迅速成长。形成上海的现代服务业和部分现代制造业加长三角其他城市竞争力强的制造业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大格局，不但使服务业从第二产业中（主要是制造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而且产业间的密切联系可使制造业在升级的过程中得到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强有力的支持。

第二，长三角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互动、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区域之间产业分工和合理布局，只有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才能充分实现，并会促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本地区有竞争力的服务业只有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之后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在服务业的发展上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推动区域内部的制度建设和相应区域组织形式的形成与活动的开展，在长三角城市间建立多层次、宽领域的产业发展协调机制，以政策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为区域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条件。

第三，区域产业的分工是随着各中心城市功能的增强和产业化发展而开展的。长三角区域服务业的定位关键看上海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同时给其他城市留下的多大的范围和拓展空间（关键在于上海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发展顺序和重点上）。上海在正确处理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的关系上应进行准确的定位。从目前的情况分析，上海应该发展金融保险、信息咨询、商贸流通、房地产等体现城市服务功能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环保、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以及具有上海特色的知识型服务业（R&D、教育培训、医疗卫生、文化传媒）和都市型旅游业，加快产业全方位软化①和轻型化的发展趋势。在发展都市型服务业的同时，努力创造条件形成各城市节点对节点、节点对面和面对面的区域服务业发展网络框架，实现服务业的区域互补、联动、合作与分工，构筑起高层次、强辐射的服务业网络体系，从而通过“磁场效应”带动整个长三角地区服务业能级的提升。上海在选取金融服务、航运服务、文化服务、物流服务等六大领域作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点领域的同时要充分发挥它联合与带动整个长三角区域的服务业能级提升的辐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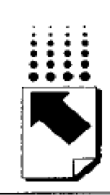
第四，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专业化经济理论和内生比较优

---

① 服务业的软化是指服务业的发展更注重科技、知识和信息等软性生产要素的含量。

势原理，从整体上确定长三角区域服务业的功能定位。江苏正着力打造沿江产业带，浙江着力打造的杭州湾产业带，在服务业的区域一体化上可以以世博会为契机，在一些合作性强的产业（旅游业等）方面进行优势互补，并以之为突破口加强对其他服务业领域的渗透，形成金融、物流、旅游等一体化发展平台，塑造以上海为中心，以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和宁波为次中心的一体化服务网络。各城市可按照服务业发展的比较优势来定位各自功能。南京可以建设成区域性金融中心，突出发展金融保险业。形成的现代物流、旅游会展、金融、信息、商贸五大区域性服务中心应继续扩大辐射范围。依靠科技教育资源优势发展知识密集型和高新技术服务业，着力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第二个服务业发展核心。杭州可以建设成为中小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服务的区域专业化金融服务中心，并根据资源禀赋的结构特征，带动一批高附加值的相关产业（旅游业、房地产业、会展业、物流业等）的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可和宁波一起在与上海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建设成为长三角南翼的现代服务业中心。嘉兴的传统产业集中度高，可利用打造杭州湾产业带为契机，建设成为现代物流基地，重点扶持市场需求旺盛、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并运用新技术改组、改造传统服务业，赋予其新的内容，改变传统服务方式，提高服务业整体水平，同时作为接轨上海的桥头堡的优势提升产业能级。湖州可建设成为江浙皖现代物流中心，加强优化小梅口太湖休闲旅游度假区的功能，大力发展旅游业。绍兴可以以建设成为杭州湾现代物流中心为突破口，带动其他功能性服务业的发展。舟山可以以深水岸线为服务业发展支点，重点发展临港型服务业，可与宁波、嘉兴和上海等城市共建国际航运中心。宁波应重点发展现代物流等临港服务业以及社会服务业和商贸业等。无锡和苏州可以发展基础好的传统服务业和新型服务业，努力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比翼齐飞。

总之，整个地区服务业网络体系的建立是十分必要的，以现代物流业为例，现代物流发展模式有香港物流发展模式、新加坡物流发展模式和鹿特丹物流发展模式等。考虑到物流业的地域性特征，长三角大部分城市在发展物流业上有各自的优势，因此，借鉴鹿特丹物流发展模式大有裨益，以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企业自主经营，配套设施齐全，储、运、销一条龙服务。从长三角整个地区角度则可以加强对现代物流设施网络化体系和信息体系的建设，构建和完善区域物流政策、物流运输和物流信息三个平台，从而打造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和货物集散中心。



参考文献

谢文蕙、邓卫：《城市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王淑婧、陈忠暖、王开泳：《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城市服务业竞争力比较分析》，《热带地理》，2005年第1期。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上海市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4。

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4。

江苏省统计局：《江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4。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香港经济年鉴编辑部：《香港经济年鉴（2004）》，经济导报社，2004。

任若恩、王惠文：《多元统计数据分析——理论、方法、实例》，国防工业出版社，199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尹继佐：《2004年上海经济发展蓝皮书——创新城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王洪庆、朱荣林：《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关键：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互动》，《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1期。

周振华：《现代服务业发展：基础条件及其构建》，《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9期。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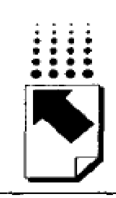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动因与演变的实证分析

○ 王红霞　林志宗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同时也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最为成功的地区之一，早在1989年就被法国著名学者戈特曼誉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近年来的飞速发展更是引世瞩目。在城市发展日益成为经济发展增长极的今天，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和影响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最为成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进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是否像发达国家地区的城市化那样源自工业化的推动？这些问题无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将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为研究对象，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和规律，以期能对上述问题作解答，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借鉴。

一　城市化动因的理论探析：中国特色的三元主体城市经济模型

19世纪欧美国家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繁荣推动了城市的迅猛发展，从而使其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欧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时发现：一般来说，来自城市的吸引力和来自农村的排斥力即“拉力”与“推力”是构成城市化持续推进的动力机制——工业化形成的“拉力”效应和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所形成的“推力”效应（Todaro，1969）影响和决定着城市化的进程。钱纳里和赛尔奎因在1975年的研究中指出：城市化可以看作是“以导致工业化的贸易和需求的变化为开端、以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就业的源源不断转移为结果"[①] 的一个过程。钱纳里和赛尔奎因通过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进而指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从而带动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②] 钱—赛模式表明，随着工业化逐渐向高层次阶段演进，工业化对城市化进程的主导作用逐步分散而减弱（郭克莎等，2002）。但是，从本质上说，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在我国，很多学者认为：中央政府发动的工业化和农村自发的工业化是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力量（赵新平，周一星，2002）。也就是说，工业化是影响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仇保兴，2003）。经济地理学和新城市经济学，尤其是空间经济学在研究城市的形成、起源和发展等问题时深入和细化了工业化对城市化和城市的作用。空间经济学创始人藤田和克鲁格曼等学者通过考察19世纪美国城市发展的历史指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及城市化进程是在市场条件下企业和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是市场经济主体相互之间发生作用的自我组织过程（Fujita，Thisse，1996；Fujita，Krugman，1999）。由于19世纪的美国是“自由主义”和“完美市场”盛行的时期，因此，藤田和克鲁格曼所考察的城市形成和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显然处于一个只有企业和个人二元主体参与的城市经济之中。当市场不尽完善、存在政府部门的干预时，城市化进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企业、个人和政府的多重影响和作用。在我国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进程中，我国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实际上处于一个由企业、个人和政府三元主体参与的城市经济之中。因此，在这个三元城市经济中，企业、个人和政府部门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共同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如果以U代表城市化，那么城市化函数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U = F(\text{企业},\text{个人},\text{政府})$$

以下本文将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的历史实践，利用1984～2001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长江三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内在动因进行深入探讨。

---

① 钱纳里等：《发展的格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第56页。

② 钱纳里等：《发展的格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第22～23页。

二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发展演变的实证分析

根据以上城市化函数，本文选择利用反映城市化活动的城市化率指标、反映非农经济活动的企业活动指标和反映政府行为影响的政府类指标等三类指标来全面考察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的发展与演变。

（一）指标选取、方程建立和样本说明

具体来说，反映非农经济活动的企业活动指标包括综合反映企业发展水平的工业化率指标和具体反映企业集聚演变的企业集中度指标；在构建反映政府行为影响的政府类指标时，考虑到一个城市所处市场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一个城市微观经济的运行，而市场完善程度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纯市场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则突出反映着政府政策和体制改革、制度改进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们设定市场开放度指标来主要反映政府政策和体制改革城市化的影响；同时，由于我国目前情况下，城市公共设施等市政基础环境的改善一般依赖于政府行政规划和财政投入因而主要是政府行政力量的结果。因此，我们还设定了政策支持度指标来综合反映政府行政干预的影响。这些指标界定如下。

1. 工业化率（记为 I）

由于工业 GDP 的间断和缺省，为保持指标的连续性、可比性和减少人为误差，本文采用工业总产值占总 GDP 的比例来表示工业化率，该比值越大说明工业化水平越高，反映企业发展的综合水平越高。

2. 企业集中度（记为 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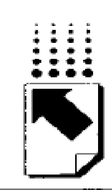
指市区工业总产值与辖域地区工业总产值之比，该比值越大说明在某一城市的企业集聚程度越强，反之越弱。

3. 城市化率（记为 U）

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进行度量。指标值的大小反映了城市化水平的高低。

4. 市场开放度（记为 M）

由于追逐利润的外资总是流向最具市场引力和投资回报的区域，因此，一个区域实际利用外资的程度和效率直接反映着该区域的市场程度和政策环



境的变化；为便于本文研究，市场开放度指标借用外资依存度指标来表示，即用实际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来进行衡量；市场开放度越大说明其体制改革的力度越大。

5. 政策支持度（记为P）

根据上文界定，政策支持度指标主要反映政府财政干预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因而最好由政府投资占城市GDP的比重来进行衡量，但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缘故，政府投资没有可以利用的连续数据，因此，为便于研究和不失代表性，本文用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来衡量这一指标。

根据上述城市化函数，构建以下关于城市化的回归计量方程：

$$U = a_0 + a_1 I + a_2 F + a_3 M + a_4 P$$

利用该方程，本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进行实证考察。

关于本文所使用的样本范围，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本文的样本城市指江苏、浙江的全部城市和上海。样本数据取自1984～2001年18年间的城市地区总人口、市区人口、城市GDP、城市地区工业总产值和市区工业总产值、城市预算内财政支出、城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其中实际利用外资额根据当年汇率由美元单位换算为人民币元）等逐年数据，上述指标则根据以上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二）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发展演变的整体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市场开放度和城市化率等指标的历史变化分别见图1所示：

通过对1984～2001年间上述指标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模拟回归方程为：

$$U = 0.123I + 0.926F + 0.891M - 0.772P - 0.383$$

$$(R^2 = 0.904, F = 30.737, D-W \text{ 值为 } 1.744)$$

从模拟方程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的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市场开放度、政府支持度等指标可以解释90.4%的城市化率数据。也就是说，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市场开放度、政府支持度等指标能很好地解释城市化率的变化。

从工业化、企业集中度、市场开放度、政策支持度和城市化率指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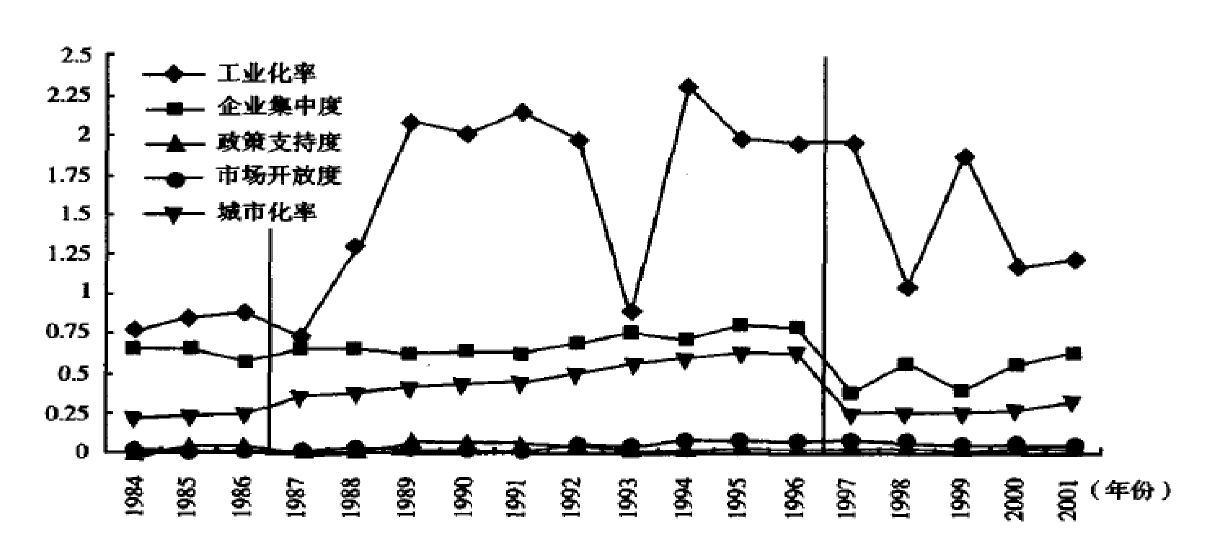


图 1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变化轨迹

数据来源：1985～2002 年间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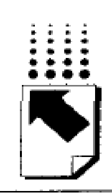
看，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大致呈现如下变化特点：

第一，从城市化率指标的变化轨迹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发展基本呈平缓上升趋势，但又明显表现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4～1986 年），指标值较小且曲线平稳，可以称之为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87～1996 年），指标值逐渐变大，曲线向上倾斜，称之为加速发展阶段；第三阶段（1997～2001 年），指标值开始下降，曲线表现出起伏，称之为回落调整阶段（见图 1）。

第二，与其他指标相比，工业化率波动较大，尤其是在 1988～1992 年和 1993～1997 年间，出现明显起伏。结合当时经济发展背景，可知工业化率的波动与当时投资过热和整个经济发展波动一致。

第三，在上述指标中，企业集中度指标与城市化率指标的走势最为相似，相关检验表明其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为 0.767；其余指标与城市化率指标的总体走势基本一致，即都呈现平缓上升趋势和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关系；此外，上述指标的皮尔逊（Pearson）相关检验表明政策支持度和企业集中度之间呈弱负相关性，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企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政府财政支持的制约，企业集中度对城市化率的作用有一部分被抵消。

第四，进一步分析以城市化率为因变量，以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市



场开放度、政府支持度为自变量的简单线性回归方程，经测算得知：在政策支持度对企业集聚的负面影响条件下，企业集中度对城市化率的贡献率为 47.73%，市场开放度对城市化率的贡献率为 45.93%，而工业化率的贡献率仅为 6.34%；可见，总的来讲，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主要是企业集中和市场开放即深化体制改革的结果。

第五，结合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来分析上述指标，可以发现：

（1）在城市化发展起步阶段，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市场开放度等指标与城市化率的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 0.897、-0.956、0.810、0.919，也就是说，工业化率、政策支持度和市场开放度等指标都于城市化率呈强正相关性，而企业集中度指标则与城市化率呈强负相关；可见，在这一时期，城市化发展不是企业集中行为而主要是改革开放加快工业化发展的结果。分析其中原因，企业集中度与工业化率、政策支持度和市场开放度等指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 -0.728、-0.603 和 -0.994，而工业化率与政策支持度、市场开放度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分别为 0.986 和 0.649，可见，由于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财政倾向于整个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因而微观的企业集聚行为难以发挥作用。

（2）在城市化发展加速阶段，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市场开放度等指标与城市化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 0.602、0.895、0.076、0.944，表明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呈明显相关关系、与企业集中度呈较强相关关系、与市场开放度呈强相关关系而与政策支持度无明显相关关系。通过对这一时期上述指标的回归模型分析（回归方程为 $U = 0.087I + 0.989F + 0.709M - 0.310P - 0.374$；$R^2 = 0.992$，$F = 126.825$，$D-W$ 值为 1.639）[①]，可以计算出这一时期企业集中度对城市化的贡献率达 55.41%，市场开放度对城市化的贡献率达 39.72%，而工业化率对城市化的贡献率仅为 4.87%。也就是说，在 1987~1996 年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之所以迅速发展主要是得益于企业的集聚行为和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相比之下，工业化对城市发展的作用甚微。

（3）在城市化发展回落调整阶段，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市场开放度等指标与城市化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 -0.345、

① 上述回归分析剔除了工业化率的异常波动年份 1993 年的数据。

0.666、0.916、-0.359，可见，这一时期政策支持度与城市化率呈强正相关关系、企业集中度与城市化率呈明显正相关关系而工业化率和市场开放度指标与城市化率均呈弱负相关；也就是说，近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主要是企业集中行为和政府加强城市基础环境和条件改善的结果，其中城市基础环境和条件的改善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发展的影响与历史相比呈现明显增大的趋势。

（三）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区域分析

实际上，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述指标依地区进行具体和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长江三角洲地区江、浙、沪三地的城市化进程又各有不同。

1. 从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市场开放度和城市化率等指标看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化的发展演变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市场开放度和城市化率等指标的走势与变化（见图2），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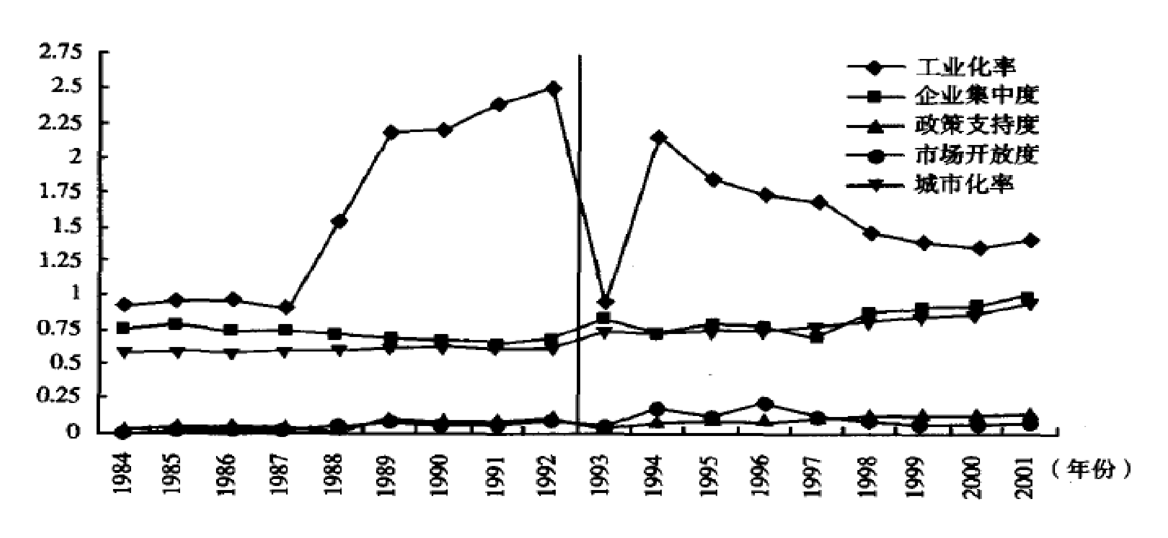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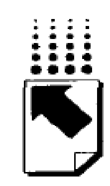


图2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化的发展变化轨迹

数据来源：同图1。

（1）总体来看，上海的城市化发展呈缓慢上升态势，且城市化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明显波动；依据城市化率指标的走势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整个城市化发展历程可以基本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84~1992年间，其间城市化发展平稳；第二阶段是在1993~2001年间，该时期城市化



进程加速。

（2）从各指标的历史变化走势来看，在上述指标中，企业集中度的走势与城市化率的走势最为相似（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810，显示较强正相关），其次为政策支持度（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751），市场开放度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仅为 0.425；如果剔除工业化率的剧烈波动年份，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工业化的总体走势也与城市化率的走势基本相似。

（3）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市场开放度等指标与城市化率指标的连续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为：

$$U = 0.011I + 0.857F + 0.549M + 0.833P - 0.097$$
$$(R^2 = 0.897, F = 28.163, D - W \text{ 值为 } 2.647)$$

可见，1984～2001年间上海的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市场开放度、政府支持度等指标可以解释 89.7% 的城市化率数据，方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4）进一步分析以城市化率为因变量，以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市场开放度、政府支持度为自变量的简单线性回归方程，可以计算得出：企业集中度对城市化率的贡献率为 38.09%，政策支持度对城市化率的贡献率为 37.02%，市场开放度对城市化率的贡献率为 24.4%，而工业化率的贡献率仅为 0.48%；可见，总的来讲，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城市化主要是企业集中、政府财政支持和市场开放的结果；其中，上述分析结果还表明：上海的城市化主要是企业集聚和城市基础环境条件改善的共同作用（两者对城市化率的贡献率合计达 75.11%），而上海的工业化发展对其城市化进程几乎没有发挥作用。

（5）具体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化的两个阶段分析上述指标，可以发现：

①在城市化发展的平稳期（1984～1992），回归方程为

$$U = 0.595 + 0.014I - 0.055F + 0.052M + 0.163P$$
$$(R^2 = 0.992, F = 127.898, D - W \text{ 值为 } 2.558)$$

工业化率、政策支持度、市场开放度等指标对城市化率的贡献率分别为 6.11%、71.18% 和 22.71%；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后到 1992 年间，上海的城市化主要是政府推动和市场深化的作用。

②在城市化的加速时期（1993～2001年），剔除工业化率大幅波动的

1993 和 1994 年相关数据得到模拟回归方程为

$$U = 0.230I + 0.164F - 0.159M + 6.017P - 0.407$$

$$(R^2 = 0.955, F = 10.73, D - W \text{ 值为 } 1.766)$$

分析该回归方程可知：在这一时期，政策支持度对城市化率的贡献率高达 93.85%，工业化率和企业集中度对城市化率的贡献率分别为 3.59% 和 2.56%；可见，近十年来上海的城市化绝大部分是政府财政支持的贡献，工业化和企业集聚行为对城市化的作用并不明显。

2. 从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市场开放度和城市化率等指标看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地区城市化的发展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地区诸城市的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市场开放度和城市化率等指标的历史变化如下（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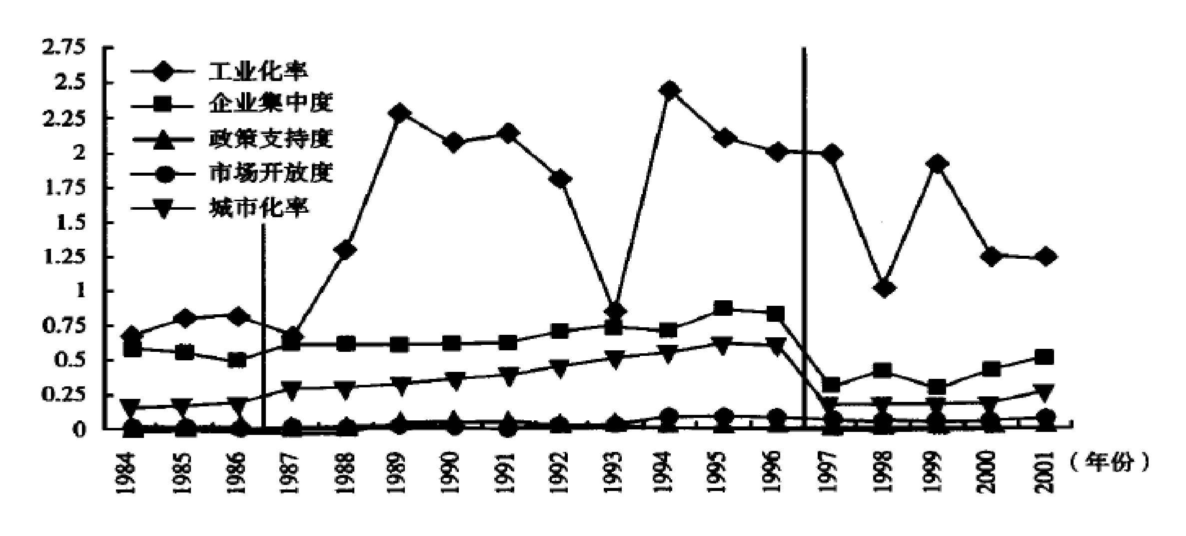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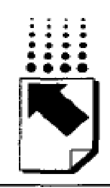
图 3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城市化的发展变化轨迹

数据来源：同图 1。

从图 3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有以下几个特点：

（1）依据上文划分标准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地区的城市化历程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4～1986 年）为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87～1996 年）为加速发展阶段，第三阶段（1997～2001 年）为回落调整阶段。

（2）通过对 1984～2001 年间上述指标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我们



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地区城市的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市场开放度、政府支持度等指标可以解释94.1%的城市化率数据；以城市化率为因变量，以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市场开放度、政府支持度为自变量的回归方程为

$$U = 0.069I + 0.850F + 1.077M - 0.158P - 0.318$$

$$(R^2 = 0.941, F = 51.735, D - W \text{值为} 1.564)$$

（3）进一步分析以城市化率为因变量，以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市场开放度、政府支持度为自变量的简单线性回归方程，可以得知：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和市场开放度对城市率的贡献率分别为3.46%、42.59%和53.95%。也就是说，从城市化率指标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地区的城市化主要是企业集聚和市场开放的结果，工业化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

（4）具体到城市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来看：

①在城市化的初期，市场开放度和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917和0.786，显示较强相关；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江苏地区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和工业化的作用，企业集中行为和政府财政支持未发挥明显作用；

②在城市化加速阶段，模拟的回归方程为：

$$U = 0.039I + 0.774F + 1.207M + 0.188P - 0.230$$

$$(R^2 = 0.986\ F = 54.143, D - W \text{值为} 1.946)$$

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和市场开放度等指标对城市化率指标的贡献率分别为1.77%、35.05%、8.51%和54.67%[①]。可见，在这一时期，虽然工业化、企业集聚、政府财政支持和市场深化都对江苏的城市化发挥了一定推动作用，但江苏的城市化却主要是市场深化和企业集聚的作用；

③在城市化的调整期，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和市场开放度与城市化率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32、0.772、0.9和-0.595，可以推知，近年来在江苏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财政支持的力度在逐渐加大，企业集中行为对城市化的影响明显。

3. 从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市场开放度和城市化率等指标看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地区城市化的发展演变

与上海和江苏地区的城市发展相比，浙江城市化的发展特点又有不同。

① 以上分析剔除了工业化率的异常波动年份1992和1993年的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地区诸城市的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市场开放度和城市化率等指标的历史变化如下图（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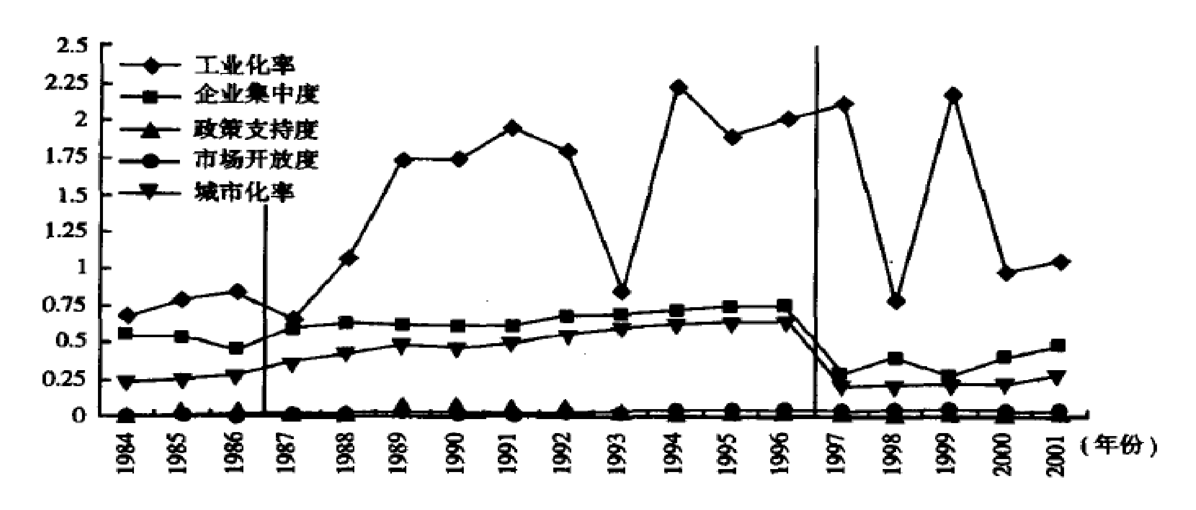


图4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城市化的发展变化轨迹

数据来源：同图1。

（1）从城市化率指标的变化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地区的城市化明显表现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4～1986年）为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87～1996年）为加速发展阶段，第三阶段（1997～2001年）为调整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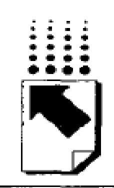
（2）通过对1984～2001年间上述指标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地区城市的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市场开放度、政府支持度等指标可以解释94.6%的城市化率数据。模拟的回归方程为：

$$U = 0.072I + 0.948F + 2.359M + 0.317P - 0.280$$

$$(R^2 = 0.946, F = 57.25, D - W \text{ 值为 } 1.803)$$

也就是说，以工业化、企业集中、市场开放和政府财政干预为代表的多方面因素可以很好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地区城市化的发展历程。

（3）进一步分析以城市化率为因变量，以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市场开放度、政府支持度为自变量的简单线性回归方程，可以得知：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和市场开放度对城市率的贡献率分别为1.95%、25.65%、8.58%和63.83%。可见，从城市化率指标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地区的城市化主要是体制改革和市场深化的结果，其次是企业集中行为的推动作用；工业化和政府财政支持的作用不明显。



（4）具体分析浙江地区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城市化发展的演变特点则发现：

①在城市化初期，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和市场开放度与城市化率的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998、－0.827、0.884和0.996；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改革开放之初，浙江地区的城市化主要受到了工业化、市场开放和政府财政支持的积极影响，企业集中行为对城市化产生的影响却是负面效应；

②在城市化发展加速时期，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和市场开放度与城市化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863、0.961、－0.025和0.927；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1987～1996年间，浙江地区的城市化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主要是因为企业集中行为和市场力量逐步加强的结果；

③在城市化发展的调整期，工业化率、企业集中度、政策支持度和市场开放度与城市化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326、0.757、0.927和0.569；可见，近年来在浙江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中企业集中行为和市场的作用有所减弱，而政府财政支持的作用在明显增强。

三　基本结论与改进

由以上分析可知：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基本上是工业化、企业集中、政府财政支持和市场开放等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结果。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基本呈平缓上升趋势；除上海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都明显表现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4～1986年）为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87～1996年）为加速发展阶段，第三阶段（1997～2001年）为调整阶段。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历程基本遵循了如下演化路径（见图5）：

工业化推动（1980年代初） ——→ 企业微观（集聚）行为推动为主，政府推动为辅（1987～1996年） ----→ 企业集聚＋政府推动 政府推动作用增强（1997～）

图5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发展路径示意图

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之初，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工业化作用减弱且愈来愈不明显，企业集中行为和政府推动的共同作用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而在近年来的城市化中政府的作用日益突出。

第三，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的城市化进程中，又充分显示了不同的区域发展特征：

（1）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城市化主要是得益于政府的财政投入和体制改革作用，企业集中的影响相比较弱。

（2）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和浙江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既一定相似性又呈现一定差异。与上海的城市化发展历程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它们的发展历程都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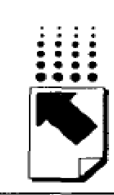
①城市化发展明显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城市化起步阶段、加速阶段和调整阶段；

②城市化的发展主要是企业集中行为和体制改革、市场深化的结果；

③近年来，江苏、浙江两地在城市化进程中都有逐渐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的倾向。而且，以上分析还表明：江苏和浙江两地的城市化发展特点又有明显差异性——两地的城市化发展特点相比，市场深化对浙江城市化的影响和作用明显大于其对江苏城市化的影响和作用。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改革开放以来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历程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上文对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实证考察明显显示：企业集中行为和政府干预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颇为突出，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也就是说，在一个有个人、企业和政府部门三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城市经济中，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动力将可能来自企业的微观市场行为和政府的经济性干预，工业化的作用将不再明显。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做的城市化动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只是初步探讨，尤其是在实证考察中，所选取的指标虽然具有一定代表性，但是还不尽完善，有些指标如政策支持度、市场开放度等并不能全面、彻底反映政府部门在城市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尚需进一步完善。当然，这并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



参考文献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50年系列分析报告之三：城市化进程稳中趋快》，1999年9月17日 http：//www. stats. gov. cn。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2002（北京）。

仇保兴：《我国城镇化的特征、动力与规划调控》，《城市发展研究》，2003年第1期。

"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赵新平、周一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及城市化理论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王红霞：《企业集聚与城市发展的制度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发展的路径探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H. 钱纳里等：《发展的格局（1950～197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Fujita, Masahisa and Thisse, J. F., 1996,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Journal of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Vol. 10, No. 4, pp. 339～378.

Fujita, Masahisa, Paul Krugman, and Anthony J. Venables, 2000, "The Spatial Econom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M. P. Todaro [1969].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 pp. 138～148.

（作者单位：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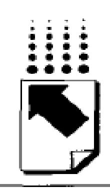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及制衡机制研究

○李　富

21 世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纪。就世界而言，过去以国家、民族和政府等方式割裂开的经济体正以市场经济的方式重新整合。就中国而言，在加入 WTO 的背景下，以行政区划决定地域特征和发展模式正在面临很大的挑战，以资源重新分配和提升竞争力为目的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对中国今后经济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其中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将会成为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显著的区域，成为主导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而长江三角洲更是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制度优势进一步稳定确定其“龙头”的地位，对中国经济、产业的影响将不可估量。

一　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现状

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思想早在 80 年代就已经出现，在 1982 年提出了“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的设想，仅包括上海、南京、宁波、苏州、杭州 5 个城市，1986 年合作范围扩大，建立了“上海经济区办公室”和“五省一市省市长联席会议”制度。但由于在当时的长三角经济圈中，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相差太大，导致长三角经济圈最终难以维持，改革开放后，长江三角洲地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浦东的开发开放，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上海市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4 年长三角 15 城市经济总量共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28775 亿元，占全



国 GDP 总量的21.7%，人均 GDP（按户籍人口计算，下同）达到35147 元，利用外资总额占到全国的半壁江山，达到52.1%，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

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看，当一个国家人均 GDP 处于 3000 美元至 10000 美元之间，正是国民经济具备了相当实力，进入活跃、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长三角地区人均 GDP 超过 3000 美元，标志着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综合实力跃上新平台。然而，发展中的行政区域分割导致了各自为政，为了各自利益及彰显政绩，颁布出台自己的相关政策，其结果是一方面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大量雷同，恶性竞争的局面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环保等涉及跨行政区域，有利于整个长江三角洲可持续发展和可以提高整个长三角竞争力的制度、政策的执行却难以令人满意，由此加快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议在 90 年代以来又被重视，营造全球第六大都市圈的概念被提上日程，期望通过跨行政区划的经济协作、合作和互动关系，来共同分享分工协作带来的经济利益，促进长三角经济圈迅速崛起，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二　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非均衡性制约

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给长三角地区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并不意味着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就会一帆风顺，区域内许多人为的或历史遗留的问题正在干扰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进程，阻挡着世界第六大都市圈的形成步伐。区域间不协调与不合作因素制约了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而区域内各城市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正是制约着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一大难题。

1. 长三角区域经济非均衡性分析

根据2004 年的相关统计资料，选择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等 9 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构造城市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进行分析，在对数据进行标准化的基础上，设定特征值为 1，所得结果如图 1 所示。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因子 1 贡献率达到 81.589，足可以反映各城市经济综合实力，因此可设权重为 1，得出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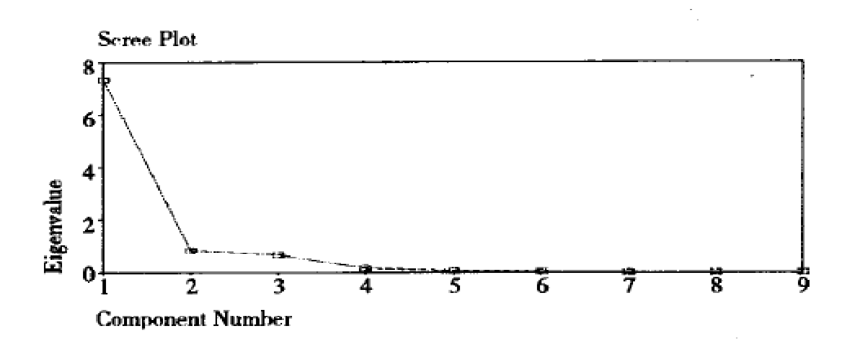


图 1

表 1　2004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综合实力得分评价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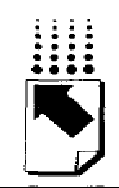
城　市	排　序	得　分	城　市	排　序	得　分
上　海	1	2.98724	常　州	9	-0.38330
苏　州	2	1.27031	南　通	10	-0.52005
无　锡	3	0.34075	湖　州	11	-0.60879
宁　波	4	0.25542	镇　江	12	-0.64464
杭　州	5	0.19557	扬　州	13	-0.76095
南　京	6	0.02866	舟　山	14	-0.77707
绍　兴	7	-0.23915	泰　州	15	-0.84061
嘉　兴	8	-0.30339			

根据上述的因子分析，可以看出长三角内部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大体可以分为四层：第一层次为上海，因子得分超过 2.0，经济实力各项指标远远高于其他各个城市，是整个长三角的经济中心；第二层次因子得分大于 0，包括苏州、无锡、宁波、杭州、南京五市，是各区域经济中心；第三层次主要因子得分小于 0 大于 -0.5，包括绍兴、嘉兴、常州三地；第四层次因子得分小于 -0.5，包括南通、湖州、镇江、舟山、扬州、泰州等地。采用 SPSS 的聚类分析法，所得结果也基本相符，证明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确存在静态非均衡性。

另一方面对照 1985 年的数据，我们还可以发现，长三角区域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经济发展速度的不一致性，以致各个城市因子分析的经济综合实力排名逐渐的在发生变化，这说明了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在静态中还存在着动态的非均衡性。

2.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原因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原因有很多种，其中上海经济的梯度辐



射效应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浦东开放后，上海经济快速增长，对整个周边地区带动效应十分明显的。然而由于各地区离辐射中心的位置不同，其所受的辐射程度呈梯度排列。而且随着与上海距离的拉大，沪宁线上的各城市即苏州、无锡、常州和镇江（南京本身为大都市，不在此范围内），其反映经济总量、地方财政实力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的各项指标，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些数据从侧面反映了苏南各市接受上海经济辐射的程度随距离的延伸而呈现明显的梯度递减态势。

经济政策的实施效应是造成后天各区域经济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各种城市在各个行政区的地位不同，造成政府的政策倾斜度不同，政府的投资、扶持力度不一样，这导致了一些城市总体经济实体及竞争力要强于其他一些城市。另一层则在于，由于政策调整得当、投资环境改善等原因，有的城市发展潜力逐步体现出来，因此其排名逐步上升，综合实力逐步增强。除此之外，历史遗留因素，如工业基础，以及地理位置的限制也有一定的影响。

三　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非均衡制约的博弈分析

长三角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给长三角今后的区域经济合作带来了一些挑战，如何协调区内各行政区的经济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到各区域利益，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否顺利开展的一个关键，也是一个博弈过程。

在长三角各地经济发展策略选择博弈中，各地间最初是一种典型的非合作博弈关系，其博弈的原则是仅仅是各自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了分析简单起见，现作如下的假定，设当前仅有两个博弈方：甲地和乙地，二者在投资、产业等各方面存在竞争。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各自获得收益 A（$A>0$），由于双方事先并不知道对方的策略，也不能保证对方选择何种策略，甲地定会选择不公平竞争。因为如果乙地选择公平竞争，相对于选择公平竞争来说，选择不公平竞争，甲方则可以从中多获利 a，如果乙方选择不公平竞争，甲方选择公平竞争，将会遭到损失 a，出于本地经济利益考虑，甲方定会选择不公平竞争，同样对乙方也是如此，这样纳什均衡的结果是（不公平竞争，不公平竞争），其结果是与公平竞争双方相比，都遭受损失 b（$b>a$）（见图2）。

		乙地 公平	乙地 不公平
甲地	公平	A,A	A－a,A＋a
甲地	不公平	A＋a,A－a	A－b,A－b

图 2

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技术创新、产业扶持、投资优惠等领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长三角产业雷同严重，有些领域甚至出现恶性竞争的局面。

而如果有协议加以约束，甲乙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并制定一些惩罚性条款，谁实施不公平竞争，谁就要付出代价 c（c＞a），博弈的结果就会成为（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因为甲地知道在乙地采取公平竞争时，如果己方采取不公平竞争将会多获益 a，但根据协议，乙方定会申诉，甲方将面临 c 的罚款，特别是当 a＜c 的时候，甲方反而会遭受损失，为此只要惩罚力度足够大的话，甲方肯定会遵守协议，采取正当竞争。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乙地，并且相对于非合作博弈结果，合作博弈的结果对双方都有利，同时双方合作也增强了对外谈判、竞争的力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长三角区域一直在追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原因。

但须注意的是，现实合作博弈的结果未必如此。因为在上述分析中，我们没有考虑到一些实际问题，比喻说双方经济实力、综合实力的不均等，由此不但会造成谈判的力量不同，影响谈判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则可以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后同样制度条件下的弱小者一方经济利益相比强者来说受损。不妨续前假设，并设甲地实力较弱，乙地实力较强，双方公平竞争下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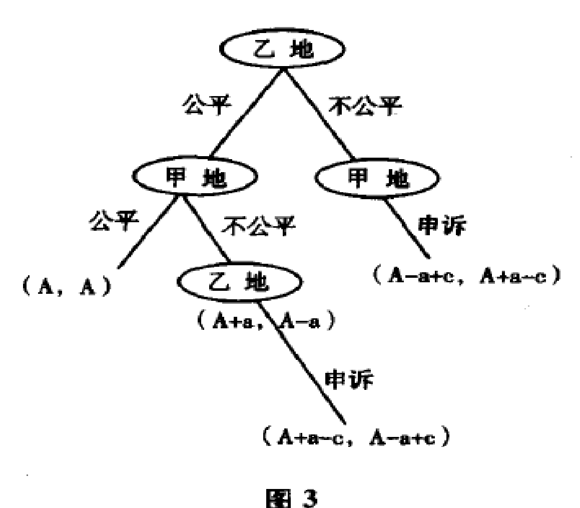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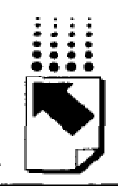


图 3



利分别为A，B（A＜B）。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由于乙方实力较强，投资环境较好，因此其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不妨设两地发展速率为S_1，S_2，$0<S_1<S_2<1$，n年后两地的经济实力对比如下：

甲地：$(1+S1)^nA$

乙地：$(1+S2)^nB$

乙地/甲地＝$(1+S_2)^nB/(1+S_1)^nA > (1+S_2)^{n-1}B/(1+S_1)^nA > \cdots > B/A > 1$

甲乙双方经济实力差距在扩大。并且由于乙地实力较强，投资环境较好，其产业、投资等政策肯定先于甲方，为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其政策出台后往往会持续一段时间。这对甲地来说是一个后动博弈过程，选择公平竞争肯定不是最优策略，而选择不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益，则有利于甲地经济的增长，缩小与乙地的差距。换句话说，如果甲乙签订协议，对不公平竞争行为加以惩罚，则相比签订协议前，甲地的投资环境可能恶化，经济利益可能受损，甲乙经济实力对比可能会进一步发生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显然一旦甲方意识到这个问题，则甲乙的协定很难保证能够顺利进行，即使有惩罚也不例外。

由前述分析可以看出，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中，各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和经济实力确不一样，那么合作由此所带来的后果则必须加以考虑，才能保证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顺利实施。

四　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非均衡制约的制衡机制研究

长三角区域各城市之间经济发展存在非均衡性，而且由于这一地区包括多个行政主体，因此如何加以协调发展中的问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为了保障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顺利实施，就必须采取相应对策，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非均衡性进行制约。

1. 转变观念，整合区域市场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并不是区域内各行政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完全一致，经济增长完全相同，而是指从整体上来说更有利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而对于某个行政区域来说，通过实现区域内资源的自由流动、信息的共享，为该行政地区的经济发展营造良

好的环境，增加该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良好潜力，有利于该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即实现其经济发展的总体效应要比以前单个自身发展更大，这也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的好处。这就要求长三角各行政地区在参与一体化进程中，要充分转变观念，要考虑到比较利益，要从整体区域经济利益出发，同时也要互相帮助，甘于奉献，合理协调利益冲突，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2. 走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经济合作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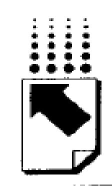
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固然毋庸置疑，但同时又不可置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于不顾。其实这是一个双面效果，只有坚持考虑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有未来持续发展的潜力。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区域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大，污染已相当严重，产生了区域性的影响，行政区边界往往是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受地方利益驱使以及认识上的差异和缺少整体协调机制，已成为改善整体环境质量的最大障碍。为此，在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中，必须要注意处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关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改变传统的发展思维，寻求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健全相应的环境和资源保护政策，将环境和资源问题纳入社会发展的目标体系，为区域内各个城市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实现协调发展、长三角区域共同繁荣的目标。

3. 建立区域信息网络，实现信息共享

信息网络的发展，可以加强区域经济中心和经济腹地的联系，使它们更好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各自的功能。同时，信息网络的发展能够减少区域内要素流通的盲目性，使要素流通更具合理性，减少生产的盲目性，从而节省大量的费用，为区域经济的发展积累大量的资金。为此，长三角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过程中，首先要充分认识信息网络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确立利用信息网络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思想观念，其次应继续加大信息网络建设投资力度，把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异，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协调地区之间信息网络发展不平衡状况，把信息网络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4. 加强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目前长江三角洲正处于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动时期，需要在有效竞争的基础上加强区域间合作，避免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首先要加强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协调，各行政地区应当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在深入分析本地区经济发



展条件的基础上，正确选择主导产业。其次要加强与其他行政地区的产业协调，统一制定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区域产业政策，实现合理的地区分工，避免产业结构趋同。由于长江三角洲各区域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各区域生产要素构成比例不相同，这决定了各区域比较成本优势上的差异，通过各城市之间的产业战略角色的分工与协作，实现跨区域产业组织的整合与协调，形成产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将有利于实现经济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

5. 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法制的建设

区域法制建设属于地方法制建设范畴，是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合的，在推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法制环境一体化将直接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现阶段长三角区域经济互动发展中在法制环境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区域政策标准不平等，法制环境欠完善；一些地区政策存在跨区界溢出效应与司法辖区或行政辖区的利益边界不一致，影响着资源合理配置；部门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加大了执法成本等等，因此，急需加强长三角区域法制建设，围绕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目标和要求，在国家法制统一原则下，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创制功能，使地方性法规、规章、政策等所形成的制度及其执行相互协调，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实现形成最有利的外部条件，以推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冯之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高洪深：《区域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段进军：《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城市化及产业发展态势分析》，《经济地理》，2002年第6期。

郝黎仁等：《SPSS 实用统计分析》，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长江三角洲区域立法协调问题研究

○ 宣文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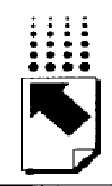
一　长三角区域协调实践综述

近年来，长三角区域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深化，地方政府的市场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进而形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趋于复杂化。在地方利益主导下，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产业结构布局趋同、地区间恶性竞争频发、环境污染严重、土地与人力资源浪费、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统一规划，这些现象既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影响了中央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是协调的发展。协调才能促发展，已成为区域内各行政主体的共识。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为协调各方利益冲突，长三角区域内各行政主体曾进行过多层次的协调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正如以上所述，这些协调工作总的来说具有临时性、无序性、低效性的特点，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三角区域内各行政主体的利益冲突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思路，从问题的源头抓起，即通过协调法制环境建设，来给予今后协调工作指引和保障。为了能更清晰地阐述我们的设想，我们不妨对长三角区域已有的协调实践先做一个简单述评。

已有的协调实践是从四个层次上展开的：

1. 层次一：由中央政府牵头进行的区域协调

这类协调最早可追溯到国家计委于 1975 年 8 月向国务院提出的《关于筹建华东地区经济协作机构的意见》、1982 年 12 月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成立上海经济区的意见》以及后来由交通部牵头制定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化公路水路交通规划纲要》、国家发改委研究的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来制定和实施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等。这类协调启动成本较高，被启动的可能性较



小，协调意见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效果不理想。

2. 层次二：由长三角区域内各行政主体之间形成的磋商协调

这类协调工作主要表现为由区域内各行政首长之间的直接磋商和对话。具体形式表现为长三角区域的市长联席会议、经协委（办）主任联席会议等。在这些会议上达成了诸如《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合作宣言》、《关于以筹办“世博会”为契机、加快长江三角洲城市联动发展的意见》等行政契约。形成这类磋商对话机制的平台还包括：副省（市）长级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长三角城市（15 +1）市长级别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沪苏浙规划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论坛”。相应的协调机构有：“长三角规划与发展委员会”、“长三角一体化建设顾问委员会”等。这类协调最后形成“合作宣言”、“共同声明”等行政契约。由于这类契约没有法律约束力，契约的实施就变得困难重重。每年一次的峰会照开，但区域内的冲突却不断。

3. 层次三：区域内各行政主体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

这类协调主要产生在各行政主体职能部门之间，达成层次较低、范围较窄的行政契约，表现形式主要为“互认协议”、“互认宣言”等。2003 年 8 月二省一市的质量技术监督局发表的“长三角质量技术监督合作互认宣言”，主要是对市场准入、物流标准、信息资源、标准体制等确定了互认制度；2003 年 11 月，三地质量监督部门签署了“长三角食用农产品标准化互认合作协议”；2004 年 2 月，长三角 15 各城市的车辆管理部门达成了“车辆管理工作信息互通制度”；2004 年 5 月，长三角各地的税务、银行、技术监督、海关等部门针对区域内的偷税漏税、拖欠债务、商业欺诈、假冒伪劣、恶意违约等行为，达成了“信用联动机制”，意在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制”的制约体系；2004 年 7 月，长三角道路运输稽查部门针对区域内非法营运等现象达成“市场共管、规则共守、信息共享、号码共用”管理制度。此外，区域内的其他 30 多个部门也纷纷就环境保护检测、地下水资源调查、人才开发一体化等领域达成“联动”、“互认”、“联席会议”等制度。这类协调就其性质而言，与层次二是一样的，只不过参与协调的行政主体及其达成的行政契约级别更低、具体涉及的领域更宽而每个契约所针对的协调范围更窄。这类协调的主要缺陷也是缺乏法律约束力和违约责任的法律救济等。且由于涉及部门众多，协调的成功与否更多地取决于人为的因素，协调效果自然也不理想。

4. 层次四：区域内民间团体的协调

这类协调来自于民间，目前尚处于萌芽状况。比较明显的例子是2004年4月成立的“中国长三角工经联席会”。由于这类协调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无法触及，故其影响有限。但从发展趋势看，这类协调将来形成的机制，将会对市场层面的利益冲突协调，产生不可替代的积极影响。

二　国外区域法制协调实践综述

与国内区域协调显著不同的是，国外区域协调均是以法制协调为主。以法律、法规为协调的框架，在解决区域内各地方政府之间、甚至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方面，它们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一）成功经验之一：国家间立法协调的典型——欧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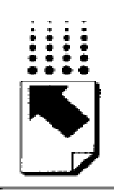
欧盟协调的范围和程度都非常彻底，可以直接称为“法制一体化”。欧盟法制一体化的建设过程，实质上是其成员国利益和共同体利益不断冲突又不断协调的磨合调整过程。在整个过程中，欧盟始终坚持以法制协调为区域协调的基础。具体而言：它的成功的法制协调体系可分解为法制协调原则、法制协调机构和法制协调机制这三个组成部分。

1. 欧盟的法制协调原则

欧盟从最初的“煤钢联盟”6国开始，到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15国，一直在协调国家利益与集团利益的过程中遵循着四大协调原则。第一是“民主、平等”原则。即各国在加入、退出、部分主权让渡等方面都以自愿、平等为基础。对重大事项采取协商一致的议事规则、对主席国实行轮值制度等等。第二是“互惠互利”的原则。即在各国由于产业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别而造成某一政策的实施导致各国损益不同时，采取补偿等机制。并进而使政策实施的最终结果发挥集团的整体优势，使各国均衡受益。第三是“多速欧洲”原则。即在充分考虑各国国情后，允许某些政策在个别国家实施进度有差异，但最终目标一致。第四是“灵活性”原则。即允许某些成员国援用“例外权”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在一些不十分重要的政策领域方面实行多数（并非一致）表决制。

2. 欧盟的法制协调机构

为了保证经济一体化的顺利进行，根据以上协调原则，欧盟相应建立了五



大协调机构。它们是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部长理事会、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每个机构都有规定的责权范围、议事规则、组织结构等制度。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相比，欧盟在机构的设置和权力的分配上不但强调各个成员国参与，而且强调各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超越各成员国政府的权力以及各机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凸现欧盟独特的机构运作机制。

3. 欧盟的法制协调机制

所谓运作机制，其实质就是上述协调原则的具体体现和协调机构的运作规则。对此，欧盟作了精心的安排。其一是共享机制。欧盟各机构具有超国家性质，所以机构的成员均来自各主权国家，因此强调每个成员国都“共同分享”机构席位与权力。其二是法制机制。欧盟的所有活动都经过法制程序。即首先建立起立法、司法、行政、议会等超国家性质的机构，这些机构拥有各成员国政府赋予的法定职权；其次是欧盟的每一项法律、法规都是由欧盟委员会提出动议，经过理事会决议而产生的，具有十分的规范性和权威性；第三是欧盟司法制度具有很高的独立性。它通过欧洲法院，判决所有与共同体事务有关的案件，对各国有强制执行权，并负责解释欧盟法、审查欧盟成员国的二级立法，以保证其符合欧盟的一级立法。其三是制衡机制。欧盟的五大机构由不同的人员组成，各有其独自的职能和责权范围，但它们的权力经过制度安排而互相制衡。

无疑，从欧盟法制协调的成功经验看，我们可以获得不少有益的启示，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我们认为是它进行法制协调的“四项原则”，它建立的五大协调机构的责权设定、议事规则及组织结构方面的周密设计和包括“共享机制”、“制衡机制”在内的多项法制协调机制。

然而，欧盟法制一体化协调的毕竟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它设计的法制协调体系在协调的对象上、协调所需要的条件上以及参与协调的行政主体上都与我们要开展的一国范围内区域法制协调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它们的经验我们不能照搬。但他们建立法制一体化的方法、原则及运行机制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运用。这些将体现在我们后面的建议中。

（二）成功经验之二：一国内部区域立法协调的典型——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

从一国范围来看，立法促成协调的先例也有不少。美国田纳西流域的协调开发，就是一例。它的成功之处，可以分解为二个方面。

1. 中央立法先行，为流域内统一法制建设提供支持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州的权力很大，每个州都有自己独立的立法权。田纳西流域地跨 7 个州，要实现对田纳西流域的统一开发管理，没有立法保证是难以想像的。因此，美国国会于 1933 年通过《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法》，并依法成立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在该法中，对 TVA 的职能、开发各项自然资源的任务和权力作了明确规定，如 TVA 有权为开发流域自然资源而征用流域内土地，并以联邦政府机构的名义管理；有权在田纳西河干支流上建设水库、大坝、水电站、航运设施等水利工程，以改善航运、供水、发电和控制洪水等等。TVA 法案的这些重要规定，为对田纳西流域包括水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的有效开发和统一管理提供了法制保证。TVA 法自 1933 年颁布后，还根据流域开发和管理的变化和需要，不断进行修改和补充，使凡涉及流域开发和管理的重大举措（如发行债券等）都能得到相应的法律支撑，为流域内相关发展环境协调建设在制度上奠定了基础。

2. 依靠有效的机构沟通区域内各行政主体

TVA 成立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国会提出，TVA 应成为既享有政府的权力、同时具有私人企业的灵活性和主动性的机构，据此，TVA 被确定为联邦一级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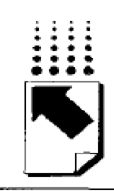
TVA 的管理由具有政府权力的机构——TVA 董事会和具有咨询性质的机构——地区资源管理理事会实现。董事会由三人组成，行使 TVA 的一切权力。董事会下设一个由 15 名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会的各成员分别主管某一方面的业务。

TVA 的内设机构由董事会自主设置，这些内设机构曾根据业务需要进行过多次调整。如前期根据自然资源综合开发的需要，设置有农业、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开发保护等方面的机构，以后根据发展电力的需要，又增设了电力建设和经营等方面的机构。

以立法作为流域管理的依据，以有效的机构作为载体，同时根据市场信息的反馈不断修订 TVA 法，TVA 的成功正是建立这两点的基础之上。

总之，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法制协调经验给我们提供了两点启示：

（1）区域协调必须有一部区域法律，如《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案》。仅靠对话、磋商、沟通、协议是不能真正解决区域内各利益主体间冲突的。正是这点启示，促成了我们在后面的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开发法》的建议。



（2）法制协调的实施，必须有相应的机构去推动和实施。该机构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与责任的范畴，应由上述法案给予界定。我们在提出关于建立长三角区域立法协调机构时，参考了他们的做法。

当然我们也认识到，尽管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与我国的长三角都不少类似的地方，譬如都在一国之内、都面临地方政府的利益冲突、甚至连面积大小也差不多，但两者之间毕竟还有较大的区别。譬如立法制度、经济体制、市场体系、调控手段、经济水平等。因此，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的区域协调经验，也不能完全照搬。我们在后面的建议中，只是汲取了其中的法案为协调的框架、以机构为协调的工具等合理有益的部分。

三　国内研究观点综述

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国内众多学者对长三角区域协调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对如何进行区域经济协调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意见[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

1. 成立新的行政区域

提出这种设想的学者认为：设置一个统辖江、浙、沪二省一市三地的大行政区，将能解决地方利益冲突。具体设想是：①赋予其作为一级地方政权的相应的国家权力。②设置相应的机构以行使职权。

重新划分行政区直接涉及到地方政府的责权范围和利益核心，工程浩繁。行政区域的界定划分，交织着经济、政治、历史、甚至于人文、地理、环境等诸多综合因素，历经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积淀，因此，该建议理论上可行，操作性几乎为零。

2. 成立区域立法机构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为了保持长三角地区法律和法制统一、根本改变长三角地区立法权分散、立法主体不一而导致的法律不统一的现状，应该专门设置一个在三地之上的统一的立法机构。其设想如下：①就法律地位来看：在宪法中应当规定这个机构受全国人大的直接管辖和节制，所以在定位上可以规定该机构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法律地位低于全国人大而高于省、直辖市的人大；同时必须明确该机构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作为一级地方立

① 这些观点主要参阅了《长三角法学论坛论文集》（2004. 10. 上海）

法机构的身份。②从职权的配置来看，应当由宪法或者立法法对其职权以及职权的行使作出明确的规定。规定该机构有权根据长三角地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内容涉及除了必须由中央立法规定的事项以外的所有与该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事务密切关联的问题。③就机构的人员组成和工作程序来看，在人员组成上应当考虑把既具有丰富的立法工作经验又能够比较充分地代表长三角各个地方利益的人吸收进来成为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法律制定时可根据法律内容的具体情况采取由二省一市的人大或者其常委会或者相应的政府分别表决的形式。

成立区域立法机构这一观点与我国的《立法法》相冲突。我国是一个立法单一制的国家，如果我们按此方案建立新的立法体制，则必须先修改宪法和立法法，其工程之浩大，牵涉面之广，使该观点也几乎没有操作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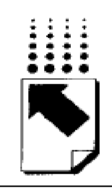
3. 由国家设立经济管理局

该观点认为：在现行行政区域不变的前提下，建立跨行政区域的管理机构“长江三角洲经济管理局”，以实现对各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划和规制。对该机构的性质，有的认为应该是国务院主管全国各区域协调的一个部门，有的则认为应该是为长三角特设的一个机构。多数认为，该管理机构应享有决策和规划权。但有的则进一步认为，该管理机构应享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下设有关专业或综合职能管理机构，如区域规划与产业协调委员会、重大基础设施开发管理委员会、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管理委员会、太湖流域环境保护与治理委员会等。有的还认为，应在长三角地区设立大区法院，“以直接受理和审判区际法院管辖的跨区争议案件”。

设立凌驾于两省一市政府之上的经济管理局仍然是一种变相的行政区划论。首先是这一机构的定位难以确定，即：如果行政区划不变，则该机构与原地方政府的关系如何确定？原地方政府应各自让渡多少权利给该机构？其次是如果仍要由人大通过法案确认该机构的法制地位及责权范围，则需要修改的是宪法、组织法、甚至整个国家体制。其中的复杂性和成本，恐非能简单估算。

4. 通过地方立法机构协调

该观点提出：在充分尊重长三角各成员方意愿和平等对待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对各区域内法制建设予以协调一致的方案。如有的学者明确指出：“采取比较柔性的‘协商’协调机制，通过‘自主参与、集体协商、懂得妥



协、共同承诺’的方式，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进行‘软约束’，这应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区域协调、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其初级形式可以采取就某一问题进行专题性的协调，将区域协调职能赋予相应的部门，由该部门牵头，会同下一层级政府的对应部门共同履行协调职能。在各方分歧较大、协商失效时，上一级政府拥有裁决权。综合性的区域协调职能可以放在综合管理部门，专业性的区域协调职能则纳入专业管理部门，专业协调服从于综合协调。”不少学者、官员都认为，经济的一体化不应该由政府来协调，政府的职责是协调法制事务，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政府所设立的协调机构只能就法制问题向政府提供建议。

通过地方立法机构的协调应该是最符合我们目前法制协调的宗旨的。实际上，前面提到我国目前已有的几种协调方法已经将此模式付诸实践了。但该模式仍然无法解决以下几个问题：①各地利益一致时容易协调；利益冲突无法协调时，怎么办？②事前协调一致、事后发生冲突，怎么办？③政府协调有时在对市场越俎代庖，市场协调则又不能解决政府利益冲突，怎么办？④按目前我国立法法规定，凡规范性法制文件发生层级冲突，可由上级立法机构协调，区域内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法制文件发生的是平级冲突，不在立法法所协调的范畴内，怎么办？⑤目前达成的协调意见，原则性多于操作性，具体履约有障碍，怎么办？⑥目前协调的模式基本是一事一议，在具体协调磋商时，人力、财力、时间难以满足怎么办？因此，这种协调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尚存许多问题无法解决。

四　设想和建议

（1）建议由人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开发法》，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创设法律框架。若全国人大立法需要一个较长讨论期则应当先表现为长江三角洲各地公约的形式。

该法案是统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高纲领，各地方立法都不得与之相冲突。作为区域经济开发基本法，该法案的立法对象为长江三角洲，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法律效力。在这点上，我们既可借鉴美国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法”，也可参考国内的“香港基本法”与设计中的“西部开发法”。该法案拟包括以下结构和内容：

第一章，总则，主要规定立法目的、长三角区域经济开发法的概念、性

质、地位、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和开发法的基本原则；第二章，长三角区域协调组织的组建方式、方法和条件等；第三章，区域内部法律关系，包括省、市级政府的法律地位、各级政府在区域经济协调中的责、权、义务及企业、公民的利益保护等；第四章，地方政府与区域协调组织的关系，包括地方政府在成立协调组织过程中的职、权及管理制度等；第五章，法律责任，包括协调机构、政府、企业、公民及相关机构和人员的法律责任等；第六章，区域协调中的政策工具，包括法律、行政、市场三个方面的工具。第七章，附则，包括长三角区域经济开发法的效力范围、解释和修改机关以及与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之间的关系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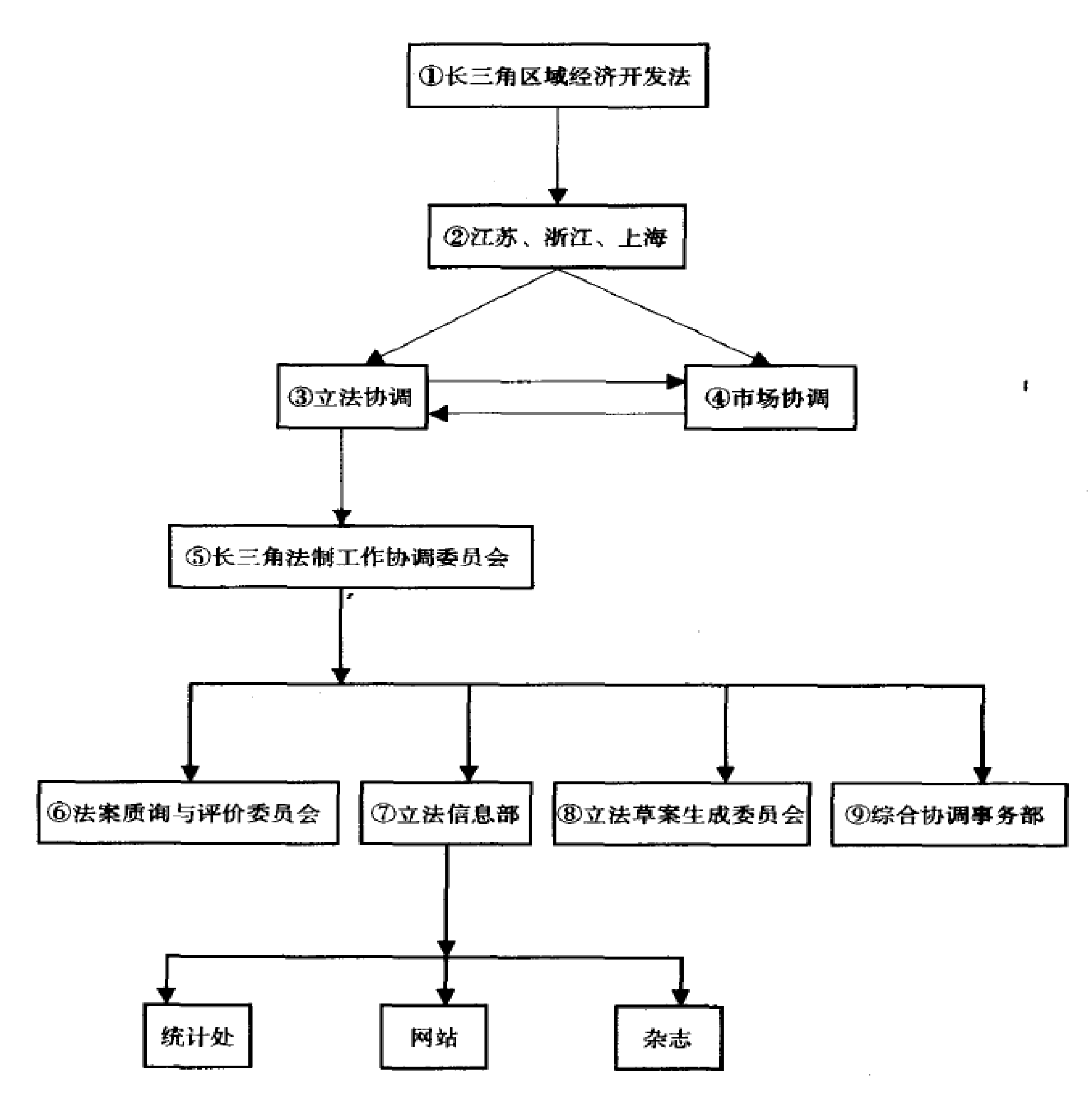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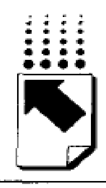


图1　长江三角洲区域立法协调体系图示



（2）长江三角洲区域立法协调与法制环境建设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江苏、浙江、上海三地立法权相互协调的问题，目标就是使三地基于各自独立立法权所产生出的法制环境能够彼此相通，达到和谐，从而为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最优化提供支持和保障。如图1所示，我们认为这个目标的实现依靠两方面的努力：

（3）一是立法上的协调，也可以称之为主动的协调。这要求发挥三地立法主体的主动性，将协调工作做在法案出台之前，以创造区域内协调的法制环境为宗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开发法》为依据，确保各地方立法质量足以符合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

（4）二是市场的协调，也可以称之为被动的协调。这是指包括与市场各行业直接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如交通部门、旅游部门、环境部门等）在内的市场主体、行业协会、消费者、市场秩序管理者根据市场的要求对实践中各类需要协调的领域所作的探索和尝试。这种协调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它通常是在市场的促动下，对那些阻碍价值实现的不协调问题的一种末端处理。"立法的协调"和"市场的协调"二者的关系是互动的、相互促进的。前者直接指引和推动了后者，后者在实践中反馈回的信息也是对前者的促进。同时"市场协调"过程中积累的某些成熟的经验可以通过"立法的协调"直接转化为各地方立法，成为区域法制环境的一部分。

（5）建议由"长江三角洲法制工作协调委员会"为承担"立法协调"工作的主体。该组织的地位应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开发法》明确予以确认，将其定位为长三角各地区行使法定立法权的一个共同必经环节。也就是说，今后各地方立法草案在提请各自人大正式表决前都应该经过该环节的论证和检验，确认符合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宗旨后再行表决，不符合的地方应由"长江三角洲法制工作协调委员会"提出修改建议。同时"长江三角洲法制工作协调委员会"肩负对长三角地区以往地方立法进行梳理的职责，对现有地方立法中不符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宗旨的立法既可以主动向有关人大提出修改建议，也可以在接受并审查相关投诉后将合理投诉以法律修改建议的形式提交给相关的地方人大。"长江三角洲法制工作协调委员会"的性质可以定位为非政府组织，其人员组成应该包括法律、经济、管理等领域的专家和部分在职或已离职的政府高级官员。其组织机构请见附图1中的⑥、⑦、⑧、⑨。

（6）"法案质询与评价委员会"负责对具体的法案进行质询和评价，判断其

是否符合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宗旨，并附支持结论的详细说明。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以法律专家为主。建议集合符合条件的专家成立专门的专家库，在对个案进行质询和评价时临时从专家库中调取专家组成该委员会，工作结束后解散。这样即可以保证工作质量和公正、公平又可以节约不必要的开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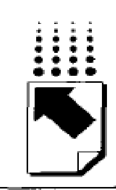
（7）“立法信息部”负责全区域的立法信息统计、收集和分析工作。统计是决策的重要预备手段，各类各项统计结果将有力的标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法制建设进程中的问题所在。该部门将统计工作的立足点建立在区域经济协作发展的基础上，加大统计数据的使用效率，使之不仅能引导和加快、加深各地方的协作，还要能引导各行业及企业投资发展决策，从而逐渐实现区域内合理的产业布局。同时统计数据为教学科研机构提供全区域角度的研究素材和论据，进而从教学科研机构获得对区域协作发展有意义的科研成果。通过对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可以迅速、清晰的找出与“协调立法”相违背的症结所在，对症下药，提高工作效率和效果。建议该部门建设一个网站和一份刊物，专门作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法制环境建设研究的平台，收集、探讨问题和对策建议。这个部门是实现“③立法协调和④市场协调互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8）“立法草案生成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工作机制与⑥相同。长江三角洲各地区如果拟就某个领域立一个法案的话，可以将这个立法草案的生成作为一个课题交给该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发挥信息、专家的优势，本着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宗旨生成一个立法草案，毫无疑问这个草案必定是符合长江三角洲地区法制环境建设的根本宗旨的。我们建议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收费的。

（9）“综合协调事务部”的职能包括：接受对地方法案违背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宗旨的投诉，并作初审，将通过初审的投诉提交⑥“法案质询与评价委员会”；组织专家数据库并根据个案需求抽取专家组成⑥和⑧；总结“长江三角洲法制工作协调委员会”的年度工作，并向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联席会议作工作报告。

五 结 束 语

总之，到目前为止，长三角区域合作已在许多领域展开，并已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正如本文开始所言，要使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走向坦途，唯有将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协调工作通过法制化的手段推进下去。在这个过程中，立法上的协调是整个法制协调的基础；地方政府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是区域法制协调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市场协调则作为立法协调的有机组成部分。立法协调和市场协调两者的互动，必将使长三角的区域经济合作走向高效、和谐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0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

胡鞍钢：《政府与市场》，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

胡伟：《改革创新需要制度设计》，《外汇报》，2002。

邱华云等：《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制度建设刍议》，《上海城市发展》，2003年2月。

靖学青：《西方国家大都市区组织管理模式——兼论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协调管理机构的创建》，《社会科学》，2002年12月。

宣文俊：《关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法律问题思考》，《社会科学》，2004年12月。

林建生：《大上海变革与长三角一体化》，《经济观察报》2003年1月6日。

丕浩：《发改委有意试点长三角一体化迈向国家战略》《国际金融报》2004年6月21。

汪怿：《长三角人才一体化新进程：新添三协议》，《人才市场报》2004年6月28日。

罗志军（南京市市长）：《南京要更好地融入"长三角"》，《南京日报》，2003年4月4日。

王洪庆等：《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途径新探》，《经济纵横》，2004年第5期。

叶必丰：《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法制协调》，http：//www.yfzs.gov.cn/ 2004年11月15日。

左学金等：《长三角，需要怎样的协调》，《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3年6月25日。

吴焰：《沪苏浙再推人才一体化》，《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4年6月21日第1版。

李建勇：《长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法律思考》，《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5期。

刘汉杰、魏利民：《"长三角"法制一体化刍议》，http：//www.yfzs.gov.cn/ 2004年11月17日。

吴振贵、刘伟东：《长江三角洲区域立法协调初探》，http：//www.yfzs.gov.cn/ 2004年11月15日。

李春燕：《长三角地区立法协调机制初探》，http：//www.yfzs.gov.cn/ 2004年11月15日。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学院商学院）

区域统筹："长三角"合力做大 2010年世博会会展与旅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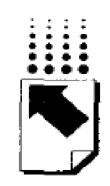
○ 陈建勤

一　问题的由来

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是一次规模盛大的国际性展会。据权威部门预测，世博会期间集聚来自国内外的7000万左右人次到会观展，将造成高峰日住宿60万～80万人左右的超常规模。面对如此庞大的入住游客数，排除正常的游客接待，上海市届时40万张床位也仅能满足实际市场需求的一半左右[①]。解决世博期间的客房供应短缺，成了世博会旅游接待工作的重中之重。由于客流的短暂性，上海不宜为一个时期的高峰旅游人流配足供给资源，以尽可能地避让过度投资所带来的风险。除了适度增建5万～8万张床位，并多渠道开发诸如影院、浴室、游船等住宿场所以尽可能多地妥善安置瞬时"井喷"人流外，还将有一二十万游客的住宿无法得到解决；上海现有的600家旅行社、15667直接从业人员（含导游9011人），也难当世博会接待重任；此外，世博会所需要的大量会展策划人才、会展技术人才、会展管理人才、会展营销人才、翻译人才等，也远远超出上海一地人才存量资源的供应能力。解决上述经营资源、人才资源短缺的矛盾，唯有跳出上海一城之地，寻求"长三角"[②]地区的旅游合作，集合"长三角"地区的旅游服务

① 到2004年底，上海市共有各类住宿设施3752家，床位27.78万张。预测到2010年，上海床位将自然增长到40万张左右。见上海市旅游委：《2010年世博会与上海旅游业》。

② "长三角"，即长江三角洲。本文所指的"长三角"，除了地理概念中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即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上海、嘉兴、湖州、杭州外，还包括南京、绍兴、宁波、舟山，共计15座城市、74个县（市），9.96万平方公里。



资源，合力做好世博会的旅游接待工作。本文旨在探讨如何统筹整合并充分发挥“长三角”地区的旅游服务资源优势，在推进“长三角”旅游一体化的过程中，依托包括上海在内的“长三角”15座城市旅游产业基础，完善、优化世博会的服务与配套设施，并因此扩张世博会展经济效应，以世博会驱动“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的协调、健康发展。

二 “长三角”旅游业合力服务世博会的基础条件

“长三角”地区的江浙两省14座城市，对2010年上海世博会倍加关注，因看好世博所带来的良好经济与社会效应，从申博起，14市就给予了极大配合与热情支持。14市都把2010世博会当作是发展本地社会经济的一大契机，纷纷主动融入世博经济圈以期分享世博效应。尤其是旅游部门，世博旅游的扩散功能，促使他们深刻意识到参与世博会的经济意义，他们将与上海一道，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世博会的承办工作。从会展旅游来说，“长三角”地区已为2010上海世博会储备了较为优越的基础条件。

1. “长三角”作为一个地理区域，具有良好的交通基础

以上海为核心的直径约200公里的“长三角”扇形地区，各种高速公路、干线公路、水路及空路，尤其是将要兴建的沪宁、沪杭城际轨道交通，使区域内出行交通十分快捷便利，将“长三角”打造成了一个紧密的无空间障碍的地域整体、世博会展整体。发达、便捷的交通条件，保证了“长三角”地区旅游服务资源共享、全方位合作的可能性，为“长三角”世博会展旅游创造了现实、良好的交通环境。

2. “长三角”充裕的旅游服务资源，为世博会储备了可资利用的资源基础

——旅游吸引物。通过近几年的发展，“长三角”地区旅游景区（点）数量多、层次高、吸引力强。据统计，共有知名旅游景区（点）73家，其中4A级旅游景区（点）45家，3A级旅游景区（点）2家，2A级旅游景区（点）2家。而且，“长三角”旅游资源在有较大同质性的同时，差异性也十分明显，江苏的市镇人文资源、浙江的山水风光资源与上海的都市时尚资源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资源互补圈，形成了世博旅游的一个吸引整体。

——饭店客房。截止2003年，“长三角”江苏境内主要旅游城市苏州、无锡、常州、南京、南通、扬州等6市，共有星级饭店床位91266张，2003

年6～12月的平均出租率为64.99%；"长三角"浙江境内的杭州、湖州、嘉兴、宁波、绍兴及舟山市等6市共有星级饭店床位101788张，2003年6～12月的平均出租率为70%。12市出租率曲线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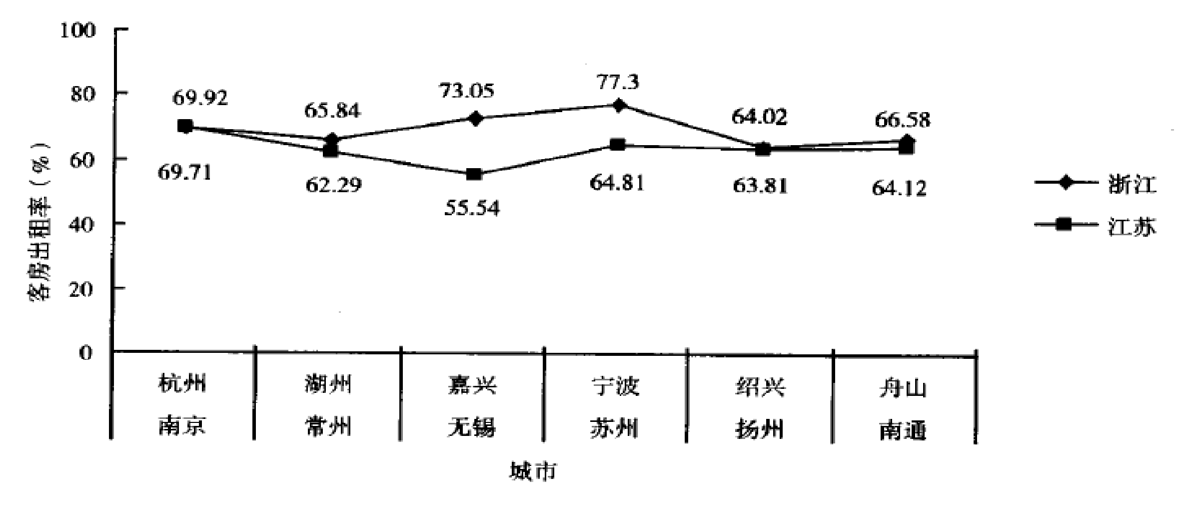


图1 客房出租率

资料来源：江苏省旅游局、浙江省旅游局、上海市旅游委：《"世博与长三角"旅游接待设施调查报告》，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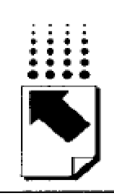
由上可知，就目前床位数来说，如按100%的出租率，12市尚有6.2万左右的剩余床位。根据近年"长三角"地区饭店增长情况，预计未来几年饭店年递增率约为8%，到2010年，12市饭店床位总数将达到32万张左右。如果以70%的较理想出租率出租，则"长三角"地区能提供世博会的床位约是9.6万张左右。

此外，"长三角"地区还有一批行业宾馆、社会旅馆可资利用。据测，它们将为世博会提供10万张左右的床位。

——旅行社。"长三角"所在的江浙沪三地旅行社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三地拥有全国总量的20%左右的旅行社，占全国百强国内旅行社的半壁江山，拥有全国双百强旅行社中的1/3席位。"长三角"地区旅行社联合，能胜任超常规模旅游人流的接待，包括旅游线路设计、旅游服务采购与导游服务等。

3. "长三角"旅游合作如火如荼，为世博旅游奠定了区域合作的实践基础

自1992年"江浙沪旅游年"活动开办以来，"长三角"地区的旅游合作不断加强，合作内容更加广泛，合作层次不断提升。2003年7月上旬举办



的“长三角旅游城市15+1高峰论坛”，共同发表了《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合作宣言》，提出打造“中国首个跨省市无障碍旅游区”；两月一次的江浙沪旅游联席会议已连续召开5次。与此同时，“长三角”旅游合作由务虚向务实迈进。如以“同游江浙沪，阳光新感受”为宣传口号，联合组团参加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和国际旅游交易会、英国伦敦国际旅游展、巴黎国际旅游展等大型旅游展会。AEPC期间，为塑造一流的会议服务水平，上海特地从周边其他城市借调优秀服务人员参加AEPC会议服务，而AEPC周庄会议的成功举行，更是为跨区域联合办会提供了成功的先例。

三 做优做大世博会展旅游的六大统筹工程

对分属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同一行业进行统一管理，成立一个协调机构是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如在区域合作进程中，欧盟设立了强有力的区域合作机构——旅游咨询委员会，定期举办“欧洲旅游论坛”，达成欧盟“共同文化合作行动”，实施欧洲文化之都计划。“长三角”是个地理范畴，其广大的地域空间，隶属于江苏、浙江、上海三个省市。在这样多个行政辖区内整合旅游服务资源，统一旅游服务行动，应首先成立能代表各地政府的旅游合作协调管理机构——“长三角”世博旅游协调领导小组。协调小组下设政策法规组、市场组、管理组、宣传组、教育组等专业组，通过会议制度、建规立章制度、协查协办制度、督察督办制度等途径方法实施对“长三角”旅游行业的协调统筹。

1. 统筹交通供给

充分利用“长三角”良好的交通条件，统筹世博期间的交通供给，包括选择“长三角”内条件成熟地区设置旅游集散机构，推广旅游集散中心这一新型旅游交通形式，形成上海、杭州、南京三个一级集散中心、所有地级城市的二级集散中心、旅游县市及大型景区的三级集散站的旅游交通网络；整合“长三角”内的铁路、机场资源，在世博会高峰人流期间，充分发挥各城市的交通分解功能，将部分旅游包机、旅游专列的始发与终到站放在笕桥、禄口、奔牛、硕放等上海周边有条件的机场及有关火车站点，以尽可能减轻上海的交通压力。

2. 统筹客房供应

——建设统筹。包括统筹客房总量，降低“长三角”地区饭店建设的盲目性，避免出现床位过剩的昆明“世博现象”；统筹结构，使饭店客房高、

中、低等级结构控制在2:3:5，大力发展经济等连锁饭店；统筹地域分布，就是从服务世博会、配套大上海需要出发，统筹协调“长三角”饭店分布，引导新建饭店主要集中于昆山、常熟、苏州、无锡、嘉兴、杭州、宁波、绍兴等上海近邻城市。

——预订统筹。成立世博客房预订中心，统一受理包括上海在内的“长三角”地区旅游客房的预订业务。

——房价统筹。即协调世博期间“长三角”地区的客房价格，防止区域内房价无序竞争，并通过合理的地区差别化房价制度，使房价成为影响客流的一个导向性指标，以缓和上海客房资源短缺之矛盾。

3. 统筹信息服务

设立世博旅游网，及时、全面、准确地公布“长三角”及其世博会的各种信息。旅游网分中、英、日、韩、法、德等多种文字版，使其成为中外游客了解世博会及“长三角”旅游服务的最权威、最全面的窗口；开设覆盖“长三角”全区域的统一的旅游电话声讯系统，方便“长三角”旅游者对世博旅游的咨询，消除“长三角”地区旅游咨询及投诉的时空障碍；为弱化公共服务标志阅读障碍，统一规范“长三角”地区公共场所的指示牌等图形标识，包括各类指示牌的图文、大小、材质、色彩等都应作统一的格式与要求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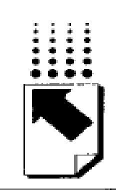
4. 统筹产品开发

国际会展业表明，会展旅游的经济效应是会展+旅游，而且旅游收入要占到整个会展经济的一半左右。如2001年的巴黎市会展消费总数为31亿欧元，其中15亿欧元来之于参展，16亿欧元来之于旅游。[①] 由于受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制约，上海缺乏名山胜水，人文景点的历史积淀不够深厚，传统意义上的旅游资源吸引力也不强。打造最具吸引力的世博会展旅游产品，必须与“长三角”等地区的旅游资源进行匹配，将上海的都市旅游资源与江浙地区的文化资源、山水资源有机结合，形成富有魅力的会展旅游资源诱因。

——统筹开发主题旅游产品。对“长三角”地区的旅游资源按主题进行整合，策划主题会展旅游产品。如，世博江南园林游、世博江南天堂游、世博江南山水游、世博江南古镇游、世博江南休闲游、世博太湖环线游、世博海天佛国游、世博江南美食游，等等。

——统筹开发游船旅游产品。“长三角”是我国著名的水网地区，游船

① 国家旅游局驻巴黎办事处：《从巴黎看北京旅游的发展》，《旅游市场》，2004年第4期。



旅游有着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魅力。目前，“长三角”地区的水上旅游主要局限于本地游，如上海的浦江游、无锡的太湖游等，跨地区内河、近海水上游，除了前往普陀山外基本还是空白。因此要大力开发游船资源，开辟“长三角”区域内游船航线，将原来以交通功能为主的水上客运改造成休闲旅游产品。开辟：上海至常州、至新安江、至湖州的内河游，上海至崇明、至南通、至南京（含沿线各城市直至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长江游，上海至普陀山、至温州、至连云港的近海游等。

5. 统筹人力配置

2003 年江浙沪三省市发布的《江浙沪高校毕业生将无障碍流动》政策，打开了“长三角”地区高学历人员流动的大门。但是，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旅游会展业来说，一些学历要求较低的服务类岗位员工的流动障碍并未消除。直面世博会展旅游的劳动力资源紧缺，应出台“长三角”地区旅游职场大专以下学历人员的无障碍流动政策，全方位开放“长三角”旅游劳动力市场。

“长三角”所在的江浙沪三地旅游教育发达，各类学校所设专业几乎涉及旅游及会展的所有门类，其本科、专科、职校结构为 11.78%、32.81%、55.40%，也基本符合旅游产业对人才的层次需求。但会展管理、景区开发管理、导游（含外文导游）等本科专业开设偏少，不能满足市场要求。为此，需要在“长三角”范围内，对旅游类、会展类的专业、学历层次进行统一规划设置，使其专业设点布局、结构层次更趋合理、科学。此外，在“长三角”范围内实行旅游职业的统一考核与等级评定，以提高整个“长三角”地区的旅游服务水平。

6. 统筹宣传营销

构建“长三角”旅游联合营销机构与机制，彻底改变 15 市过去“画地为牢”的营销模式；在国内外主要客源地设立“长三角”旅游营销分支机构；成立专家组，编制“长三角”世博旅游宣传资料；在国内外媒体、公共场所、大型文体活动上，将“长三角”作为世博旅游目的地的一个整体，向外宣传营销。

四 余 论

区域合作是 21 世纪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旅游业因其特殊的产业特性，更需要打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隔阂，实行跨行业、跨地区的互渗互动。

应该说，"长三角"地区的旅游合作已有了较好的开端，在共享世博效应、互惠共赢的理念下，15 市完全应该进一步弱化行政鸿沟，通过统一规划"长三角"区域旅游发展，统一制定连接区域内两地以上产品、服务的标准，共同开发旅游项目，共同进行市场促销，使"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加快得以实现。从这点上来说，世博会成了"长三角"旅游一体化的催化剂。

参考文献

陈建勤：《2010 年上海世博会旅游设施配置对策》，《上海大学学报》，2003 年第 6 期。

"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大讨论领导小组：《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世博专题研究报告》，2003。

上海市旅游委：《2010 年世博会与上海旅游业》（专辑），2003。

上海市旅游委：《走向世界的上海都市旅游——上海都市旅游研究成果汇编》，2004。

江苏省旅游局：《2003 年江苏省旅游业》，2004。

浙江省旅游局：《浙江省旅游业"十五"计划与至 2020 年旅游发展规划纲要》，2001。

江苏省旅游局、浙江省旅游局、上海市旅游委：《"世博与长三角"接待设施调查报告》，2004。

江苏省旅游局、浙江省旅游局、上海市旅游委：《"世博与长三角"旅游资源调查报告》，2004。

江苏省旅游局、浙江省旅游局、上海市旅游委：《"世博与长三角"旅游人力资源调查报告》，2004。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

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新趋势

○ 张二震　魏　浩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长三角地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最发达的地区。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①]：目前，长三角地区占中国2.2%的陆地面积，10.6%的人口，如今创造了中国22.1%的GDP、24.5%的财政收入、60%的外商投资和28.5%的进出口总额，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因此，世界城市规划第一人英国的彼得·霍尔爵士对此感叹："它简直就是世界的工厂！"长三角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外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本文对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发展新特点进行实证分析，并对跨国公司的投资战略的调整做初步探讨。

一　长三角地区利用FDI的新发展及其影响

入世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在长三角的投资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阶段，实际利用外资额不断增加，2001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34.18亿美元，2002年增加到175.38亿美元，2003增加到210.13亿美元。长三角地区利用外资额占全国总的外资额的比例也在不断地增加，2001年为28.62%，2002年增至33.25%，2003年增加到39.27%。

制造业仍然是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基础设施领域、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领域的投资上升迅速。以上海为例，世界500强在上海投资的外商投资企

① 《世界经济语言的核心音节：长三角的骚动与烦恼》，www.cbinews.com，2005年3月14日。

业基本上涵盖了汽车、通信、钢铁、石化和精细化工、家电、电站设备等工业支柱产业和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三大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普遍具有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强、出口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特点。

1. FDI 对长三角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

从表 1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2000 年长三角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只有 26.1%，出口占全国的比重只有 26.9%，进口占全国的比重只有 25.1%。同期，珠三角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是 31.8%，出口占全国的比重是 32.2%，进口占全国的比重是 31.4%，珠三角地区的三项指标都大于长三角地区。但是，2003 年，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长三角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增加到 32.5%，超过了珠三角的 32.1%，出口占全国的比重增加到 32.3%，几乎达到了珠三角 33% 的水平，进口占全国的比重增加到 32.9%，超过了珠三角的 30.5%。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三年内，长三角地区的对外贸易获得了高速发展，超过了珠三角地区，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最快的地区。

表 1　2000 年和 2003 年长三角、珠三角和全国进出口贸易额比较

地　　区	2000 年			2003 年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长三角所占全国比重	26.1	26.9	25.1	32.5	32.3	32.9
珠三角所占全国比重	31.8	32.2	31.4	32.1	33.0	30.5
合　计	57.9	59.1	56.5	64.4	65.3	63.4

资料来源：《2004 年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统计年鉴》。

再看外资企业在对外贸易方面的贡献度。从表 2 的数据可以看出，在上海和江苏的对外贸易中，外资的贡献度都是比较大的。在 1997 ~ 2003 年期间，上海和江苏地区的外资贡献度一直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地区的外资贡献度于 1998 年首次超过广东，并一直保持这种状态，江苏地区后来者居上，于 2002 年超过上海和广东，成为外资贡献度最高的地区。2003 年，江苏的数值高达 69.01%，上海的数值达到 67.19%，广东的数值只有 6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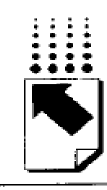


表 2　1997 ~2003 年外资企业对当地出口的贡献度

单位：%

年　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全　国	40.98	44.05	45.47	47.93	50.06	52.21	54.84
上　海	47.42	52.23	56.57	57.88	59.40	61.77	67.19
江　苏	46.47	50.53	53.06	54.80	56.63	62.15	69.01
浙　江	22.90	23.12	24.37	26.11	29.26	29.15	29.40
广　东	48.43	51.37	50.02	52.99	56.74	58.46	62.05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2. FDI 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

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速度明显。从表 3 中的数据来看，1990 年，长三角地区的第一产业所占比例是 15.8%，高于珠三角的 14.4%，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是 57%，高于珠三角地区（44.2%）近 13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所占比例是 27.2%，低于珠三角地区（41.4%）大约 14 个百分点。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以后，2003 年，长三角地区的第一产业所占比例降到 5.0%，第二产业所占比例降到 54.6%，仅高于珠三角地区大约 2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增加到 40.3%，仅低于珠三角地区大约 3 个百分点。虽然很难用统计数据证明 FDI 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但是这一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与 FDI 有很大关系，是可以肯定的。

表 3　长三角、珠三角和全国三次产业构成比较

单位：%

地　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0	2003	1990	2003	1990	2003
长三角	15.8	5.1	57.0	54.6	27.2	40.3
珠三角	14.4	4.1	44.2	52.4	41.4	43.5
全　国	27.1	14.6	41.6	52.2	31.3	33.2

资料来源：2004 年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统计年鉴。

3. FDI 对长三角地区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只依靠本国的力量去进行技术创新，还必须充分利用外部技术资源，通过技术引进和扩散来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从而推动本国或本区域经济的发展。跨国公司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也

是全球先进技术转移与扩散的主体。由于技术具有广泛的外溢性，引进 FDI，与跨国公司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是获得技术、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

外资企业对长三角地区的技术外溢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一是通过进口机器设备、中间产品等硬件技术的进行技术转移；二是实施人员和技术研发的本地化战略，通过对技术人员培训，导致组织管理技能和企业家精神等技术的渗透和扩散，通过直接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利用我国的高科技人员等均可以使我国企业得到技术外溢效应；三是外资企业为内资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咨询，也可以使长三角地区的内资企业获得技术外溢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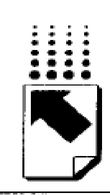
根据 1995、1997、1998 年对投资于北京和天津的 14 家和上海 15 家外资企业的有关调查数据表明[①]：90% 以上的企业投资引进了先进技术，仅有个别是利用中方原有的技术，在引进的技术当中有 50% 以上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浦东新区 1998 年底已经确认的 132 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有 69 家是外资企业，这些企业为上海和浦东有限发展集成电路与计算机、现代生物与医药、新材料等行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上海贝尔的 S12 程控交换机 3 毫米集成电路、上海华虹 NEC（909 工程）的 0.35 及 0.5 毫米集成电路等产品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提升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层次；以上海罗氏制药等企业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促进了张江“药谷”科技生产基地的形成与发展。

4. FDI 对长三角地区就业水平的影响

第一，对就业数量的影响。一是直接增加就业。跨国公司在长三角地区的直接投资建厂，在企业内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二是间接增加就业。外资企业投资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当地化程度，加强和长三角地区当地内资企业的联系，就会带动长三角地区当地企业的发展和就业。目前，一些大型外商投资企业在这方面已经发挥显著作用，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为与其前后相关的本地企业间接的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据保守估计，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每雇佣一名员工，就为其当地的原材料、零部件、服务供应商，以及当地中间购买者（如分销商、维修代理商等）间接地创造 1～2 个工作机会。国际劳工组织的实证研究表明，外商投资企业为前后相连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比其直接雇佣的人数高 2.3 倍。另外，有关研究表明[②]：每增加 1

① 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2003 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② 兰绍瑞：《中国对外经贸的就业效应》，《江苏统计》，2000 年第 4 期。



亿美元的外商投资，将直接吸纳近1.25万人就业。以上海为例，有关数据表明：外资企业成为上海吸收就业的重要载体。外资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年均增长超过10万个，其中外资工业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市工业就业人数的45.6%。

第二，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外资企业通常比长三角地区当地内资企业提供更好的工资待遇、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险福利；另一方面，外资企业通常可以为国内雇员（甚至是潜在雇员）提供获得新知识、新技能的机会。外资企业相关的管理人员培训中心的建立，也会促进长三角地区人力资源的开发，加速长三角地区人力资源的升级。

我国在新的世纪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要求实现充分就业，把庞大的人口规模转化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在下列方面进行一系列努力：通过扩大经济总规模，增加就业机会；加快培育劳动力市场，让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改革企业管理体制特别是报酬制度，进一步改进激励机制，培养和提高人力资本存量。跨国公司的投资，作为改革以来出现的非国有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在上述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将随着其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进入领域的拓展，在这些方面继续做出贡献①。对于长三角地区更是如此。

二　长三角地区利用FDI新特点

1. FDI规模的变化

近几年来，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和浙江利用外资的数量都在不断地增加。从实际利用外资额来看，表4中的数据显示：上海利用外资额从2000年的316014万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5350467万美元。江苏利用外资额从2000年的642550万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1056365万美元，增加了将近1倍。浙江利用外资额从2000年的161266万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498055万美元，几乎增加了2倍多。与此同时，北京利用外资额从2000年的168368万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219126万美元，但增加幅度比较小，广东利用外资额从2000年的1128091万美元下降到2003年的782294万美元，不增反减。

① 王洛林：《2003～2004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表 4　2000～2003 年长三角等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额

单位：万美元

地区 \ 年份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全　国	4071481	4687759	5274286	5350467
上　海	316014	429159	427229	546849
江　苏	642550	691482	1018960	1056365
浙　江	161266	221162	307610	498055
北　京	168368	176818	172464	219126
广　东	1128091	1193203	1133400	782294

资料来源：2004 年中国统计年鉴。

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在长三角的投资，不但总体规模日益增加，而且单项投资规模也越来越大。以江苏为例，2003 年新批外资项目 7301 个，比上年增加 1500 个，30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 97 个，其中总投资 1 亿美元以上的项目有 37 个。全省增资项目达到 1697 个，一次净增资超过 1 亿美元的有 12 个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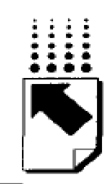
有关研究表明[①]：2005～2007 年期间，82% 的跨国公司继续扩大对华投资，无论是生产、销售、技术开发的投资规模与速度，都在逐步提高；35% 的跨国公司处于投资整备阶段，并计划开展新一轮对华投资。从选择投资区域企业数分布看，长三角占 47%，环渤海经济圈占 22%，珠三角占 21%，东北地区占 9%。因此，可以预见的是，长三角吸引外资的规模在全国范围内将成为一个新的亮点。

2. FDI 区域分布的变化

长三角地区由两省一市构成，但是，在长三角内部，跨国公司的投资却不是均匀分布的。从图 1 来看，在长三角地区内部，跨国公司的投资分布具有这样的特点：

（1）长三角三个地区当中，江苏利用外资额最多，自从 1994 年以来，几乎都占整个长三角地区利用外资总额的 50% 左右，其次是上海，自从 1994 年以来，几乎都占整个长三角地区利用外资总额的 30% 左右，最后是浙江，在 1992～2002 年期间，占整个长三角地区利用外资总额的比例都在

① 《2005～2007 年跨国公司对华产业投资趋势调研报告》，商务部网站，2005 年 3 月 24 日。



10%～20%之间，多数年份在15%左右。

（2）在1994年以前，跨国公司在三个地区的投资分布没有规律可言，但是，自从1994年以后，投资分布的规律性越来越明显。浙江所占份额表现为先降后升，1994年所占份额为15.57%，1998年所占份额下降到11.41%，自从1998年以后，所占份额逐年增加，2003年所占份额增加到23.7%。上海和江苏保持着此消彼涨的关系，形成这种分布特点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浙江主要是以发展民营经济来带动经济发展的，所以，不仅导致了浙江利用外资较少，而且也导致了江苏和上海之间在吸引外资方面存在竞争关系。

目前，随着国际经济摩擦的日益增加，浙江单纯依靠民营经济发展经济的弊端日益凸现出来，也开始注重吸引外资来发展经济了。因此，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可以判断，跨国公司在长三角地区的投资分布会出现新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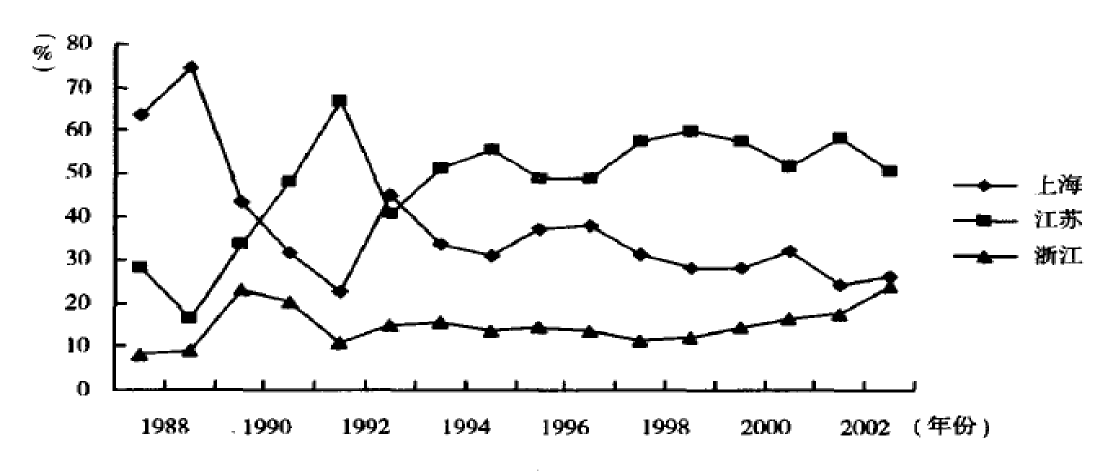


图1　1988～2003年期间长三角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的内部分布情况

3. FDI行业分布的变化

以江苏为例，从表5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2000～2003年期间，FDI投资于制造业的比重虽然一直保持很大的份额，但是，却出现了递减的趋势，制造业所占比重从2001年的91.1%下降到2002年的87.9%，2003年下降到85.6%。同期，服务业所占比重不断地增加。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领域，跨国公司的投资比重从2000年的0.6%上升到2002年的0.8%，2003年的0.7%；在社会服务领域，跨国公司的投资比重从2000年的1.2%上升到2002年的2.2%，2003年的2.8%，增加速度十分迅速；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领域，跨国公司的投资比重从2000年的0.1%上升到2002年

的0.2%，2003年的0.5%。

同时，有关数据表明[①]：2003年江苏省服务业实际吸收外资增长72%，主要分布在现代物流、公用设施、信息咨询、社会服务等领域，是江苏利用外资增幅最高的产业，同时，外资银行、保险、证券等机构和触角已经遍及江苏经济发达地区。2004年，江苏省服务业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877个，注册外资51.65亿美元，实际到账外资16.94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在金融、保险业领域的投资也保持了较快的增加。例如，英国汇丰银行在2002年把地区总部从香港转移到上海并把技术保障中心迁到深圳，把呼叫中心转移到广州和上海。摩托罗拉公司将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给上海对外服务公司，为其进行销售团队的招聘、培训和管理工作。

表5　2000～2003年江苏地区外资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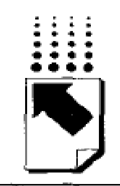
地　区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当年引资总额	100	100	100	100
农、林、牧、渔业	0.6	0.4	0.8	0.9
采掘业	0.0	0.0	0.4	0.1
制造业	89.4	91.1	87.9	85.6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3.0	2.0	0.7	1.7
建筑业	0.4	0.4	0.5	0.9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0.0	/	/	0.0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	0.4	0.5	0.7	1.1
金融、保险业	/	/	/	0.1
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	0.6	0.5	0.8	0.7
房地产业	4.1	3.7	5.3	5.1
社会服务业	1.2	1.2	2.2	2.8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0.0	0.0	0.0	0.1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0.1	/	0.0	0.0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0.1	0.2	0.2	0.5
其他行业	0.1	/	0.4	0.3

资料来源：根据《2004年江苏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4. FDI来源地的变化

从江苏地区来看，2003年的十大外资来源国或地区分别是：香港特区、

① 《外资进入江苏出现五新动向 开始向服务业渗透》，新浪网，2004年4月11日。



中国台湾省、唯尔京群岛、日本、美国、新加坡、韩国、德国、荷兰、开曼群岛。截至2003年底，江苏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是香港，香港地区的外资占江苏实际使用外资累计总额的25%，远远小于全国的数值（44.38%）。依据2000～2003年期间各国和地区的外资来源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台湾、韩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日益增加，所占份额不断上升。从上海地区来看，上海地区的跨国公司投资来源国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近年来，港澳台地区投资所占比例逐渐减少，美、日、德、英、法的投资力度加大，新加坡、韩国的投资呈明显增长态势①。

台商是长三角地区新一轮投资热的先驱。目前，珠三角和长三角在外贸进出口方面虽各有竞争优势，但珠三角在今后的发展中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长三角已形成高科技产业附加价值较高的集中地，晶圆半导体、封装测试、液晶显示器等制造出口都建立了良好的产业链，在江、浙两省各大城市，半导体、轻纺、机械、木材、不锈钢等出口产业链也已经形成，再加上人才素质高和人才聚集，以及上海港、宁波港等航空、海运航线多等外在条件下，吸引了众多的台外资企业加速进入长三角地区②。

5. FDI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三角地区外资独资化倾向也日益明显。以江苏为例，在1998～2003年期间，江苏吸引外资逐年增加，但是，吸引外资的主要方式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吸引外资额基本保持了下降趋势，外商独资企业吸引外资却表现为超速增长，独资化倾向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从实际利用外资额来看。中外合资企业吸引外资额从1998年的310539万美元下降到2002年的260969万美元，中外合作企业吸引外资额从1998年的57872万美元下降到2002年的29241万美元，年吸引外资额减少了近1倍，外商独资企业吸引外资额从1998年的290057万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206690万美元，年吸引外资额增加了4倍多。

（2）从实际利用外资所占比重来看。从图2来看，1998～1999年外商独资企业所在新增投资的比例只有40%多，2000年独资企业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合资企业达到59%，2001年达到了64.3%，2002年达到了71.5%，

① 沈玉芳：《长江经济带投资、发展与合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② 《长三角成台商投资首选》，人民网2004年5月8日。

2003 年达到了 76.4%。而与此同时，不仅合作企业、外资股份制企业所占比重逐渐下降，而且原来一直占据绝对地位的合资企业所占份额急剧下降，1998 年所占比重是 46.7%，2000 年所占比重下降到 35.4%，2002 年所占比重下降到 25.2%，2003 年所占比重只有 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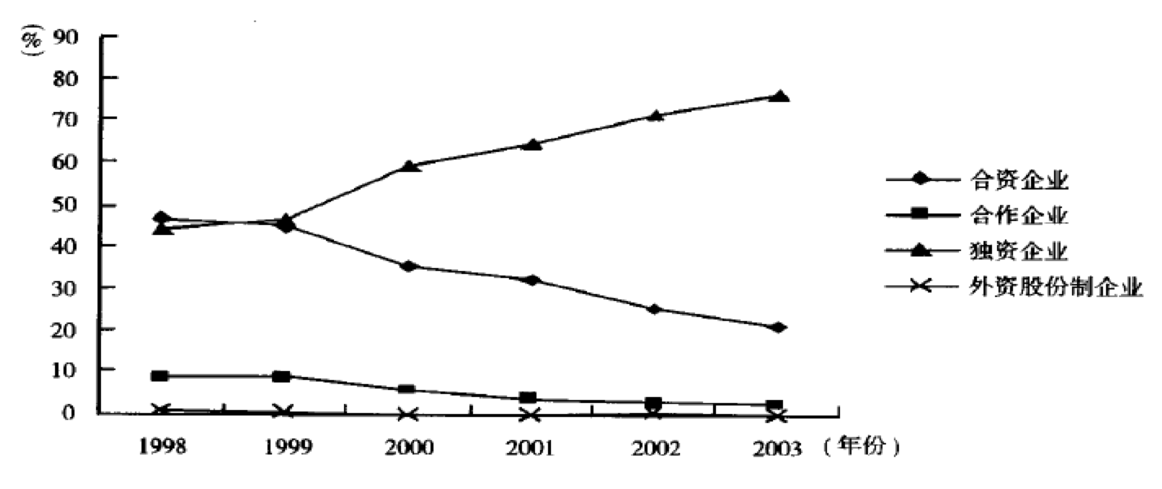


图 2　1998～2003 年期间江苏地区在实际利用外资中各类投资方式所占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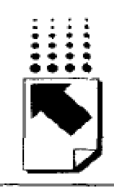
三　跨国公司对长三角地区投资战略的调整

跨国公司根据其全球战略的需要，结合在长三角地区投资的经验和教训，纷纷调整在长三角地区的投资战略。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些著名跨国公司进行的战略调整，有助于长三角地区更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外资，更好地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加速长三角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目前，跨国公司在长三角地区的投资战略调整主要有以下内容。

1. 严格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华专利申请量以平均每年 30% 的速度高速增长，中国企业已处在跨国公司专利的重重包围之中。随着我国国内竞争的加剧，产业结构的升级，跨国公司为了保持竞争力，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必将严格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一方面，跨国公司将从“各自为战”走向“联合攻关”①，即跨国公司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在集团内部互相优惠使用对方专利技术，但对集团外的企业收取统一的高额许可费；另

① 《跨国公司对华知识产权战略》，计算机世界网 2002 年 4 月 28 日。



一方面，以前，跨国公司专利“攻势”集中于通信、计算机、家电等领域，现在，跨国公司把眼光投向中国的医药和汽车业，这两个领域日益密集的专利“陷阱”将成为中国公司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①。

2. 加速实施研发本土化战略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成果、信息分布于全球各地，市场竞争加剧，产品的更新速度，特别是技术的更新速度不断的加快，跨国公司要想在竞争中保持自身的地位不被淘汰或者要想获得不断的发展，就必须在技术上保持优势。因此，跨国公司将充分利用全球各地的科技资源、人力资源等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技术研发，在投资国设立研发机构。

在长三角地区，跨国公司加快了设立研发中心的进程，使长三角为地区研发中心或全球研发基地。以上海的浦东为例，据不完全统计②：截至2003年，就已经有阿尔卡特、通用电气、杜邦、英飞凌、微软、花旗等91家跨国公司在浦东建立了独立的研发中心或企业内部的技术开发中心，占到上海市的九成和全国的四分之一。仅张江高科技园区就汇聚了73家中外研发机构，它们共有各类授权专利1506项，累计申请专利1831项。其中，电子信息业跨国公司设立研发机构的比例最高，达41.3%，其他依次为交通工具23.1%、一般消费品10.3%和化工3.8%③。

3. 渐进实施总部战略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仅2002年1月～2003年3月，就有829例跨国公司建立或转移公司总部，而其中近1/4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总部，有的是中国总部，有的是亚太地区总部，甚至有的跨国公司准备在中国设立全球总部。

可见，作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作为世界上第六大经济圈，长三角地区必将成为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最重要的区域。因此可以预测，跨国公司在发展势头迅猛的长三角地区将设立更多的地区总部。以上海地区为例，最新的数据表明④：2004年，上海新批了3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使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累计达86家；新批了15家投资性公司和34家研

① 《商务部报告称跨国公司借专利术“包抄”中国》，《北京晨报》2004年6月14日。

② 《跨国公司投资战略升级“头脑经济”激荡上海》，《国际金融报》2003年12月17日。

③ 《海外研发中心登陆中国：跨国公司苦练功夫》，《金融时报》2005年2月21日。

④ 《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86家》，新浪网2005年1月16日。

发中心，在上海的外商投资性公司和外资研发中心总数分别达105家和140家。其中，阿尔卡特（中国）投资公司、联合利华（中国）公司和通用汽车（中国）投资公司3家已经获得国家级地区总部认定。

4. 实施“归核化”战略和集群化战略

所谓“归核化”，就是跨国公司在长三角的投资，纷纷由多元化扩张向有竞争力的主营业务回归，把公司的业务或新的投资全部集中到其最具竞争优势的行业上；把经营重点放在核心行业价值链上自己优势最大的环节上；强调核心能力的培育、维护和发展。这是跨国公司在外部环境竞争日趋激烈情况下的一种主动选择，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核心主业、提高竞争力而实施的战略转移。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内资企业竞争力的日益增强，跨国公司向中国的投资也越来越具有系列化特征，即上、中、下游企业一起转移，形成集群式发展，产业转移的转移速度和范围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不管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将要面对的竞争对手不再是单个的国际顶尖跨国企业，而是一个庞大而高效的国际化商业链条，即专业领域跨国公司的联合体。以苏州的IT产业为例①，目前，在苏州投资IT产业的台湾企业达500多家。台湾前20家最大的电子上市、上柜公司中已有14家落户苏州，形成以龙头企业为主，生产配套齐全，研发、制造、销售同步发展的格局。众多IT厂商在苏州已建立一个成熟的制造业体系，形成完整的供应链。苏州的小屏幕液晶显示器、压力传感器、电脑摄像探头、水晶振子、鼠标等产品已占据世界市场30%的份额。台湾IT企业在苏州的集聚速度、厂家的规模和技术层次都远远超过国内任何地方，且这种集群效应几乎以几何级数扩大。

参考文献

《世界经济语言的核心音节：长三角的骚动与烦恼》，www.cbinews.com，2005年3月14日。

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兰绍瑞：《中国对外经贸的就业效应》，《江苏统计》，2000年第4期。

① 查志强：《台湾IT产业长三角发展态势研究》，中宏数据库2002年10月28日。

王洛林：《2003～2004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005～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产业投资趋势调研报告》，商务部网站2005年3月24日。

《外资进入江苏出现五新动向 开始向服务业渗透》，新浪网2004年4月11日。

沈玉芳：《长江经济带投资、发展与合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长三角成台商投资首选》，人民网2004年5月8日。

《跨国公司对华知识产权战略》，计算机世界网2002年4月28日。

《商务部报告称跨国公司借专利术“包抄”中国》，《北京晨报》2004年6月14日。

《跨国公司投资战略升级“头脑经济”激荡上海》，《国际金融报》2003年12月17日。

《海外研发中心登陆中国：跨国公司苦练功夫》，《金融时报》2005年2月21日。

《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86家》，新浪网2005年1月16日。

查志强：《台湾IT产业长三角发展态势研究》，中宏数据库2002年10月28日。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长江三角洲主要城市投资环境评价及实证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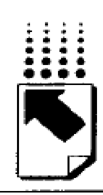
○ 吴静静

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在逐步形成经济一体化，开始进行各自资源的整合和调配，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即以上海为中心，南京、苏州、杭州、宁波为次中心的城市带。改革开放以来，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历史因素，长江三角洲成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为了更加高效地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对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和宁波等长三角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找出问题症结以改善投资环境。

一　投资环境的主成分分析

（一）评价指标的选取

投资环境，是一个地区对于开展投资活动所具有的外部条件，它是投资赖以进行的基础和前提。它既是主动的选择，也是满足投资者目的的配合。投资环境评价目的是客观地反映各个城市综合投资环境现状。投资环境包括投资软环境和投资硬环境。投资硬环境主要是指基础设施和工业配套程度、整体经济水平、对外交通条件、工业科技园区、邮电通信设施、环境保护措施、销售市场、原料和零部件的供应、水电气价格和市内交通等。投资软环境主要是指城市所提供的台商居住环境、法制环境、劳动力供应和工资水平，商业信息服务、技术和管理人员的供应、信用环境、税收减免政策、融资环境、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政府办事效率和土地及房产价格。



因此，投资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综合系统。因而在研究城市投资环境时应综合考虑各个方面。有些指标，如政策、法规、体制、服务、政治环境、居民观念、社会氛围等，本身是影响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但由于这些指标极难量化，因此未列入本次指标体系。

基于此，遵循重要性、差异性、可比性、可量化、资料可获得原则性，选取6类共22项因子作为长三角各城市投资环境比较研究的参考指标（见表1）。

表1　长三角城市投资环境测度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GDP（X_{1}）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X_{2}） 第三产业比重（X_{3}） 进出口总额（X_{4}）	交通条件	客运总量（X_{11}） 货运总量（X_{12}）
		劳动力状况	高校在校生/万人（X_{13}） 技术人员数/万人（X_{14}） 在职工人平均工资（X_{15}）
城市基础设施	人均用电量（X_{5}） 人均用水量（X_{6}） 公共汽车数/万人（X_{7}） 医生数/万人（X_{8}） 人均铺装道路数（X_{9}） 人均邮电业务量（X_{10}）	环境状况	绿化覆盖面积率（X_{16}） 环境噪声达标率（X_{17}）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X_{18}）
		市场潜力	人均批发零售商品销售总额（X_{19}）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_{20}） 物价指数（X_{21}）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_{22}）

（二）主成分分析计算

本文对投资环境的评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按照下面的步骤对各城市统计数据进行计算，具体的计算过程借助统计软件包SPSS来完成，从而得到各城市投资环境综合评价的排序。

（1）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各评价指标数值的大小相差较大，有的单位是亿元，有的是亿美元，有的还是万吨等，如果直接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则主成分会过于照顾数值较大的指标，而对数值较小的指标却照顾不够。为使主成分分析能够均等地对待每一个指标，消除由于数值大小的差异而可能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需对各指标作标准化处理。即：

$$Xij^{*} = \frac{Xij - \overline{Xj}}{\sqrt{\mathrm{Var}(Xj)}} \quad (i = 1, \cdots, n;\ j = 1, \cdots, p)$$

其中为$\overline{Xj}$为第j个评价指标的样本均值，

$$Var(x_j) = \frac{1}{n-1}\sum_{i=1}^{n} (Xij - \overline{Xj})^2 (j = 1, 2\cdots, p)$$

（2）求出相关矩阵R。

（3）用SPSS求出R的特征值及相应的一组正交单位特征向量及累计贡献率，确定主成分个数，使累计贡献率≥90%。见表2

表2 主成分情况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X1	14.529	66.041	66.041
X2	3.566	16.211	82.252
X3	2.056	9.346	91.5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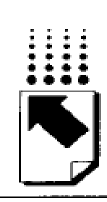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计算。

从中可以看出：前三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已达91.597%，而后19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只有8.403%，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最多抽取3个主成分作为因素，就可以概括数据的特性，即这三个主成分是影响投资环境的决定因素。

（4）由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回归模型，即把各主成分作为新的变量代替原来自变量X做回归分析。把数据代进去，计算出各个城市的主成分得分。

表3 2003年长三角各主要城市投资环境得分

城市	第一主成分得分	名次	第二主成分得分	名次	第三主成分得分	名次	综合得分	名次
上海	10.73757	1	-0.04329	9	-2.16343	15	7.516128	1
南京	3.437859	2	-3.61459	15	2.46258	1	2.089763	2
杭州	2.003334	3	2.036337	2	1.055823	3	1.91278	3
无锡	1.133461	4	0.434737	7	0.377773	6	0.932852	4
宁波	0.556817	5	1.987393	3	0.917081	4	0.846784	5
苏州	0.429552	6	2.155267	1	0.15958	10	0.707679	6
常州	-0.13215	7	0.060464	8	0.376181	7	-0.04633	7



续表 3

城 市	第一主成分得分	名次	第二主成分得分	名次	第三主成分得分	名次	综合得分	名次
绍 兴	-1.67809	9	1.418913	4	0.613172	5	-0.89659	8
湖 州	-1.8187	10	0.738801	6	0.363472	8	-1.14384	9
舟 山	-1.4016	8	-1.65639	13	1.489043	2	-1.15268	10
嘉 兴	-1.97175	11	1.185166	5	0.363472	9	-1.17516	11
镇 江	-2.00413	12	-1.12881	12	-1.18242	11	-1.76553	12
扬 州	-3.01792	13	-1.10624	11	-1.2703	12	-2.5016	13
南 通	-3.07503	14	-0.60962	10	-1.78704	14	-2.50741	14
泰 州	-3.19922	15	-1.85813	14	-1.76244	13	-2.81556	15

资料来源：同表 2。

（三）投资环境分析

由表 3 可以看出上海市的投资环境最好，居长三角城市之首，其他 14 个城市与其相差很大；接下依次是南京、杭州、无锡、宁波、苏州、常州、绍兴、湖州、舟山、嘉兴、镇江、扬州、南通、泰州；其中南京、无锡、杭州、苏州、宁波综合分值为正，说明这几个城市的投资环境高于长三角 15 个城市的平均水平。

上述计算过程和结果只是粗线条的给出了长三角各主要城市投资环境的基本状况，还不足以明确各个城市的投资环境的特点，为更清楚地看出各城市环境的详细情况，进而明确改善的方向，下面通过因子负荷量来解释各个主成分。由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表 4）可以看出，主成分 1 在 X 8（医生数/万人）、X7（公共汽车数/万人）、X12（货运总量）、X10（人均邮电业务量）、X2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4（进出口总额）、X17（环境噪声达标率）上的载荷值很大，显而易见主成分 1 表达的是社会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状况；主成分 2 在变量 X2（固定资产投资总额）、X18（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X6（人均用水量）上的载荷值较大，尤其在变量 X2（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上特别大，因此公共因子可以理解为固定资产投资状况；主成分 3 在 X11（客运总量）、X2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X21（物价指数）、X15（在职工人平均工资）上的载荷值很大，因此可以归纳为市场容量或潜力。

表 4 主成分负荷矩阵（转轴后）

变 量	component		
	1	2	3
X1（人均 GDP）	0.696936	0.08053	0.595991
X2（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0.10545	0.896862	-0.03204
X3（第三产业比重）	0.682539	0.708654	0.064551
X4（进出口总额）	0.913893	0.089827	0.326386
X5（人均用电量）	0.783546	0.452705	0.398727
X6（人均用水量）	0.554494	0.770625	0.193696
X7（公共汽车数/万人）	0.959086	0.254431	-0.04306
X8（医生数/万人）	0.963757	0.030644	0.228946
X9（人均铺装道路数）	0.583596	0.630776	0.401264
X10（人均邮电业务量）	0.915163	0.324481	0.172174
X11（客运总量）	-0.32521	-0.10358	0.869974
X12（货运总量）	0.930249	0.2522	0.218225
X13（高校在校生/万人）	0.574321	0.710602	-0.30758
X14（技术人员数/万人）	0.856595	-0.0701	0.178337
X15（在职工人平均工资）	0.491092	0.302868	0.804104
X16（绿化覆盖面积率）	0.672905	0.716175	0.087453
X17（环境噪声达标率）	0.863048	0.501687	0.026571
X18（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0.00686	-0.83344	0.020187
X19（人均批发零售商品销售总额）	0.834005	0.347199	0.36752
X2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420749	-0.02026	0.867993
X21（物价指数）	-0.4908	0.054602	-0.80747
X22（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914699	0.277458	0.258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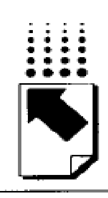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同表 2。

二 对长三角主要城市投资环境聚类分析

运用 SPSS 对长三角 15 个城市进行聚类分析。在定义类与类之间的距离上采用组间均联法，用欧几里得距离表示样品间距离，运用标准差标准化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得 15 个城市树状聚类图。

结合表 3、表 4，我们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 15 个城市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上海市。上海的投资环境居于第一，尤其在社会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状况这一项的得分上遥遥领先。但是同时也应看到，在固定资产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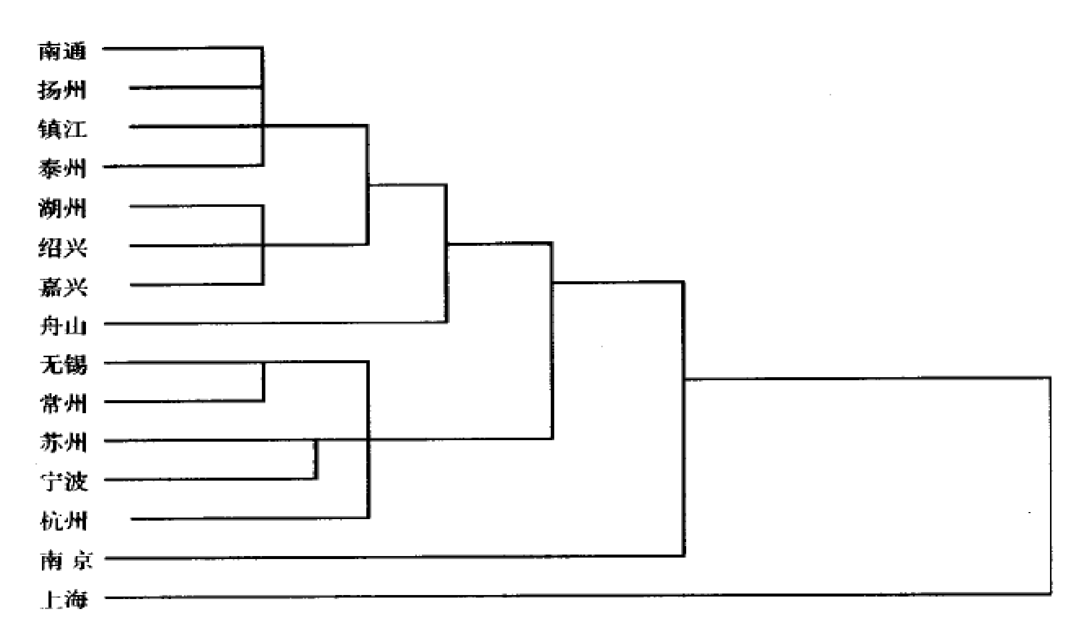


图1　长三角15个城市投资环境树状聚类图

和市场容量上还是相对薄弱。上海市定位为国际化大都市，应该进一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同时也应在增强市场潜力上多下工夫，加大在通信、商业、旅游、环保、金融、保险、咨询等处于市场中介的服务业的引资力度，支持外商投资上海国际中介服务机构，大力引进熟悉该国际惯例的专门人才。其次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为了获得经济的持续发展，上海市应该也必须积极与长三角其他城市联动发展，不断提升上海在长三角区域整体联动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第二类是南京市。在投资环境的其他方面相对其他14个城市比较强，但是其主要薄弱环节是固定资产的投资，排在15个城市的末位，也就是说对于南京这样一个特大城市来说，目前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还显得不匹配。南京处于沿海地带和长江流域的交汇部，又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型综合性交通运输枢纽之一，拥有较理想的区位交通优势。该市拥有47所高等院校，科技力量高度密集。所以，南京市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拓展渠道吸引外资，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第三类是杭州、无锡、宁波、苏州、常州这5个城市。这5个城市投资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好，尤其苏州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名列长三角第一（这是该市的一大突出优势）。常州在投资环境各方面也比较好，薄弱之处是社会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状况，低于长三角平均水平，

因此常州市应该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把交通、邮电、通信作为薄弱点予以重点支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使该市的外向型经济与地区布局建设同步推进。杭州、宁波、无锡、苏州要利用上海国际大都市的经济辐射，继续完善现代化的交通、通信、网络、国际化的物流体系和生活服务体系，同时应针对本身的优势，优化投资环境，发展本地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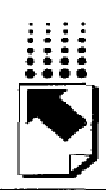
第四类是镇江、南通、扬州、泰州、湖州、绍兴、嘉兴、舟山这八个城市。其中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四个城市在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市场潜力得分均为负值，在这几个方面都低于长三角平均水平，普遍显得比较薄弱。而绍兴、湖州、嘉兴在投资环境的各方面比较好，薄弱之处是社会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状况，低于长三角平均水平。舟山在居民收入市场潜力方面比较强，但是在社会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状况、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显得比较薄弱。嘉兴、湖州紧邻上海，应该借助于与上海的自然区位优势，加强在交通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上的投资，以上海为技术依托成为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基地，加强与长三角内各市支柱产业的配套协作，并且借上海之势把自己发展成物流基地和旅游休闲基地。镇江、南通、扬州、泰州除了须继续强化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外，同时应该依托上海，接轨上海吸引外资、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

三　进一步讨论

上述分析主要是针对那些可以量化的硬环境因子，而软环境因子由于数据获取与量化的难度，因而本文并不涉及到，所以本文对于长三角各城市投资环境的评价只是一个总体上的评价。然而软环境因子对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力正越来越大，各市应同步在政策、法规、服务等软环境方面增强吸引力，通过提供优质服务、优惠政策、简化入境手续等措施以弥补硬环境的不足。同时，加快软、硬环境因子的相容结合，发挥两者在区域投资环境的提升功效，以真正增强长三角地区城市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李锦珠、方文明：《珠江三角洲主要城市竞争力分析》，《统计观察》，2005 年第 6 期。



周恩德：《湖北城市投资环境比较研究》，《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59~6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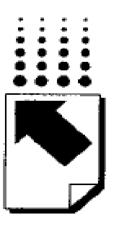
周玉翠、廖荣华等《湖南城市投资环境比较研究》，《热带地理》，2005年第1期，第62~66页。

何晓群：《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应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阮桂海、蔡建琼等《统计分析应用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

珠　　三　　角



珠三角：自主创新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 游霭琼

珠三角利用国家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毗邻港澳的“搬不动的”区位优势、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等各种资源，积极主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工业化的率先起飞，创造了长达25年的GDP年均增长在15%以上的空前奇迹。目前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扮演着领跑者角色的珠三角，却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发展疲态已显，维持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尚未长成，粗放型的外源型经济增长模式又因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大、贸易摩擦多发期的到来而日渐走到尽头，国际国内竞争的双重挤压使珠三角的发展空间越来越窄。珠三角经济发展如何面对资源、土地、水、电、环境等各方面的制约？如何在“十一五”期间继续扮演领跑者的角色？创新外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就成为新时期珠三角唯一选择。而将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有机结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从单纯依靠外源型经济向内源外源“双源”推动转变是当前珠三角要着重思考的重大课题。

一 传统的增长模式已日渐走到尽头

不论是工业总产值还是工业增加值，外源型经济都占到珠三角整个区域总量的六成以上。2003年，广东外源型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45.4%[①]。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的资源消耗式的外源型经济是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主要形态。这种本地土地、资源和外来劳动力与境外（主要是港澳台）生产要素相结合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曾为珠三角工业化率先起飞立下

① 卜新民：《广东实践雄辩地证明：发展才是硬道理》，《广东统计年鉴2005》，第1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汗马功劳。但随着珠三角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传统的增长模式虽然在工业化中期可以继续维持一定时期的增长，但其作用的空间已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和外部环境的恶化而日益收窄。

1. 经济增速趋缓

珠三角的经济增速在2003年达到历史的高峰后（同年长三角经济增速首次超过珠三角，且两者的差距越拉越大），2004年开始下滑（参见图1）。2005年前三个季度珠三角GDP、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都有所下滑。从GDP增幅来看，除了佛山同比上升2.7个百分点外，其余8市均表现出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广州、深圳和中山分别下降3.5、3.1和4.5个百分点；从工业增速来看，前三个季度除佛山、肇庆分别上升3.6和1.2个百分点外，其余城市均有不同程度回落，其中深圳、广州、东莞、中山分别下降8.4、5.2、1.8和10.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只有珠海上升了1.7个百分点，其余均出现大幅回落，如广州、深圳、佛山、中山分别下降7.6、18.6、5.6和15.6个百分点；2005年1～8月外贸出口增速除深圳上升4.5个百分点，其余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如广州、佛山、东莞、珠海分别下降4.2、9.8、10.5和14.6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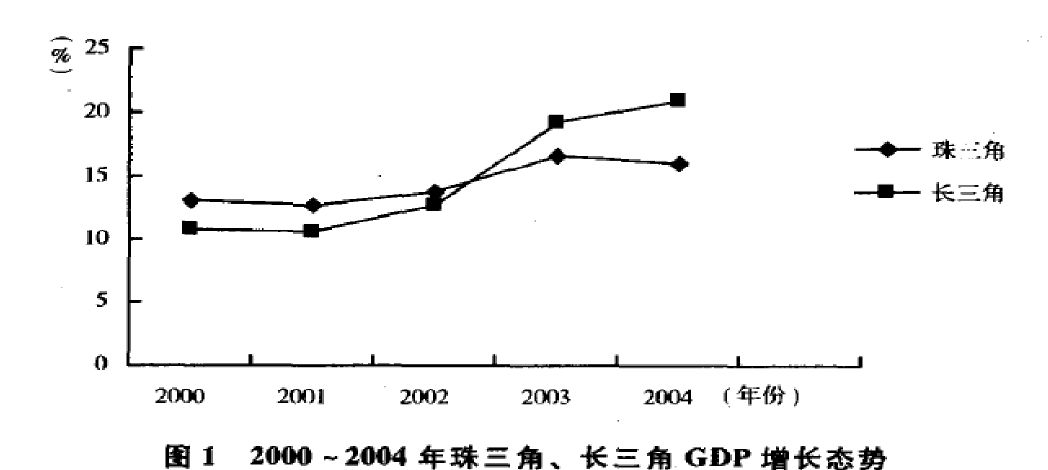


图1　2000～2004年珠三角、长三角GDP增长态势

2. 资源环境约束加大

投资珠三角的外资中，“成本指向型”外资占了近八成以上，而“成本指向型”外资的市场在外，主要利用珠三角低廉的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来获得其在国际市场的成本竞争优势，一般属于“technologyless industry”（无技术产业）的资源消耗型产业；而且从外资来源结构来看，珠三角的外资是以香港资本占主体。截止2004年底，来自香港的资金占广东使用外资

总量约66.1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17个百分点；而作为我国外资的第二来源国美国在广东的投资所占比重只有3.59%，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1/2，欧盟亦然。也就是说，广东经济的国际化尚未超出“华人经济圈”。以港澳台资本为主体的产业普遍存在“小而弱”、“大而弱”等特点，受资源钢性约束大，产业升级乏力，属于“无根”的“候鸟”型经济。正是这种以“成本指向型”为主导的外资结构使珠三角的单位GDP能耗比沿海一些发达地区都要高，使能源资源匮乏的广东成为能源消费大省。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珠三角的可持续发展正面临能源不足的严峻挑战。

当前广东所需能源85%以上要靠从外省购进或从国外进口解决，从2002年起，广东进入了电力电量双缺，2005年电量缺口237亿千瓦时，约占全年全社会用电量的9%，电力缺口达600万千瓦以上，约占需求的13.3%，占全国电力缺口的24%，成为全国缺电最严重的省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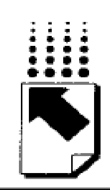
经过20多年的开发，珠三角地区可建设用地已十分有限。目前，东莞已无地可用，深圳剩余的土地也用不了几年了。在内圈层先发地区建设用地储备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小城镇及外圈层低质量的发展空间无法满足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的需求，导致珠三角在引入国际资本及高端产业方面和长三角等区域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土地资源不足成为制约珠三角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瓶颈。

此外，珠三角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石油、煤炭、电力等资源约束的问题进一步显现。一些重要的基础原料，如氧化铝、铁矿石等也出现明显短缺。资源不足已直接影响到珠三角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安全。珠三角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多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工业产品附加值低，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定价话语权。而近年来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土地等资源成本也不断上升，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进而影响企业的再生产和投资。

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耗尽了珠三角有限的资源，而且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被污染而无法恢复，青山绿水不再。2004年广州、深圳等城市灰霾天气超过了120天；珠三角地区二氧化硫等有毒气体排放量居高不下，酸雨频率达45.4%，一条常年存在并随季节改变的空气污染物传输通道已在珠三角近地面上空形成；人民甚至不敢吃地里种出的蔬菜、河里捕捞上来的鱼。经济与自然发展的不和谐已严重威胁着珠三角的可持续发展。

3. 外贸环境日趋恶化

经济发展的高度国际化使珠三角对国际市场形成了严重依赖，而国际竞



争的日趋激烈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外技术壁垒的更加隐秘和多样化，使珠三角出口面临严峻挑战。随着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广东遭受反倾销调查也逐年增加，2003 年有 12 起针对广东产品的反倾销案，比 2002 年的 9 起增加了 3 起。涉及到彩电、木制卧室家具、纺织品等，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方面的限制也给广东的出口带来很大困扰。预计 2005 年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广东出口产品的影响将高达 25 亿美元；从 2006 年起，欧盟《WEEE》和《RoHS》两项指令将影响价值高达 200 亿美元的广东机电产品的出口。

4. 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不足

作为内源型经济主推器的民营经济发展相对较弱。广东民营经济起步虽早，但由于思想不够解放，扶持政策不够到位，市场准入和融资难等问题未能较好解决，民营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已落后于江苏、浙江两省。2002 年，广东个体私有经济不仅增加值总量小于浙江和江苏分别达 1059 亿元和 619 亿元，而且个体私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广东只有 20.3%，浙江和江苏为 45% 和 28.3%，差距非常明显。特别是，广东民营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不高，创名牌水平（拥有 6 件全国驰名商标、45 件著名商标）落后于浙江（12 件、99 件）。国家有关部门对全国 8 万多家中小企业中的 1 万多家进行考察，发现其中有 2000 多家属于成长型的中小企业。在 2000 多家中，浙江有 900 多家、江苏有 500 多家，而广东只有 200 多家；在前 500 名中，浙江有 180 多家，而广东只有 30 家。

营商成本的上涨，资源价格的持续攀升，土地、劳力、水电等资源的不足，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使珠三角的“无根”经济开始了向外迁移，而本地内源经济成长不足又无法填充外源型经济外迁后留出的空挡，珠三角就面临着产业空心化和经济增长动力不继的严峻问题。新时期，珠三角必须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抢抓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实现第二次腾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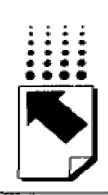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进一步加深。为避免在新一轮知识经济发展中被边缘化，争取主流化，为了进一步提升外源型经济，为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承接浪”中抢得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先机，为了突破资源的“瓶颈”制约，珠三角必须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早日实现“广东制造”向“广东创造”的转变，而外源型经济发展模式下的自主创新又必须依托全球资源的配置。

二　自主创新是成功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前提

（一）创新：先发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成功经验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的转换是以收入水平、价格结构、生产链长度为变量的需求结构变动和以资源条件、科技水平、产业集中度为变量的相对成本变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转移的国际化成为产业结构转换的主导力量之一。按梯度转移规律，产业总是由经济相对发达和现代化水平相对高的高梯度国家和地区向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水平相对低的低梯度国家和地区转移。发达国家利用产业转移国际化将整个世界作为它产业转换的舞台，根据它的全球战略，凭借其资本、技术、管理优势来实现产业结构的重组和调整，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利用产业转移国际化通过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来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步伐。

不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都已说明，在市场开放条件下后发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提高本国产业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加快经济发展，为本国经济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更多地分享全球化利益提供必要的基础与实力。但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拉美国家的沉痛教训也同样说明，只有在创新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才能真正获得产业转移国际化的利益，实现承接产业转移的根本目的。因为，国际产业的顺利转移必须具备三大条件：供给条件、需求条件和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供给条件是指产业转移国转移产业的类型、转移的意向；需求条件是指承接产业转移国的条件，包括经济发展阶段、产业配套能力、技术水平、承接产业转移的需求等；经济国际化程度决定着产业国际转移的快慢。只有供给条件和需求条件相互衔接，生产要素在国与国之间畅通无阻流动，才能使产业的国际移动顺利进行，并使其作用有效发挥出来。而承接方的承接和转化能力决定着承接的成败。18 世纪以来，世界的科学中心和工业重心从英国转到德国、再到美国，表面上是地理位置的更替，实质上是创新能力强弱转换的结果。美国从英国、日本从美国、亚洲“四小龙”从日本承接产业转移，无不是在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的，将被动地接受先发国家的生产能力转移和自身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将承接产业转移与本国创新能力提高紧密结



合起来，最终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资源相对丰富的阿根廷等一些拉美国家，却因在承接产业转移之后，忽视了自主创新，在此后的货币危机中，经济险些崩溃。

拉美国家的教训说明，一国经济发展的希望不能完全寄托在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上，应该技术引进与创新并重，在提高产业转移承接能力的同时，增强产业升级的主动性。这是因为，技术垄断是跨国公司在实行全球战略时保持技术优势所必需的，“跨国公司无国界”只是相对的。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是为了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东道国承接产业转移，引进技术是为了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两者目的是不一致的。因此，想单纯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来实现产业升级的想法是十分幼稚的，历史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20 世纪末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日趋成熟，竞争的白热化，跨国公司为获得竞争优势，实施其全球战略，不但加快了高新技术产业向外转移，而且推动着研发全球化和本地化，纷纷在其他国家建立研发中心，争夺当地人才、利用当地资源，直接为其全球战略服务。比如，美国升阳公司（Sun）将全球研发作为重要战略，拟将 50% 以上的研发放在硅谷之外，在爱尔兰、印度等地建立了主要的技术中心；英特尔于 2000 年底设立了中国实验室，开展面向全球的研发；微软在北京设立的中国研究院，是其境外最大的科研机构；贝尔实验室在北京设立的基础科学研究院，是其第一次在本土之外建研究院。

尽管如此，美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仍将核心技术和高端技术研发留在母国。大型跨国公司如英特尔、思科等公司的高层普遍认为，核心和高端技术的研发关系到国家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不宜转移或流失。例如，英特尔虽然在海外设立了不少研发中心，但芯片设计等关键技术却一直留在美国总部。

先发国家向后发国家转移产业哪怕是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是看中后发国家的成本与市场，而后发国家如果因为承接产业转移，在核心技术、关键部件、营销渠道等方面形成对外依赖，忽视自主创新，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所处的低端位置就有可能被固化，难以培育出动态比较优势，长期对外依赖可能影响本地的自主发展能力，拉美国家就是前车之鉴。尤其对于发展中大国来说，过于依附跨国公司的发展模式不可取。

可见，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日益深化，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加速的知识经济时代，产业承接方的资源条件特别是创新能力和水平已成了决定承接产

业类型、承接效果的重要前提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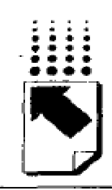
（二）产业高度化：当前国际产业转移主要特点和趋势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各国对外开放的日益加深，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知识经济方兴未艾，这一切都构成了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条件，而高度化是这一背景条件下国际产业结构转移所呈现出的新趋势和特点。表现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心开始由原材料向加工工业、由初级产品工业向高附加值工业、由传统工业向新兴工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业、服务贸易业、电子信息业、房地产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日益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领域。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对国外服务业的投资已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60%以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占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投资总额的比重也由80年代的46%提高到90年代的52%。21世纪，知识经济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际产业转移结构高度化、知识化有进一步加强的态势。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将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因而将加快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转移的速度也将比以往更加迅速。

同时，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还表现出显著多梯度性特点。与以往不同，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发达国家在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本国已经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技术双密集产品的生产，甚至开始向少数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技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个工序。看中发展中国家丰富低廉的智力资源，一些跨国公司甚至将部分研发机构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如微软、IBM等相继在我国设立研究院。

随着我国市场准入的进一步放开，我国将成为更多跨国公司投资的首选之地，国际产业向我国转移的总体趋势将呈现出重化工业为主的多样化，其特点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并行，技术含量较高的先进制造业与新一轮以IT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并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转移并行，高技术与先进技术并行，其扩散程度加大，速度加快。同时，转移的方式也将由合资、合作为主更多地向独资、并购为主转变。

国际产业转移结构的高度化和多梯度性对承接方提出了新的要素要求，即传统的劳动力、土地成本的约束弱化，而技术、知识、人才、制度等要素



则日趋强化。

（三）自主创新：珠三角应对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机遇与挑战的必然选择

1. 通过创新提高珠三角的承接和吸收消化能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已成为一个地区吸引外资的构成要件之一。以高度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有别于前两次，前两次的产业转移主要采取梯度方式，主要着眼于劳动力优势与区位优势。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转移是以跨越的方式，更注重东道国的技术、人才、研发能力等综合知识优势与信息基础设施、体制条件等，这也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仍旧是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主流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欧盟、美国的投资成本比发展中国家高出许多，但他们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完善的市场机制仍吸引着大部分的高端国际资本。

当前，创新能力的不足使珠三角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要素仍旧是劳动力和土地等，一方面使珠三角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末端位置的状态固化，不能实现通过引进产业和技术促进本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民工荒”、土地及其他资源的枯竭也使珠三角以劳动密集型为核心的粗放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只有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提高珠三角承接国际高度产业转移，才能增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最终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误区，进入“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良性循环。

2. 通过创新提高珠三角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竞争力

为分享国际产业调整利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展开了争夺国际资本的竞争。发达国家吸纳国际资本的空间和能力比较强，发展中国家间吸收外资的竞争激烈，一些周边国家的引资政策更为优惠。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3年，世界各国出台了220项有利于吸收外资的法律法规，印度、泰国、越南、韩国等周边国家和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竞相推出了吸收外资的新举措。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国际资本在我国区域分布变化明显：出现了“北上”和“西进”的趋势，国际产业在我国转移的方式更趋多元化。“十一五”时期，由于国家将继续实施东北振兴、西部开发、中部崛起战略，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支持力度，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区域格局也将有所改变：东部仍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规模最大的地区，但东北与中西部将成为承接国际

产业转移增长最快的地区。在区域的产业分布上也将由于不同地区的产业特点呈现出较明显的特色分工：东部将承接高技术产业及服务业转移；中西部将承接重要原材料与能源及制造加工工业的转移；东北老工业基地与长三角、珠三角将更多地承接配套性装备制造、电子通讯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如汽车、造船等国际产业的转移。

在产业区位选择越来越灵活的全国大开放大发展的今天，珠三角外向型优势面临严峻挑战，如果珠三角不能及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业的承接能力，珠三角不能顺利完成从“订单主导型”向“生产者主导型”转变，产业可能出现向外转移，本地陷入“产业空心化”危机。全球性制造业基地就有可能从珠三角转移到其他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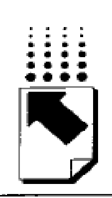
可见，珠三角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承接浪”中抢得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保持对外开放的优势，珠三角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三　自主创新是改善珠三角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中位次的前提条件

（一）世界加工厂：当前珠三角所处的全球产业大系统中的位置

1. 所谓的“世界制造基地”

当今，珠三角的制造业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的目标仍非常遥远。尽管珠三角已经初步成为全球性消费商品制造业基地，建立了数以万计的工厂，组成具有一定竞争力的消费品制造体系。东莞生产的电脑主板、扫描仪、显像管、微型马达等，也已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15%～40%，深圳的钟表占全球市场的四成以上。但与世界主要工业产品的制造基地相比，仍具有相当大的差距。珠三角企业及其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度和影响力微乎其微。一是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产业升级还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造基地。如在数控机床、大型成套设备、交通运输制造主要是轿车和飞机及大规模集成电路这些领域，珠三角与美国、日本、德国差距至少在15年以上。二是工业模仿能力强，但创新能力差。珠三角生产的工业品绝大多数档次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工业研发能力差，珠三角发展最快的这20年来，真正由自己企业原创，被广泛生产和使用的产品一件也没有。尽管广东顺德已成为全球家电生产基地，但彩电生产的核心技术



（显像管、大规模集成电路）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而且数字化彩电的生产技术也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冰箱、空调的更新换代技术也是如此。如深圳的钟表业，从生产量来说，深圳是"世界手表制造之都"，但从品牌来说，深圳应该不算"世界手表制造之都"。因为她没有像瑞士、日本等国家拥有在世界叫得响的品牌，只能走占据中低档市场、生产适合大众消费的钟表发展道路。

1985～2004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额从9.19亿美元扩大到100.12亿美元，同期，广东出口额也从101.40亿美元扩大到1915.58亿美元。1990年，广东所有产业的出口中外商投资完成的占24.69%；2003年，所有产业出口的60.69%来自于外国子公司。正是跨国公司根据广东成本和市场优势，选择了广东在其分工体系中承担起全球加工厂的角色，"技术在外、资本在外、市场在外，生产在内"就成为了珠三角制造业的主要特点。可见，严格说来，珠三角充其量不过是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中一个"生产车间"，"世界加工厂"是当前珠三角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200年前，当国际分工仅发生在原材料开采及加工制造之间（三次产业之间），"世界制造基地"显然比"原材料生产地"具有更强的增值能力，具有更高的分工地位。而在知识密集环节与劳动密集环节的分工体系下，在主要来自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正将更多的生产性环节分包给世界各地的合同制造商，甚至完全退出生产，让特别是集中发展中国家的合同制造商从事生产的今天，"世界制造基地"的位置显然是极为被动且极具风险的，即便是"世界工厂"也并不是最大利益的获得者。在充当制造基地的过程中，珠三角企业及其品牌并没有在世界市场上占据显要的位置，更别说是领袖的位置，这是珠三角目前被冠之以"制造基地"的美名，而却截然不同于以往历史上数个"世界制造基地"的最大差异，也是最值得担忧的。只有当珠三角本土的企业有效吸收并转化直接投资的正向效应，积累起将国内生产要素与外来生产要素融合的竞争力时，才有望使珠三角跨越自然资源禀赋所决定的静态分工位置，成功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自主性提升。

2. 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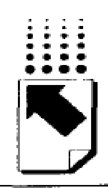
当前，珠三角参与国际分工比较优势仍然是丰富劳动力要素供给；相对而言，资本、技术、知识要素的供给不具有比较优势，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不具有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定位的国际分工位次，珠三角多数产业仍处于低端位次上。体现在，相对于货物贸易，广东服

务贸易还比较落后。由于服务产品主要是技术、知识密集使用的生产部门，珠三角不具有比较优势。在工业生产中，作为资本技术要素密集型的装备制造业不具有优势，产品也缺乏竞争力。因此，在出口产品中，成套机械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精密仪器、数控机床等产品的比重还很小。

就珠三角引以自豪的高新技术产业而言，也面临着出口量大与产业竞争力弱和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大而获利能力低的矛盾。广东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总量居全国首位，但这种以 OEM 为特征、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导而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仍然依赖进口，主要依靠吸纳 IT 产业转移，自主创新能力依然很弱的产业发展格局，严重制约了广东高新技术产业效应的提高。2002 年，广东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率为 22.4%，比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低 4.2 个百分点，与美日英约 36% ~43.0% 的水平相差更远；高新技术制造业销售利润率和利税率分别为 4.1 和 5.3 元，比全省工业还少 0.4 和 2.8 元。2005 年上半年，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率为 20.4%，比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低 4.7 个百分点；销售利润率为 2.3%，比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低 1.8 个百分点；资产利润率为 3.8%，比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低 1.4 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润率为 2.3%，比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低 1.1 个百分点。这说明广东主要是利用外资、抓住信息产业的低利润的生产制造环节向我国转移，而不断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由于广东高新技术产业的根和主动权都在外商那头，技术创新强度不高，直接制约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后劲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据全国 R&D 资源清查统计，广东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R&D 投入占其增加值比重只有 0.84%，明显低于内资企业的 1.24%。尤其在工业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R&D 投入仅占全省工业的 29.7%，比其增加值占全省工业的比重 57.2% 差近一半。

3. 处于价值链的低端

尽管近些年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不断扩大，但总的说来，珠三角目前仍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垂直分工阶段，虽然这种分工格局可以发挥接近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但却使珠三角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现代工业是一条环环相扣的价值链，包括研发、设计、制造、组装、采购、库存、营销、运输等环节。在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技术含量不同，所包含的价值也就不同。一般说来，研发、设计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较高，制造其次，而组装加工环节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最低。在加工制造业中，通过外商投资和国际化生产建立的生产基地和生产环节，多数还属于中低技术和劳动



密集型的生产，主要是搞贴牌加工生产，进行模仿、组装，处于世界制造业价值链体系的低端环节，研发、制造等产业链的中端和高端环节往往不掌握在我们手中，相当部分加工贸易产品的要素报酬较低，加上跨国公司研发和品牌经营两端的挤压，附加值很小。国际纺织品采购价值链中，中国纺织品生产商只能拿到10%的利润，90%的利润都属于品牌拥有者、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等各个环节，而这些环节大多被进口国垄断；目前，彩电生产企业的利润率已不到5%，消费电子类企业利润只有3%；鞋类中的85%都是中低产品，法国每双皮鞋的平均出口价格在35美元左右，而广东的出口均价则仅为5.5美元。据欧盟材料，2005年1~4月，来自中国的纺织面料鞋、皮鞋、拖鞋等6种鞋类产品进口数量和金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加了581%和433%，单价则下跌了28%。2005年1~5月深圳口岸出口钟表3.73亿只，但平均每只表价格不到1美元，总价值3.19亿美元，钟表出口平均每只折合成人民币不足10元。中国加入WTO以及后配额时代的到来，给珠三角外经贸发展带来巨大历史机遇，但贸易摩擦多发期的接踵而至又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体的珠三角外贸出口面临严峻考验。广东在背上向欧美倾销的“黑锅”同时，却成就了两大赢家，一是境外原料供应商，二是国外零售商。

（二）创新与珠三角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位置的改变

决定国际分工的要素禀赋差异已经由自然资源转为科技和人力资源，上游产业控制下游产业、无形生产控制有形生产，知识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国家控制知识技术创新能力弱的国家的特点日益明显，没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富裕国家。广东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追上发达国家，归根结底体现在科技开发能力上；在参与国际分工时，广东不能忽视比较优势，但更应该注重自主创新，通过创新使产业链向两端延伸，在保持广东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提高和实现中高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国际竞争力，在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终改善广东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位次。必须看到，正是由于技术创新能力的低下，珠三角才选择了数量扩张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道路。未来十几年是珠三角经济腾飞的重要时期，在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方面，珠三角仍具有独特的空间和优势，但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基础，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为动力，以发挥人才优势为主因，在创新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并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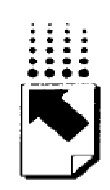
靠新的优势使广东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从纵向分工走向横向合作；通过学习、消化与创新，逐步从简单的加工组装环节上升到制造环节，从产业链条中的低附加值的加工生产边缘环节一步一步地向营销、研发甚至是品牌、先进的核心技术等核心环节逼近，努力提高广东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位次。

（三）创新与珠三角产业调整升级主动性的增强

2004年珠三角人均GDP达5745美元，按国际通行的工业化划分标准，珠三角已进入了工业高度化阶段。但珠三角主要依靠周边地区的产业转移和技术引进来实现产业升级，以引进国外技术作为提升工业竞争力的主要途径。这种“外来型工业化”模式对本地企业的技术进步与升级造成了严重冲击，自身科技研发与创新的动力和投入都不足，使珠三角的产业结构向低技术部门聚集的程度提高，导致珠三角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虽然近年来技术投入所占比重有所提高，但真正通过自身开发取得的成果很少。1999年广东高新技术产品4200个，其中拥有专利的产品只有410个（深圳未统计在内），而发明专利、外国专利仅有144个，代表技术前沿的核心技术和产品极少。很多行业和产业依赖外资企业提供技术。由于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参与世界经济循环，本土制造业对珠三角GDP增长的贡献度很低。如果珠三角的产业升级完全依赖技术进口而不是引进与自主开发、健全科技创新环境三者并重，将失去未来工业发展的自主权，将越来越向加工、装备方向发展。随着外资企业在珠三角经济发展所占份额的不断扩大，外资企业主导珠三角产业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上述情况的延续，必然对珠三角经济的可持续性形成威胁。对长期的经济增长来说，最重要的是本土技术进步的速度。

三　构筑平台，抢抓机遇，加快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虽然“自主创新”成为当前最受关注的热词之一，但人们仍旧将其局限于科技创新来谈论。笔者认为，自主创新是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目的，以技术——产业创新为中心，包括思想理论创新、制度政策创新、产业组织创新、精神文化创新、方式方法创新、思维观念创新、开放体系创新等



的系统工程。自主创新贵在自主，重在创新。创新的主体包括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创新的内涵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发展模式的创新。为此，我们在强调政府和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的同时，必须同时强化科技、教育、人才、市场、制度、文化对自主创新的基础性作用。

1. 营造良好的自主创新环境

完善制度建设，强化政府的导向意识与服务意识。结合政府机构改革，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和完善现有科技管理体制，明确职能部门的职责，指导企业技术进步工作；完善自主知识产权保护的新体系、新框架和新机制；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必须彻底转变“见物不见人”的观念，切实做到以人为本，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和稳定人才，让人才的创造性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作为科技工作的主线和创新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进一步完善科技投融资体系，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以企业投入为主体、以金融机构与社会投入为支撑的科技投融资体系。建立科技资源共享机制，健全技术研究和开发体系，增强原创力。

2. 培育创新主体

企业是承接产业转移的主体，企业的技术基础和技术吸收和创新能力，对于吸纳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和层次具有决定性作用。珠三角一方面要大力培育本地企业的成长，另一方面促使本地企业以外商转让技术为契机，通过模仿创新、人才流动、科研合作、生产技术分包等渠道，不断提升企业的学习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出口”的良性循环，实现技术发展跨越；实现从以加工为主向自主研发、拥有自己核心技术、打造自有品牌转变，提升产业竞争力。

3. 依据区域发展水平，选择合理的自主创新的实现形式

就技术层面的创新而言，自主创新的方式主要包含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创新。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三类创新方式在国家发展进步的各阶段是同时共存的，但三类创新方式的组合与重点却与一国的经济实力、物质基础、体制机制、社会文化、民族精神等等因素的状况以及国际环境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创新方式的重点呈现逐步演进的趋势。就珠三角而言，2004年珠三角的人均GDP达5745美元，应采取集成创新和消化创新并重的创新方式。应充分利用业已形成的对外开放优势和资金、市场优势，利用产业配套能力和产业聚集效应，注重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并担负起向内陆省区传递的功能。

4. 搭建平台，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置于全球产业大循环中

全球最大500家跨国公司已有近400家在华投资两千多个项目，世界上最主要的电脑、电子产品、电信设备、制药厂和发电设备制造厂家都在把他们的生产网络扩大到中国。这确实是世界制造业转移和调整的历史机遇，抢抓发展先机，以科教兴粤的重大产业攻关项目为抓手，实施科教兴粤大开放战略，积极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构建原始创新与二次创新的科技服务平台，提高珠三角承接世界先进制造业转移的能力与水平。当前应抓紧建设三个平台：一是建立与先进制造业技术引进相对接的全球资源配置平台，及时预测新的高端产业转移发展的趋势，把握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机遇，具有高成长性和较大市场空间又缺乏技术优势的产业，要更大胆地实施“请进来”的发展战略，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实现制造业的跨越式成长。二是建立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相对接的全球资源配置平台。大量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主要来自于对原创模仿基础上的集成、再创造和二次创新，提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能力是珠三角获得未来优势的关键。珠三角要在未来有所作为，就必须注重二次创新，注重引进技术的多次创新，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技术创新高地，实现先进制造业的集聚发展。三是建立与科技成果转化、辐射相连接的全球资源配置平台。科技成果转化是提高地区核心竞争力，集聚并形成珠三角科技创新高地的重要环节。珠三角要力争通过科教兴粤战略的实施，以资源全球化配置平台为载体，占据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转移分工格局中的优势地位。

参考资料

杨正位：《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的对策》，《经济日报》2005年2月4日。

刘崇献：《从珠江三角洲“民工荒”看产业转移问题》，《人民日报》华南版，2005年1月26日。

史眉：《国际产业结构变动基本趋势与经验》，《浙江经济》，2005年1月12日。

宋群：《东北和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步伐将加快》，中宏网2005年7月24日。

熊晓云：《政府在自主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科技管理研究》2005年25卷04期。

郭昌欣：《新形势下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若干思考》，《科技日报》2005年6月8日。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大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和发展格局的战略调整与新格局

○ 陈广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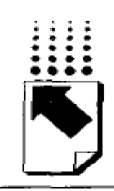
珠江三角洲凭借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制度创新优势和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初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制造业基地。在中国沿海三大经济圈中，珠三角在经济实力、经济市场化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面均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面临新时期中国区域经济整合加快和区域发展格局不断重组的新形势，珠三角经济区域发展格局、产业结构和发展战略正在迅速地进行调整。

一　珠三角和香港、澳门的经贸关系——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构建

近二十年来，香港和澳门的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到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建立生产基地，从而形成了粤港之间“前店后厂”的跨境一体化生产贸易体系，开启了粤港澳区域经济合作过程。据广东省有关部门统计，从1979～2003年5月在广东投资的港资企业有74067家，合同投资总额1394.36亿美元，实际投资总额888.05亿美元，分别占广东全省外商企业和投资的75.25%、67.61%、68.34%。大量的香港企业将生产过程转移到珠三角，不仅快速的推动了该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成就了珠三角世界性制造业基地的形成；同时也保持香港经济的持续增长，加

快了香港产业结构的转型，使香港成为了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从香港和内地、香港和珠三角的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内地市场开放程度和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是决定这种经贸关系的两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内地市场的局部开放和广东经济起飞与工业化初期粤港两地的比较优势的特点，产生了粤港之间在制造业领域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随着中国内地市场的全面开放和地区之间比较优势的变化，“前店后厂”制造业的分工体系将会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新的变化。内地与香港和澳门分别签署了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这标志着港澳与内地的经贸合作关系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奠定了新世纪粤港澳合作的新框架。从合作形式看，“前店后厂”将会向“统一市场”转变。CEPA 包括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三方面的主要内容，其目的在于减少和消除香港与内地商品与生产要素的流动的障碍。在 CEPA 的合作框架下，粤港澳之间经济的整合过程将会加快，推动两地商品和生产的自由流动，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的效益。因此，“前店后厂”模式将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在区域内将会逐渐建立起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从合作内容看，制造业领域的合作将会向服务业转变。港资企业在珠三角形成规模的制造业有服装、钟表、珠宝、金银首饰、电脑整机、手机、数码相机、化妆品和包装装潢印刷等行业。这些产业仍然是两地合作的重要领域。做大、做强这些产业需要建立技术创新体系、打造国际品牌和提升产品的附加值，鼓励部分产业向粤北和东西两翼转移。服务业将是新一轮产业合作的重点，包括了金融业、物流业、咨询业和会展业、建筑和房地产行业、商业零售业、旅游业、法律和会计等行业。从合作机制看，“自发合作”将向“自觉合作转变”。政府在新一轮合作中将会扮演重要角色。

在粤港澳新一轮经济合作与分工过程中，广东和珠江三角洲将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基地，香港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以现代物流业和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中心，澳门发展成为世界具有吸引力的博彩、旅游中心和区域性商贸服务平台，努力将包括粤港澳在内的大珠江三角洲建设成为世界上最繁荣、最具经济活力的经济中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粤港澳之间还必须加强大型基础设施的对接和协调。香港与深圳的西部通道、广深港高速铁路、广州至珠海并连接澳门的城际快速轨道交通、港珠澳跨海大桥等项目，都需要积极的推进。



二　珠三角与内地的经济关系
——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发展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上世纪中期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倒U型变化的理论，并用“累积循环因果关系”的学说加以解释。他认为某一地区的优先发展会对周边地区产生两种效应，即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这种效应是通过投资、贸易和人口等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动实现的。回波效应是一种负效应，它反映了优先发展的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对周边地区资本、劳动力和商品的吸纳作用，它会抑制周边地区的发展，使区域之间的差别扩大。扩散效应是一种正效应，它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优先发展的地区将会通过投资、贸易和技术与产业转移等方式，向相对欠发达地区扩散经济发展的利益，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回波效应会大于扩散效应，因此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别会扩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扩散效应就会大于回波效应，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别就会逐渐缩小。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扩散时期。近几年来，沿海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珠三角也内在地产生一种向周边和内地加强经济合作和扩大市场的要求。从历史、文化和自然的条件看，与长江三角洲相比，珠三角经济与内地的融合度存在差别。这是中国加入WTO后，一部分致力于中国国内市场发展的外商将投资转向长三角地区的重要原因。因此，珠江三角洲经济腹地的拓展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包括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四川9省以及香港、澳门，即所谓“9+2”。2003年8月8日，内地九省区计委主任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探讨建立政府联席会议制度，提出在交通、能源和科技等方面开展经济合作；9月，广东科技厅提出与其他8省区共建“泛珠三角”创新体系；10月11日，9省区决定共建“泛珠三角经济圈信息产业及信息化交流网”；11月11日，9省科技厅长和港澳的科技主管官员在广州草签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协议。交通、能源、旅游、科技、信息产业与信息化等将会成为合作的重点领域。为了使泛珠江三角洲的合作能够成为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平台，需要有中央政府的积极支持，应该将其列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

三　珠江东岸与西岸的关系
——珠三角区内的协调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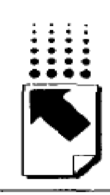
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制造业基地。它不仅具有强大的生产加工能力，而且形成了扎根本土、生产的分工与协作紧密的产业集群和与国际市场接轨的产品销售网络。珠江三角洲初步形成了三大具有一定特色的产业分工体系：

第一，珠江东岸的东莞、深圳、惠州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主，是全国最大的电子通信制造业基地，被称为“广东电子信息产业走廊”。深圳市在信息产业、软件产业和电子通讯设备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科技开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第二，珠江西岸的珠海、中山、顺德、江门则形成了以家庭耐用与非耐用消费品、五金制品为主的产业带。顺德、中山、珠海和江门的一批企业形成了很强的家用电器生产能力，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电制造业基地，并形成了一批知名品牌。

第三，中部的广州、佛山城区和南海、肇庆是电气机械、钢铁、造船、纺织、建材产业带。近几年来广州市在汽车、软件和石化产业方面发展也十分迅速。

如果以产品的市场取向来划分，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可分为两种类型：国际市场导向的产业成长模式和国内市场导向的产业成长模式，前者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东岸，后者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中部和西岸。国际市场导向的产业大多是两头在外的“三来一补”的企业。这些企业利用国内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在一种开放的经济中，通过引进国际直接投资，参与全球产业的分工体系，建立起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基地。这一模式表明：后发性国家不需要通过贸易保护的进口替代政策，在一种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贯彻比较优势的原则，实行国内工业化。这种产业成长和工业化模式对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市场主导的产业主要是利用进口替代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开始，通过进口国外的设备和原材料发展起具有自己品牌的进口替代产品，推向国内市场。然后，逐步提高产品的国产化的比例，延伸产品在本土产业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并逐步的走向国际市场，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产业成长的角度看，政策的差异、工业化的初始条件、区位优势



和规模经济大致可以解释珠江三角洲东西两岸两种不同产业成长和工业化模式形成的原因。

珠三角东岸和西岸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不平衡。从表1中可以看到珠三角东岸的惠州、东莞和深圳的GDP总量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中所占的比重由1988年的22.6%上升到36.7%，而西岸的江门、中山和珠海的GDP所占的比重则由19.7%下降到15.7%。在工业和第三产业总产值、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上也表现出上述特征。珠三角东岸一些城市例如深圳和东莞的土地已经十分稀缺，依靠土地和劳动力投入增加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因此，加快珠三角西岸的发展应该成为新一轮珠三角经济发展格局调整的重要趋势。珠三角西岸的这些城市在生态环境、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具备了较快发展的潜力，通过加快发展逐渐缩小东西两岸的差距。

表1　珠三角东、西岸城市经济比较

城市/地区	境内生产值（GDP）		工业总产值（亿元人民币）		第三产业总产值（亿元人民币）		实际利用外商投资（亿美元）		进出口总金额（亿美元）	
	1988	2002	1988	2002	1988	2002	1988	2002	1995	2002
东岸：										
惠州	32.3	525.2	17.5	1216.3	10.8	148.99	0.52	13.26	43.72	112.26
东莞	47.0	672.89	41.6	1601.67	11.7	278.84	0.67	21.48	153.91	442.41
深圳	73.8	2256.82	119.5	3934.62	34.3	1003.08	4.44	49.02	387.76	872.16
三市合计占珠三角（%）	22.6	36.7	22.6	39.6	24.8	33.5	41.14	55.8	62.12	67.3
西岸：										
江门	73.5	660.83	87.3	1425.96	21.3	270.94	1.03	7.41	32.32	47.76
中山	34.8	415.67	46.2	1158.08	10.0	143.19	0.28	7.65	36.23	93.41
珠海	25.3	406.27	25.4	789.39	10.3	165.98	2.18	9.37	49.05	128.34
三地合计占珠三角（%）	19.7	15.7	20.1	19.8	18.2	13.6	25.5	16.3	12.47	12.7

资料来源：历年《广东统计年鉴》。

四　制造业“缺钙”和产业结构“软化”——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向

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重化工业和装备工业大多布局在内地，珠江三角洲

的工业化是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开始的。人们将珠三角制造业的这种轻型化状况称之为“缺钙”。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表明，当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将会逐渐让位于资本密集的资本品工业发展。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通过对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演变的实证分析，提出了工业化发展三阶段的理论。根据霍夫曼的理论，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大致处于工业化的第二阶段，即消费品工业虽然仍占主导地位，但资本品工业的增长超过消费品工业，并逐渐开始出现取代消费品工业主导地位的趋势。当前，珠三角制造业的升级表现出三种趋势：第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价值增值。通过创造品牌、技术创新和管理体制创新，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第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它包括石化工业、汽车工业、造船业、钢铁工业、通讯设备等。广州市在珠三角资本品工业的发展中，将会扮演重要角色。第三，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转型，即电子信息技术、电脑软件、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科技行业的发展。

配第－克拉克定律揭示了随着经济的增长，第一、二、三次产业依次变动的规律和产业结构软化的趋势。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产业结构软化的表现和结果。虽然珠三角的目标是建成世界性的制造业基地，但是在一些中心城市例如广州、深圳等，也需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引进香港的服务业的资本、人才和管理，促进珠三角服务业的发展。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能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

五　内生与外生经济发展因素的关系
——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的运用

珠三角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它成功的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完成了经济的起飞和初步的工业化过程。但是，与国内某些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内生性经济发展因素还需要进一步调动。这些内生的经济发展因素包括：本土和民营经济发展、自有品牌的打造、加工贸易的本土化发展、国内市场的拓展等。珠三角经济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民间和社会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发展的能量。如何将社会和民间的储蓄转化为有效的投资，是一个需要我们时刻关注，逐步解决的问题。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和制度条件，是珠三角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课题。加工贸易的本土化也是发展内生



经济增长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产业配套能力的不断增强和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广东和珠江三角洲的加工贸易的本土化和升级趋势日益明显。第一，外商投资规模扩大，由一般的加工生产向研发基地转变；第二，由初加工向深加工转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产业链在本土延伸；第三，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产品的技术含量逐渐提高；第四，由中小企业逐步向大型跨国公司转变。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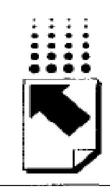
“十一五”时期“深港一体化”与港澳珠三角“共同市场”

○ 刘品安

一 “深港一体化”与港澳珠三角“共同市场”的若干理论思考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阶段，其具体关系表现为：在空间上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局部实践，在时间上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阶段性探索。区域经济一体化使世界经济格局为之一变，区域集团化、不同规模尺度、目标层次的经济圈构成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主要特点，并使得对世界新秩序的探索出现了转机。20 世纪 50 年代，是区域一体化的初创时期；60～80 年代中期，是一体化的蓬勃发展时期；80 年代中至今，是一体化的内涵深化时期。就经济一体化的实质而言，体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发展规律，生产力的国际化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国际化，而生产关系的国际化则要求各经济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国际化。

但就经济一体化的具体发展阶段和组建形式而言，又具有不同的层次、功能和特征。单一商品一体化是一种初级形式，只是通过控制投资、分配原料、协调价格、调节生产和销售；自由贸易区则取消相互间工业品贸易限额，并分阶段减免工业品关税；关税同盟要求各成员国之间实行商品的免税流通，而对任何第三国又实行统一的关税税率；共同市场是较之关税同盟更高一级的一体化国家集团，商品、资本、劳力、服务均实行自由流通；经济同盟则不但实行商品、资本、劳力、服务的自由流通，各国还必须在货币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等主要经济政策方面协调一致；完全的经济一体化或政治



一体化则是最高的终极形式，并具有超国家的性质。以欧盟为例，如果说发行欧元前的欧盟属于共同市场层次，那么发行欧元后的欧盟则属于经济同盟层次。至于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完全的经济一体化或政治一体化目前在世界上还没有出现。

共同市场的概念或许是1956年在斯巴克的报告中提出的，但总的来讲，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共同市场一词已被广泛使用。相比来说，共同市场不仅通过关税同盟而形成的贸易自由化实现了产品市场的一体化，还通过排除集团内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实现了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可见共同市场的特征就是要使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同时实现一体化，即实现商品、资本、劳力和服务的4大流通。

而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刚刚打开国门从事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世界经济一体化已经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对于一体化进程，我们与世界拉开的差距太大，这是因为当世界进入一体化的内涵深化时期，我们却还在一体化的初创阶段思索徘徊。

经济一体化是一个过程，即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成一个相互依存、共同运行的整体，是各国在政治意义上的主权和地理意义上的疆界不变的情况下，作为经济意义上的国家界线的淡化。如果说经济一体化是在过去的100年中，人类对世界经济整体的一个伟大创造，那么现代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行动就更加深化。近年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正在全球范围内加快，这种紧锣密鼓的一体化进程，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并有利于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

如欧盟正在实现最大的一次扩张计划。在2002年12月13日的哥本哈根欧盟首脑会议上，欧盟15国完成了与波兰、匈牙利等10个中东欧候选国的入盟谈判，它们从2004年5月1日起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这意味着欧盟的边界从15国扩大到25国，人口将相应增加8千万左右，达到4.5亿，其GDP将占世界的1/3强，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

又据委内瑞拉《宇宙报》2003年11月21日报道，美洲自由贸易区（ALCA）第八次部长级会议于2003年11月21日在迈阿密结束。与会34个美洲国家（古巴除外）签署了此次会议的最终宣言。根据最终宣言，美洲自由贸易谈判将涉及农业、服务、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竞争政策、补贴、反倾销和补偿关税等领域，并将分别成立相应的谈判委员会。宣言指出，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最后期限为2005年1月1日。

另外，东盟从1993年1月1日起到2008年的15年内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其目标是提高东盟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优势，从而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提高产量以获得规模经济。同时，引进外资，刺激支柱产业发展并扩大内部贸易。2000年，东盟10国关税的平均税率已经降到4.43%，2001年降到3.96%，而新加坡则已经实现了零关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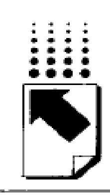
综观世界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应当和东南亚一并通过一体化建设形成世界新的增长极，且机不可失。而实现“深港一体化”、建立港澳珠三角“共同市场”，并同时带动泛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正是中国顺应历史潮流、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

二　港澳珠三角“共同市场”的战略作用

有专家指出，在当代国际战略格局中，北美、欧洲、东亚战略3大角的框架和均衡态势已露端倪……在美、欧、亚战略3大角关系中，东亚这一力量还不明确，还不稳定，还不强有力，这是显而易见的……这将必然影响到21世纪世界多级化格局的主体和基础的构造和稳固。

正是基于这样的格局和考虑，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10国的领导人达成协议，双方将在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这是因为从1995～2002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以年均19.1%的幅度快速增长。2002年中国与东南亚贸易额比上年增长了32%，其中，中国向东南亚出口值增长28%，中国从东南亚进口值增长34%，并且东盟已经连续10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其双边贸易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东盟10国是中国未来对外经济贸易合作与发展的亮点，也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外部力量。

2003年10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了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中国本着“睦邻、安邻、富邻”的既定方针，双方签署《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结为战略伙伴。随着2010年东盟和中国联合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形成，一个拥有近20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总值的世界人口最多的市场和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将出现在世界东方。根据麦肯锡的一项研究，一旦东盟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整个区域的GDP将增加10%，商业运作成本将减少20%，这意味着东盟整体GDP将会每年增加500亿美元。



由于中国必须通过构建世界多级化格局的努力，来赢得未来和平与发展的建设环境，建设港澳与珠三角“共同市场”将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的基础和前提，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框架能够早日形成。从2004年1月1日起，开始落实为期3年的“早期收获”计划，中国将对一系列农产品和制成品提早减税作出让步，此外，中国和东盟已选定11个经济领域率先加速进行市场整合，统一各国条例、程序和检查标准。包括橡胶产品、木业产品、汽车业、纺织产品、农业产品、电子商务、渔业、保健产品、航空业、电子产品以及旅游业等。中方还建议从2004年起每年在广西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努力在2005年实现年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的目标。

与此同时，“10+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未来构想已经提上议事日程。2003年10月中日韩3国领导人签署《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3国倡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标志着3国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东亚这一力量做得更明确、更稳定、更强有力，从而为中国参与世界多级化格局的建立和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作出贡献。港澳与珠三角“共同市场”未来的战略作用正在于此。

三　港澳珠三角“共同市场”的战略前景

对于港澳珠三角“共同市场”的未来前景，我们似乎可以得到相对清晰一些的结论。

1. 龙头城市已经确立

香港将作为未来港澳与珠三角“共同市场”的中心和龙头城市，这是由香港这座国际化城市的经济总量、对内带动辐射和对外经济交往对接的能量、作用和功能所决定的。

2. 经济特区先行先试

深圳从事国际化城市建设的最佳途径就是实现“共同市场”层次的“深港一体化”，而“深港一体化”恰恰成为港澳与珠三角“共同市场”建设的先行者和一部分，时代又再一次赋予了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在新的条件下先行、先试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3. 枢纽城市基本形成

深港一体化将使香港对内地的辐射和带动半径成倍地增长，特别是对广

大泛珠三角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同时，亦使深圳成为 CEPA 连接内地的枢纽城市、副中心、功能区和桥头堡。深圳无论是作为经济特区、区域性中心城市，还是作为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或是其他级别的城市，这种城市功能和格局都不会改变。

4. 珠三角内部重新整合

港澳和珠三角共同市场内部，广州是广东的省会和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广佛都市圈的重化工业、文化教育与行政中心的重要地位依然；深港都市圈的金融、物流和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从事更高层次的合作已成气候；珠澳都市圈则以创业环境和澳门与欧洲的传统关系见长；三大都市圈功能的相错和非同构将十分有利于港澳和珠三角共同市场的内部整合和优势互补。

5. 全国的经济格局发生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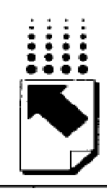
港澳和珠三角共同市场的建立，将使大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总量大大超过长江三角洲而成为我国 3 大城市群之首，同时，也是我国三大城市群中外向型水平程度最高、经济总量最大的经济增长极。

6. 对内将拉动经济强劲增长

由于港澳与珠三角共同市场的建立，更有力量带动“9 + 2”模式的泛珠三角，并使泛珠三角成为中国市场覆盖面最大的内部市场。根据有关统计，广东与周边 8 省，人口达 4.5 亿，占全国的 34.76%，2002 年 GDP 共达 34474.2 亿元，占全国的 33.67%，再加上港澳的 1 万多亿，GDP 可以达到 5 万亿元。对内，共同市场有利于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7. 对外将与国际市场进一步衔接

港澳与珠三角共同市场的建立，既有龙头城市香港的带动，又有深圳作为连接内地的枢纽，还有云南、广西与东南亚接壤，更有福建、江西、四川等经济地理、自然生态各有特色的地区作为腹地，使得不同区域经济资源和要素得到重新的配置和整合，有利于共同市场内部各个方面的共赢。由于创造了新的区域经济总量、市场覆盖面、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加工制造基地的扩大，对外有利于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和区域总部、研发中心和采购中心的对华投资，从而一举改变南中国原有的经济格局，并有利于中国加速接轨东南亚，从而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四 “深港一体化”与港澳珠三角“共同市场”的若干实践思考

1. “深港一体化”是港澳珠三角“共同市场”的光行者和重要组成部分

在港澳与珠三角建立“共同市场”，就是要实现商品、资本、劳力和服务的大流通。我们认为港澳与珠三角建立“共同市场”已是势在必行。而以“共同市场”为目标层次的“深港一体化”，则必然作为港澳珠三角“共同市场”的先行者和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因为：

第一，深圳与香港之间有着特殊的地缘经济关系，深港之间有优势实现“深港一体化”。如 2004 年 1 月香港地铁公司采取 BOT 方式投资 60 亿元人民币，建设深圳市轨道交通 4 号线二期和承接 4 号线全线 30 年营运，建成通车后，4 号线可与香港九广铁路落马洲支线实现接驳，成为一条真正意义的深港跨境线路。跨境地铁的建设将使深港获得双赢，必定会给深港双方包括交通、商贸、社会服务等行业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对香港服务业拓展内地市场带来新的契机，如同皇岗口岸 24 小时通关、深港西部通道建设对推进深港一体化一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也为香港与珠三角城际快线的接驳、为香港融入珠三角 1 小时经济圈开了好头。深港之间的地缘优势是其他任何城市也替代不了的，说明深圳、香港之间有优势实现“深港一体化”，并作为港澳珠三角“共同市场”的先行者。

第二，深圳与香港之间特别频繁的经济贸易往来，使深港有可能率先实现“深港一体化”。深港合作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经由“三来一补”为主体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并逐步转到金融、物流、旅游、服务贸易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多方位的合作上来。香港对祖国大陆的直接投资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多年来在大陆的外商投资总额中始终占 40%～50% 的比重，在深圳更高达 65%，可见深港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不仅十分紧密、往来十分频繁，而且合作层次越来越高，在广东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经贸合作的频繁必然提出在体制上衔接的一体化需求，说明深圳、香港有可能率先实现“深港一体化”，并成为港澳珠三角“共同市场”的先行者。

第三，深圳经济的不断发展令港人和全国人民瞩目，深圳有能力融入“深港一体化”。2003 年在深港、粤港合作关系的历史上是不平凡的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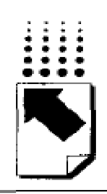
因为具有“共同市场”特征的四大流通正在港澳和珠三角地区获得逐步的推行和实践，在封闭时代深港、粤港之间商品、资本、劳力、服务等根深蒂固的四大管制正在松动，生产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双向流通和推进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将在不远的未来成为现实。

（1）商品的自由流通已经开始。CEPA 签署之后，2005 年 1 月 1 日始，对原产香港进口金额较大的 273 个税目的产品实行零关税；到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对 273 种以外的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约 4000 多种实行零关税。这样就使得香港成为第一个得益于中国内地市场的单独关税区经济体，香港为此每年将节省关税大约 40 亿港元，而深圳、广州和珠三角则成为香港商品进入内地的最大集散地。

（2）资本的自由流通正在加速。CEPA 签署之后投资贸易便利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安排，金融管制虽然是传统计划经济国家最重要的调控职能，但在 CEPA 签署以后，金融管制正在放松。有专家估计，从 1997 年香港回归后人民币在民间的流量高达 700 亿元左右，因此，2003 年 11 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管局在北京签署《人民币合作备忘录》，并经国务院批准，2004 年 1 月 1 日起，香港银行获得办理人民币存款、兑换、银行卡和汇款 4 项人民币业务，有利于香港成为人民币的离岸结算中心，从此人民币在港将畅通无阻。中央在香港试行对人民币管制的放松，对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酝酿更进一步的金融开放均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加上 CEPA 签署之后，香港银行进入内地的规模要求已经由 200 亿美金降低到 80 亿美元、继而降低到 60 亿美金，目前已经有 8 家香港银行向内地银监局提出了申请，其中若干家如香港大新银行、永隆银行、上海商业银行、中信嘉华银行将落户深圳罗湖，使深圳成为 CEPA 后第一个有外资银行进驻的城市。

（3）劳力的自由流通将以人员的自由流动作为前提。现在不仅港人居深成为潮流，香港引进内地专才已开端倪，而且根据有关规定，广东佛山、东莞、中山、江门 4 市于 2003 年 7 月 28 日正式开办居民个人赴港澳旅游，至 8 月 20 日，广州、深圳和珠海市开始办理个人赴港澳旅游，至 2004 年 7 月开始整个广东将放开居民个人赴港澳旅游，这些不仅在深港两地民众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响，而且人员进出的松动，将为劳力（包括脑力和体力）作为生产要素的流动作出有效铺垫。

（4）服务的自由流通已拉开序幕。香港的服务贸易将通过 CEPA 大举进入内地，根据 CEPA 的安排，包括管理咨询、会展、广告、会计、建筑及房



地产、医疗牙医、分销、物流、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运输、旅游、视听服务、法律、银行、证券、保险等，再加上《附件》中同意对港开放电讯服务共18个行业，将先于世界贸易组织许可的开放时间表进入内地市场，而深圳和珠三角就成为与香港服务贸易合作的枢纽和桥头堡。

2. “深港一体化”的几点实践探索

深港一体化，重要的是深圳怎样跟香港融合，深圳跟香港融合本身就是国际化了，深圳不是自己去争独立于香港的国际化城市。在深圳和香港的都市圈中，深圳基本上是IT、金融、物流、服务产业，这些都是深港都市圈支柱产业的内容。

在新时期香港要发挥新的作用，而在香港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深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由于地缘优势，只有深圳能够配合香港、服务香港或者是配套香港，使深港都市圈发挥作用。将来不但是在华南地区，在整个中国，甚至在整个世界上都有它的特殊作用。深圳有资源优势、低成本优势、技术力量优势、人才优势；香港则有自由港优势、国际营销网络优势、国际高端服务贸易优势等等，从地缘上来讲，深港两地优势的结合是最合适的、最好的。

（1）深港合作“一制两体”。深港合作的真正精华所在是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核心是金融，金融最要害的是资本市场和货币，而资本市场最要害的就是规则。我们的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标准、中介服务标准、交易所管理制度、证监会监管制度都是“中国特色”，其主要原则和国际上认可的资本市场原则，不仅是微观上的差异，而且在中介服务、交易所管理、宏观监管上都有重大差异。现代服务业的背后，是市场经济和法律制度的高度衔接，越大、越网络化的服务业，对法律的要求就越高，所以率先在市场经济和法律制度上实现深港衔接意义重大。

1997年的金融风暴，对香港、广东乃至于深圳的波及比较厉害。但是香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就敢出手把索罗斯抵制住了，说明他还是很有力量的，其实深港联合起来，抗风险能力就会更强。对于深港合作，“一制两体”的概念，就是一个市场法律制度下的两个独立的行政主体、两个区域的经济主体的高度互补合作。

很多事情，深圳自己做会很难，还是要和香港合作一起做。香港是全球的金融中心，香港最有竞争力的产业是金融业，只有支持香港最有竞争力的产业，才是支持到根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深圳金融服务业是第一位的。

香港金融业非常发达，但是成本比较高，金融服务业的后台业务完全可以进入国内、进入深圳来做。现在的深圳港口其实是一种“前店后厂”的运作模式，和记黄埔在前面拉单子，深圳在后面倒箱子，金融业也应该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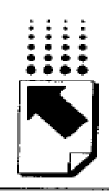
（2）“深港一体化”更迫切也更有操作性。“深港一体化”对香港、对深圳都是很重要的。这两个城市2004年的GDP总和达到1900多亿美元，外贸进出口6000亿美元，港口吞吐量达到3亿吨，集装箱达到3200万个，这么大的经济规模，这么紧密相连的两个城市，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

随着深港的经济发展变化，香港作为中国内地过去的窗口、桥梁的这种中介作用现在已经明显降低。香港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它的产业链条已经不完整了。现在香港强调第三次产业结构的转型，到底方向怎么走，怎么转，目前也还不明确。近期香港经济好转的主要原因是外部因素特别是内地因素的刺激，现在谈走出困境还太早，它的结构性失业和财政结构性赤字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深圳提出要转变发展模式，要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和谐深圳转变，客观上也是因为遇到了资源、环境、人口、能源等等瓶颈，遇到了不解决发展模式就难以为继的问题。因此，现在“深港一体化”，应该比10多年前更具有迫切性，提出的措施也会更有可操作性。

（3）深港合作“互补”要拉开层次。在深港合作上，深圳本身还需要有更高的战略和考虑。以资本市场为例，香港资本市场有制度优势，但是没有规模优势，香港证监会比美国稍微有差距，但是比国内强很多，特别是它的立法制度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而从资本市场设计的出发点来说，两地千万不能在同一层次上做事，因为两地都发展同一层次的业务就是相互争夺客户资源，首先自己就把自己打败了。在资本市场合作方面，关键的问题是把层次拉开。如果香港是二板市场，深圳就应该搞一个三板市场，这样才有竞争力，才有价值。

我们认为，资本市场之间不是简单的互补，层次相同或接近不仅谈不上互补，反而可能导致互相的恶性竞争。沪深港资本市场是竞争、合作与互补的关系。竞争是服务质量、法律、制度方面的竞争；合作是在监管方面的合作；互补是在功能上互补。在功能互补上，如果形象的比喻一下，国内的应该是“幼儿园”，香港应该为“中学”，国际资本市场则是“大学生”、“研究生”。

（4）跨境合作“特区中的特区”。有专家呼吁启动深港跨境合作。跨境合作可以把CEPA真正用起来，因为CEPA最大的好处就是发展香港制造。



香港有些人认为CEPA会使香港的制造业回流，这是不可能的。CEPA有利于在深港地区搞跨境合作，甚至搞跨境产业。既利用深圳的低成本优势，又利用香港的国际环境优势，再加上CEPA的政策优势，把国外的一些大企业吸引过来，相当于实行特殊政策。这个特殊政策是CEPA给它的。在跨境这个地方，香港管制区是20多个平方公里，深圳则是盐田保税区、沙头角保税区、福田保税区甚至还可以扩大到几十平方公里，很有文章可做。

"深港一体化"从构想变为现实路还很长。实现深港一体化，不可能全面铺开，最好的试验田就是深港交界地区，不妨把步子走得更大一点，把交界地区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在里面实行一些特殊的政策，包括两地法律制度、两地的货币金融管理制度高度地协调、融合等等。通过这种模式的运作，从中总结经验，形成政策。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区域竞合互补：经济全球化下的泛珠三角—东盟合作探讨

○ 游霭琼

一　区际竞合互补：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泛珠三角—东盟经济发展的趋同与竞争

首先是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趋同与竞争。与泛珠三角相比，东盟的经济结构调整在时间上比较早，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盟四国早在80年代其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就已经下降到了25%以下。但是近几年随着东盟经济结构优化的放慢和泛珠三角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快，双方的产业结构表现出了明显的趋同性，又以第二产业尤其突出。不论是第二产业在GDP所占的比重还是制造业在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及发展趋势都趋于接近（参见表1）。由于双方经济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较为趋同，经济互补的领域较小，这也是长期以来泛珠三角与东盟的双边贸易在各自贸易总额中占比较小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外贸结构的趋同与竞争。泛珠三角与东盟国家对出口的依赖性都较大，对外贸易依存度非常之高，2000年，印尼、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四国的外贸依存度分别达到69%、127%、106%和229%；2004年，泛珠三角的外贸依存度也达到77.21%。由于泛珠三角与东盟的经济资源有较大的相似性，而且双方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均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都是世界中低档制成品的重要生产基地，电子、家电和机电类产品的出口比重也都逐渐提高（参见表2），以上这些就决定了泛珠三角和东盟在出口产品结构和出口市场结构的趋同与竞争。当前，两者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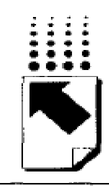


表 1　泛珠三角和东盟的三次产业在 GDP 中的构成

单位：%

	泛珠三角各省区			东　盟			
省　区	一产	二产	三产	国　别	一产	二产	三产
广　东	7.8	55.4	36.8	新加坡	0.1	35.7	64.2
广　西	24.4	38.8	36.8	文　莱			
云　南	20.4	44.4	35.2	印度尼西亚	17.5	44.5	38.1
贵　州	21.0	44.9	34.1	菲律宾	14.7	32.5	52.8
四　川	21.3	41.0	37.7	马来西亚	9.0	47.4	43.6
湖　南	20.6	39.5	39.9	泰　国	9.4	42.7	48.0
江　西	20.4	45.6	34.0	越　南	23.2	38.5	38.5
福　建	19.4	45.1	35.5	老　挝*	33	23	24
海　南	36.9	23.4	39.7	柬埔寨*	37	20	42
香　港	0.07	11.16	86.27	缅　甸*	60	9	31
澳　门	0	13.1	91.2				

注：泛珠三角 9 省区的数据为 2004 年；香港、澳门数据为 2003 年；东盟国家中被 * 标记的国家数据为 2000 年，其余为 2002 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 2005 年》，《国际统计年鉴 2004 年》；世界银行，《2003 年世界发展报告》有关部门数据计算得出。

表 2　广东、东盟 5 国贸易结构构成

单位：%

	出口商品构成					进口商品构成					欧美发达国家所占比重		
	农业原材料	食品	燃料	矿物和金属	制成品	农业原材料	食品	燃料	矿物和金属	制成品	欧盟	美加	日本
印度尼西亚	11.5	24.4	5.3	54.4	5.8	11.1	21.3	3.1	58.7	13.7	15.4	19.2	
马来西亚		7.6	8.7	0.9	79.5	1.2	5.3	4.7	2.9	83.5	12.5	22.2	11.0
菲律宾	0.5	5.2	1.1	1.3	50.1	1.0	7.5	9.2	2.0	56.1	16.8	29.7	15.6
新加坡	0.4	2.3	7.7	1.1	84.8	0.4	3.6	13.1	1.6	80.1	12.5	15.6	7.1
泰　国	3.1	15.4	2.5	1.1	74.5	2.8	5.0	12.2	3.2	76.1	14.8	20.8	14.5
广　东	1.19	0.95		0.66	97.5	2.59	0.50		5.90	88.82	14.4	25.0	6.7

注：为数据收集和分析方便，以占泛珠三角 9 省区对东盟贸易量 80% 左右的广东 2004 年的数据代表泛珠三角；5 个比较重要的出口国的 2002 年数据来代表东盟。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出版社，《广东统计年鉴 2005 年》，《国际统计年鉴 2004 年》有关部门数据计算得出。

出口产品上的竞争主要表现在纺织品和服装、皮革制品、机电设备等部门，尤其是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但由于泛珠三角和东盟国家的出口市场都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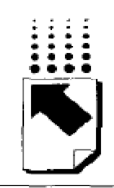
集中在美国、日本、欧盟，占80%以上，使得泛珠三角和东盟贸易关系的竞争性主要存在于同一发展层次的地区经济之间和第三方市场，而在不同发展层次的地区经济之间则具有较大的互补性，在CAFTA市场上的竞争也不很突出。也就是说，虽然在资源密集型产品及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泛珠三角以较低的劳动成本及丰富的资源与东盟展开竞争，但是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泛珠三角技术的低成本优势使其在部分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不是与东盟，而是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展开竞争。

再次是利用FDI的竞争。经济的外向性使得不论是泛珠三角抑或东盟都希望借助国际资本的力量来加快本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由于经济结构的趋同性，对同一性质的外资需求上就存在着竞争。主要体现在对日本FDI的竞争上。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2001年针对日本国内企业所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大量企业计划增加对中国的投资，虽然大部分日本企业仍会维持其在东盟的现有生产基地，但新投资的重心则向中国倾斜。与此相关，随着日本对外投资的减少，其在东亚的投资地位相对下降。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在最多的1997年度曾高达9613亿日元，而到2003年度只有2631亿日元，减少了近3/4。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为东盟各国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因为如此，其减少将可能使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放慢。

（二）泛珠三角—东盟经济的互补性与合作前景

泛珠三角—东盟虽然在产业发展、外贸发展、吸引外资上存在竞争，但双方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的多层次阶梯状态，又使双方在比较优势方面呈现出多样性和综合性，决定了双方产业关系的互补性和广泛的合作前景。

首先是经济资源结构的互补性。一是双方在自然资源方面存在互补。泛珠三角和东盟都是拥有丰富的资源，但都互有需求。泛珠三角除西南省区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外，其他省份都比较缺乏。而东盟各国自然资源都比较丰富，如林业资源、渔业资源、油气资源、矿产资源、热带经济作物等，富饶的资源对工业化快速推进的泛珠三角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且长期以来，东南亚各国在矿产资源的开发和提炼、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加工、水产捕捞和加工以及热带树木的采伐及加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许多技术专长。因此，随着经济规模的增长，泛珠三角和东盟4个新成员国将成为自然资源的一个巨大消费者，泛珠三角和东盟在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上的合作将不止局限于进口，还可能通过投资联合加工和联合开发来进行。因此可以说，泛



珠三角和东盟的资源互补将是长期的、可持续的，资源贸易以及在林业、渔业、矿业等方面的共同开发就成为双方合作颇具潜力的重要领域。二是人力资源的互补。中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而泛珠三角占我国人口的34.8%，而且与东盟相比，中国的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素质较高，价格也比较便宜，与印尼、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相比，大约是1:1.07、1:1.58、1:1.94和1:2.6，而东盟国家中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均已出现不同程度上的熟练劳动力和高级技术人员短缺问题，老东盟4国在管理技能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而这一优势又是泛珠三角所需的。可见，泛珠三角和东盟在人力资源上也存在互补性。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市场开放加快，产业结构加速调整，贸易投资障碍逐渐消除，中国服务业逐步开放，它将为泛珠三角—东盟在承包工程、劳务合作、金融、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

表3　泛珠三角和东盟人均GDP水平

单位：美元/人

	泛珠三角(2004年)	东盟(2003年)	
广　东	2382.95	新加坡	20987
广　西	870.13	文　莱	12971
云　南	814.15	印度尼西亚	973
贵　州	509.62	菲律宾	973
四　川	981.02	马来西亚	4198
湖　南	1106.43	泰　国	2291
江　西	990.21	越　南	481
福　建	2081.98	老　挝	362
海　南	1142.68	柬埔寨	310
香　港	23684	缅　甸	179
澳　门	23324.74		
珠三角	5599.03		

注：按1美元＝7.7788港元；1美元＝8.0226澳门元；1美元＝8.27人民币折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王姝村：《东盟主要经济指标（2003）》，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网2005年4月29日。

其次是经济发展阶段的互补性。按照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以2002年人均GDP作为对各国收入水平的划分标准和科技发展状况、工业化水平和贸易模式，可以将泛珠三角—东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可以分为

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新加坡、文莱和泛珠三角的大珠江三角洲（包括香港、澳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属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具有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优势；第二层次是马来西亚，属于上中等收入水平，具有中等技术及资金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第三层次为泛珠三角的广东欠发达地区、福建、海南、四川、湖南、江西、广西、云南和东盟的泰国、菲律宾、印尼，属于下中等收入层次，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第四层次是泛珠三角中的贵州和东盟北部的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属于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具有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

经济发展水平的层次性决定了泛珠三角—东盟产业结构分布也呈现阶梯型。新加坡、香港、澳门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特征明显，第三产业已居主导地位，并开始出现从传统制造业分工中撤出的迹象；泛珠三角的大珠三角有较现代的工业，已经形成竞争较强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和初步发达的第三产业；内陆 9 省区中的大部分地区和东盟 4 个老成员国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相当，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泛珠三角内陆省区如四川、湖南、广西的工业化水平虽比较低，但高于东盟 4 个新成员。而东盟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上优于泛珠三角（见表 1）。多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组合在产业结构上所体现出的全面性无疑将会更加易于形成与东盟产业之间的互补。

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为处在工业化发展关键阶段的泛珠三角—东盟进行梯级穿插合作提供了可能性，有利于形成梯度和点轴交叉发展的模式。通过形成梯度和点轴交叉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模式，能够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促进产业转移和升级。在泛珠三角－东盟区域中，大珠三角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工业化水平相对较高，而中部的滇、黔、桂，以及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低。因此，泛珠三角－东盟可以形成两头高、中间低的梯度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较发达区域可以拓展发展空间，转移夕阳产业、加速产业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中部较落后地区则可以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加快工业化进程。

再次是产品结构的互补性。在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上，东盟国家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特别是文莱、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基本上保持了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如动植物油脂、矿产品、塑料制品、木材及木材制品等产品，约占泛珠三角从东盟进口额的 50%；在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印尼、菲律宾、泰国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但泛珠三角在非熟练劳动密集

型产品上的出口的比较优势强于东盟国家。如鞋类、纺织品与服装、金属制品和各式制造品等产品，约占泛珠三角对东盟出口额的五成。在技术密集型产品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拥有比较优势，泛珠三角在这块的优势弱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但高于印尼。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上，东盟国家在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均处于劣势地位。近几年，东盟向泛珠三角出口的商品主要以石油、天然气为主的矿物燃料和以木材、纸浆为主的非食品原料，泛珠三角向东盟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以交通工具、机电产品为主的一般机械产品和纺织服装产品（参见表 4）。伴随着泛珠三角与东盟双边贸易结构的变化和贸易规模的扩大，双方的竞争优势产品同样也发生变化。在竞争中，泛珠三角的优势产品已经从初级产品和资源性产品转变为各类工业制成品，而东盟仍主要在一些资源密集型产品和部分工业制成品占有优势。

表 4　泛珠三角 9 省区与东盟主要贸易商品

省区	从东盟进口的商品	向东盟出口的商品
广东	食用植物油、大米、水果、天然橡胶、纸及纸板、成品油、矿砂	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蔬菜、水果、水海产品
广西	橡胶、煤、木薯淀粉、水果、矿砂、棕榈油、原木	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中草药材、化肥、钢材、纺织品
贵州	烟胶片、天然橡胶乳	烤烟、磷灰石
云南	金属矿砂、木材、农副产品、海产品	黄磷、烤烟、有色金属、化肥、日用品
四川	水果	机电产品、纺织产品、化工产品、种子、农机
湖南	化工产品、钢铁和钢铁制品、有色金属、纺织品和服装、各类机械器具（柴油机、电机、手工具）、花炮、鞋类、烟草等；彩管、汽车和摩托车配件、打火机	棕榈油、椰子油、木浆、铌钽钡矿砂、化工原料（对苯二甲酸、无环烃）、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彩管玻壳、冷轧钢板
江西		
福建		服装、箱包、鞋类、水果、蔬菜、显示器、彩色显示管、车辆及零附件、船舶、食品、动植物加工产品
海南	液化丁烷、钢铁结构体、动植物油、无烟煤	尿素、硅锰铁、服装及衣着附件、机电产品
泛珠三角 9 省区	机电产品、成品油、塑料原料、木材、纸板等资源性产品以及植物油等农产品	机电产品、传统纺织服装、鞋产品、农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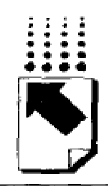
最后是产业内贸易将保持强劲发展势头。随着区域国际分工的演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区域内各经济体实力的消长，支撑区域经济高速增长达30年之久的“雁行模式”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萎靡不振而出现衰变。随着泛珠三角和东盟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产业结构逐步升级，逐步从传统的产业间贸易走向产业内贸易形式的互补性分工，区域产业内分工日益细化，产业内分工趋势明显，产业内贸易规模在不断扩大。而跨国公司在泛珠三角—东盟区域内的产业内分工投资则对泛珠三角—东盟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近年来，跨国公司在泛珠三角—东盟的投资发展迅猛，在区域内，跨国公司依据各自的投资战略展开产业内分工，将零部件生产分布到区内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专业化生产，以发挥其规模效应。

未来一段时期内，泛珠三角—东盟产业内贸易将主要在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机电产品、电子产品等产业内展开。初级产品贸易方面：东盟可以凭借物流成本优势，抓住泛珠三角经济快速发展对原材料需求的急速扩大的机遇，泛珠三角成为东盟出口工业原料和初级产品的重要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虽存在竞争的一面，即使是同类产品，双方也可以相互进口一部分在花色、品种上进行调剂，建立在产品质量和差异化基础上贸易格局将使得泛珠三角与东盟相互进口产品之间的互补性增强；泛珠三角机电产品具有优势，潜力较大，而东盟国家的基础工业相对薄弱，机电产品需求较大，每年进口400亿~500亿美元，大部分属于中、低档机电产品，发达国家的这类产品质量较好，但价格昂贵，而泛珠三角物美价廉，与欧美产品相比，具有性价比优势；电子产品：东盟的优势是工业电子产品，泛珠三角是家用电器占有优势。随着泛珠三角信息化的推进，为东盟工业电子产品提供了广泛的市场。

总体而言，泛珠三角—东盟区域合作过程中，既有竞争的一面，又有合作的一面。因此，处理这对关系的过程中，总的基调应该是放眼全球，“扬己所长，补彼所短”，更多地寻求合作，以免在类似产业或产品的过度竞争中两败俱伤。

二　泛珠三角—东盟竞合互补面临的问题和障碍

虽然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竞合互补具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具备良好的历史机遇，但也应当看到，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竞合互补过程中，还



存在许多障碍，正确认识和分析这些障碍有助于推动和引导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竞合互补的良性发展。

（一）经济发展水平接近

经济发展水平的接近和经济结构上的同构。无论是资源存量和经济结构，还是经济发展水平，泛珠三角和东盟各国的相似度都很高。就经济结构而言，在泛珠三角和东盟各国的国民经济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彼此重合度较高。从东盟与泛珠三角近年来出口商品的结构来看，农、矿、水产品、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重都比较大，而且出口市场都集中在美国。在市场需求量一定的情况下，竞争也就不可避免。从国际贸易理论来讲，经济发展的相似性会因双方需求结构的相似双方贸易量会增长，并不会给区域合作构成合作的障碍。问题在于泛珠三角和东盟这种相似是一种低水平的相似性，对双方合作发展产生制约作用。而且泛珠三角和东盟都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问题，而二者又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甚至都面临着解决劳动力剩余问题，面临着向外转移从农业及其他劳动密集型转移的剩余资源进行再配置问题，也成为泛珠三角和东盟区域合作的一个挑战。

（二）市场容量不足

市场容量是区域经贸合作的最基本条件，但是泛珠三角—东盟的市场总容量比较有限。也就是说，泛珠三角和东盟的主要贸易伙伴都是发达国家，泛珠三角能为东盟国家提供的市场空间并不大。与此同时，东盟国家能为泛珠三角提供的市场空间也很有限。阿兰·M. 鲁格曼指出，在存在经济区域集团的情况下，区内市场小必然引起成员国跨区域销售。所以，泛珠三角—东盟市场容量有限必然会削弱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建立在自主创新基础上的产业分工尚未形成

按美国一位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不论是东盟还是泛珠三角都属于“无技术工业化”（technologyless industry），靠技术引进和外源型经济来实现工业化的起飞和推进，自主创新能力弱。目前两大区域之间的分工，不论是水平分工还是垂直分工都是建立在低水平的资源比较优势上的所谓资源差异化分工，而不是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而区域合作互补深化和后劲的源泉是

技术创新基础上的产业分工。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将是制约两大区域竞合互补的重要因素。

（四）来自日、美的压力和干扰

作为一个东亚国家，日本一直视东亚特别是东南亚为其“经济后院”和“经济根据地”。长期以来，东盟国家作为能源、原材料供应者以及消费品的容纳者，在日本的雁行经济发展模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经历了近10年的经济低迷之后，正加快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将一些传统制造业向海外劳动力成本相对比较低的地区转移是这次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东盟对日本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出来了。此外，日本希望主导或至少与美国平分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也使日本对东盟国家另眼相看。当中国与东盟合作走到日本前面时，日本也迫不及待与东盟签订经贸合作协议，并希望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发展超过中国。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战略利益，它企图依托北美自由贸易区，借助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建立由其主宰的“太平洋经济体”。美国在东亚强大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其对亚太经济合作大框架下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将对泛珠三角和东盟经贸合作顺利推动产生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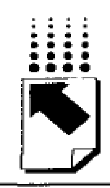
（五）政治领域的摩擦与纠纷

近年来，我国与东盟关系日趋改善，但由于种种原因，也出现一些杂音和不适。总的说来，在中国—东盟整体合作的进展上，存在经济贸易合作超前、政治安全合作滞后的问题。此外，对南中国海资源主权及合作开发的争议也都影响着泛珠三角和东盟大区域合作。

（六）泛珠三角区域内部整合不足，竞争有余

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制度缺失，缺乏有权威的上级协调机构，国家控制力在区域经济层面上出现调控“真空”，省份经济空间格局一直难以突破，甚至出现“板结化”倾向。在现行行政区划格局中的泛珠三角，虽处同一区域，但由于存在多元利益主体，区域内经济合作与冲突交替进行，但冲突已成为了主流。主要表现为区域间低水平的竞争、区域要素争夺、区域市场封锁等。

受行政体制的约束，我国外向型经济呈行政区各自为政发展状态，强调“竞争有余”，倡导“合作不足”。自中国、东盟宣布建立自由竞争区以来，



全国各地包括泛珠三角各省区掀起了对接东盟的热潮，都在强化对东盟市场的研究，强调自由竞争区建设带来的机遇。但由于观念陈旧，目光狭隘，对东盟的政策和制度都带有显著的行政区域利益特征。各方都将目光局限于本地经济的发展，只重视本地经济与东盟的对接，而且同时还强调来自相邻省区的竞争，很少谈及共同协作，走向东盟。省区之间存在大量的争资金、争项目、争人才、争外商等恶性竞争。制定的规划大多是以我为主，不是从区域整体出发。西南一些省区对中国—东盟桥头堡的争夺正酣，有的强调自己拥有“西南出海大通道”，有的强调拥有“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区域各方政府只看到互相竞争的一面，导致区域内各方政策制定上的不协调，严重影响区域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的发挥，削弱整个区域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力。

三　建立泛珠三角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战略思考

（一）建立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互动发展的机制

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的合作和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宣传和推动，更需要企业的参与，形成政府与企业互动、国内与国际联动的局面，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重视政府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在推动泛珠三角—东盟政治、经济和技术合作中，政府的引导和指导作用是十分明显和重要的。在中国与东盟已达成的一系列合作协议的框架下，遵循外交大原则基础上，泛珠三角区域政府和东盟政府需要通过领导人会议、各部门的联席会议和专业会议进行协调和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解决存在的问题；定期公布对方市场的供求信息和商情分析报告，向企业介绍对方的投资环境和可合作项目，与企业互动；组织企业家前往实地考察和招商，增加对对方市场的了解，减少投资风险；举办各种展会促进交流，携手办好每年一届的南宁“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时，泛珠三角作为一个次区域经济体，还要在“10＋1”合作机制下积极同各次区域经济体进行对话，充分发挥“9＋2”的协调作用。

（二）通过产业竞合，提高产业竞争力

泛珠三角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虽随着“10＋1”的顺利推进而迅猛发展，但总的来说，双方的经济关系主要是贸易关系，在区域经济分工、产业

结构互补、相互拓展产业方面仍很欠缺，区域产业优势远未形成。要提高产业竞争力，泛珠三角—东盟应积极利用各自经济的协同作用和相对优势来创造互补性，消除经济结构雷同带来的合作障碍，并确定好产业合作重点。

1. 农业合作

气候的接近，相似的物产、作物和气候，很强的互补性，使泛珠三角—东盟成为互为重要的农业贸易伙伴，近年来每年的农产品贸易额达到50多亿美元。为此，东盟与中国第五次领导人会议把农业确定为面向21世纪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并先后签署多个“农业合作协定”，如《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中泰果蔬协议》等。泛珠三角—东盟可以利用双方的互补性和相关的制度安排，逐步扩大农业相互投资的规模，建设农业园区，定期开办农业会展、农业合作论坛、培训和研讨会，深化农业领域的合作，加快整个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现代农业的发展。

2. 投资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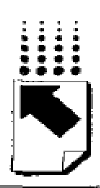
由于中国—东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外资实现经济起飞的，相互间的投资合作比较少。截至2003年底，中国对东盟投资不足10亿美元，不及东盟对华投资的1/30。不论是泛珠三角省区之间还是东盟国家之间都缺乏链锁效应，技术进步、社会变革、收入乘数等波及效应难于传播，以致经济先发地区无法带动欠发达地区。珠三角—东盟区域合作要从贸易走向投资，就应尽快启动投资合作，主要措施包括完善投资保障体制；强化投资合作政策与制度协调；建立投资促进机构，设立投资服务园区，促进“官、产、学”的有效参与和协调，构建合理的投资合作机制。相互之间投资的扩大，双向资本流动的加强将推动区域产业整合和区域连锁效应的增强，发达地区的波及效应就有足够的力量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

3. 能源合作

共同开发资源。海洋资源是“21世纪的资源”，南中国海丰富的资源需要泛珠三角—东盟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共同投资、共同管理、共同利用。除了海洋资源之外，石油、矿产、水电等资源通过双方的合作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开发。

4. 人才合作

近年来，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东盟国家为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正在大力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落后地区的开发，但机械制



造能力的薄弱和劳动力的短缺，建设的步伐缓慢。泛珠三角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在为其提供成套机械设备、承包基建工程的同时，输送相应配套的劳务人员，这样既可以帮助劳动力短缺的东盟国家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难题，又可以使泛珠劳动力资源优势得到发挥，更有助于加强彼此之间的技术交流和人员合作。与此同时，双方可以在更高层次人力资源流动和联合培养方面加强合作。在较高层次人力资源上，泛珠三角与东盟各具优势，但东盟北部的欠发达国家和泛珠的西南地区相对比较弱，可以通过合作，提高高级人才的科技扩散效应，提高科技服务的利用率。逐步实现信息、通讯和人才培训网络的一体化，加强彼此之间各个领域的沟通，共同培养可以在两大区域内都能胜任的高级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

（三）在中国—东盟已达成的制度框架下，加速双边贸易发展

1. 开展自由竞争试点

泛珠三角和东盟经济发展水平虽比较接近，产业结构的相似性比较高，但从双方的贸易结构来看仍然具有互补性。泛珠三角的制造业发达，产品质优价廉，在东盟国家非常走俏。而东南亚是亚洲重要的资源出口地，快速发展的泛珠三角对这些资源有很大的需求。在中国—东盟货物贸易自由化方面达成的协议框架下，泛珠三角与东盟可以在各自的边境地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或经济特区试点加速贸易自由化。这样做不仅有利于“10＋1”的经济发展和自由贸易区建设，而且对实施《茂物宣言》关于 APEC 发展中成员不晚于 2020 年完成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的目标也将是有力的推动。

2. 拓宽贸易领域，提高贸易水平

近年来，泛珠三角—东盟的贸易虽增长很快，但贸易额在双方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都还不高，贸易结构层次水平较低，方式单一，区域发展也不平衡。泛珠三角对东盟出口贸易就主要集中于东盟北部国家。泛珠三角—东盟应在现有贸易的良好基础上，深入挖潜，加强贸易的纵深力度，开拓新的贸易项目，以此提高相互之间的贸易规模及比重；横向拓宽贸易领域，纵向挖潜贸易潜力，全面提高产品档次，利用独特优势，把潜力巨大的东盟作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3. 大力推进产业内贸易

从动态的角度看，贸易关系的互补推动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优化区内产业分工结构，在形成规模经济的基础上产生贸易效应。克鲁格曼在其新

贸易理论中认为，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来自于报酬递增形成的国际分工，而不是国与国之间在资源禀赋上存在的差异。规模经济以及双方市场需求的差异性使泛珠三角与东盟在原有的水平型分工的基础上开始了一定程度的产业内分工，其中机械及电子产品、矿产品、纺织品与服装、化工产品等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产业内贸易。通过产业内专业化分工和有效率的规模化生产，可以避免低层次的内耗、降低生产成本，增强泛珠三角—东盟整体出口实力，获得更大的贸易效应。

4. 借鉴欧盟，实施统一产品政策，处理好区域贸易与环境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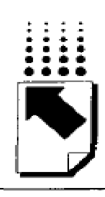
在两大区域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将不可避免面临贸易与环境问题，为消除贸易障碍，推动双方贸易发展，保证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协调，泛珠三角—东盟各方在制定各项社会经济政策时应始终注意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同时结合泛珠三角—东盟环境保护的原则，如源头治理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等，有针对性地制定一系列环境标准和具有特色的政策措施，使产品生命周期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尽量符合环境要求，减少因环境原因导致的区内产品自由流动障碍。这些措施应包括：①激励政策引导企业开发环境友好技术，增加环境友好产品与服务的供应，并向消费者传达有关产品与服务的环境特性，引导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②努力协调贸易各方环境标准，防止污染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促进环境保护与对外贸易同步发展。③注重与贸易伙伴之间建立有关环境问题的平等协商机制，加强对话与合作。一方面应加强进口环节的管理，坚决杜绝危险废物和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的越境转移；另一方面应推进绿色采购（如绿色森林认证）制度，为全球环保做出更大的贡献。④积极寻求建立区域内环境技术合作制度的可行途径，强调合作各方加强在环境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消除交流障碍，建立合理的转让机制。

（四）依据发展的差异性和特点，“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地开展区域合作

建立既符合各地利益，又能根据各种客观条件和实际需要的互惠互利的灵活的多层次、多阶段混合区域合作模式，来推动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竞合互补，为重构东亚产业分工模式发挥示范作用。

1. 优势互补型合作

从比较优势来看，泛珠三角在技术性劳动密集型产品及非技术性劳动密



集型产品方面较有优势，东盟在资源密集型初级产品上最具优势。双方只要注意消除经济结构趋同带来的区域合作障碍，积极利用各自经济的协同作用和相对优势来创造互补性，就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扬长避短。如新加坡利用长期国际市场营销经验和渠道，成为泛珠三角的对外窗口。泛珠三角生产能力比较强，应充分利用新加坡国际贸易中心这个优越条件，通过与新加坡企业的合作，将泛珠三角产品带入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泛珠三角的香港、澳门、广东可以利用资本、技术优势扩大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2. 见缝插针合作

泛珠三角—东盟可以利用各自产业的梯级结构，见缝插针地发挥原有产业的相对优势。泛珠三角在机器制造、轻工产品、家电方面的生产能力过剩，可以向东盟的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欠发达国家转移，针对其资源丰富，但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技术水平差的特点，扩大对其的产品出口，并在资源开发和工业生产领域加强与之合作。这样，既可以加速泛珠三角产业结构调整，又可以为东盟北部国家提供工业化起飞所需的产业和资金；新加坡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可以同泛珠三角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垂直分工的协作关系，彼此间存在明显的互补。

3. 差异化（错位）竞争

在同层次产业结构中，泛珠三角要力争凭借样式、品种、花色、价格等方面与东盟国家展开错位竞争，努力提高产品档次，以免正门撞车。

4. 增强大都市的经济辐射功能

泛珠三角—东盟的大都市，从新加坡和吉隆坡，到曼谷和河内，到昆明和南宁，到成都和长沙，再到香港和广州，最后到福州和南昌，是实现经济点—轴—面扩散的基础。泛珠三角—东盟通过形成两头高、中间低的梯度和多中心的点轴交叉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增强大都市的辐射能力，加速整个区域的城市化进程。

5. 加快“四沿”经济带的形成

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地理上有这样那样的关联，可以在边境贸易、边境经济合作、流域经济合作开发、海域资源共同开发、相连区域旅游合作等方面寻找合作项目。

总之，泛珠三角—东盟在寻求产业互补和合作的过程中，应尽量利用彼此之间的梯级产业技术结构，错落对接，优势互补，避免两败俱伤。同时，

更应苦练内功，提高产业档次，从根本上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五）重点——泛珠三角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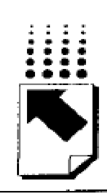
泛珠三角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级差，不论是产业还是资源的互补性都很强，而且湄公河流域国家与我国的关系比较友好，泛珠三角与该区域合作具有较好的政治基础和相关的制度安排。泛珠三角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可以着重开展以下领域合作：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如航运资源开发、泛亚铁路建设、电力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等；二是旅游资源开发；三是人力资源开发；四是积极参加“两廊一圈”建设。大湄公河次区域被中国和东盟列为重要的合作领域之一，将成为泛珠三角的最佳国际合作伙伴。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国际合作，可以突破泛珠三角自身经济运行的框架、有效整合区域生产力布局、统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使中国单一的沿海开放战略转变为全方位开放，使中国的经贸合作从太平洋地区扩展到印度洋地区。

（六）重视第三部门的作用

发挥泛珠三角和东盟工商界、商会、行业协会、贸促会等非政府组织以及由双方民间组织组建的各种组织的作用，如中国—东盟企业理事会、泰中农业科技促进会、马来西亚—中国西部大开发促进会、菲律宾菲华各界联合会，这些组织具有非官方性和灵活性，在促进泛珠三角和东盟经济合作中可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泛珠三角—东盟的商会可共同举办各种促进经济技术合作的研讨会、展销会、洽谈会、招商会和论坛，给企业提供展示和交流的机会，如已经在成都和广州举办了两届的中国—东盟企业家研讨会；其次，非政府组织可为企业提供中介服务，及时向会员提供商务信息，向政府反映合作过程中的新问题和新动向，并提出建议；最后，非政府组织可以在企业合作出现矛盾和纠纷时起协调和仲裁的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冲突，促进合作的顺利进行。

（七）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

华侨华人是推动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竞合互补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和人脉资源优势。资本实力雄厚的东盟华人可以为泛珠三角—东盟合作开发提供充足的资金，而粤港澳资本也可以为东盟国家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泛珠三角在利用东盟资本，尤其是东盟华人资本方面仍需进一步挖掘潜力。改革开放以来，来自东盟的华人资本虽增长比较快，并已成为泛珠三角外资重要来源之一，但就泛珠三角区域中利用外资大省广东而言，1979～2004年，在广东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来自东盟的仅占3.39%，而且东盟资本在泛珠三角的分布也很不平衡，投资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海南，其在外资总量中的比重也很小。如广西利用外资中东盟资本只占其利用外资总额的6%～7%。

要发挥华人资本在泛珠三角—东盟区域竞合互补中的作用，合作双方应顺应华人投资新潮流，尽力创造一个安全赢利的投资环境，不断寻求新的聚合力以吸引更多的华人资本，力争成为海外华人资本竞相争人的一个黄金区域。为此，合作双方一方面既要保持住对海外华人资本的巨大吸引力，又要为华人资本的区域自由流动创新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及时调整政策，适度引导华资转向新兴的高技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大型投资项目，提高利用华人资本的质量和水平。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CEPA 架构下内地与香港服务业合作的问题与对策

○ 陈　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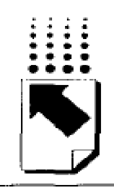
广受内地和香港各界民众关注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 CEPA 正式实施已整整两年了。CEPA 实施两年来，零关税原产地证和服务贸易投资申请踊跃，"香港个人游"和"民企自由行"成效显著。内地与香港经济由自发联系走向理性有序的合作，香港经济重新恢复和实现稳定增长，CEPA 实施取得显著成效。但因两地市场环境、法律体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CEPA 实施特别是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方面仍存在一些困惑与问题。本文拟对两年来在 CEPA 架构下内地与香港服务业合作面临的困难与问题代作一初步分析，并提出若干对策性管见，以就教于专家。

一　当前 CEPA 实施中面临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CEPA 实施两年来，内地与香港在服务业合作中虽然取得显著成效，但也仍存在如香港服务业北上门槛过高，审批程序复杂，港人"挂壳"北拓产生众多纷扰和问题，内地政策法律环境多变，CEPA 香港城货不对板，管理混乱和内地区域贸易保护主义严重等问题。

（一）两地法律制度和专业环境差异大，港人考取内地服务业执业资格难度大

由于香港服务业市场竞争激烈和人才相对过剩，香港服务业都想乘 CEPA 东风开拓内地市场。但因受到难于取得内地执业资格、两地不同的法



律制度、专业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影响，包括法律、会计、医疗、建筑等香港服务业人才北上，基本上处在“停步不前”的状况。CEPA协议正式实施后，为方便香港专业人才通过内地相关执业资格考试，中央有关部门特意在深圳和香港设立考点，定期为有意北上的香港服务业专业人才提供相关服务，但港人报名参加内地专业资格考试并不踊跃，考试的结果也“令人失望”。如在医疗服务行业，2003～2004年度报名参加内地医疗执业资格考试的香港医生仅6人，虽有2人勉强通过首轮考试，但至今仍未有港人取得内地医疗执业资格。在会计行业，自1994年以来的近十年时间中，香港仅有12人获得了内地执业资格。而在法律服务业，根据2004年12月国家司法部公布的数据，2004年度共450多名港人报名参加内地律师资格考试，但涉险过关者仅为4人。香港专业人才参加内地执业资格考试成绩不理想，与两地不同的法律制度与专业环境差异大密切相关。如香港法律界认为内地与香港采用不同的法条和分属不同的法域，即使是香港资深律师，要通过内地的考试，也要从头学起。会计界表示香港会计不了解内地的《税法》与《经济法》，要香港会计师在较短时间内投考完全陌生的内地会计师专业课程有较大难度。医疗界则表示，香港医生用的是英文学医，难于通过内地简体中文考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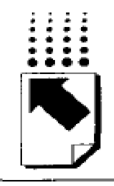
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香港专业服务人才来说，由于内地与香港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环境存在显著差异，即使资格互认得到解决或通过内地资格考试，内地较低的服务收费和薪酬待遇也吊不起香港大多数专业服务人才的胃口。据调查，目前即使在内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一般专业人才的收入仍比香港低2～4倍。以医疗收费为例，经济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的深圳，平均门诊收费为128元/人，住院费为428元/人，而香港的平均门诊费用为350港元/人，住院费用为3000元/人。与此相应的是，深圳聘请一个普通医师只要5000元人民币/月，而香港则需约20000港元/月。正是这一原因，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急缺型人才，内地医院一般不会高价聘请香港医生，而香港医生也不会轻易抛弃香港优厚的待遇与良好的工作环境北上。深圳龙珠医院原是一家港资合资医院，原计划招收约100名香港医生，但真正报名的仅有几个人。据报载，自从内地允许港人报考内地保险从业资格后，港人掀起了一股报考热，历年来共有700多人取得内地保险代理资格，但真正在内地保险公司注册展业的却不足100人，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内地做单所得的回报太低。

（二）审批程序复杂，税收和收费太高

据了解，CEPA 项下的服务审批权，大多集中在中央及省级相关部门，这种情况导致相关审批环节多，程序复杂，时间长，且手续费用不菲，从而大大挫伤了香港服务业人才北上拓业的积极性。如港商要在内地申办一个合资医院，不仅要经过市、省、中央一级的卫生部门批准，还要经过市、省、中央一级的外经贸及商务部审批。此外，还要经过医院所在地的国土、消防、环保等部门审批，这些章都盖下来至少要二、三年时间。港商即使在内地申办一个联营法律事务所，也要一级级报到司法部及商务部审批。不少有志于进军内地服务市场的港商都表示，内地要吸引香港服务业投资，政府服务效率是关键。一位港商抱怨说，“一位香港律师朋友想在广州开一家律师事务所，经过司法、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花了 8 个多月，腿都跑细了，肉也掉了 10 多斤，但还是没有下文”。香港服务业进军内地除了审批环节多，程序复杂外，税收和收费过高也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如在会展业方面，CEPA 规定“允许香港公司可以独资形式在内地提供会展服务”，使香港会展业成为 18 个获准进入内地的服务业之一。但两年过去了，以独资方式北上的香港会展业者仍屈指可数，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内地服务业的税收和收费相对于港人来说实在太高。在内地，国内外展览企业的税收标准不统一，港澳业界进入内地后，是按国外企业收税还是按国内企业收税，未有明确规定。在展览收费问题上，内地实行的是境内外“双轨制”，香港参展商需付的摊位费比内地参展商高 5 倍，直接影响香港展览公司内地办展的客源和收益。香港展览公司进入内地后，将会主要发挥其信息资源优势，以举办国际展览为主，但港资展览公司取得内地办国际展的资格，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应由哪些专业团体或政府部门来认定等问题，目前仍未有明确规定。此外，按照海关有关条例，展品进出海关需要按货物的价格交纳押金，这一政策也难倒了不少香港参展商。

（三）市场准入门槛仍太高，具体的操作程序迟迟未出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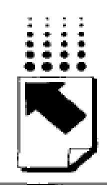
虽然 CEPA 协议大幅降低了港商进入内地的门槛，其中部分条款还超过了 WTO 协议的规定，但是门槛问题仍然成为香港服务业北上的难题。目前港商认为 CEPA 协议中，门槛仍然较高的行业有金融、法律、会计、



医疗等。香港金融业在CEPA1可谓是最直接、最大的受益者。因降低门槛5家合资格的港资中小银行于2004年陆续到内地设立分行。但因受外汇管制和市场准入条件的限制，香港的证券、期货、保险业进军内地却成效甚微，至今仍停留在布局阶段。尽管CEPA2中已规定，内地将在证券、基金等领域对香港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其进入门槛由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管理的资产不少于200亿美元减少至100亿美元，但因香港本土的金融、证券机构规模太小，香港中小金融机构至今没有一家够格进入内地证券业。截止2005年5月底，也仅有一家香港证券期货公司申请《香港服务提供者证明书》。虽然香港期货业进入内地的注册资本依CEPA规定只需3000万美元，CEPA2还规定自2005年1月始，在香港证监会注册的期货机构可以参股形式进入内地，股权不超过49%。但因内地在引入港资股东的政策细节迟迟未公布，引进港资参股内地期货公司还未进入正式实施和实际操作阶段，所以至今内地所有的178家期货公司，还没有一家期货公司引进港资股东。在CEPA首阶段承诺中，允许香港保险公司经过整合或战略合并组成的集团，按照内地“532市场准入条件”（即集团总资产50亿美元以上，经营历史在30年以上，在内地设立代表处2年以上）进入内地保险市场。目前，虽已有数百名港人获得内地保险代理从业资格，上百人被内地保险公司录用，但这只限于个人行为。特别是由于香港保险公司的资产规模太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家香港保险公司进入内地。不但香港的证券、期货和保险业进军内地成效甚微，而且香港的医疗、法律等行业，因至今未允许港商独资北上，其进入内地的发展情况也不理想。而香港拥有较多优势的会计行业，CEPA的相关规定虽允许香港会计师事务所与内地合作，但要求香港合作方年收入必须在2000万美元以上及审计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不少于200人。而在香港，除了在国际上拥有老大地位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外，其余的都达不到上述条件，所以至今为止，尚未有合作个案出现。除了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的市场准入门槛仍太高外，目前，CEPA实施所面临的另一问题是，相当一些政策落实不到位和具体操作程序的模糊不清。在整个广东省，有关CEPA的具体操作方式及办事程序仍未完全确立，地、市一级也还没有相关操作办法出台。由于各个地方政策不一，解释各异，造成港人依CEPA协议进军内地市场的制度成本剧升，实际运作过程也相当繁复，港人的投资热情也因此锐减。

（四）不规范的港人“挂壳”北拓现象相当普遍，也产生不少的困扰和问题

CEPA 协议的签订，其初衷是为了促进内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与香港经济的进一步融合，特别是加快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的步伐。但实际上，早在 CEPA 实施前，不少香港服务业便通过地下渠道，以“挂壳”方式进入内地尤其是毗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如为了鼓励香港个体户北上创业，深圳早在 10 年前就网开一面，允许香港个体户在罗湖商业城内创业。而感到自己落后的东莞、广州等地也纷纷效法深圳。有鉴于此，深圳在 5 年前，再次开放了人民南商业街、东门老街、地王大厦等区域，允许香港个体户进驻。CEPA 协议正式实施后，按照正规程序，香港大部分服务行业进入内地，都必须通过中央商务部批准，手续较为繁琐。为避过复杂的审批程序，在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暗示下，香港的服务业从业机构和人员，大多仍以“挂壳”方式进入内地。港商进入内地的所谓“挂壳”方式，是在那些不让外商独资进入的行业或为规避繁琐审批程序的香港服务业从业者，由港商自己出资金，然后以内地亲友名义注册设立内地民营企业。有些港商还先通过这种途径注册一个内地民营企业，再以香港企业身份与这个假民企合资，成立所谓港商合资企业，享受各种优惠待遇。据分析，目前获 CEPA 协议允许进入内地的 26 个服务行业中除银行、保险业因为目标和风险太大而没有“挂壳”现象外，其余的 24 个行业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挂壳”现象，其中尤以物流、零售、电信增值、房地产、广告等行业为甚，实际上就连 CEPA 实施后表面上仍未见北上动静的香港法律及会计行业也不例外。有报道说珠江三角洲一些地方的律师及会计师事务所，不仅其注册资本来自香港，就连幕后掌舵人也是香港人，可见港人“挂壳”北进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港商所以能采取“挂壳”方式进军内地，其重要原因是香港人口中绝大部分来自广东等内地省份移民，几乎所有纯正港人在内地都可找到自己的亲朋好友，而香港已有约 18 万家企业进入内地，其中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的港资企业便达 8 万多家，在内地工作及定居的港商更达近百万之众，这些都为香港服务业“借壳”北上提供了天然的优势条件。实际上，不仅香港企业，而且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资企业，也不同程度地偷步享受了 WTO 待遇和 CEPA 优惠。例如，至 2004 年 10 月，内地拥有的大中型外资零售企业达 360 多家，全球零售企业 50 强中，超过 2/3 已经进入内地市场。但令人深感惊讶的是，



这 360 多家外资零售企业中，仅有 76 家经过国家商务部批准，其他大多是当地政府从后门放进来的。由于以“挂壳”进入内地的这种方式，严格来说是非法的，它既得不到内地的法律保护，也容易产生众多矛盾和纷争。因为在“挂壳”企业的工商注册登记证上，白纸黑字写的是别人的名字，不少经营“挂壳”企业的港商，等企业辛辛苦苦做起来后，内地的亲朋好友往往会“两眼一翻不认人”，与港商打起企业产权官司。由于法院大多会判港人败诉，使不少港商最终以“鸡飞蛋打”的结局收场。因此，港商应充分认识“挂壳”企业所蕴含的产权纷争和经营风险，应利用 CEPA 带来的机会，尽快将那些“挂壳”企业过户到自己名下。同时，有意北上创业的香港服务业，也最好不要用“挂壳”方式进入，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困扰和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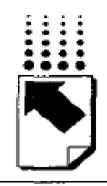
（五）CEPA“香港城”盲目上马、货不对板，管理混乱现象严重

按照 CEPA 规定，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香港、澳门公民即可申请到广东当个体工商户，广东各地也相继出现了“香港城”项目。但根据 CEPA 规定，凡是内地“香港城”的租户与商场签订的租赁合同都必须写明售卖香港货品，而“香港货品”的定义要符合 3 个条件之一，即一是要售卖香港本土还在销售的产品；二是在“香港城”售卖的产品是在内地设厂，但是在香港注册的品牌；三是售卖从香港输入的 CEPA 香港零关税产品。从来自香港务商会的信息显示，尽管有关 CEPA 的推动时间已两年，但不少香港工商界人士都表示不了解内地推出 CEPA 香港城项目的具体内容和政策涵义，也不知道应该投资内地的哪些行业。因此，尽管内地不少地方热炒 CEPA“香港城”概念，但港人既担心内地营业税比香港高，也没有明显意识到 CEPA“香港城”所带来的投资便利，因而对 CEPA“香港城”的招商并不很感兴趣。从经营层面看，作为一种政策性安排，大部分名为“香港城”的项目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大多仅是把 CEPA 香港城当作项目招商的一个概念，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具体的合作中来。尽管专门销售香港商品的“香港城”、“香港街”、“零关税销售特区”等商业宣传口号不断进入人们的视线，但最关键的内容落实方面却根本不到位。例如，许多“香港城”存在的同一问题是，规模过小，品种单调、贫乏，产品的种类、数量及档次都远远达不到人们期望的要求。即使是在东莞常平镇这样一个香港人聚集的地方建立的 CEPA“香港城”，商场内也仅有 5 个香港个体户，原产地香港的零关税产品所占比例很小，一些内地产品竟公然挂上“零关税”旗号冒充港货，“而且

几乎所有香港城都这样做"。有港商这么说。CEPA"香港城"中货不对板，挂羊头卖狗肉的状况，导致内地众多"香港城"的经营困境和夭折。内地不少CEPA香港城经营欠佳甚至夭折、倒闭的另一原因是商城的管理体制出了问题。据业界分析，不少香港城刚开始时，商城的管理比较严格，一旦查出有卖假货的店铺；就会采取措施，取缔其经营资格，吊销执照。但后来不少店铺为了竞争而不得已卖假货，大家都这样做，也没有人管。由于商城管理出了问题；商城的形象和信誉受到损害，商城的困境乃至倒闭便是必然的了。

（六）内地营商环境复杂，资金调度困难和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浓重，影响了香港服务业在内地的投资意愿

不少港商表示，虽然港商可凭CEPA进入内地的门槛降低，香港企业又有人才和国际视野，但因内地营商环境复杂，区域贸易保护主义严重，特别是由于香港市场模式及法规与内地不同，所以港商要在内地大展拳脚还有不少困难。有港商表示，CEPA帮他们进入内地，就好像人们利用CEPA入了屋，却看见里面的房间仍有另一把锁，要打开这把锁，还要很多功夫。香港服务业拓展内地市场所遇到的困难，很大程度上首先是两地之间在制度和法律上的差异所致。以建筑师为例，内地要求香港建筑师必须在内地注册后，还要具有一定经验，才可开设建筑师事务所，但香港建筑师在未获注册前不能独自执业，根本无法积累一定经验，使他们在内地开所执业的机会变得微乎其微。在法律服务合作方面，按照CEPA的规定，两地律师事务所必须各自委派资深人员，抽调部分资金，在内地另找场地，成立一个新的律师事务所，才能叫联营，而这些条件对于不熟悉国内法律的香港律师行来说，所花的精力、所冒的风险都太大。因为香港的港资律师事务所，本来规模就比较小，还要抽出一部分人力及资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办一个新的律师事务所，大多有所顾虑。这也是CEPA协议规定"允许在内地设立代表机构的香港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至今两年来，仅有香港"胡关李罗律师行"与内地的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签订联营协议的原因。在营商环境方面，港人以"个体工商户"形式北上创业首先面对的现实难题，是在内地资金流动不畅的问题。虽然近年内地放宽了人民币和外币的跨境流通，但仍未有明确、具体的实施政策，也使香港"个体工商户"在内地资金融通时会顾虑重重，并担心会随时触犯走私货币的罪行。此外，对香港"个体工商户"



货物进出境未能规范进行，迫使经营者只能以“红白蓝袋”的方式用水客携货，也使他们担心会触犯走私货物的罪行。由于对内地法制和商业环境认知贫乏，也使港人对以“个体工商户”形式在内地创业存在重重隐忧。

二　对策与建议

（一）简化审批程序，消除贸易壁垒，增加营商法规透明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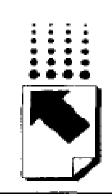
CEPA 实施两年来，内地与香港在服务贸易方面的合作成效未如预期。其重要原因是服务贸易投资审批程序繁杂、内地营商法规透明度不够和区域贸易壁垒仍广泛存在等。据此，我认为，为确保 CEPA 的有效实施，应全面简化投资审批程序，切实加强推行 CEPA 的实施机制。应将消除各省区之间的贸易壁垒，增加营商法规透明度作为正在进行咨商和即将公布实施的 CEPA 协议重点。面对内地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粤港两地政府应在认真调查核实基础上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积极寻求解决办法。切实加强香港与内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海关的沟通，统一各省市对港货原产地证书的要求，方便港货进入内地市场。为了简化审批程序，降低机会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建议中央有关部门把一些不影响宏观经济环境的项目审批权下放到省或市一级管理部门。目前香港个体户在深圳、广州等内地“香港城”售卖的零关税商品，大多是从罗湖口岸用肩扛手提方式“蚂蚁搬家”进来的。为简化手续并缩短报关时间，建议有关部门在深圳罗湖口岸为香港个体户申报零关税商品开辟一条“快速绿色通道”，为其提供快速、便捷的一条龙服务。CEPA 实施已近两年，至今还未有专门的政府部门或民间机构对 CEPA 实施成效及存在问题进行专门的课题研究，甚至无论从哪一个政府部门几乎都得不到一个 CEPA 实施进展的具体数据。因此建议内地特别是广东省政府除应尽快出台简化港商服务业投资的审批政策外，还应该对 CEPA 实施的效果及面临的问题进行全面评估和专题研究，并拿出具体的对策性改进方案以供中央参考。为有效监察 CEPA 各方面的实施和发展状况，内地和香港宜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三方面建立常设委员会，并由香港四大商会与内地特别是与广东省总商会成立的联合委员会来收集各行业对 CEPA 的意见和监察地方政府执行 CEPA 的功能，从而切实有效地推动 CEPA 协议的实施和为两地商界提供更直接、具体的服务。

（二）建立两地商务往来快速批核机制，积极改善过境交通拥堵状况

香港是内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商贸和专业服务中心。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人流对两地服务业的合作和发展极为重要，但目前的跨境交通存在很多问题，未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商贸人流需要，妨碍了两地经济的进一步结合。特别是现在内地商人办理来港签证需时较长，需向公安部门申请，符合资格的申请人通常也要等 15 个工作日才能拿到签证，甚至比到欧美国家的签证时间还要长，这削弱了香港生产性服务业对珠江三角洲商人的吸引力，不利于珠江三角洲使用香港的商务服务职能。因此，应尽快设立方便两地商务往来的快速商务批核机制，为内地和香港商务人员往来提供即时（just-time）商务签证服务。现时深圳罗湖口岸几乎是超负荷运转，高峰时期每个周末往返人流近 23 万人次，口岸拥堵不堪已严重阻碍正常的跨境商贸活动。据此，为有效分流商务旅客和其他过境旅客，从口岸管理上加速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商贸融合，应认真研究和考虑在过境通道加建商贸专用柜台和商贸专用通道，为商贸人员往返两地提供快速、便捷的“绿色服务”，有效分流商务旅客和其他过境旅客，从口岸管理上加速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商贸融合。目前香港和澳门之间主要靠便捷、高效、每隔 15 分钟一班的水翼船联系。而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江三角洲地区还未充分利用其水运优势。因此，应在改善现有跨境交通运输网路，延长九广直通车服务时间的同时，借鉴港澳间建立便捷水上交通运输网路的做法，建立香港与珠江三角洲主要城市间的频密、舒适、高效率水上客运网路，从而既为两地商贸旅客提供直通火车以外的另一种选择，也有助于疏导现时十分拥堵的陆路跨境交通口岸。

（三）香港服务业应调整服务心态，进行服务业转型和重新定位

香港服务业如金融、法律、专业服务等，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有国内同行无法比拟的优势，也可以为国内企业打开国际市场提供协助。近年来内地由于经济快速发展，而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专业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因而内地经济发展对香港服务业有越来越大的需求。由于香港服务业拓展内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市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便利和 CEPA 政策优势，而内地企业则普遍存在如对国际市场了解不够，对海外法律和经营环境认识不足，产品设计与国际时尚未接轨等问题，因而目前正是香港服务业大举进入内地



市场的最佳时机。因为再过几年，内地服务业市场彻底开放了，届时欧美日一些规模大、实力强的专业服务企业进来了，香港规模较小的专业服务企业还不一定能竞争过人家。香港服务业在内地市场大有可为，但香港服务业者也应调整心态，重新认识自己，其提供的服务需要有明晰的定位。内地服务业市场的发展特点是市场广阔、需求量大、成本较低。特别是近年来内地服务业发展相当快，已经超过了许多香港同行的想像。而香港服务业者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了解内地市场，感觉自己很了不起，常常以自己“拥有上百年的专业服务经验”而自居，不大瞧得起内地同行，也不大愿意到内地去开拓业务，从而错失很多市场机会。因而香港服务业者要开拓内地市场，首先必须调整自己的心态，重新认识自己，正确认识和了解内地市场，以便更好地把握机会，寻求最佳的市场切入点。香港的服务业在内地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但要吸引内地商务旅客来港消费及购买商务服务，还必须配合珠江三角洲的发展，积极推动香港服务业转型。以前，香港人从事商贸服务大多只了解本地法，对国内法和国际法不熟悉。香港服务业者为了开拓内地市场，还必须熟悉国内的营商环境，如内地的法律、做事方式，社会文化等，并在了解内地的同时，也熟悉国际环境。在语言方面，香港业者要适应内地业务开展需要，重点提高普通话能力，做到掌握中文、英语和日语多种语言，具有精通“两文三语”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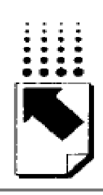
（四）加快内地与香港服务业的制度对接与资源整合，妥善解决两地商业法律衔接的问题

由于香港法律制度属于英美普通法系，而内地属于大陆法系，内地与香港分属两种不同法域，使内地和香港服务业合作的实际操作存在不少法律制度和会计准则层面上的障碍与困难。为此，应把加快内地与香港法律制度和会计准则方面的对接作为推进两地服务业合作的基础性工作来实施，尽快组织专门力量对阻碍两地会计、法律制度对接的有关法律、条例和规则进行清理，并在不违反法律精神的条件下，作必要的变通性调整、修正，颁布相关的补充说明、法律解释。由于香港的司法独立，内地最高法院与香港法院并无隶属关系。内地与香港分属两个不同法域，法律衔接并非简单由一方改变而去适应另一方要求，因而需要在两地的商业法律交往中找到双方都可接受的方式。在“一国两制”架构和CEPA协议实施条件下，为便利司法承认和两地商业法律衔接，应在总结现有司法协助经验基础上建立简便易行的司法

协助关系，在公文送达、调查取证、承认执行判决和仲裁等方面，尽快协商制定特殊立法或法律解释。在会计制度方面，内地与香港的会计制度各有一套，缺乏共同的“商业法律语言”，同一公司内地财务报表上的某些项目、名称与香港不同，甚至有些项目、名称只是内地才有。另外，内地的会计计数方法与格式与香港也不同，这对两地商务交往与合作造成很大困扰。据此，应在不影响中国主权的前提下服从国际商业习惯，制定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兼顾国际惯例的会计准则，从而便利于内地与香港同行的交流与合作。此外，为便于内地与香港服务业机构在组织架构和运营模式上的制度对接。内地还应尽快提高服务业发展的市场准入和市场开放程度，加快制度创新，允许建立私营或合伙经营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逐步撤除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的行政挂靠单位，实现内地与香港两地律师、会计师事务所在组织架构和运营模式上的制度对接。

（五）构建 CEPA 下的争端解决机制，加强两地服务业行业协会层面的合作

CEPA 签订后，内地与香港经贸交往日趋频密，两地间的民事和商务法律纠纷将大量增加。但 CEPA 协议及其附件中却没有解决争端的规定。据此，我们认为应构建适应 CEPA 协议的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建立由公认的法律、贸易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和简明高效的上诉机构。从而形成包括谈判、斡旋、调解等在内的争端解决程序，建立一套 CEPA 自己的争端解决规则和机制，并提供争端司法化解决的场所。行业协会在服务业发展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香港的如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等行业协会运作规范、管理严格，在制定行业规则、规范会员操守行为，组织同业交流，跨行业协作和市场开拓活动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内地应把加强与香港服务业行业协会间合作作为规范管理，提升服务业素质和管理水平，推进两地服务业合作的重要内容，建立内地与香港服务业行业协会层面的紧密型协商、合作机制，并以两地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为依据，制定和实施两地业者自律和共用的行业行为规范、服务标准、执业操守、资质认证书、信誉评估等行业管理规则。联合开发一批两地服务行业共用的国内外信息数据库，如资质认证、资信调查、人才结构、知识产权、国内外投资环境、市场营销、服务网路等数据库，同时建立分行业中介服务信息资源交换中心和服务网路，发挥信息支撑平台的共用功能。



（六）适度放宽内地民企来港的政策限制，更充分发挥香港的对外商贸“平台”功能

“民企自由行”是CEPA第二阶段的重点项目，内地不少企业也把香港作为提升经营能力，进军国际市场的重要窗口。但“民企自由行”实施的头4个月，仅68家合资格内地企业来港投资。民企来港投资数目不多，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内地民企赴港投资仍遇到不少障碍，如行政审批程序繁复，外汇管理规定严格，内地民企缺乏对香港营商环境了解，香港经营成本太高，香港对内地人员的入境及工作限制严格等。面对实施“民企自由行”存在的问题，还需进一步调整和放宽政策限制。外汇管制方面，现时的做法是由国家商务部按不同行业，弹性处理及审批内地企业来港投资的金额，没有明确的外汇管理政策，使内地民企来港设立公司缺乏信心。因此，应简化内地企业赴港投资程序，放宽外汇管制，为内地民企提供在港开办企业及营商的有关信息。香港拥有大量的财金管理专业经验及人才，香港特区政府还应充分利用香港优势，加紧与中央政府商讨解决相关资金进出与国家金融安全的平衡问题，向中央政府争取放宽资金管制，争取尽快落实QDⅡ计划（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令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从而既可为内地居民对外投资提供特殊而合法的通道，也有利于人民币逐步开放，加快内地经济与国际接轨。从目前情况看，内地民企调派人手来港受限，也是影响内地民企赴港投资意愿的因素之一。因为不少民企在香港设立公司并购置所需设备后，却因内地员工来港工作的申请迟迟未批，新公司已投入资源却未能营业的问题，严重打击其来港投资意愿。据此，我们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应考虑制订特别工作签证安排，配合简单的申请及审批程序，方便内地民企人士因业务所需在两地穿梭工作，并配合人才及技术的流动，尽量降低对民企人员来港造成的阻碍。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关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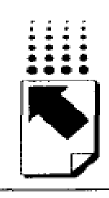
○ 谢名家

面对21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并提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东、中、西部经济互联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新格局”的战略方针。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构想，正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方针的重要计策和实践方案。

一　一个具有时代高度和重大现实意义的战略构想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构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会同八省区的党委政府和香港、澳门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出的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大战略。泛珠三角区域是位于我国南部地区珠江大流域，背靠大中华腹地，面向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广阔地带，涵盖了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2003年7月，张德江同志在一份报告上首次正式提出“泛珠三角”这一概念；在同年9月举行的广东省地厅局领导干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班开班典礼上又进一步指出：“广东要积极推动与周边省区的经济合作，构筑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市场广阔、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体系；同时，推动9省区与港澳的合作，建立‘9+2’协作机制，形成‘泛珠三角’经济区。”在11月举行的“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上，张德江同志对这一构想又作了深入阐述：“珠三角地区是目前全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包括粤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地区则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我们正在谋划由广东、香港、澳门以及广东周边的8个省区组成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我认为这是更具潜力的大事”。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构想，得到8省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积极



呼应，引起热烈反响；中央领导对这一构想给予了充分肯定，鼓励积极探索；国家有关部委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2004 年 6 月，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香港、澳门、广州分别举行，“9 +2”地区的行政首长莅会，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进入了起步阶段。在 2004 年 7 月 17 日闭幕的“9 +2 洽谈会”上，847 个签约项目，2926 亿签约金额，证明了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的巨大威力。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构想，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世界发展潮流，与我国扩大开放的大趋势相一致，尤其符合泛珠三角区域整合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实际需要。诚如张德江同志指出的，“广东在推进珠三角、大珠三角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设想，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内在规律使然，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尽管泛珠三角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大部分省区还属于经济后发地区，在某种意义上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的缩影，但不可否认，该区域巨大的发展能量和发展潜力已逐渐显示出来。历史将证明，泛珠三角区域是我国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极其重要的战略增长极，该区域合作与发展的伟大实践将开辟我国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中央把推动区域的合作与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从战略高度看，在如此幅员辽阔的中华版图上，的确需要规划和建设几个合作紧密、互补性强、带动力大的经济区。而目前内地的几大经济区离区域一体化的要求还差距甚远，就连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具有综合优势的经济区也面临进一步提高合作水平和层次的问题。因此，通过制度推动和机制建设，建立真正发挥功能效用的新型经济区，关系到区域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已在九省区和港澳的领导层达成共识，具备良好的基础和开端，并建立起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区域发展新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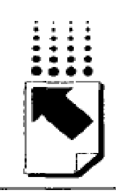
大珠三角作为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为拓宽发展空间，一方面需要与之相邻的内地中西部省区作为发展的腹地，另一方面中西部省区又需要大珠三角地区经济技术、资金和人才的辐射和带动，以达到合作发展，共创未来的双赢目的。随着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动，对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大珠三角经济与中西部经济的日益融合，优势互补和区域一体化将极大提升整个经济区的综合竞争力和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大大增强中西部若干省区经济技术和文化素质，使中国的综合实力上升到一个新台阶。

中国正积极融入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入 WTO 标志着中国经济

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将遵循 WTO 的规则管理经济，对进入中国的外国企业将实行国民待遇和透明度原则。这将推动国内各省区在市场运作规则和政策法律环境上的一致性，从而为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包括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处在开放的前沿，有着良好的投资环境，市场经济体系较为完善，通过发展以大珠三角为龙头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可以带动和辐射周边省区的发展，促进合作经济区域间的良性竞争，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后发经济的动力，必将整体上有利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持续地快速推进，从而增强中国对外综合竞争力。将于 2010 年建成的中国——东盟（10+1）自由贸易区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大珠三角在泛珠三角中处于核心地位。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形成和推进，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深厚的侨资侨力和紧密的经贸联系，将为泛珠三角区域走向世界搭建一个新的平台，也为资源整合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强劲的动力。内地与港澳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签署和实施，为港澳与内地经济和文化的融合创造了条件，这一制度安排不仅为港澳而且为内地提供了互惠双赢的经济环境基础，这就为把泛珠三角建设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区域提供了制度保障。

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众多，侨力资源丰富，拥有香港、澳门两个独立的关税区，这是泛珠三角区域与国内其他经济区相比，所具有的显著特色和巨大优势。据不完全统计，海外华侨、华人约 3500 万人，90% 以上集中在“9+2”地区。这种独特的优势，客观上形成了本区域与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所具有的血缘、人缘、亲缘、地缘上的紧密联系和人文历史渊源，也造成了本区域拥有最丰富的侨资侨力、外资外力、民资民力的“三资三力”资源，从而也使本区域具备了大开放、大发展的特殊优越条件。特别是在大珠三角崛起的以香港、广州、深圳为代表的城市群，已经发展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通过大力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并融入环太平洋经济圈和全球化运动，泛珠三角区域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建设成为世界级经济中心。我国已经形成了“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以往形成的各地发展自成体系、引进港澳台资和侨资比较分散、引资方式以捐赠为主、投资新办实业比重不大的状况已有根本改变。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可以在通过华侨、华人吸引外资外力方面做得更活、更有特色、更有成效，取得更大的突破。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后，与内地经贸和文化交往更加紧密，特别是粤港澳关系愈加密切。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港澳可以借助 9 省区的



紧密合作关系，促进 CEPA 的落实，开拓在内地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同时，充分发挥港澳现代服务业和国际市场开拓方面的优势，继续发挥在我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作用。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一方面，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增加了港澳与本区域省区的对话协商机制。在已有的制度化的沟通渠道之外，开辟了新的与内地省级行政区多方面对话协商机制和制度化的渠道，有利于推动互利共进；另一方面，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为港澳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支撑。对港澳来说，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最现实有效的路径，是依托“一国”的坚强后盾，发挥“两制”的全新活力，去赢得新的繁荣发展和稳定。随着“9＋2”经济融合和文化建设的提升，港澳在实行“一国两制”方针中的示范作用越显突出，这不但促进港澳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而且会大大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这对祖国的完全统一将会产生强大的经济、政治、文化效应。

泛珠三角正迎来国内其他区域经济竞争和文化竞争群雄并起、百舸争流的新格局。“9＋2”内既有先进发达地区也有后发展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是缩小地区差距提高整体实力的重要途径。现在我们正面临着社会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转换，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才能在科学合理的限度内加速实施。张德江同志和广东省委、省政府按照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伟大构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建设“经济强省”和“文化大省”的历史进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战略构想。可以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这一战略构想，是对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人类文明发展坐标系上方位的正确判断和把握，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科学运用，是把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视野和区域一体化的现实要求有机结合起来的科学探索，是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运用到新的环境并力争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去的伟大实践。

二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客观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内在需要的必然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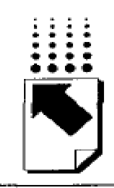
泛珠三角的天然经济带是区域合作的内在要求，天然经济带赋予了区域合作的神圣使命。

第一，大珠三角需要开辟新的腹地或延伸地。粤港澳特别是小珠三角在经过多年的扩张和大发展之后，需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结构优化，建立有效的高新技术转移和促进机制，从根本上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益和水平。这就需要营造一个更强大的后方作为支撑；与此同时，其对能源、劳动力和各种初级加工产品也形成了较大的市场需求。而泛珠三角区域中西部地区，则具备提供能源、劳动力和各种初级加工产品的优良条件。“西电东送、西菜东送、西烟东送、西劳东送”的有序实施，正在改变本区域的传统经济格局。区域内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基础。

第二，中西部省区有参与区域分工，获取比较利益的客观要求。本区域的珠江中上游地区，最大的特征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人才、技术和资本则比较稀缺，而要实行丰富资源与稀缺资源的置换，分享东部地区经济繁荣的利益，只有参与到发达地区的市场分工中去，才能得以实现。粤港澳具有向其他省区转移和扩散劳动密集型甚至技术、资本密集型加工业的要求，而上述省区也具有接纳这种转移和扩散的需求和能力。同时，这种需求和能力正由被动式转向一种通过区域合作去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实现共同繁荣的主动创新方式。

第三，本区域的中西部省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决定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粤港澳自然资源禀赋缺乏，而其他生产要素、文化观念和对外开放则具有相对优势。粤港澳所稀缺的正是这些省区所丰富拥有的，如云南省，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有色金属王国”之美称。整个区域的水能资源和电力资源也十分丰富，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这个区域拥有全国乃至世界最丰富的生物自然优势，许多世界珍稀植物、动物都能在这里生长和繁衍栖息；还拥有极为丰富的、具有自身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等丰富旅游资源，这些不仅奠定了其实现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物质基础和自然条件，而且也决定了其在区域一体化中的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必须把握制度创新这一本质要求，变体制差异为制度动力。从经济发展来看，应该指出，“9+2”各省区的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禀赋、产业层次差异很大，市场经济体系和发育程度也有很大差别。泛珠三角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差异性，决定区域合作具有优势互补性，决定了其合作的多层建构性。然而，制度差异和水平落差则是区域合作面临的一大障碍，与此相关的不同体制政府间的协调也是一件难事。如何保全和提升区域的整体制度竞争力，是当前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面对的重要课题。要使体制



差异转变为制度动力，现实的路径是，让体制创新滞后的地区向先进地区模仿和学习，并在实践中磨合和推动这一创新和进步。通过体制创新，努力缩小客观存在的制度差异，避免只模仿技术和工业化体系而忽视制度建设的后发缺陷，避免由于这种差异而造成非良性竞争和地方主义盲目竞争现象的加剧，变体制障碍为制度动力。

三　以建设“文化经济”为枢纽，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跨越式发展

“文化经济”，是张德江同志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经济强省”和“文化大省”的战略决策和生动实践所作出的理论新概括。张德江同志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世纪的经济，就是‘文化经济’”。

“文化经济”是对当今时代越来越突出的文化形态与经济形态日益交融、彼此渗透、相互促进现象的深刻反映，它从本质、地位、功能和作用等方面准确揭示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20 世纪下半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现象，过去常常分离的文化因子和经济因子日趋融合成一体，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顺应时势，加速文化力与经济力互相融合、互相促进，不仅仅是发展“文化经济”的重点，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强发展活力和发展后劲，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因此，要加快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实现泛珠三角的跨越式大发展，必须以建设文化经济为枢纽，通过建设文化经济构筑和形成新型的具有质的飞跃的综合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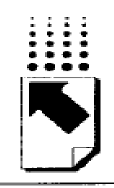
高新技术产业是发展文化经济的制高点，为此，要在 9 省区的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中牢固确立高新技术为主导的思想观念，坚持经济“文化化”的发展方向，其首要的是努力在五大产业基地建设方面取得突破：

建设大主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包括一切自然科学的应用、科技实验、技术开发、技术发明、技术传播。力争在 5 ~10 年内，把泛珠三角建设成为具有高新技术品格的工业大区域。在发展泛珠三角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要实现政策环境创新。自觉地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推进模式和政策措施。二要实现产业结构创新。大力倡导

新技术、新方法、新技能，催生一批先进实用的高新技术产品，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三要实现研发体系创新。推动各种产业、产品研发中心和“实验室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每一个价值链的作用。四是要以技术和资本为纽带，在港澳、广州、深圳和区域内省会城市、大中城市形成扇形辐射的高新技术网络，构建高新技术产业群和产业带；联合一批有较强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推进战略性结构重组，组成高新技术企业的联合舰队。

建设大工业产业——现代制造业。这种工业体系，依托先进的海、陆、空港和信息港，以高新技术为牵引，对周边区域经济辐射带动力强大。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的一部分属于临海平原型，发展临海型现代制造业得天独厚。现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世界产业向中国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三大经济区转移已成为潮流，三大经济区争相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以实现本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要在新一轮竞争中胜出，就必须发展临海工业、临江工业和山区工业发达产业带，建构世界级制造业体系及产业链和基地群，而在广大后发展地区特别是山区，建立起具有强大基础的配套生产厂并形成产业链，支持先进地区新型工业化主导基地建设，同时承接先进地区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效益和好处。本区域制造业的战略目标和重点的分布要根据客观形成的优势地位来确定。在小珠三角，要建设国际性集群式的制造业基地，培育一批核心竞争能力强的企业集团；在省会城市和其他区域中心城市，要建设区域性扇形辐射工业制造、服务和控制中心。要承接世界产业转移，不仅要对外开放，利用国外资金、物资、技术、人才等外源型资源，还必须充分利用大华南、大西南极其丰富的水电、矿藏、生态及人力等资源，并将内源型与外源型资源进行大整合，在区域内建立一批特色生产基地和开发一批特色消费市场。

建设大农业产业——现代农业和海洋江河产业。建立现代农业，要对九省区的农业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坚定不移地推进“三农”问题的“三化”建设，根据各地的天时地利条件，建设能发挥各地资源和特色优势的农业生产基地。从东往西，在各个扇面互动的经济三角区，建设包括水稻在内的主粮生产基地，建设热带和亚热带蔬菜、水果、花木等经济作物生产基地，建设林木、湿地等生态园保护基地和建设集生产、旅游为一体的热带和亚热带农业观光旅游基地。同时要把海洋与江河资源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把海洋与江河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综合发展海洋与江河产业，要抓住海洋渔业，滨海、滨江、滨河旅游业、海上和江河运输业、海洋与江河产品



深加工业、海洋与江河生物工程等新兴海洋与江河产业的发展机遇，拓展江海经济领域，形成新的生产项目。

建设大流通产业——现代物流业和现代交通业。以海港、空港集散为重点，建设现代化物流配送系统。随着大珠三角和整个华南地区集装箱货源的大量生成，要重点建设好以香港、深圳和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国际集装箱枢纽港群。当前，应积极建设深圳、广州、厦门、汕头、珠海、湛江、海口和北海等南部沿海城市的集装箱深水码头，并以此为枢纽和节点，发展现代物流业，将其培育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建立区域内统一的物流信息交汇中心、行业物流信息系统、物流企业连接客户的物流信息系统等等。要以建立华南、西南交通枢纽为目标，规划从渤海到南海沿海战略高速公路以及相互贯通的全区域高速公路网；加强铁路主干线及省际通道建设，形成与“9+2”大区域紧密联系的铁路网；要在小珠三角和各省会城市重点规划建设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系统。

建设大消费产业——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大旅游产业，泛珠三角区域各级政府要主导旅游规划，整合旅游资源。各省区和各市县要与区域的整体旅游规划相衔接；要从纵横两方面重点规划精品旅游项目和特色旅游线路。建设“9+2”地区现代服务业，要适应区域内建设有特色和优势的上述几大产业基地、文化大省（区）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质量提升的需要，创新服务方式。要按照在区域内建设几大产业基地的要求，建立和完善为生产服务的专业化服务企业，特别是要在港澳、广州、深圳和成都、昆明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建立强牵引力和大辐射力的现代服务业基地。

最后，确立文化产业在整个“文化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把文化和经济这两个长期分离而相对独立的领域高度融合起来，建造泛珠三角区域“文化经济”的强大体系。除了上述重点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五大产业基地外，还包括发展教育产业、智力产业、媒体产业、艺术产业、体育产业、健康产业和休闲产业，并加大文化产业向其他产业的扩张和渗透力，建立起完整系统的文化产业体系。既要科学规划和调整区域文化产业的生产力布局，又要实行内源型和外源型并重发展的方针，着力发展一批文化内涵丰富、附加值高的产品。鉴于整个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总体上还处于较低水平的现状，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增强原创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创作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产品。注重精神产品的软性开发和素质升华，采取一切可能手段，包括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道德

的软硬措施，坚决而有韧性地改变文化在一些地方存在的落后、庸俗、低劣等状况，恢复和提升中国文化产品的科学含量和精神活力，恢复和提升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在国际上的崇高声望，以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强有力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使泛珠三角区域的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与广东大型企业的竞争战略选择

○ 梁桂全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带来了国际产业的大调整、大转移。国际产业转移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给各地产业结构调整带来契机，同时也给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挑战，这一挑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本地政府能否形成有利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环境和条件；二是本地企业能否承受得了转移中跨国公司进入带来的竞争以及形成把握国际产业转移机遇的能力。发达国家由于产业结构调整而形成的产业转移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企业实现规模扩张和提高竞争力创造了一条重要途径的同时，也正是企业生存受到冲击最大的时候。广东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得益于外源性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在下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中，广东大型企业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抢得先机，把握机遇，正确选择竞争战略，对广东大型企业在未来培育持续的竞争优势和能力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　国际产业转移进程新特点和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和国际分工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先进国家或地区向后进国家或地区转移、传递产业，后进国家或地区不断追赶、调整、提升产业高度的过程依然存在，而且还在不断深化、发展。同时，后进国家和地区充分利用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后来居上。因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了保持竞争优势，重点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具有更高附加价值的创造性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把一般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从而不

断形成新的产业转移浪潮。

1. 跨国公司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导力量，市场和前景成为海外投资的重要因素

经济全球化导致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调整和重组。这一进程表明，目前阶段不仅体现在生产、投资和贸易等方面，而且呈现出研发、营销、服务、职业、消费全面全球化的新趋势。在这一大背景下，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推动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前，跨国公司大都自己开展主要业务，只是转移了部分劳动密集型加工装配环节。90年代后期以来，他们不但大规模转移生产制造环节，而且将转移延伸到研发、设计、采购、销售和售后服务环节，以增强核心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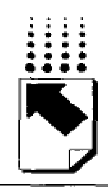
目前，跨国公司已控制了全世界生产的40%，国际投资额的90%，国际技术贸易的60%，国际技术转让的80%，科研开发的90%。由于这些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有一半左右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因此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及产业结构调整都有重大影响。

2. 国际产业转移结构高度化特征明显，出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相互转移的特征

据世界银行统计的资料显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产业转移不仅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也有发展中国家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转移的趋势，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旅游和咨询等服务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信息、电子产业）则是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

3. 高新技术产业链中的低价值环节转移加快，高价值环节的技术转移有所进展

高技术产业国际转移加快，研发全球化和本土化趋势明显。随着研发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加速，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大大提前和加快，其结果打破了传统的产品周期论，即高技术产业只有到成熟阶段、失去竞争优势时才向低成本国家转移。20世纪末以来，跨国公司纷纷在其他国家建立研发中心，争夺当地人才，利用当地资源，直接为其全球战略服务。比如，英特尔于2000年底设立中国实验室，开展面向全球的研发；微软在北京设立的中国研究院，是其境外最大的科研机构。信息产业是此轮高科技产业转移的核心，信息设备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都在加快转移。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1999～



2001 年，信息设备制造业的 FDI 达 660 亿美元，占制造业利用外资的 15.4%，居制造业各行业之首。

4. 国际产业转移出现组团式、产业链整体转移趋势

由于跨国公司社会化协作程度高，横向联系广，跨国公司不再遵循传统的产业转移的阶段进行投资，而是主动地带动和引导相关投资，鼓励其海外供货商到东道国投资，加大零部件供给当地化战略的实施力度，发展配套产业并建立产业群，将整条产业链搬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除了转移传统的制造业外，对其他生产经营环节如研究与开发、设计、中试和公司总部等，也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这种新的产业转移趋势是伴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以及区位条件的变化而出现的，它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整体企业的竞争力。因此，产业转移不再是个别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在国际生产的网络或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核心，全球范围内相互协调与合作的企业组织框架。通过这些国际生产网络，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范围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二 广东大型企业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现实条件

根据新产业分工理论，发展中国家经济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既需要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寻找合适的切入点或价值环节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又需要根据价值链的增值路径来制定产业发展战略以实现产业价值环节的升级，更需要瞄准价值链的战略环节采用突破性创新手段来谋求跨越式发展，以改变企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而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关联带动效应，可以迅速融入国际分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广东由于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具备较好的产业基础，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仍有许多因素制约着广东吸引国际产业转移，而且国际产业转移这一客观趋势也对广东企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1. 广东具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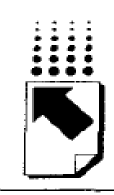
广东在改革开放以来，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使广东成为全国外向依存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全省出口占全国出口 1/3 强，而且表现出对国际市场的强烈依赖。经济全球化进程通过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深刻影响了广东经济的发展。

目前，广东经济发展已开始由工业化中期阶段向工业高度化阶段转换，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逐步向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过渡。这一趋势符合国际产业发展的规律。国外学者根据国际间通用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函数计算结果，一些发达国家在20世纪初，科技因素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中仅占5%～20%，而在20世纪末已达到60%～70%。广东城市化正进入重要发展阶段，由城市建设拉动内需的空间很大；广东对外开放承接国际（区域）产业转移正由第二波转向第三波（第一波主要是80年代承接香港传统制造业转移，第二波主要是90年代承接台湾地区传统制造业和电子产业转移，第三波将是承接欧美技术密集产业转移），同时由单向开放转向双向开放；国民经济增长动力由国有-集体（乡镇）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为主转向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为主。无疑，广东正处于消费结构升级期、产业结构优化期、企业制度创新期和增长方式转型期的重叠阶段。

广东在前期已经有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基础和经验。广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充分利用有利时机，大量吸收、利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科技扩散和产业转移，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使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得到优化。20多年来，广东已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100多万台（套），生产装配线3000多条，使半数以上的老企业设备得到不同程度的技术改造。

同时，经济全球化形成了相对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全球大市场，为广东发挥其出口产品及服务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创造了条件。在主要出口市场稳步增长的同时，广东对新兴市场出口保持较快增长。近年来，对我国香港地区及美国、欧盟、日本等市场出口合计增长28.6%，对非洲和中东等新兴市场出口分别增长52.4%和44.6%。

因此，从总体看，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对未来一段时间广东经济发展是有利的，是广东加快发展，追赶包括日本在内的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时期。目前，欧美在20世纪90年代利用信息产业急剧扩张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格局已经结束，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从目前情况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难以看到曙光，这将推动欧美资本外溢寻找新的空间。另外由于我国不仅有低自然要素成本优势，还有低成本技术优势，会加速欧美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制造业甚至研发部分向广东转移。广东要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先行优势，继续主动借助国际产业新一轮大循环的势头，乘势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广东外向型经济主要借助港资和香港加工业转移推



动。这股动力到90年代中已经逐步弱化。90年代广东外向型经济的主要动力是台资及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转移。但这股力量将逐渐弱化。下一步，广东应积极利用日本资本、欧美资本推动外向型经济上新台阶，积极吸引国际产业转移，推动广东产业结构新一轮调整升级。

2. 广东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存在的制约因素

（1）企业国际经营能力不强，自主发展的信心不足

广东许多企业虽然在口头上说进军国际市场，但在观念上并没有形成全球竞争或跨国经营的意识，也没有制定真正意义上的跨国经营战略。管理层缺乏国际化人才，缺乏掌握国际市场的能力，无法充分了解国际市场各国顾客对品牌的认同感。企业自身资金不足，同时缺乏对国际资本的操纵能力，无法以大量的资金进行市场投资，缺乏强有力的国际营销网络等。

广东相当部分企业包括部分生产设备精良、技术能力较强的企业，宁愿为别人做贴牌，也不愿意把精力投入到做自己的品牌上来。客观地说，在广东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通过贴牌等方式可以拉近我们与国际市场的距离，解决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完全满足于“打工”的位置，而把命运交到别人手中，那么，这样的企业不要说参与国际化竞争，就是在区域性的市场也难以长久立足，更不要说形成对市场有重大影响的竞争优势了。

（2）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影响承接高度化产业转移的能力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可以促进GDP增长、带来外汇收入、增加地方税收，广东对国际转移产业来者不拒，主要承接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较大比重的机械电子项目中，约半数以上为产品组装线，亦属劳动密集型。即使像电脑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广东主要还是承接了低附加值、生产劳动密集型部分。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难以消化日益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和相关生产要素成本，导致广东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日渐削弱。而且，由于“先来后到”效应的制约，已有的产业布局对后来产业会产生排斥作用，劳动密集型产业对高新技术产业会天然地排斥。更严重的是，由于没有承接到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业链，广东产业结构难以实现合理化和高级化，不利于吸引高新技术产业或导致已经承接的高新技术产业有再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危险。

（3）区位优势的逐渐消失，新的区位优势培育速度有待提高

广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广东向国内市场腹地辐射能力比长三角弱。而且长三角地区工业基础相对较强，已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基础设施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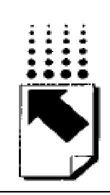
善，拥有充实的人力资源等。以此为依托，长三角地区吸收了许多跨国公司的资本密集型投资项目，如汽车、通讯、电子、精细化工等，近年来比较突出的有大石化、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等项目。从项目规模上看，长三角地区引进外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也比广东大，2002 年，上海、江苏外资项目平均规模分别是 349 万美元，广东只有 244 万美元。世界 500 强的大企业，在长三角地区有 400 多家，而在广东只有 250 多家。可以说，广东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方面的地理区位优势正在逐渐减弱。这将是在今后一个时期制约广东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

（4）高素质人才不足，高技能劳动工人缺乏

人才是发展高层次产业的关键。20 多年来，广东通过从国外大量引进资金和技术，从国内吸收大批廉价劳动力，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这种增长的人才基础是薄弱的。很多企业在“开发技术不如买进技术，培养人才不如引进人才”的思想指导下，在技术开发和人才培养的投入严重不足或者根本就没有。广东绝大多数的高等院校非常注重学历教育，但专业技能培训、岗位资格训练相对不足，使得广东制造业所必需的优秀技工缺乏，制造业从业工人一般没有受过很正规的技术培训，或者简单培训一下就上岗。这样的人才使用和管理机制造成广东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极为悬殊，必然弱化国际产业转移的技术扩散效应，最终不利于国际产业向广东转移。

三　国际产业转移对广东企业持续发展的作用和要求

经济全球化将国际分工推向更高的层次，形成了最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新雁形分工格局以及与之相应的“金字塔”的国际产业结构。从金字塔的底层到顶层，其产业技术层次、产业水平、产品附加值均呈上升趋势，同样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处于顶端的最具优势，而处于底端的最无优势。为了提高广东的经济地位，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促进广东产业结构高度化和重型化，通过发展资本市场来吸引外资，特别是吸引外国并购资本来增加广东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资本供给，仍然是未来广东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然而，通过投资形成的国际产业转移在本区域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将形成新的竞争，一方面会对



本土化企业持续发展形成动力和机会，同时也对本区域企业对抗产业转移形成的冲击和竞争提出了新的要求。

1. 国际产业转移对广东本土企业持续发展的作用

（1）有利于企业弥补自身生产要素缺乏

广义而言，要素是产业可以获得的、能使其有效生产出对消费者有用产品（服务）的有形或无形的统一体。它包括有形要素，如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也包括无形要素，如劳动者技能、知识和生产技术等。由于产业转移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资本、技术的转移，也伴随着其他无形要素的进入，具有综合性，因而接受产业转移能够使欠发达区域迅速积累起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为区域经济的起飞创造条件。广东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广东外向型经济发展经历了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第一波是香港产业，以传统的服装、五金产业为代表。第二波以台湾产业和台湾资本为主，其产业档次明显高于第一波转移的香港产业。现在是第三波产业转移，以日本韩国大量的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以汽车等为代表，这个产业群有利于在轻化和重化工业两个方面展开，因此比第二波的台湾产业又高一个档次。可见，正是由于产业转移，弥补了广东企业自身所存在的资金和技术要素不足的问题。

（2）有利于企业学习新的技术

产业转移往往是由经济梯度较高的发达区域进入梯度较低的欠发达区域，具有梯度性。这种梯度性决定了欠发达区域移入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一般要高于当地产业的平均生产技术水平，这样，移入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将发生作用。技术溢出效应是指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输出的先进技术被输入方消化吸收所导致的技术进步，以及技术转移过程所带动的输入方的经济增长。技术溢出效应产生途径有二：一是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硬途径，即由于移入产业所包含的技术本身被移入区产业模仿、消化、吸收，导致移入区产业的技术进步；二是软途径，即具有先进技术的移入产业在对移入区相关产业产生前后波及作用的过程中，往往会拉动后者的技术进步。无论哪种途径，都将促进移入区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可以使企业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迈克尔·波特明确指出："采用一项重要的技术革新可以使企业降低成本，同时又提高别具一格的形象"。

（3）有利于发展关联企业，延长产业链

产业关联是指产业之间存在的广泛、复杂而密切的联系，包括后向、前向和旁侧关联。产业的关联带动作用实质就是移入产业关联效应的发挥过

程，包括：第一，后向关联效应，即移入产业的发展会对各种要素产生新的投入要求，从而刺激相关投入产业的发展。第二，前向关联效应，即移入产业的活动能通过削减下游产业的投入成本而促进下游产业的发展，或客观上造成产业间结构失衡而使其某些瓶颈问题的解决有利可图，从而为新的工业活动的兴起创造基础，为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提供可能。第三，旁侧关联效应，即移入产业的发展会引起它周围的一系列变化，如促进有技术性和纪律性的劳动力队伍的建立，促进处理法律问题和市场关系的专业服务人员的培训，以及促进建筑业、服务业的发展等。国际产业转移的关联带动作用是产业转移的重要功能，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催生出产业集群，如东莞的 IT 产业集群的发展就具有这样的特征。

（4）有利于企业更新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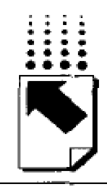
观念落后是欠发达区域一笔沉重的历史遗产。来自发达区域的产业移人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因为先进产业的移入必然伴随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文化的传播与扩散，即产业转移带来的不仅是品牌、资金、技术等有形资源，更有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意识和新的管理方式等无形的资源。这些无形资源将进一步对广东传统观念起着融合、更新、改造作用，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精神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转移也加剧了竞争。一方面，移入产业与当地产业相比，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营销手段等方面往往占据着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使当地产业卷入竞争之中，打破了原有的市场结构；另一方面，随着企业的增多，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也会增加，从而导致要素价格的提升。比如，珠三角“民工荒”问题近年来日渐突出，仅东莞市目前缺工达到 30 万人。缺工引发了恶性竞争，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高。

2. 国际产业转移对广东大型企业持续发展提出的战略要求

（1）要求广东大型企业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实现产业升级

经济全球化所催生的产业全球化，加速了各国、各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对广东企业而言，在全球化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立足于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其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处于全球化的劣势地位，极大地降低广东企业持续发展能力，且长期坚持必然使产业固化难以升级，也无法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胜，最终将拉大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显然不能作为广东的产业调整方向；相反，放眼于发展战略的资本、技术密集的前景产业，虽然面临巨大的冲击，但它具



有广阔发展前景，有无限发展潜力和持续竞争优势，发展它们本身就是产业结构的提升，竞争力的提高。

因此，作为经济细胞的企业必须提升技术水平，主动承接欧美技术密集产业转移，积极利用日本、欧美资本推动外向型经济上新台阶，从而推动广东产业结构新一轮调整升级。

（2）要求广东必须实现产业组织创新，大力发展内源性企业

实施内源发展战略，可以开拓广东经济发展的新境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倚借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率先对外开放，借助外力和国际产业大循环，迅速推动了工业化起飞，形成了外向依存度很高的开放型国民经济发展新格局。其中，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外向型经济群聚的国际加工业基地。20多年来广东采取外向带动战略推动工业化起飞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在目前外“强”内“弱”的格局下，广东要想融入新一轮的国际产业大循环，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就必须加大内源经济发展的力度，形成内源发展与外源发展互动共进，相得益彰的新格局，才能保证广东安全、顺利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促进经济的发展。

（3）要求广东企业必须加快培育国际竞争力

企业国际竞争力直接表现为一个企业能够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在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因此，企业要想利用国际产业转移之机，必须着力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据研究，广东工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不强，除大型企业在上海、山东、浙江、江苏、北京等省市中排名第一外，其余均处于中等水平。广东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发展迅速，但因政策等外部配套条件不完善，其竞争力仍低于浙江和上海等地。

广东企业只有提升国际竞争力，才能增强生存和发展能力，才能适应新的环境变化。任何经济体都依存于一定的经济环境来发展，随着环境不断变化，经济体必须不断调整、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才能最终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得益。这是因为，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企业直接或间接地得到国际经济发展好处的门槛正在提高。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就是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要求企业培育新的生存竞争能力。

（4）要求企业经营者必须有新的国际经济战略观念

企业的经营者必须从长远发展的战略视角思考这样的问题：一是如何不断地改善和提升企业的战略地位，特别是要优化其战略地位；二是如何优化企业在国际地缘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优化在国际产业链或价值链中的商业地

位等；三是如何提高自身的生存、发展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发展的战略地位。特别是近几年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国际化、经济全球化、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市场主体多元化、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交错发展等，因此，广东企业必须走向战略时代，必须注重构筑国际竞争力，其中的关键则是开展战略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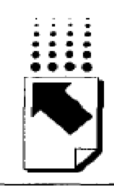
四 在国际产业转移进程中实现广东大型企业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广东企业在国际产业转移的进程中要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如果仅仅关注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更多地关注发展的能力，将使广东的发展陷于短期行为模式中而丧失前瞻能力和驾驭发展战略全局的能力，错失企业所面临的历史机遇。因此，必须使企业的发展由只关注发展的结果转向既关注发展的结果，更重视持续发展能力的强化上；由只重视发展的规模、速度转向既关注发展的规划速度，更关注发展的效能与质量上；由只关注经济的发展转向既关心经济的发展，更重视经济与环境、社会、文化和人的协调发展上；由过去靠拼资金、资源的发展转向依靠知识、智慧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上来。换言之，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增强发展能力，包括提升企业家素质，增强产业竞争力、制度竞争力、文化竞争力，依靠人的综合素质和人的发展能力的提高，从而培育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

1. 实施企业自主创新战略，培育广东企业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自主创新对企业持续发展的支撑功效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自主创新活动使企业能够领先一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产业领先者。不论是成本、技术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领先都能使企业拥有比竞争对手更大的回旋余地。有利于在国际产业转移中形成竞争优势；二是自主创新有利于企业创造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三是自主创新活动能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与发展，培育企业的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四是创新能给企业创造出奇制胜的机会。

由于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跨国投资更趋系统化，产业链的连锁转移显现。生产能力的转移不再是个别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形成了以领导企业为核心、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协调的国际生产网络或体系。这种系统转移和在国外配套的现象，促使现代市场竞争由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演变为全球生产体



系或全球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企业如果要在产业链中处于高价值环节，就必须通过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只有技术创新才能降低产品成本、增强产品特色并进而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同时要求企业实现全面创新，这是因为：制度（主要指所有制与分配制度）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证，它们提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管理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企业生产力的提升（因为管理也是生产力）；产品创新和营销创新则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桥梁与纽带，因为只有通过产品创新与营销创新，企业才可能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并将其成功推向市场。总之，市场的激烈竞争与环境的迅猛变化以及科技与时代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迫切需要企业通过持续不断的自主创新来赢得竞争优势，以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中外企业发展证明并仍将继续证明，企业创新则生与兴，不创新则亡与衰，而且企业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创新才能实现持续发展。针对广东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少，高技术被垄断的多，相当部分企业从事低端、低档产品的加工装配等特点，必须迅速培养技术力量，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体系，增强自主技术创新能力。

2. 企业家要有广阔的视野，培育国际化产业精神

国际产业转移给企业带来了不断拓展生存空间的机会，同时也要求企业家不断提升自己的战略判断能力。这就要求企业家的眼光要看到更广阔的市场，追求国际经营灵活多样化的企业战略。作为 21 世纪的企业家，应该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从全球化的高度，进行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质量的战略策划，树立国际竞争的观念和勇气，从精神到力量上为所经营的企业发挥核心作用。应把战略重点投向国际化产业经营，并为经营管理实施尽最大的努力。换言之，企业家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需要培养强大的国际化产业精神。企业的经营力强弱体现在国际市场较量的竞争力绝不亚于国际社会其他领域的竞争。这就对企业家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在这种国际化产业精神的支持下，企业家对企业所经营产业和产品或服务的管理就能形成独特的方法：在产业上有“产业的先见之明”，不断以创意来提高资源要素的利用率，借以克服资源不足的问题；引导分散的力量形成核心专长，先行进入新发展的国际产业；在市场上有灵敏的感觉，能够透过市场微弱的信号迅速形成企业产品的转向；在内部管理上有综合的观察能力和组织能力，通过整合不同部门、不同专业人员组织来形成和发展“策略架构”，以构成有国际化经营能力的有序组织。

3. 确立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使企业的发展融入全球化产业链

广东得开放风气之先，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主要是出口）、引进外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带动经济发展，提高企业的再生产的投入水平。同时大量引进外资，与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相结合，使得广东的加工制造能力得以提高和充分发挥。在这一过程中，广东许多企业实现了外向型经营，但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的行为。这对于融入经济全球化，在国际产业转移中争取发展机遇是不利的。

利用国际性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实施经营国际化战略、市场结构调整战略，通过国际化实现企业战略性调整，是企业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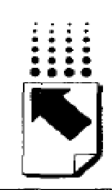
对于处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来说，主要是通过吸引国际资本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环节，使自身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利用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规律来发展自己，以逐步缩小与价值链高端企业的利润差距。

对于处在高新技术产业链的企业，必须充分认识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风险高、产品生命周期短、市场前景较难把握等特点。在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过程中，充分注意避免企业一种产品还未推向市场，就有可能被跨国公司更先进的技术与产品所替代，惨遭被扼杀在襁褓中的厄运。为提高技术和产品的生命周期，减少风险，提高竞争力，制造业跨国公司已经逐渐加强了研究与开发的全球化合作，因此，在培育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上，把企业融入到跨国公司的研发体系中去。

为了使企业竞争力得到充分的延伸，保持竞争力的持续性，企业必须把虚拟制造作为国际化经营的战略重点。虚拟制造是指因强化外部资源利用和特许经营而几乎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场所和销售渠道的企业。虚拟制造只有在利用信息技术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和发展。虚拟制造使得一些具有核心能力或资源的人或组织不必具有传统的企业实体，凭借先进的信息通讯联络手段，调集别人的力量，以其独有的核心能力或资源就能实现其战略构想。

4. 根据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调整企业的产业战略

随着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产业结构对于企业的盈利能力越来越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选择一个好产业远胜于选择一种好产品。美国战略学家迈克尔·波特指出："在一些产业中，很少的生产过剩也会引起价格战和导致较低的盈利能力。这是一些对激烈竞争和强有力的购买者施加结构性压力的产业。在其他产业当中，由于结构理想，生产过剩时期对盈利能力只产生相对来说微乎其微的影响。"显然，如果企业在一个前途暗淡



的产业中运作，有可能付出极大的努力而只可能收效甚微，更难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因此，企业必须对参与何种产业的竞争作出选择。

目标产业的选择，不仅是在企业处于创业之初，也不仅是在企业发生危机之日，即使当企业处于蒸蒸日上之时，也应居安思危，既要考虑在目前产业内核心竞争力的保持和提升，以维持竞争地位，也要考虑未来应选择什么产业。因为从理论上说，任何产业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企业目前进入的产业在未来都会逐步走向衰落，企业现有的较强的核心竞争力也会随着竞争对手的复制模仿和市场需求特点的变化而不断被削弱，甚至会从根本上被新的市场需求所淘汰。因此，企业应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处产业生命周期的阶段性，当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变化时，适时进行战略调整和转移，变换自己的产业领域，重新构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首先要选择那些在市场上处于成长的、能够为企业提供长期盈利的产业。如果是处于衰退的产业，进入的风险就很大。而决定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和根本因素是产业的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目标产业的吸引力越大，企业选择的成功率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其次，要顺应国际产业组织结构变化的趋势，改变产业链上的企业组织方式。根据比较优势和产业链区别定位之上的区域分工和合作机制，确定企业在产业链上的地位和优势，选择既有发展前景，又能向产业链两端延伸的产业环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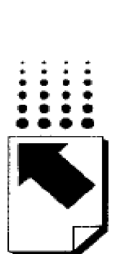
最后，围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方向，大力发展自有配套加工能力，争取优势外资企业（技术型和资本型）与本企业形成制造或市场上的产业关联，融入到国际制造业产业高端加工制造体系中去。

对于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要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建立本企业同大中型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形成小企业对大中型企业的专业化配套和专业化服务，提高生产的社会化水平。

为了与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外资强势企业实现竞争与抗衡，企业在战略定位上应考虑自身的规模定位。具备规模优势，才能在国内市场国际化经营中具备竞争力。这种规模不是一种企业自己的生产规模，而是一种通过资本经营、“品牌”经营所能控制的生产规模、市场规模、资本规模，是现代意义上的规模。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其他经济区



对青岛市建设为山东半岛城市群龙头城市的分析

○ 马传栋

一　对青岛建设为山东半岛城市群龙头的条件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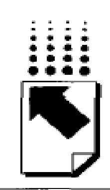
青岛过去一直被定位为山东省对外开放的龙头，但近两年中共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对青岛寄予的厚望已远不止于此。2005 年省委、省政府将发挥青岛市的龙头带动作用，作为突出抓好的 5 项工作之一。推动青岛强势崛起，已经成为山东省经济发展全局的必然。

（一）青岛作为龙头城市的条件和潜力

青岛位于中国内地伸向西太平洋的最前端，与日韩地缘相近、人缘相通，经济外向度高达 96%，国际知名度大，是日韩产业转移的最佳桥头堡，目前落户的世界 500 强企业已占全省的 65.2%；2004 年实际利用外资和出口分别占山东省的 35.6% 和 44%，具备了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协作的坚实基础，最有条件率先建成面向国际特别是日韩的产业协作区和制造业基地。

1. 国际化大港口和航空港是一个城市参与国际分工、集聚生产要素、拉动区域发展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这方面青岛优势独具

青岛有着天然的海陆优势，众多的优良港湾，海岸线长 730.64 公里。现在，青岛与上海、广州、天津、大连并称为中国五大外贸口岸。青岛既是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和西北地区进出口物资的主要集散地，也是太平洋国家与欧亚大陆国家联系的纽带。2003 年，青岛港与世界三大航运巨头马士基、



铁行、中远成功联姻，斥资8亿多美元合资经营前湾集装箱码头，成为中国最大的码头合资项目。此次合资目的不仅在于引资，更在于引航线、引市场，加速把青岛建设成为中国北方航运中心。青岛港集装箱日吞吐量已由西移前湾港前的每日平均不到万箱，迅速达到2004年的每日17060标箱。而且西移两年来，年集装箱吞吐量连续跨越300万和400万两个百万大关，年增幅达30%到40%，2004年超过500万标箱。以此为龙头，还可将腹地延伸至拥有全国26.2%的人口和25.9%的生产总值的沿黄9省区。

至2005年11月14日晚6时，青岛港吞吐量完成1.6265亿吨，一举超过2004年，317天干了2004年一年的活；至2005年10月18日，青岛港总收入也超越2004年全年。预计2005年青岛港集装箱运输量将超过600万标准箱。继续大大领先于北方的各大港口。

2005年11月15日，从韩国仁川返程降落在青岛流亭国际机场的CA134航班迎来了100万位出入境旅客。这也是青岛空港口岸出入境人数17年来首次突破百万大关，由此，青岛流亭国际机场继北京、上海、广州、厦门之后，跻身全国开放口岸城市五强之列，使山东半岛城市群有了自己联系全世界的航空口岸。目前，青岛空港口岸已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等10家中外航空公司进行航线经营，国际客货运航线18条，航线范围涵盖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韩国、东南亚，并通往欧洲（法兰克福、巴黎）、美国（洛杉矶）等国家与地区。目前，民航总局又批准青岛至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航线，年底可运营。

2. 青岛已经成为中国和山东省开放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十五”期间，青岛GDP年均增长超过15%，2005年总量比2000年翻一番多（见表1）。品牌众多，产业基础雄厚，经济增势迅猛，发展潜力巨大，为青岛确立龙头地位奠定了实力。青岛经济“十五”计划主要指标已提前一年完成。同时，由于2005年保持的高位运行，预计“十五”期间，全市GDP平均增长速度将超过15%，总量将比“十五”前的2000年翻一番多。从综合经济实力看，2004年全市生产总值为2163.8亿元、财政总收入49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30.5亿元，分别占全省的14.0%、18.5%和15.8%；从对外开放度来看，2004年青岛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省的36.6%，进出口总值和出口分别占全省的44.4%和44.0%，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5位。

表 1 “十五”期间青岛市的 GDP 及其 GDP 增长率

单位：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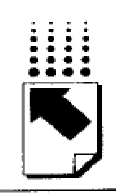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1~9 月
GDP	1150.1	1316.1	1518.2	1780.3	2163.8	1896.5
同比 GDP 增长率		13.7	14.6	15.9	16.8	17.0

资料来源：青岛市统计局

审视青岛工业的百年历程，“轻型”产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产业结构尽管对青岛发展贡献不小，但产业链条短、拉动能力弱却相当突出。增强对自身及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首先要让产业结构“重”起来。着眼于此，近几年青岛抓住国际重化工业加速向外转移的难得机遇，以引进培植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为突破口，带动家电、电子、石化、汽车、造船、港口 6 大产业集群强势崛起。年加工进口原油 1000 万吨、实现销售收入 300 多亿元的大炼油工程，近期年产值可达 76 亿元的大造船等一批大项目纷纷落户开工。这些产业具有增长速度快、增长周期长、产业关联度高、产业链条长、辐射带动能力极强的突出优势。一个大项目落地，众多上下游企业纷至沓来的集群效应在青岛已开始显现。以修造船项目为例，2004 年 7 月与中船重工全面合作协议刚一签订，韩国浦项制铁、新加坡郭氏兄弟、宝钢等相关产业巨头闻风而来，武汉重工铸锻、重庆齿轮厂、陕西柴油机、725 研究所等“六厂四所”更是风从影随，一个以造船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在青岛已具雏形。创建于 1985 年的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20 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4 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 275.1 亿元，工业总产值 587.1 亿元，区域性全口径财政收入 31.7 亿元，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国家级开发区第 4 位。一个投资环境良好、以开放性经济为主体、社会事业日益繁荣的新城区正在逐步形成。

3. 有发达的山东经济和日益发展的黄河流域经济区作为港口和城市的腹地

2002 年，青岛港的集装箱运量达到 341 万标准箱，基本是天津港和大连港两大港的集装箱运量之和（2002 年上述两港的集装箱运量分别为 210 万和 121 万标准箱）。2003 年，青岛港吞吐量突破 1.4 亿吨，其中，全年集装箱运量跨越 420 万标准箱，在全国居第三位；外资运量达 10247 万吨，居上海之后列第二位；全年集装箱运量继续超过当年天津港的 301.5 万标准箱；



到2004年青岛港的集装箱运量已达到510万标箱，天津港集装箱运量达381.5万标箱。预计2005年青岛港能突破600万标箱。

青岛港在集装箱运输方面之所以能大大超过大连港和天津港，除了有港口自身区位和管理等优势外，其背靠迅速发展且总量巨大的山东经济板块优势已越来越明显，而大连港背靠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板块最近几年就未为其提供如山东经济板块迅速发展的货运需求。2002年大连港背靠的东北三省和天津港背靠的京津冀三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都在1.1万亿元左右，同总量过1万亿元的山东经济板块大体相当。2003年东三省、京津冀和山东三大经济板块的经济总量又分别升至为12957.3亿元、13094.24亿元和12430亿元，山东与前两大经济板块的差距在进一步缩小。2004年山东省的经济总量已分别超过了京津冀两市一省和东北三省两大经济板块的经济总量（见表2）。

表2　中国北方的三大经济板块2004年的GDP总量和吸引外资数量表

京津冀经济圈板块			东北三省经济圈板块			山东省经济板块		
省市	GDP总量（亿元）	实际利用外资总量（亿美元）	省市	GDP总量（亿元）	实际利用外资总量（亿美元）		GDP总量（亿元）	实际利用外资总量（亿美元）
北京	4283.3	30.8	辽宁	6872.7	54.1	山东半岛城市群8市	10179.3	82.7
天津	2931.9	24.7	吉林	2958.2	5.7			
河北	7095.4	19.8	黑龙江	5303.0	14.5	其他9市	5311.4	15.5
合计	14310.6	75.3	合计	15133.9	74.3	合计	15490.7	98.2

资料来源：2004年度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等省市经济社会统计公报。

从这一点说，青岛港乃至青岛市的发展离不开山东腹地的发展，而山东的振兴也离不开青岛港和青岛市的超常规发展。可以说，青岛市和青岛港已同山东半岛城市群及整个山东经济初步形成了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和相互促进的格局。这为青岛市成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经济龙头城市和东北亚国际接点城市创造了良好条件。

青岛海关和山东省12个内陆海关已经全面实施“属地报关、口岸验放”的通关新模式，一个一体化、大物流的通关新格局已见雏形。该模式在山东省东西部间架起一条畅通无阻的通关高速路。目前已确定实施这一通关模式

的有临沂、枣庄、菏泽、济宁、泰安、聊城、德州、滨州、济南、淄博、东营、潍坊12个内陆海关，黄岛海关为口岸海关。该模式实施后，享受最大实惠的是广大的内陆进出口企业。“属地报关、口岸验放”的通关模式对营造山东口岸“一体化、大通关、大物流”新格局，使青岛港和山东腹地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对促进青岛港和内陆地区经济持续均衡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

（二）青岛作为龙头城市的差距分析

从所处位置来看，青岛理应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但从综合实力和目前所起的作用看，青岛距离龙头城市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

在区域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是成为龙头城市的重要标志。目前上海GDP已经占到长三角的27.5%，深圳、广州已占珠三角的60%，而青岛2004年的经济总量仅占山东半岛城市群的21.25%（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2004年青岛GDP只是处于GDP第二、三位的烟台和济南的1.32和1.33倍，其首位度远远低于上海在长三角和广州在珠三角的相应的首位度。

表3 2004年青岛市GDP占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比重

	青岛	济南	烟台	潍坊	淄博	威海	东营	日照
GDP(亿元)	2163	1618	1639	1246	1230	1008	856	389
人均GDP(元)	30464	27423	25371	14710	29782	40809	48636	13992
半岛八市GDP总合(亿元)			10179					
青岛占半岛城市群的比重(%)			2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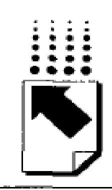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1. 产业拉动能力不够强

尚未与周边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主导产品家电产业省内配套率不足20%，计算机、手机不到10%，船舶、石化等辐射带动能力极强的重化工业还未形成突出优势。

2. 城市规模不够大

城市规模与辐射带动能力密切相关，但目前青岛的城市人口仅246.8万人，属中等城市规模，生产要素集聚能力还不够突出，对周边拉动能力也大受限制。



3. 服务业发展不够快

龙头中心城市最显著的标志是发达的服务业，但青岛2004年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仅占GDP的16.9%；金融保险业比重比全省平均水平还低1.8个百分点；国外驻青商务代表机构1677家，但金融机构仅8家；物流以水运为主，铁路、公路分别仅占12.3%和3.7%，商贸物流规模小，枢纽功能比较弱，缺乏大型贸易中心和批零集散市场，消费品零售额一直居济南之后。

4. 技术研发能力不够强

高端关键技术决定着产业的发展方向、控制能力和利润水平，是龙头城市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的重要方面，但青岛尖端研发机构还比较少；科研力量甚至落后于济南，中高级专业人才在全国城市中仅排23位；最具优势的海洋科研主要集中于基础性研究领域，对海洋产业发展带动作用很小；作为支柱产业的家电电子产品处于产业链条末端，附加值不足5%；工业产值利润率甚至低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

龙头城市的聚集扩散功能还与腹地大小直接相关。目前上海的腹地已遍及长江流域，广州甚至把腹地扩大到包括华南9省区在内的泛珠三角地区，大连的腹地则直达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但青岛港作为沿黄九省区的出海口，目前来自省内的集装箱占比高达90%，这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青岛集聚辐射能力的提高。

（三）市场经济发展推动着青岛－龙头城市的崛起

国内外城市群发展的实践证明，一个区域的龙头城市的崛起和发展是区域市场经济发展和选择的结果。青岛的龙头带动与腹地接轨青岛，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市场经济的力量，才能促进这一双向驱动。

青岛市当龙头，要有龙头的发展速度，要起到龙头的辐射带动作用，要做出龙头的贡献。目前青岛在山东省经济中占的比重还不够大，发展还不够快，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快发展。腹地接轨青岛，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跳出地区经济小圈子，融入半岛一体化发展大框架。日照、即墨、胶州、乳山、高密等青岛周边地市，借助地缘优势，加快与青岛接轨，主动接受青岛辐射带动，使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05年即墨市平均每个月都有五、六个过千万美元或5000万元人民币的大项目落户。即墨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毗邻青岛、与青岛产业错位互补的优势。在纺织服装业等劳动密集型

产业渐渐退出青岛市产业中心区的时候，即墨市看准这一机遇，承接项目转移，迅速把这一产业做成了由近千家纺织服装企业支撑的支柱产业。同样是错位竞争，由于临近青岛港，胶州市更多的承接了青岛制造加工业和仓储物流业。在胶州市引进的500多个青岛项目中，唱主角的都是汽车造船配件、家电电子配件等与青岛互动发展的新兴产业。

除即墨、胶州等地外，更多的地市也把接轨青岛看作利用这一平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在高密，不仅60%的新增规模以上企业来自青岛，而且主动对接青岛，已经被列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点。在乳山市，“借青兴乳”战略的提出，已经在实施四年的时间里打造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从最初的借名气、借人气，到现在接项目、借产业，越来越多的青岛企业把目光放在了乳山。

与青岛毗邻的日照市，在接轨青岛上最早开始了扎扎实实的行动。两个城市先后就农业协作、制造业协作、服务业协作、人才、物流、金融、旅游等29个方面的合作签署了协议，这也是半岛城市群之间的第一次政府间的全面合作。协议签署以来，两市之间的双向投资总量已经超过了6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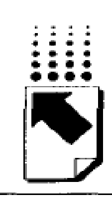
二　以举办奥运海上项目为契机，构建有青岛特色的国际大城市框架

（一）构筑起青岛有特色的国际大城市框架

青岛市委、市政府确立了以青岛、黄岛、红岛“品”字形三点布局和以滨海大道为主线展开的城市发展格局，构筑起有特色的国际大城市框架。为此，青岛市加快了东西快速路、中山路改造、奥运场馆等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搞好流亭国际机场扩建及周边环境建设，使青岛国际空港进入全国区域中心空港行列；启动跨海大桥建设，促进实施“西移战略”，加快黄岛发展。积极研究红岛地区的开发建设政策，按照现代化的标志性区域进行建设。

青岛市近几年发挥山、海、城浑然一体的优势，以“山、海、城、文、商”为主题，抓住奥运机遇，加快青岛城区及汇泉湾改造、滨海步行道建设、崂山风景区等旅游资源深度开发等项目建设。

在四大产业基地建设中，西海岸作为青岛产业调整、结构调整的最大着陆点，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适应这一战略的实施，青岛市将大青岛的规划



视野，扩展到胶州、胶南两市的部分区域，这个区域以胶州和胶南城区为两端，以同三高速、环海高速、滨海公路及204国道为轴线构成的带状区域，总面积约为920平方公里，具有强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将成为山东省和环黄海范围内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也将成为大青岛最具发展潜力和前景的地区。预计2020年，青岛中心城区人口将达到400万。其中新增人口将首先主要向西海岸集聚，西海岸核心城区人口将达到160万左右。东部城区将基本稳定在240万人左右。

2005年6月，青岛海湾大桥项目开工建设，2008年奥运会前通车。届时，青岛市不但将告别青岛、黄岛“青黄不接”的历史，还将增添一座代表城市形象的超大型标志性建筑。

现在，作为新规划主轴线的300公里滨海大道，特别是沿线的海湾大桥及连接青黄两岛的海底隧道即将打通。青岛现代商务集中区、黄岛临港重化产业集群聚集区、红岛海洋科研出口加工产业区三个特色鲜明的经济增长极及琅琊、胶南、红岛、鳌山、田横5大特色组团沿滨海一线次第展开，并迅速串线成珠，进而产生强大的辐射和集聚效应。

到2020年，青岛市将以都市区总人口900余万，90%的城市化水平，市域GDP11000亿元，人均GDP1万美元的城市规模，跨入中上等国家收入水平行列。届时，一个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文化昌盛、社会文明、生活富裕的新青岛，一个拥抱胶州湾、辐射山东半岛、放眼世界的大青岛，将在中国北方崛起，在世界城市之林中崛起。

（二）以举办奥运海上项目为契机，加快滨海宏大的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及其配套工程建设，提高青岛老城区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日益临近，青岛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建设将全面展开。该工程在浮山湾，陆上占地42公顷，水上占地约150公顷。另外，作为奥运重点配套项目，投资逾30亿元的前湾港疏港专用线主体已完工；而滨海交通大道和青银高速路二期等项目也将陆续开工建设；总投资12.46亿元的流亭空港扩建工程进展顺利并已现雏形；而投资11亿元建设4个污水处理厂，将使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65.5%。这些工程建成后将大大提高青岛市的现代化水平。为解决城市交通高峰期主干道的“卡脖子”问题，青岛把轨道交通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争取“十一五”期间开工建设第一条城市地铁。

三 建设与龙头城市相对应的产业体系

青岛市要建成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龙头城市和东北亚地区国际化城市，必须建设青岛市具有国际化竞争力的产业结构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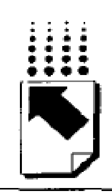
（一）建设具有国际化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2005年6月22日，新世纪中国第一个千万吨级炼油项目——青岛大炼油工程在黄岛开工。青岛大炼油项目是经国家发改委批准、跨“十五”、“十一五”计划的石化战略项目，由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青岛市国信实业公司三方共同出资，具有规模经济、技术先进和环保领先的特征。一期工程综合配套年原油加工能力为1000万吨，拟建常减压、催化裂化等10余套主要生产装置，可年生产成品油760万吨，化工轻油100万吨，轻油收率超过80%，实现年销售收入300多亿元，预计2007年下半年建成投产。

在西海岸石化基地内，除了大炼油、丽东化工项目以外，包括中燃油、韩国液化码头、法国液化空气等一批大型石化项目也已经投产或正在开工建设。这些项目的建设，不仅将在青岛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石化工业产业集群，同时还将使青岛西海岸成为江北最大的石油化工基地。

青岛市正进一步促进海尔集团、海信集团、澳柯玛集团等特大型信息家电企业的发展，真正把青岛建成世界级的信息家电制造业基地。青岛家电业则利用名牌优势和技术优势吸引了包括三洋、爱默生等世界著名家电企业落户青岛。地处于南方的TCL公司也看中青岛家电业聚集的产业氛围，在2004年年底移师北上，将彩电生产基地建在了青岛。数十家以上关联企业居于一定区域，数家龙头企业相互依托，形成产业链完整、规模巨大的产业群落，成为一个地区的工业支柱。大企业、大品牌聚集的青岛具备建设产业集群的先天优势。2005年，在青岛着力推进的石化、汽车、家电、造船、港口、电子信息六大产业集群中，22个项目已经开工或投产，完成投资超过350亿元，而正在洽谈和申请立项的重点项目也达到60个，投资总额近600亿元。重型化和集群化发展战略，使青岛工业的核心竞争力明显提升，产业链条的加长，也为更好的带动半岛制造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初步预计，全市工业总产值到2007年将达到6800亿元左右，到2010



年达到1万亿。届时，石化、汽车、造船、电子、家电、港口六大产业集群将基本形成规模，产值比重占到全市工业的70%左右，使青岛成为重要的现代化国际制造业基地之一。

未来几年，青岛的六大产业集群将向着更为高远的目标迈进：

——以大炼油、LG精油化工、高合化纤、SK化工为核心的石化产业集群，将以大炼油为龙头，带动整个石化基地的腾飞，2007年产值达到1000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达到10%，进入国内石化基地前五名。到2010年产值达到2000亿元以上。

——以一汽集团、上汽集团等为核心的汽车产业集群，争取在3年内各种汽车产量突破20万台，2007年产值达到600亿元，2010年产值达到1000亿元。

——以北船重工等企业为核心的造船产业集群，争取在3年内造船吨位达到180万吨，进而实现460万吨的造船能力，2007年产值达到300亿元，到2010年产值达到900亿元。

——以海尔、海信、朗讯、LG等企业为核心的电子产业集群，争取实现电子和光通讯、基站、软件、芯片等产业的迅速突破，2007年产值达到400亿元，2010年产值达到900亿元。

——以海尔、海信、澳柯玛等企业为核心的家电产业集群，调整结构、提升能级，2007年产值达到1400亿元，到2010年产值达到1800亿元。

——青岛港将成为中国北方第一、中国内地沿海第三、世界第十三大集装箱港。根据前湾港发展规划，预计到2010年，集装箱吞吐量为1000万标准箱以上。青岛不仅要成为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而且要跻身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

六大产业集群蓬勃崛起，带来的最大收获当是青岛大工业体系架构的初步完成，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据预测，到2007年，青岛市重化工业比例将提高到6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重达到45%；到2010年重化工业比例提高到65%，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重达到50%。届时，六大集群将挑起青岛工业的大梁。

（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力促海尔集团成为全球500强企业

目前世界很多国际化城市都是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城市。青岛要成为国际化城市，也必须成为这类城市。

海尔集团2003年实现全球营业额突破800亿元，折合97亿美元，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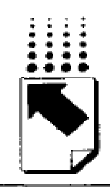
世界500强入围线的12/13。2003年，海尔蝉联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第一名。海尔六大类产品市场份额继续占据行业榜首。2003年8月号的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美国以外25位全球最杰出的商界领袖"，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名列第19位，是中国内地唯一入选的企业家。2003年12月18日，美国道琼斯公司旗下的《远东经济评论》公布了年度"亚洲企业200强"最新评选结果，海尔集团再次荣登中国内地企业综合领导力冠军宝座。评选的五个单项中，海尔有三项名列第一。所以，按目前的发展势头，在最近一两年中，海尔有作为中国第一个制造业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可能。青岛市要为海尔集团这一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成功典范进一步创造条件，使这一让所有中国人都期待的梦想变成现实。

（三）大力发展青岛市的现代服务业

要建设山东半岛的龙头城市和东北亚区域国际化城市，除了要大力发展制造业外，还必须大力发展青岛的现代服务业，全面提升城市综合功能、创新能力和招商引资力度。要适应消费需求多元化、高级化和产业发展边缘化趋势，积极促进休闲经济、楼宇经济、总部经济、会展经济、现代物流经济、知识经济、培训经济、留学经济、气象经济、海岸经济、婚礼经济以及时尚产业等新型经济形态的发展，不断增强都市经济的发展活力和城市的时尚魅力，提升城市综合功能、知名度和吸引力。青岛市内四区要发挥各自优势，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加快建设现代服务业聚集区、软件信息产业区、滨海旅游休闲区、现代商业品牌区、都市工业的集中区等，构建实力强大、具有时尚价值和创新性、包容性、多元性的都市经济圈，避免老市区经济出现"空心化"倾向。

在青岛市众多的会展中，一年一度的青岛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作为中国以及亚太区最大的专业消费类电子展，具有显著的地缘优势。到2004年，每年6月份举办的青岛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已成功举办三届。2005年，国际消费电子领域著名品牌展会——美国国际消费电子展（CES）落户青岛，无疑将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展览市场注入新的活力。青博会在成功引入CES后，经过更名后的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SINOCES）于7月在青岛举办。

目前，青岛电子家电生产已基本形成规模，2003年全市家电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20%。家电产品制造业实现销售收入897亿元，占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的27%。家电集群中的海尔、海信、澳柯玛三大龙头企业，2003年除自身1300亿元的销售收入和43亿元的税收外，还带动了800多家配套企业的发展。海尔集团在青岛开发区的家电制造基地引来爱默生、三洋、三菱重工等33家跨国公司投资30亿元。山东半岛还拥有目前中国最大的电子、家电制造业集群，年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

2005年11月11日，青岛区港联动试点区域——青岛保税物流园区正式通过海关总署等八部委验收，开始封关运营。这标志着青岛市向自由贸易港建设迈出重要一步。青岛保税物流园区整合了港口区位优势与保税区的功能优势，将保税区政策覆盖到港区，实现港口与保税区之间的区域联动、功能联动、信息联动。

2004年4月已开通的青岛－郑州－西安－乌鲁木齐－阿拉山口－中亚诸国的国际过境集装箱班列，使青岛港更方便地服务于整个黄河流域的集装箱运输。充分发挥青岛港在山东半岛城市群和黄河中下游的龙头地位，必须不断扩大青岛港的腹地。目前，青银高速公路、太（原）青（岛）铁路客运专线、及济邯铁路继续西延等基础设施的修建，使石家庄到太原的城市带和由太原、晋中、阳泉、长治、临汾等组成的晋中南城市群和有石家庄、邯郸组成的冀南诸城市群也逐渐成为青岛港的服务腹地。在公路网络中，向西主要通过青（岛）银（川）高速、青（岛）红（其拉甫）高速、日（照）荷（泽）兰（考）乌（鲁木齐）高速、威（海）乌（海）高速与经济腹地发生联系，成为港口扩展腹地的主要通道；在铁路网络方面，邯（郸）济（南）线作为胶济线的向西延伸，已经铺轨完成，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和山西的一部分纳入青岛的腹地范围，远期以干线形式向西经长治、临汾、延安、宁夏吴忠，经干（塘）武（威）线接兰新线，成为与陇海铁路平行的干线铁路；修建从兰考到菏泽的铁路，从菏泽把陇海线客、货流接入山东路网，使得陇海客、货流可以通过兰考－菏泽－泰安－淄博接胶济线或通过兖石线接胶新线到达黄岛。届时，青岛港和山东半岛城市群的服务腹地就能扩大到整个黄河流域。这对加快青岛作为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龙头城市建设也极为有利。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构建成渝经济区，
打造西部经济增长极

○ 岳朝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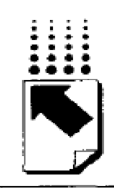
以城市经济带（圈）为增长极来带动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家更有效、更快地促进经济发展，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与客观趋势。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大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与辐射带动功能日益突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成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最富经济活力和增长潜能的区域。著名学者于光远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剧，未来国际竞争的主体既不是国家也不是企业，而是具有多种功能的大城市群或大城市圈。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大城市群经济的飞速发展，充分体现出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显示出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集聚效应与规模效应，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发展潜能。

2004 年，国家发改委将成渝经济区纳入国家“十一五”前期规划，成渝地区首次进入中央政府的视野。2005 年 10 月，国家正式将成渝地区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意味着成渝经济区已跻身中国四大经济区。成渝经济区作为长江经济带的起点，正在成为启动西部大开发的龙头。同时，川渝两地经济的融合终于纳入了政府的规划，这也为两地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遇，必将进一步推动川渝两省市的合作与发展。

一　成渝经济区在西部地区的重要地位

1. 人口最稠密，经济总量最大，中心城市综合实力最强

川渝地区是西部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的地区。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



普查数据[①]，西部12省市总人口35531万人，其中四川8329万人，居西部第一，重庆3090万人，川渝两省市总人口11419万人，占整个西部的32.14%；根据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数据[②]，2004年西部12省市国内生产总值为27536.74亿元人民币，其中四川6556亿元，遥遥领先西部所有省市，重庆为2665.39亿元，川渝两省市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为9221.39亿元人民币，占西部12省市国内生产总值的33.49%。其中，成渝经济区是西部地区最有条件和优势率先开发的区域。成渝经济区规划总面积20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省和重庆市总面积的35.75%，全国总面积的2.7%，常住人口9960万人。此外，成都、重庆是西部仅有的三个区域性中心城市中的两个，其综合经济实力居西部城市之首。成渝经济区平均每平方公里产出350万元，比全国高出227元，比西部高出316元[③]。2004年成都、重庆两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2185亿元和2650亿元人民币，分别居西部城市的前两位[④]。在新近出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显示，成都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居中国西部第一，重庆紧随其后排第二位。

2. 产业最集中，城镇密度最大

以成都、重庆两大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成渝经济区是西部产业最为集中、城镇密度最高的区域。以成都为核心的平原经济区是四川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四川以至我国电子工业、重型机械制造业、电站设备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特殊钢铁工业、量具刃具和航空仪表工业、化工和医药工业、食品工业的集中区域，该区还是全国电子、航空、航天、核能、有机化工的重要科研基地之一，同时也是四川全省金融、信息、商贸、旅游等第三产业最发达地区。重庆为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其重工业实力强大，钢铁、机械、汽车、摩托车、日用品、天然气化工以及加工制造等产业均有很大规模，并有建材、纺织、仪表、食品、旅游等优势部门。而以信息工程、生物工程、环保工程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正在形成。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成渝经济区内城镇密集，由35座城市组成，其中包括成都、重庆两座特大城市，16个中等城市和17座小城市，包含142个县级行

---

① 本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

② 本组数据来自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www.chinawest.gov.cn。

③ 本组数据分别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四川统计年鉴》搜集整理。

④ 数据来源http：//www.chinawest.gov.cn/chinese/asp/start1.asp。

政单位。以城市密度为例，成渝经济区每平方公里有1.73座城市，而西部每平方公里为0.24座，全国为0.7座[①]。

3. 西部地区最大的消费市场

川渝地区是西部地区最大的消费市场。本区庞大的人口数量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消费主体或潜在顾客，同时本地区还是西部地区购买力最强的地区。根据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一组数据计算，2004年西部地区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8902.97亿元，川渝两省市2004年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39亿元人民币，占西部地区总和的37.5%[②]，其中四川为2384亿元，居西部第一，重庆955亿元，其中仅成都、重庆两市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即为1830.3亿元，占川渝两省市总和的55%[③]。

二　成渝经济区优势条件

1. 经济互补性强

川渝两地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四川省会成都在科技、金融、商贸、文化教育方面优势明显，对成都平原地区的中小城市以及整个四川起着重要的辐射与带动作用。重庆制造业基础雄厚，工业水平较高，又是西南交通枢纽和贸易口岸，向东可与武汉城市群相接，向南经过西南出海通道与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紧密相连，成为西南地区连接华中、华南地区的枢纽。四川方面可以利用重庆的码头，弥补内陆地区发展的不足，而四川的农产品也足以大量供应重庆市场。川渝双方具有合作潜力的领域广泛，包括：水电开发和天然气利用、汽车工业、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建材工业、精细化工和医药业、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商贸和金融保险业、旅游业等。在国家将成渝经济区列入“十一五规划”的有利形势下，以成渝两大核心城市的合作为驱动，带动整个川渝地区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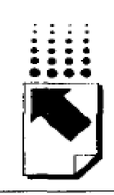
2. 区内交通快捷便利

成渝铁路实现了人口与物资在两个城市之间的可移动性，也在很大程度

① 本组数据源自国家发改委“十一五”课题：《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2005年5月。

② 本组数据来源：http://www.chinawest.gov.cn/chinese/asp/start1.asp。

③ 本组数据根据重庆统计信息网（http://www.cqtj.gov.cn）和四川统计信息网（http://www.sc.stats.gov.cn）整理。



上降低了空间运输成本。成渝高速公路大大降低了两地的空间距离和时间成本。计划 2006 年正式运行的西部第一条高速铁路——遂渝铁路设计时速 200 公里，将把成渝之间铁路通行时间缩短到 2 小时 30 分钟，该铁路通车之后，成渝之间搭乘火车将比走高速路快得多，这为成渝经济融合提供了又一有力的保障。成都、重庆的多条高速通道，将对成渝经济区的发展起到巨大作用：依托老成渝高速，将形成成都－资阳－内江－江津－重庆渝西经济走廊；依托成南、南广高速和在建的遂渝、南渝高速将形成成都－遂宁－南充－广安－重庆经济走廊；依托达州－重庆高速公路，将形成达州－广安－重庆经济走廊。规划中的成渝高速环线和成渝高速复线将把内江、宜宾、自贡、泸州、绵阳、遂宁、南充等多个潜在城市群连接起来，缔造成为“经济走廊”，并把盆地周围地区全部带入长江上游经济圈辐射范围，带动并促进这些城市间的经济联系。这些高速线大部分路段将在 2007 年底前完成。届时，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将撑起长江上游经济圈的主骨架。同时，川渝城市群落也将形成，它包括成都、重庆两座特大城市和成渝两地 25 座建制市，另外还将形成成都平原经济区、重庆都市圈和川南经济区等 3 个次经济区，整体经济辐射区域包括攀西地区、三州地区及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甘肃、陕西等 6 个省的部分地区。两地之间的空间可达性，以及从而形成的物流、人流、资本流、信息流的快速、密集通达将成为川渝两地经济上的相互融合、共生互补的基本保证。快速交通通道的形成，可以说已经为成渝经济区的形成准备了基本条件。

三　成渝经济区构建方略建议

1. 联结成渝两大中心城市的中介城镇发展方略

成渝交通轴沿线上，城镇数量虽然众多但规模较小、等级相近、综合经济实力较弱，这些城镇应该抓住发展机遇，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主动融入成渝经济圈的培育和发展过程中，打好“配角经济”这张牌，积极争取有利的城市功能分工，找准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切入点，避免出现“过路经济”现象，克服大城市对周边城市的“极化效应”的“抑制性覆盖”。同时，依循“错位发展”的战略，优化资源的空间配置，避免恶性竞争，从“让利竞争”向改善综合环境的“服务竞争”转变。近年来，成渝地区是西部地区物流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成都和重庆拥有西南最大的商贸物流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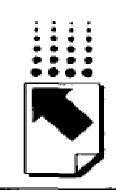
成都荷花池市场和重庆朝天门市场。位于成渝沿线部分交通枢纽城市则可以抓住目前成渝地区物流业正在兴起的市场先机，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业。在此基础上，建设一批有规模的大型专业批发市场，并且争取大型连锁商贸企业设立区域性配送基地。在成渝经济区内，依靠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农产品资源，依托成渝两个特大城市的巨大消费市场和消费潜力，发展多个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并且以特色农产品加工为龙头，带动一批城镇的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另外，成渝经济区内的各中小城市还可以根据两大中心城市支柱产业发展的需要，在“配角经济”定位中，分别发展成为交通制造业零部件配套生产基地、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接基地等等，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工业体系。

2. 统筹成、渝两大中心城市的发展布局

成渝双方为了使本区形成规模优势，缩短与跨国公司及国内大型公司投资对接的距离，必须进行产业资源有效整合。由于成渝地区园区密集，各种层次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较多，可以进行统一的产业协调和适当的分工，使园区之间相互呼应，共促发展，成为对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以及国际产业转移最富吸引力的区域。目前成渝经济区区域优势的巨大吸引力已经得到了初步体现，已经有二十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在重庆设立了近四十个企业。一大批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如诺基亚、爱立信、施格兰、五十铃、铃木、本田、雅马哈等公司也相继跟进，逐渐形成外资抢滩重庆之势；2003年，随着英特尔项目在蓉落户，安盟、友尼森、中芯国际、TCL等大公司也纷纷进驻。随着成渝经济区的进一步发展，资源和产业的进一步整合，本区的城市布局也会由以前的“特大城市——无大城市——中小城市”的不合理格局演变为三个层次：特大中心城市两个，即重庆和成都；大城市20多个，即涪陵、德阳、绵阳、宜宾等；小城市将有若干个。到那时，川渝经济区内将不仅有全国能源基地，还将是机械装备制造业基地、汽车工业基地和中国最重要的绿色产品生产基地。其影响力将直接辐射到陕南、安南、黔北、滇北、湘西与鄂西，成为西部大开发的“火车头”，并最终形成与长三角、珠三角遥相呼应的长江上游经济核心区。

3. 加强川渝之间市场和生产要素的流动

川渝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将有助于双方从区域经济的高度来审视问题，抛弃过去狭隘的地方眼光，打破互为壁垒的局面，做到货畅其通，物尽其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获取最大的效益，实现双赢。在面临着大市



场竞争、大品牌崛起、大企业扩张以及国际国内急剧变化的形势下，各行各业只有审时度势，抢抓机遇，加速发展，争取主动，才不至于在竞争中被拉下马。双方市场互相开放，联手共同面对外部市场无疑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具实力。2003年打破四川与重庆行政区划而成立的“川渝中烟工业销售集团公司”就是一个突破——它标志着四川与重庆烟草市场开始互相开放。其规模和结构调整空间等相对优势使企业当年实现产销上升，库存下降，税利达到58亿元，同比增长11%[①]。两地的资源、技术、资本、人才等的有效交流和快速发展，对西部的明显带动作用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近几年呈加速发展趋势，已经开始形成良性互动的格局。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川渝两地在竞争中形成的互为壁垒尚未完全打破，特别是重庆、成都两个中心城市把自己都定位成西南地区的信息、科技和商业中心，而且按照这样的定位，两个城市便由互补型城市成了替代型城市，两地曾一度在生产要素流动上互相设置障碍，严重阻碍了双方合作。在现今合作的大趋势下，应加大力度消除历史形成的阻碍，从制度上保证各种生产要素流动畅通。比如，在资源上，应做到共同开发利益互享，避免浪费；技术上，应该相互支持，互通有无；人才流动方面更应该做到人尽其才，从户籍到工资福利待遇等等方面为双方人才流动提供最大方便。同时在人才培养方面加强合作，使本区人才队伍在流动中不断发展壮大。

4. 共同推进巴蜀文化，增进成渝经济区凝聚力

自古川渝一家亲，川渝两地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悠久的巴蜀文化。共同的文化渊源加上地缘相亲，使两地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密不可分。两地应加强联合规划和建设，共同发掘丰富的巴蜀文化资源，这将有利于与时俱进地把巴蜀文化推向现代文明的新境界，使成渝经济区成为有活力和发展动力的特色经济区域。

四　结束语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大趋势下，区域合作尤其是构建城市经济圈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已势所必然。我国东部和沿海地区在全国率先打破区域保护和相互掣制的传统格局，积极加强联合与协作，相继形成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

① http://www.tobaccochina.com/news/data/20048/h_3440662_809163110.htm。

“三大经济区”，并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最快、水平最高的地区。实践证明，区域合作与区域竞争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同时，东部和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也说明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局部经济增长中心起带动作用。成渝经济区是目前西部最发达的地区和增长中心，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同处于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和南贵昆特色经济区的结合部，又是长江经济带的腹心地区，联动推进两地经济合作，不仅将有力促进两地的共同发展，也必将在全国的区域战略布局和整个西部大开发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我们应该看到，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不是仅仅一个增长中心所能带动得起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经济规划产业布局的调整，西部地区必然会出现多个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中心。成渝地区应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充分发挥合作潜力和优势，在西部大开发中当仁不让，作龙头率先发展，这不仅有利于两省市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联袂合作实现双赢，对于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产生巨大拉动作用。总之，区域合作、集体做大是迈向强大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武汉城市圈文化的发展与整合

○ 秦尊文

目前各个国家都很重视文化发展尤其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各国都想把文化产业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来扶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21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以制造业为中心；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以服务业和知识为基础；而21世纪则是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内容产业经济，文化内容将成为信息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内容而使本国的内容供应不足，将遭遇严重的文化独立性危机。这是比经济上或政治上的依附更为严重的问题。同时，文化发展尤其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在经济上也非常重要。文化产业是投入少、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文化产业范围内的各产业相互联结，在一类文化产业上取得成功，其“波及效果”会带动其他类别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附加值、生产效率、就业容量等，要比制造业和服务业高得多。城市圈作为跨行政区域的合作组织，应该既是经济圈，又是文化圈。城市圈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仅是文化发展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在介绍武汉城市圈文化发展情况的基础上，谈谈其文化整合发展的思路及对策。

一　武汉城市圈文化发展现状与问题

武汉城市圈，在现阶段主要指武汉市和周边100公里范围的8个城市（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和潜江市）共同构成的华中城市圈（见图1）。2004年，武汉城市圈面积占湖北省的31%，人口占全省的52%，GDP和财政收入约占60%，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占2/3，是湖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武汉城市圈，同时也是湖北省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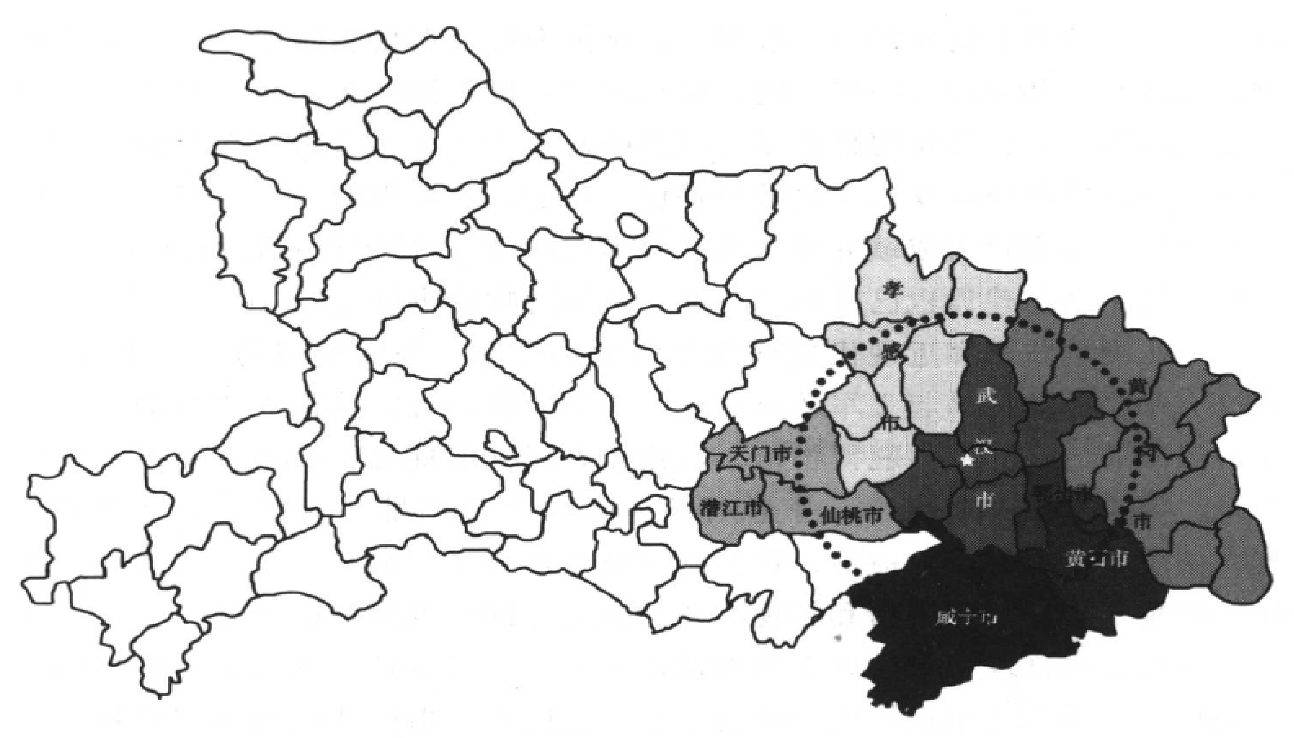


图 1　武汉城市圈空间范围及在湖北省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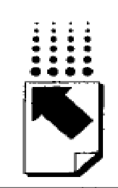
（一）城市圈文化机构与文化资源概况

1. 文化机构与设施概况

武汉城市圈城市内现有文化机构 7367 个，其中，艺术单位（剧团、剧场）111 个，图书馆 51 个，文化馆（文化站）570 个，艺术教育单位 6 个，文艺科研单位 1 个，文物单位 72 个，娱乐业机构 3625 个，其他文化单位 2931 个；从业人员 42858 个，其中有高级职称人员 1243 人，占总人数的 3%，高级职称人员大部分集中在省直和武汉市文化单位。城市内文化单位现有公用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107.7 万平方米。其中，艺术单位公用房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图书馆公用房建筑面积 16.9 万平方米，文化馆公用房建筑面积 34.5 万平方米，艺术教育单位公用房建筑面积 6 万平方米，博物馆公用房建筑面积 12.6 万平方米，文化娱乐业房屋建筑面积 19.8 万平方米，其他文化单位公用房建筑面积 2.8 万平方米。城市内文化单位现有固定资产 7.48 亿元。其中，艺术表演团体 0.95 亿元，艺术表演场所 2.5 亿元，图书馆 1.69 亿元，文化馆 1.29 亿元，博物馆 0.59 亿元，其他文化单位 0.46 亿元。

2. 城市圈文物资源

博物馆建设和馆藏文物特色鲜明，具有较大发展优势。省博物馆以楚文



化为特色，馆藏文物品级高、数量大，是国内超大型博物馆之一；武汉市博物馆的青铜器和字画有一定影响；黄石博物馆以青铜冶炼文物和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为代表；鄂州博物馆以三国六朝时期文物尤其青铜镜在全国有一定影响；黄冈博物馆以汉代文物最有特色。目前，湖北省博物馆和武汉市博物馆馆舍建设取得较大成绩并发挥着重要作用，黄石博物馆新馆已开工建设，鄂州博物馆新馆建设也已征地、立项，黄冈博物馆也已立项。

城市圈的革命和近现代遗址及革命文物丰富，是城市圈的又一大特色。武汉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八七会议旧址、武昌农讲所旧址、武汉国民政府旧址、中山舰博物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等；黄冈有七里坪革命旧址、鄂豫皖革命旧址群；孝感有中原军司令部旧址、新四军第五师旧址群；咸宁有北伐丁泗桥遗址；黄石有阳新龙港革命旧址；以及潜江市红三军团部旧址等等。这些革命和近现代遗址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城市圈内江汉平原地区文物大遗址丰富，极具特色。武汉黄陂商代的盘龙城城址、黄石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天门新石器时代的石家河遗址、潜江楚国时期的龙湾遗址，这些文物大遗址的面积范围广，文物价值和级别高（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城市圈舞台艺术资源

专业艺术剧团。武汉城市圈内共有专业艺术剧团45个，占全省专业艺术剧团的50%。其中，楚剧团14个，黄梅戏剧团6个，荆州花鼓戏剧团3个，京剧团3个，话剧团2个，杂技团2个，歌舞、话剧、儿童剧等艺术院团15个。在这45个院团中，省属院团7个，即省歌剧舞剧院、省京剧院、省地方戏曲艺术剧院、省话剧院、省京剧二团、省黄梅戏剧团、省实验荆州花鼓戏剧院7个院团，占湖北省全部省属院团的70%。

地方艺术品种。楚剧、黄梅戏、荆州花鼓、汉剧、湖北大鼓、说唱等地方艺术品种多集中在这一区域。

精品剧目及艺术名家。在全省25台“文华奖”获奖剧目中，武汉城市圈有19台；在13台“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剧目中，武汉城市圈有7台；在全省19名“梅花奖”演员中，武汉城市圈有16名。

（二）城市圈社会文化事业与文化市场现状

目前，武汉城市圈内社会文化事业已有一定的基础，公益文化服务网络比较健全。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等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4 年武汉开展群众性大型文化活动次数 19 次，组织开展“武汉·中法文化年”活动。成功举办武汉国际文化产业博洽会和第六届中国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武汉市直博物馆、纪念馆接待观众数 73 万人次。武汉市、区群艺（文化）馆组织的迎春舞龙大赛、武汉之夏、金秋农村文艺调演、社区文化节，鄂州的月周日群众广场文化活动，潜江的曹禺文化节等，已形成了一系列品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城市圈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迅速。武汉成为全国六大出版中心之一，并拥有武昌、汉口两座图书城，其中武昌的湖北省图书城规模居全国首位；广播电视蓬勃发展，网络发展迅速，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达 95% 以上；城市圈内一大批文学作品、广播电视节目、新闻作品和图书、电子音像出版物获得国家乃至国际各种大奖；组建了湖北日报报业集团、长江日报报业集团等传媒集团，还初步形成了《知音》、《楚天都市报》、《特别关注》、荆楚网等一批优势品牌。

城市圈体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武汉、黄石、仙桃为全国知名的体育强市。2004 年，在国内外的各项比赛中，仅武汉市运动健儿共获得 7 枚金牌，其中世界级金牌 4 枚，国家级金牌 3 枚。全年开展全市群众性大型体育活动 56 次，成功承办了奥运会亚洲男子足球外围赛决赛。在竞技体育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全民健身活动在城市圈广泛深入地开展。2004 年城市圈体育系统举办县及县以上运动会 200 余次，参加人数 30 万余人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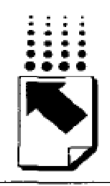
目前，武汉城市圈内文化市场主要经营单位有 7127 个，从业人员 41064 人，分别占全省文化市场总量的 57.7% 和 64.6%。武汉市的文化市场各门类发展速度较快、规模较大、硬件设施较好、市场效应和经济效益较高。武汉城市圈的文化产业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目前，城市圈内文化产业总产出（文化厅口径）已达 7.28 亿元，占全省的 69%；增加值已达 4.49 亿元，占全省的 66%；贡献税收 0.39 亿元，占全省的 66%。

（三）城市圈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目前城市圈文化建设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文化建设和发展极不平衡，周边 8 个城市与武汉市的差距非常突出，除黄石市和鄂州市外，其他 6 个城市基本处于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弱势状态。

1. 城市圈内文化事业经费和文化设施建设投入极不平衡

省直和武汉市文化事业经费投入为年人均 2 万元左右，而其他城市还不足



1万元，除了人员的部分工资，干事业的经费很难保证；文化设施建设的投人差距更大，省直和武汉市近几年不断加大对文化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已建和在建项目投资达20多亿元，如投资2.34亿元的省博物馆扩建工程、投资1.2亿元的省艺术馆工程、投资13.5亿元的武汉琴台大剧院工程、投资1.5亿元的武汉市图书馆工程等。而周边8市的文化设施投资合计还不足1000万元。

2. 艺术表演团体建设和发展水平不平衡

各院团艺术水平不均衡。省属院团、武汉市直院团由于优秀人才比较集中，艺术实力较强，创作、演出也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而其他市县艺术院团由于人才匮乏，艺术实力较弱，不同艺术品种发展不均衡。京剧创作状况较好，近年来一系列剧目获全国大奖，但由于受观众欣赏习惯局限，演出市场开拓空间不大；楚剧、黄梅戏、荆州花鼓创作状况虽不及京剧，但由于剧种符合本区域人民群众欣赏习惯，市场前景看好；相同艺术品种发展不均衡。就楚剧来说，省直、武汉市楚剧院团由于经费解决得好、人才集中、创作演出活跃，生存与发展状况较好，而其他市县楚剧团由于经费困难、人才短缺，生存与发展艰难。就荆州花鼓戏来说，潜江的省实验荆州花鼓戏剧院经费、创作与演出状况较好，而仙桃、天门两个团较弱。就黄梅戏来说，省黄梅戏剧院、黄梅县黄梅戏剧院实力较强，其他市县黄梅戏剧团生存与发展状况比较困难。

3. 武汉城市圈文博事业建设和发展不均衡，且没有形成联动优势

省博物馆、武汉市博物馆发展建设较好，黄石馆已经动工，鄂州新馆、黄冈新馆虽已立项但正式开工建设仍有很大困难，其他均为老馆舍；在革命和近现代遗址方面，大都存在维修保护做得不够的问题，且在发挥整体效益、加强合作上存在明显不足。在文物大遗址方面，由于范围面积大，普遍存在保护困难的问题。在保护的基础上建成大遗址保护园区、进而展示利用是国家关于大遗址保护的工作思路，国家还将给予适当的经费支持。但城市圈内大遗址保护工作普遍进度较慢，除龙湾遗址的总体规划国家文物局已批准外，其他几处的规划尚未制订。同时，圈内文博事业互相合作、发挥联动优势方面，仍显欠缺。

4. 武汉城市圈社会文化建设和发展不平衡

武汉城市圈社会文化建设发展极不平衡，多数地方整体水平与应有地位极不相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远远满足不了群众的需求。就地域而言，武汉市的整体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其他城市中，黄石的基础相对较好，天

门、咸宁最弱。天门至今无图书馆，文化馆也仅700平方米，咸宁、孝感、鄂州、黄冈的图书馆和孝感、咸宁的文化馆面积均不达标，武汉市的江岸、武昌、东西湖、汉阳、青山等区文化馆均无馆舍或无单独馆舍，其他各城市的条件就更差了。

5. 武汉市城市圈内文化市场发展不平衡，开放度不高

武汉市的文化市场门类齐全，发展速度较快，规模大，硬件好，市场效应和经济效益较高。其他城市在各方面相对滞后。文化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市场主体培育不够，规模偏小，重复建设、效益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资源整合与开发不够，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为产业优势，对经济的贡献率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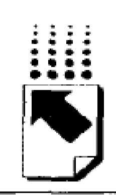
二　城市圈文化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文化建设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更是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既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要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把发展文化产业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时，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人民群众文化消费的比重将大大提高，这给城市圈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极好机遇。

（二）文化与经济的相互融合已使文化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当今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文化与经济相互融合甚至一体化趋势，使经济增长中文化的推动力越来越突出，经济竞争中文化因素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正是文化与经济的相互渗透，推动形成了以文化资源为基础、以创新为发展动力、以科技文化和人才为重要生产要素的文化经济。文化经济文化含量大，附加值高，创新性强，品牌效应显著，开拓和占领市场的能力强，对其他产业的渗透力大，具有很强的扩张能力和持续发展力，竞争优势明显，是内涵式集约发展的集中体现。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结合已成为



当今一种大趋势，武汉城市圈的文化产业方兴未艾，发展潜力巨大。21 世纪头 20 年，文化必将成为群众消费的重要增长点，传媒业、出版业、文化娱乐业等“文化朝阳产业”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当代高新技术的发展对文化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现代科技已广泛运用于文化生产、服务、营销、管理等各个环节，引发了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一些旧的艺术形态面临着如何创新发展、获得新的文化生命的挑战。文化管理方式和流通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电子传媒、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电子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高新技术将渗透到文化生产、服务、营销、管理等各个环节，传播方式将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实体走向虚拟。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文化生产方式日益更新，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对文化设施、传播媒介及文化工作者的素质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国内外文化发展态势对城市圈文化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随着现代电子媒体的广泛运用，随着中国加入 WTO，中外文化的相互交流越来越频繁、便捷；同时，国内一些城市群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城市圈及湖南长株潭城市群，在文化体制改革、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团组建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城市圈中的龙头城市，更是把文化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北京市进一步强调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功能定位，淡化工业经济发展的位置，并准备用 5 年时间使首都文化产业产值超过工业；上海市从构筑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角度，依据现代科技快速发展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对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比较全面、深入而有创意的研究，并提出加快上海文化产业的构想和策略，把文化产业作为上海新一轮经济的增长点。这给武汉城市圈既带来学习借鉴的机遇，也带来严峻的挑战。

三　城市圈文化战略目标与实施举措

在中国，由于文化上的共通性而进行区域文化开发的例子已经不在少数，有地缘亲近关系和文化相容性的长三角、珠三角城市圈都启动了区域文

化产业发展计划。在未来，文化是区域凝聚力的源泉将得到充分体现，文化发展中的这种区域性特点将更加显著。因此，武汉城市圈要进行一体化建设，必须靠文化来推动，要努力加快文化发展的整合。

（一）城市圈文化融合发展的战略目标

1. 城市圈文化融合发展的指导方针

（1）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相协调。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充分认识文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意义，把武汉城市圈文化建设纳入到武汉城市圈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中，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管理，促进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2）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充分认识文化的经济属性，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

（3）改革创新和继承借鉴相衔接。继承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合理开发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建设富有荆楚地方特色的文化。适应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趋势，广泛吸收和借鉴外来优秀文化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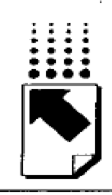
（4）坚持导向和强化服务相促进。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努力创作一批文化艺术精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高质量的艺术水平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

（5）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按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性质，明确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政府部门要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等职能，努力办好公益性文化事业。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着力培育文化产业主体，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发展壮大荆楚文化和汉派文化。

2. 城市圈文化融合发展的战略目标

到2010年，把湖北建设成为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中西部文化强省。要实现这一目标，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圈必须率先做到文化体制基本理顺、文化机制充满活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实力较强、文化精品不断涌现、文化设施功能配套、文化人才结构优化、文化市场开放有序、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文化发展主要指标和文化综合实力在全省的前列。

（1）文化事业全面繁荣。进一步发展文学艺术、社会文化、公共图书、



文博等文化事业，提高城乡居民的文化生活质量。到2010年，以武汉城市圈为中心的全省文化事业发展主要指标居于全省前列。

（2）文化产业形成规模。建成比较完善的文化产业生产、服务、销售网络体系，形成国有文化企业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力争武汉城市圈文化产业主要经济指标和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文化产业的80%以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之一。

（3）有序开放9市文化市场。加快文化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市场主体充满活力，区域分割、行政分割的市场壁垒逐步打破，市场中介组织活跃，市场机制在文化生产要素的集聚和扩散中发挥调节作用，市场管理进一步法制化。文化消费在城乡居民生活支出中的比重有较大提高，人均文化消费支出位居中西部前列。

（4）文化设施布局合理。以第八届中国艺术节为契机，加快武汉城市圈文化设施的建设。在全力加快武汉主会场设施建设的基础上，督促8个周边城市按照高起点、高标准的要求，集中力量改建和新建一批特色鲜明、功能完备的重要文化设施。同时加强9市农村乡镇和城镇社区文化设施建设，逐步形成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服务网络体系。

（5）文化区域特色明显。充分发掘区域文化资源优势，着力打造“一个特色文化中心区域”和各具特色的若干文化带。即形成以武汉城市圈为中心的浓缩了楚文化精华的江汉风情文化区域。

（6）改善文化发展环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服务水平。加快文化立法进程，逐步建立健全符合国家法律、与国际接轨的地方性文化政策法规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建立文化创新机制，营造良好的文化发展环境。

（二）城市圈文化融合发展的举措

1. 整合城市圈区域艺术资源，打造艺术精品

建设区域代表性艺术品种的10大艺术生产基地。针对区域内各市经济发展水平、各艺术品种不同特点、各艺术院团不同发展水平，抓好省京剧院、省地方戏曲艺术剧院、武汉市楚剧团、省黄梅戏剧院、黄梅县黄梅戏剧院、省实验荆州花鼓戏剧院、省歌剧舞剧院、武汉歌舞剧院、武汉话剧院、武汉杂技团10个重点院团建设，使之成为湖北省京剧、楚剧、黄梅戏、荆州花鼓、歌舞乐、话剧、杂技等艺术品种的生产基地。

实施武汉城市圈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积极配合和参与第八届中国艺术节，以10大艺术生产基地为依托，力争每个艺术生产基地创作排演1台体现湖北特色、代表湖北艺术水平的精品剧目，5年内推出10大舞台艺术精品。

实行区域艺术资源的优化组合，形成区域艺术合力。区域内45个专业艺术院团的编、导、演、音、美等艺术人才互通有无，集中优势人力、财力推出具有湖北特色的优秀作品。根据艺术创作与演出的需要，一个院团需要聘请另一个院团的优秀人才参加创作或演出时，或需要演出设备、器材支持时，由省文化厅统一调配。所调配的人才行政隶属关系不变、在原单位待遇不变；物质支持采取最大限度的优惠政策。

消除区域内演出市场壁垒，最大限度地开拓区域演出市场。武汉城市圈内所属45个专业艺术院团在本区域各市县演出均免收演出管理费，并统一享受演出区域的广告宣传、税收等文化优惠政策。

引导和支持区域内45个专业艺术院团在区域内交流性演出、展示性演出。每三年一次区域艺术展演、艺术汇演，推出本区域优秀剧目、优秀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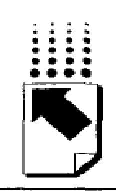
开拓全省、省外和国外演出市场。组织区域优秀剧目开展巡回演出活动。配合湖北对外宣传及招商引资工作，组织区域优秀剧目开拓省外和国外演出市场，展示武汉城市圈开放的姿态、改革的决心、发展的信心。

2. 加快城市圈社会文化发展，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加强图书馆协作协调，促进资源共建共享。根据城市圈范围内经济、社会、文化状况，共同商讨制订区域内文献资源建设的重点、服务经济社会的重点项目等，并以此为依据确定各馆的工作重点和应承担的任务，在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协作协调：一是编制图书馆联合目录；二是文献资源建设及共享工程资源建设实行协调协作，做到各具特色，形成优势互补，避免重复劳动；三是实行馆际互借。

联办群众文化活动，促进各市文化的融合。选取有代表性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开展区域范围内的调演、比赛，促进交流，如组织楚剧、汉剧、黄梅戏、天沔花鼓戏等调演，组织舞龙舞狮比赛等。加强武汉市与周边城市的文化活动交流。发挥武汉市在文化消费潮流中的引领作用，将一些时尚的文化活动通过交流及时推广到周边城市；发挥周边城市民族民间优秀文化对人民群众的凝聚作用，组织民间文艺和民间文化产品到武汉展演，扩大影响。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加大公益文化投入，为人民群众建立良好



的服务平台。各市的基础设施都要上一个新的台阶，尤其是乡镇和社区的文化设施亟待加强。要加快文化设施的现代科技手段运用。进一步加强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加快图书馆数字化、自动化建设。要加大投入，逐步解决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的问题。

3. 努力建立一个统一的、开放的、互动的文化市场

根据行政许可法和国家关于建立开放统一市场的要求，在“8+1”范围内，放宽准入，降低门槛，力争在9个城市之间形成规范，达成共识，建立良性互动的文化市场新格局。

城市圈要整合文化资源，形成共享互动的市场格局。调动演出经营机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以武汉经济圈为主体的演出经纪机构信息和业务平台；引导和扶持音像发行及连锁公司继续向武汉及周边城市发展音像零售和连锁门店，形成文化市场管理“8+1”联动稽查机制，加大打击盗版音像制品力度，扩大正版音像制品的市场占有率；鼓励各种社会主体和资金进入电影发行、放映领域，加快影院兴建和改造步伐，扩大电影市场份额和规模，支持银兴、天河等院线在周边城市拓展业务；鼓励投资者将新型的自助式KTV等形式从武汉地区扩展到周边城市，在武汉经济圈中发展连锁模式，逐步取代现有小、乱、散、差的小歌厅；引进和发展新型、健康的娱乐形式，满足广大群众求新求变的需求。

4. 改善文物事业发展环境，加快文博事业发展

在城市圈的东部板块确立以弘扬博物馆文化和革命文物及遗址为红色旅游服务的总的发展思路。加强已建博物馆（省博、武博）的陈列展示及龙头带动作用，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效益。加快已开工的黄石博物馆和已立项的鄂州博物馆新馆、黄冈博物馆新馆建设步伐，尽快使城市圈的博物馆建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合作联动的博物馆体系。

配合国家红色旅游建设工程，加强革命和近现代遗址的维修保护，以充分发挥城市圈革命和近现代遗址和文物的作用。

加强在城市圈的西部板块文物大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利用工作。使大遗址得到充分保护的同时，建成大遗址文化公园，使之成为城市圈展示利用的旅游精品工程，加强荆楚历史文化内涵，为城市圈文化的融合与彰显而服务。

5. 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开展对外文化产品贸易

积极开展文化艺术人才和图书、艺术、信息等的交流与合作。通过艺术表演、举办展览、互办文化周、缔结友好城市、民间文化往来等多种形式，

增加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充分发掘城市圈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的比较优势，积极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文化企业，大力拓展国际市场，扶持文化产品出口，开展对外文化产品贸易。重点扶持大型国有文化企业及有较强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的文化单位，做大做强一批对外交流的文化品牌，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抓好外宣精品生产，扩大湖北在海外的影响。

6. 举办大型文体活动，增强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通过举办大型文化节庆、宣传项目活动，将武汉国际杂技节、武汉国际旅游节、武昌辛亥首义文化节、李时珍医药节、孝感文化节、咸宁桂花节等活动提高档次，扩大规模，形成具有湖北特色的高质量、国际性的文化艺术节，扩大武汉城市圈的文化影响力，切实唱响时代主旋律。

精心设计重大文化产业推介、招商项目，申办中国中部地区（武汉）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将武汉文博会培育成为文化产业品牌，使武汉成为中部地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窗口和文化产业展示、交易、咨询、投融资以及文化论坛的重要舞台，进一步增强武汉城市圈文化的辐射力。

积极举办各类大型体育比赛，传播武汉和城市圈体育文化。

7. 发展新闻出版业，繁荣广播电视事业

进一步优化报刊结构，提高竞争力。打破报刊资源部门所有、地方所有的格局，建立“竞合”机制，按市场需求合理配置报刊资源。着力推动《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报纸形成党报品牌，推动《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等形成市民生活类报纸品牌。重点培育《知音》、《今古传奇》、《小学生天地》等期刊品牌，争取形成有市场竞争力和社会美誉度的品牌期刊群。

促进出版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提高市场竞争力，把武汉建成全国有实力的出版中心之一。适时组建并完善长江出版集团。

适时组建并完善湖北广播影视集团。在整合城市圈广播电视资源的基础上，通过调整结构，以电视广播为主业，组建拥有多种媒体、经营相关产业的广播影视集团。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海峡西岸”基础设施支撑体系研究

○ 伍长南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两岸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明确了海峡西岸的概念和福建的定位，充分体现党中央高瞻远瞩、推进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体现党中央对福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所进行的探索和实践成果的充分肯定，是指导“海峡西岸”立足新起点，把握新机遇，实现新跨越的重要举措。

福建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要北承长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东出海峡，西进内陆省份，迫切需要加快交通体系建设，形成以铁路、高速公路、大型深水泊位、进出省公路通道建设，从而构建“畅通、安全、高效、舒适”的综合交通运输支撑体系；迫切需要加快推进能源结构多元化，加快清洁、高效电源的合理布点和建设，建立以电力为重点的能源保障支撑体系；迫切需要加快推进电信、广播电视、计算机三网融合和综合管理，实现信息网络宽带化和高速互联，发展公用信息平台，建设现代化信息管理支撑体系；迫切需要加快强城市对外交通和内部道路建设，完善城市供水、排水、燃气、供电等基础设施，从而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各种先进交通运输协调发展的城市交通支撑体系；迫切需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农业抗旱防洪能力和完善农村路网为重点，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一 构建海峡西岸经济区发达的交通设施支撑体系

“十五”期间是福建加快交通运输业发展的重要时期，以“一纵两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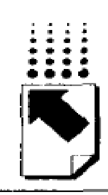
高速公路网建设为主体，尤其是同三高速公路的全线贯通，使福建与长三角、珠三角的联系更趋紧密，也使福建省交通运输业由"明显缓解型"向"基本适应型"转变。

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为加快福建省交通保障体系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以铁路、高速公路、大型深水泊位、进出省公路通道建设为重点，积极推进交通运输体制改革，加快构建"畅通、安全、高效、舒适"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促进交通运输网络上一个新的发展水平。

1. 构建海峡西岸经济区铁路设施支撑体系

"十五"期间，福建加快赣龙铁路建设，实现福建铁路与全国铁路大干线（京九线）的连接，从而密切福建铁路运输网与长三角、珠三角运输网的联系，促进福建沿海港口腹地向内陆省份推进，形成4条进出省通道（鹰厦、横南、梅坎、赣龙）。

但是，与沿海其他省份铁路交通联网建设状况相比，福建铁路建设尤其是省际联网仍较为滞后；鹰厦、外福、漳泉肖铁路等级低且均为尽头线，省内铁路未成网，通过能力低，覆盖面小；现有出省通道与国家铁路干线联系不密切；省内铁路运营里程短。"十一五"、"十二五"期间，福建省计划投资1000亿元，基本建成全省"一纵两横"铁路主干网。近期开始建设温福铁路、福厦铁路、厦深铁路（福建段）、龙岩—厦门铁路、南昌—莆田的"向莆铁路"。①温州—福州铁路。北起温州南至福州，往北延伸至宁波、长三角地区，往南延伸至厦门、珠三角地区。该铁路将贯通中国南北沿海铁路，将对福建沿线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②福州—厦门铁路。作为连接福建沿海城市的—福州、莆田、泉州、厦门的铁路交通网络，将是福建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对接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厦铁路建成后，可与鹰厦线、外福线、横南线、梅坎线等铁路干线相连，构成福建省内为环状、出省为放射状的合理铁路网布局。③漳—潮铁路。该铁路已由福建省政府、广东省政府和国家相关部门上报铁道部纳入全国沿海快速铁路建设规划。漳潮铁路是福建鹰厦铁路—广东广梅汕铁路的省际连接线，也是国家规划建设的沿海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将对闽粤两省及沿线地区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④向莆铁路。向莆铁路西接江西省会南昌市（向塘站），与浙赣线、京九线相连，中间与鹰厦线相连，东端直达福州港、湄州湾港，全长477公里，其中，福建省境内348公里。2004年12月17日，该项目列入铁道部与福建省



政府签署的《关于加快福建铁路建设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纳入中国铁路建设“十一五”规划，由铁道部与福建省合资兴建，是连接沿海与内陆省份重要的交通通道。同时，福建省将积极推进外福、鹰厦铁路等既有铁路的改造，做好宁德至衢州、长汀至永安铁路等项目的前期工作。至“十二五”后期，福建将形成“二纵三横”快速铁路网，实现与环渤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 3 个经济区快速铁路系统的连接，与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连接。

2. 构建海峡西岸经济区高速公路设施支撑体系

目前，福建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714 公里，至“十五”末期，将完成第三条高速公路出省通道—京福国道主干线福建段建设，高速公路总里程将达 1200 公里，基本形成“福鼎—诏安”、“邵武—福州”和“漳州—长汀”的“一纵两横”高速公路网。

为进一步发挥福建沿海港口优势，加快出省高速公路建设，缩短福建与内陆省份距离，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十一五”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将完成投资 600 多亿元，实现通车里程突破 2200 公里，基本形成“三纵七横”高速公路网，即“一纵”沈海（沈阳—海口）高速公路福鼎—诏安段；“二纵”福州—诏安段；“三纵”长深（长春—深圳）高速公路松溪—武平段。“一横”京台（北京—台北）公路浦城—东吴港区段；“二横”宁武线（宁德湾坞—武夷山）；“三横”福银（福州—银川）公路闽侯—邵武段；“四横”泉南（泉州—南宁）公路晋江—宁化段；“五横”厦成（厦门—成都）公路厦门—长汀段；“六横”厦门至三明公路厦门—沙县段；“七横”云霄—武平段。

按建设进度，在 2007 年完成“一纵两横”中的“两横”（福州—邵武、漳州—长汀），“十一五”期间建设衢州—南平、泉州—三明高速公路；“十二五”期间建设永泰—诏安（福厦高速复线）、永安—武平（天津—汕尾福建段）、宁德—邵武、三明—宁化高速公路建设，建成北承长三角、南联珠三角的高速公路大动脉，为发挥港口资源优势，加快“东出西进”高速公路通道建设，形成与沿海港口群相连接的高速公路网。

3. 构建海峡西岸经济区港口设施支撑体系

福建省海岸线长达 3324 公里，约占全国海岸线总长的 18.3%，居全国第二位。福建自北向南有沙埕港、三都澳港、可门港、马尾港、江阴港、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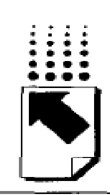
州港、泉州港、厦门港、漳州港等港口。到2005年底，全省港口货物吞吐量增至1.8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增至500万标箱。

港口在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中有着重要位置，由于"北承南接"沿海高速通道已建成，因此，"东进西拓"显得更加迫切。而加快港口建设则是"东进西拓"的基础。随着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东南沿海转移，优良港口成为吸引临港工业发展和产业集聚的重要条件，福建省要发挥区位优势，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港口建设是关键。福建省以港口群建设为龙头，带动高速公路、铁路建设，形成交通运输网络，是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交通运输保障体系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

海峡西岸港口建设目标是：到2010年建成超过100个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港口货物年吞吐量突破3亿吨，其中集装箱年吞吐能力1200万标箱，形成继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港口群之后，具有规模化、大型化、集装箱化、信息化程度较高的海峡西岸港口群。

一是要加快大型深水港口建设。当代世界海运的特点：一是普通货物运输集装箱化，油、煤、矿石、粮食、天然气等特种货物运输则使用专业船；二是运输船舶大型化。现在世界货运的主力船舶，第六代集装箱货轮10万吨，油轮20万~30万吨，矿石轮15万吨。福建现有港口只能满足近海运输的要求，到欧洲、美国的远洋货物，必须运到香港、高雄、釜山再转装上大船，中转费用接近长途运费的一半，徒增了福建货物的运输成本，弱化了福建投资环境和竞争力。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迫切需要适应新一轮经济发展趋势，集中力量建深水大港，除特殊必要，今后应严格控制3万吨以下码头建设，5万吨级码头也需谨慎决策。

二是加快大型枢纽港口建设。福建省沿海可利用建港岸线全长467.1公里，其中深水岸线190公里，可大规模开发建设5万吨级以上泊位的深水港湾有7处，加快福州港、厦门港、湄州湾港以及三都澳港建设。从长远看，福建港口发展目标分"三阶段"：2010年要建成两个吞吐量达亿吨大港，全省港口年吞吐量达3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200万标箱，港口总体能力基本适应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到2020年前建成三个吞吐量达亿吨大港，全省港口年吞吐量达5亿吨，港口总体能力适度超前国民经济发展要求；2040年港口经济成为福建省支柱产业。其中，厦门湾港全面建成主枢纽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功能齐全的组合型港口、集装箱运输干线港口、多功能的现代化综合性港口。福州港着力开发外海深水港区，加快推进主枢纽港的



建设进程，结合临海工业的发展，以大宗散货为主。湄州湾港口（包括湄州湾南北两岸），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临海工业发展，加快以石化为主的港口建设。

此外，完善港口配套设施，促进金融、保险、物流、仓储等产业的聚集。港口不仅是临海工业区的龙头，同时也是相关第三产业、带动城市发展的龙头。厦门城市规划应突出港口城市，以港带城，罗源湾和湄州湾的港口建设也要有相应的港口卫星城规划与之配套。

二 构建海峡西岸经济区能源设施支撑体系

1. 福建省能源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福建省能源生产和消费持续增长，结构有所优化。但是，能源产业与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相比，仍存在需求缺口大、优质洁净能源少和环境污染比较突出等问题。

一是本省可供开发的水电资源有限。福建省水电资源较丰富，但开发率已高达 50%，潜在的水电资源开发难度增大，开发后也只能满足局部地区的电力需求；风电资源、潮汐发电资源虽然丰富，但技术要求高、建设成本大，尚难以大规模开发利用。

二是可持续发展对能源提出更高要求。继续依靠发展燃煤电厂增加电力供应受环境容量限制，电力发展与环境保护、能源资源选择的矛盾日益突出。

三是能源供需矛盾和能源安全问题突出。今后福建省新增发电燃料大多需从省外调进或国外进口，国家实施“西气东输”工程，但由于福建省特殊地理位置限制，国内天然气难以送达，福建省选用进口液化天然气成为必然选择。

2. 建立以电力为重点的能源保障体系

目前，福建电网已联入华东网，下一步可能还要联入华南网，但华东、华南电网自身都缺电，虽然从电网安全角度，联网后可以在大网中暂时调剂余缺，提高电网运行的安全性，但是，华东、华南电网都不可能补充福建电力缺口。

根据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2006～2010 年间，福建省将进入新一轮缺电期，必须新建约 1400 万千瓦发电机组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根据电力部门规划，福建省的电力装机容量将从2005年的1620万千瓦，增至2010年的3000万千瓦，其中，预计“十一五”时期电力负荷年递增10.4%，用电量年递增长10%，预计到2010年最高用电负荷为1950万千瓦，因此，“十一五”时期需新增投产装机容量1400万千瓦）。以目前投资建设一座大型火电厂周期约3～4年、大型水电站周期约4～5年，从现在起福建省就必须进入电源点开工建设重要时期。

3. 推进能源结构多元化稳定能源保障体系

在福建省可供开发的水电资源不多的情况下，加快推进能源结构多元化，新的能源开发建设重点是水电、火电、LNG、核电。

作为可再生清洁能源，福建还需尽力开发交溪、大樟溪、霍童溪流域水电资源，九龙江、建溪、汀江等也有一些可开发利用的水电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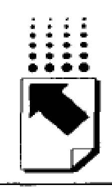
风力发电也属可再生清洁能源，福建沿海风力资源丰富，尽管装机容量有限，开发成本较高，但有效益的风力资源要尽可能开发，并考虑加快风力发电设备制造业投资。

填补福建能源缺口还需依靠火力发电、液化天然气和核电。利用福建无烟煤，建设与资源相适应的坑口电站，是既有经济效益又能解决矿工就业的好项目，要加快龙岩坑口电厂发电。除外，大型火电厂要建在沿海港口区域，依托港口运煤，降低发电成本。漳浦古雷、霞浦溪南、福清江阴、牛头尾以及罗源湾、湄州湾等地是适合的建设地点。“十一五”期间要加快大唐、可门电厂等大型燃煤发电机组投产发电。液化天然气（LNG）也是清洁能源，在秀屿港建设LNG接收站后，从印尼进口的天然气的70%用于发电，是解决能源缺口的一个可行办法。一期工程在莆田、泉州、厦门三个燃气电厂总装机容量达350万千瓦。但LNG发电成本比燃煤火电厂高一倍，且LNG价格随石油价格变动，因此，从降低上网电价考虑，LNG燃气电厂发电占能源供给比重不应过高。

福建缺油少煤，发展核电是解决能源供给的最佳选择。核电既无运输包袱，又不污染环境，规模运行成本与燃煤火电相似。福建应加快核电站筹建，尽可能挤上全国核电盘子，尽早推行电价峰谷差价，对用电大户安装峰谷电表，抽水蓄能电站就可尽早修建，要加快仙游、鼓岭、长泰等抽水蓄能电站的前期准备工作。

4. 加快电网联网建设

电网工程重点建设和完善500千伏主网架和220千伏网架以及高、中、



低压电网的配套，加强与省外电网主要是华东和华南电网的联系，把福建电网逐步融入全国大电网体系，通过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完善配电网络，降低电网电能损耗，提高供电可靠性和电能质量，建成一个网络健全、装备较好、安全可靠、高效低耗、管理科学的供电体系。

"十一五"期间，福建将加快建设一个强大的超高压网架，即在沿海500千伏网架的基础上，构建沿海二～四回500千伏网架，形成连接宁德、南平、三明、龙岩山区，环绕全省的500千伏网架。其中，沿海地区根据电源布局，从北向南由福州—莆田—泉州增加一回500千伏北电南送线路，在泉州形成一个二回500千伏线路，增加由后石向泉州送电断面，同时从漳州到龙岩、福州至南平、三明、龙岩形成全省500千伏环网，与华东地区形成一个强大的网架。

三　构建海峡西岸经济区信息设施支撑体系

1. 海峡西岸经济区信息化现状与问题

"数字福建"实施以来，省财政投入2亿多元资金，开通福建省政务信息网络工程。目前横向省直宽带网联通了180个省直单位，纵向网联通9个设区市和84个县（市、区），信息化正逐渐改变着城乡居民的生产与生活。但应该承认，福建省在信息化技术标准、共享、服务体系方面仍较落后，全省数字化总体水平仅30%左右，信息化建设存在着分散、浪费和效率低下、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每年政府投资开发的信息成果、数据，仍无法进行深加工与共享；信息化基础投入和信息化技术人才浪费与缺乏并存，信息和网络安全问题日趋突出。

2. 推进"三网"融合与综合管理

"三网融合"是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计算机网业务应用的融合，表现为技术层面趋向一致，网络层面可实现互联互通，业务层面互相渗透和交叉，应用层面使用统一的通信协议。"三网融合"可使信息产业发展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利于信息资源整合，为信息共享打造良好的信息平台，从而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而信息服务业发展又带动信息产品制造业、软件业的发展，最终实现信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加速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

四　构建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1. 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基础设施现状

近年来，福建省沿海、山区主要城市加大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福建省城镇化滞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城镇规模结构不尽合理，中心城市带动力不足等问题日趋突出，城市基础设施"瓶颈"制约——交通设施不能适应城市发展需要；城市环境污染仍较严重，城市垃圾处理率低，部分城市垃圾、污水仍未经处理堆放或排放，城市污水处理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3.83 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 23 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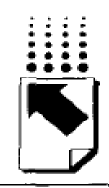
2. 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对外交通和内部道路建设

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目标是：实施以"人、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为评价标准的"城市设计"，提高城市建设质量，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创造舒适、宜人、高效、卫生、优美的环境。

（1）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对外交通。构建以福州、厦门、泉州三大城市基本框架为支撑，连接漳州、莆田、宁德，对接三明、南平、龙岩，带动福清、晋江、邵武，促进中心城市发展，形成以省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紧密互动的城市（镇）交通网络。要以城市联盟为基础，从城市规划对接和重大基础设施共享入手，加大交通布局等基础设施项目的互通互享，优化城市资源配置。为此，要尽快启动建设福州—厦门城市铁路快速通道，该通道北至温州，南延伸至汕头，在福建省内穿越宁德、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成为海峡西岸城际交通"大动脉"。该铁路可开通多班次具有公共交通性质的城市班车，从而加速闽东南都市带城市间快速轨道交通线的形成。

（2）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内部道路建设。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各种先进交通运输协调发展的城市交通体系。公共交通在城市道路的使用方面较为经济，在福建省特大型城市尚未形成的条件下，发展城市地铁受到投资、人流量限制的条件下，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减少机动车辆排放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应从政策上支持、鼓励公共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福建沿海三大中心城市，要以建设城市快速干道系统为重点，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为主、各种先进交通运输协调发展的城市交通体系，加强城市公共交通统筹建设和综合管理，完善城市交通体系。其中，福州市、厦门市要加快建成环城、环岛高速路，抓紧建设轻轨交通；泉州市以城市联盟



为重点，发展市域公共交通；宁德、莆田、漳州、南平、三明、龙岩等中等城市要加快建设城市主次干道、环城路，加快城市对外经济联系，缓解城市内交通拥挤状况；中小城市（县级市）和小城镇要重点抓好主干道路建设。

3. 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智能化交通管理

加快城市智能化交通体系（ITS）建设。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应加强ITS统一规划、建设和协调，加大ITS研发与产业化投入力度，开发适合交通信号控制软件和其他交通管理软件，重点建设公交ITS、停车ITS、紧急救援系统，尤其是ITS在公共交通中的应用，如电子收费系统、车票IC卡系统、车辆自动识别系统、公共汽车信号优先系统、公交智能化运营调度系统、电子显示系统、电子站牌和乘客引导系统、触摸式公交查询系统等。

4. 海峡西岸经济区城市其他设施建设

要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逐步放开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营市场，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其中，改革城市基础设施产品定价体系，建立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价格制定机制，理顺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等城市基础设施产品价格体系。一是推进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扶持省内民营污水、垃圾处理产业化企业，扩大企业规模，形成适度、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二是确定合理的投资回报水平。对于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若是可收费的项目，可按“成本＋税收＋微利”原则确定收费价格，实现投资——回收的自我循环。对整体难以市场化运作的项目，可进行适当分拆，剥离出可进行市场化运作的部分按市场化原则进行改革。对于纯公益性项目，可通过组团投资方式，使投资者利益从其他盈利项目中得到补偿；三是完善与协调城市基础设施：包括加大城市供水管网的更新改造，解决供水管网设施老化问题。推进城市燃气公司制改制方案，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漳州市、莆田市要加强对LNG项目的领导，加快建设燃气管网及配套项目。建立以省级协调为主导，以沿海、山区各城市政府协调为主体的多层次区域协调体系。

五　构建海峡西岸经济区农村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1. 海峡西岸经济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逐年下降

近年来，福建省用于农业财政支出比重逐年下降，由2000年的6.7%下降到2001年6.47%和2002年的6.32%；在同期全省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

农业比重分别占2.08%、1.91%和2.08%，投入也呈下降趋势。而福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极其悬殊，由1990年为1:0.43，2001年1:0.40，2002年1:0.38，农民收入增幅慢且比重不断下降。

2. 海峡西岸经济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重点

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单纯依靠农业自身积累难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国家和省级财政必须增加农业投入，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提高农业抗旱防洪能力，重点是防汛抗旱两手抓。防汛抗旱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抗御水旱灾害不仅需要政府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完善各类工程设施和非工程设施，也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共同承担防汛抗旱责任。二是完善农村公路路网建设，加快实施“年万里农村公路网工程”。为改善农村公路路网设施，要统筹城乡推进“八纵九横”路网建设。在重点构建沿海交通通道的同时，注重兼顾农村路网建设，并向山区倾斜，着力构建一个四通八达、设施配套、覆盖全省农村的公路交通网络，促进山海协作，带动城乡共同发展。为此，要加快上承国家公路网和福建高速公路网、下启全省农村公路路网的“八纵九横”干线网，使全省县级行政中心基本能上在1小时内到达高速公路、乡村可直接到达县级公路，全省县城城镇可在5小时内到达城市，形成“5小时交通经济圈”，全省沿海与山区、腹地与口岸之间均架构起快捷通道。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

2005年西部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回顾和展望

○宋　宇

一　西部经济形势的基本回顾

2005年，我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进入第6年。在国家“十五”计划圆满完成，即将进入“十一五”规划阶段的背景下，西部各省市区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正确判断形势和把握机遇，加强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建设，不断采取各种有效的政策措施，使国民经济实现较快的增长，社会各项事业也取得了很大进步。

1. 经济总量明显增加，增长速度不断加快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5年6月，西部12省市区地区生产总值（按当年价计算）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内蒙古高达20.0%，居第一位。其后依次是广西、陕西、西藏、甘肃和新疆，分别为12.3%、12.2%、12.1%、12.1%和10.6%，除云南仅为8.6%外，均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

工业生产速度不断加快，经济效益明显回升。2005年1~8月份西部各地工业生产增长平稳。其中工业增加值增长最快的是内蒙古，增长速度高达30.9%，增加值达649.68亿元，其次是四川（增长速度为22.6%，增加值为1292.47亿元）、青海（增长速度为22.5%，增加值为109.80亿元）、速度较慢的是重庆（增长速度为15.5%，增加值为418.48亿元）、云南（增长速度为6%，增加值为645.12亿元）。从工业增长的结构看，轻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从高到低的排列是：内蒙古（30.6%）、贵州（26.7%）、四川（23.6%）、青海（11.1%）、云南（0.6%）；重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较高的

是：内蒙古（31.5%）、青海（23.2%）、广西（22.9%）、重庆（15.50%）、西藏（14.5%）、贵州（12%），一些省区高于全国同期水平（16.3%）。各地主要以重点项目和技术改造为突破口，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工业生产和经济效益基本保持同步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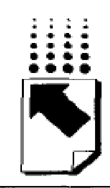
2. 宏观经济总体运行良好，物价稳定

与上年同期相比，2005 年，西部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仅有略微增长。1～8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较高的是广西（103），其次是内蒙（102.7）、四川（102.4），物价指数较低的是陕西，只有 101。与上年同期相比，上涨幅度从高到低排列分别是甘肃（1.50）、云南（1.40）、西藏（1.40）、陕西（0.60）、贵州（0.60），而青海的物价指数还略有下降，为 98.90，通货紧缩的趋势尚未完全扭转。至 2005 年 8 月，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速度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内蒙古（13.68%）、宁夏（12.72%）、青海（11.9%）、四川（5.11%）、新疆（1.5%）；存款余额增长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内蒙古（17.88%）、新疆（15.7%）、陕西（13.62%）、四川（11.17%）、云南（8.52%）、广西（6.74%），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断加强。

地方财政收支（不含基金）增长稳定。1～8 月预算收入增长最快的是内蒙古，高达 47.67%，其次是陕西（31.41%）、青海（26.9%）、重庆（24.00%）。财政支出方面，宁夏居第一位，为 36.20%，其次是新疆（26.4%）、贵州（24.8%）、陕西（18.54%），甘肃、重庆增速较慢，分别为 18.23%、17.8%，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有所加强。

3. 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增大，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建设有所加强

进入 2005 年以来，西部各省市区继续以生态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为重点，加大农业、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邮电等基础产业的重点工程建设投资。其中，退耕退林还草工程、青藏铁路建设工程、西电东送等均取得巨大成就。以最为落后的西藏为例，2005 年第一季度末，项目总投资已达 53 亿元，涉及交通、能源、农牧、林业、水利、城建、环保等许多方面。由此可见，西部地区正在成为一个中国工程建设的热土。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看，内蒙古增长高达 59.63%，云南和四川也达到 40.1% 和 31.4%，最慢的青海、新疆也分别达到 10.18% 和 6.5%。1～8 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居于前列的是云南（49.2%），其次是贵州（37.9%）、四川（37%）、陕西（35.1%），较慢的宁夏和新疆分别为 15.6%、2.2%。另一方面，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各省区普遍放慢了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与上年同期比，2005 年 1～8 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普遍放慢，仅四川、贵州略有加快。

4. 对外开放有所加深，但各省区表现不一

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继续迅速发展，进出口商品结构逐步优化，但与东部相比，出口能力较差，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对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明显。据统计，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从 1999 年的 149.6 亿美元，增加到 2003 年的 299.9 亿美元，增长了 100.46%。但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贸易规模小，增长速度缓慢，因而对地区经济贡献不大。由此导致西部地区的进出口在全国所占的份额呈现下降趋势。1999～2003 年，出口额从 4.01% 下降到 3.65%，进口额从 4.32% 下降到 3.39%，进出口总额在全国所占的份额从 4.15% 下降到 3.52%。另外，尽管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从 1999 年的 8.07%，增加到 2003 年的 10.82%，增加了 2.75 个百分点，但与东部地区相比，提高幅度很小，仍然处于滞后状态。2005 年各省区对外贸易表现不一，甘肃（64.16%）和陕西（34.48%）在 1～8 月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中名列前茅，但贵州、西藏呈现负增长，分别是 -11.10%、-24.60%。其中，出口增长较快的是新疆（71.4%）、陕西（43.04%）、云南（33.5%），青海、贵州速度较慢，仅分别为 5.4%、0.8%。

大量国内外经验表明，外商投资作为支撑经济成长与发展的一个因素是投资受体方寻求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对资金匮乏的西部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更是起着很大的催化作用。尽管国家投资逐步向西部地区倾斜，各地也纷纷采取措施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但是，由于交通基础设施、政府效率、投资软环境、商业文化氛围以及产业配套条件等方面的诸多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相应跟进，跨国公司仍然主要选择在沿海地区投资设厂。2003 年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 17.2 亿美元，比西部大开发前 1999 年还减少了 1 亿美元。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全国外商直接投资额都在不断增加，其增幅分别是 3.19%、5.83%、3.27%。西部地区 1999 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全国的份额为 4.65%，但到了 2003 年下降为 3.22%。1999 年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为 5.74%，2003 年为 4.74%，下降了 17.6%；中部地区则从 1999 年的 1.34% 增加到 2003 年的 1.45%；西部地区从 1999 年的 0.99%，下降到 2003 年的 0.62%，下降了 37.4%，尽管这种趋势与东部及全国的趋势相一致，但是西部地区下降的幅度远远大于东部，这说明西部地区并没有有效利用本来就有限的国外资金。

5. 城乡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消费平稳增长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均实现增长，但各省区出现较大差异。与上年同期相比，2005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最快的是内蒙古（15.00%），其次是贵州（12.40%）、陕西（11.80%）、宁夏（11.70%）和重庆（11.30%），增长最慢的是西藏，增幅仅为 1.90%。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方面，增长最快的是贵州，为 14.20%；其次是广西（10.60%）、四川（8.90%），增长最慢的是云南（1.58%）；陕西的增幅为 4.87%，位居第九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稳增长，且各省区差异不大。2005 年 1～8 月，西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最快的是内蒙古（15.7%）；其次是四川（13.8%）、重庆（13.6%），甘肃、云南速度较慢，其增速分别为 12.72%、12.5%；陕西增速为 13.30%，与贵州同列第七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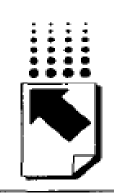
尽管 2005 年西部省市区的经济运行形势总体良好，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由于有些地区热衷于上一些能耗高、污染严重、浪费资源的项目，违背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同时，城乡居民生活收入水平的差距依然存在，“三农问题”、教育科技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问题等等也较为严重，迫切需要着力解决。

二　西部发展中存在的旧问题和旧矛盾

西部发展的相对滞后并不是偶然的，它与一些根深蒂固的老问题和老矛盾密切相关。目前，这些问题仍然存在，突出表现在资金短缺、城市化问题、贫困问题、“三农”问题、投资环境问题等方面，需要不断分析和深化认识。

1. 资金短缺且使用效率不高

困扰西部发展多年的资金问题仍很严重。这突出表现在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总量不足，以及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两方面。由于西部地区的财政长期入不敷出，加之居民收入较为低下，自身资金积累不足，同时，尽管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近年来加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但国家财政投入有限，相对于西部大开发巨大的资金需求，仍显不足。由于西部地区投资环境不理想，投资回报率低，引进外资及其他直接投资偏少，仅有少数援建、帮扶项目。从资金使用效率角度看，不仅资金供给严重不足，与资金需求刚性增长的矛



盾愈演愈烈，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西部地区资金营运低效，配置效率低下。如果以资金投入产出率衡量资金效益，西部资金效益比东部低50多个百分点，比中部低近一百个百分点，西部资金效益之低由此可见一斑。实际上，由于预期收益率低和投资风险相对较高，金融机构贷款资金流入少，资金流出多的局面仍在持续。据测算，西部地区近年来获取的银行信贷资金量不足全国的20%，且通过资金上存、净拆出、直接向东部投资等渠道流出了约10%。而证券融资角度看，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总数不足全国20%，产业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基本属于空白。

2. 城市化滞后，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平衡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各省区城镇化发展进入相对较快时期。1999年，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约为23.4%，比1990年提高5.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0.6个百分点，高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但与东部比较，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短缺，资金不足和户籍制度约束，城市化水平仍然滞后，城市平均人口规模较小，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综合辐射功能很弱。按"五普"统计口径，200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6%。东部的广东为55%、浙江为48.7%、江苏为41.5%、福建为41.6%、辽宁为54.2%、黑龙江为51.5%、吉林为49.7%，而西部地区的四川为6.7%、广西为28.2%、云南为23.4%、贵州为3.9%、甘肃为24%、西藏为18.9%，均低于30%，仅新疆较高，为33.8%。

近年来，西部许多省区都在加快实施以省会城市建设为重点的城市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省会及一些区位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开始居于优势地位，成为提高区域发展能力，扩大开放开发的重要手段。各省会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区域市场体系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心城市的功能，增强了城市发展活力。随着人口与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城市面貌也有很大改变，特别是商贸、交通、邮电、金融、信息、房地产等第三产业发展尤为迅速，部分大城市第三产业比重已达到城市GDP的40%～50%。

但是，与东南沿海地区不同，由于西部地区乡镇企业起步晚，资本积累规模小，途径单一，小城镇发展较为缓慢。除大中城市周边地区和交通干道沿线地区外，大部分小城镇总体发展质量不高，城镇人口规模偏小。不少小城镇基础设施严重短缺，"路边城镇"的现象比较普遍。"八五"、"九五"期间，西部省区先后选择了一批小城镇进行建设与规划试点，试图探索适合

本地情况的小城镇发展途径。然而，根据四川省对 50 个小城镇发展状况的调查，试点小城镇发展情况并不乐观，约 2/3 的小城镇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一些位于中心城市扩展区范围内的小城镇，由于被融入中心城市建成区而对基础设施重新改造；一些偏远小城镇由于区位选择及功能定位问题，一直缺乏活力和凝聚力，陷入"有城无市、有市无人"的境地；仅有一些毗邻中心城市的县城或位于重要区域交通干线上的城镇，包括一批旅游城镇和重点工矿城镇发展相对较好。

3. 贫困问题仍然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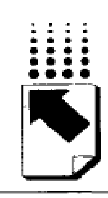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不断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一些旧问题、旧情况没有得到及时有效解决，解决贫困问题的步伐依旧缓慢，扶贫开发任务仍任重道远。据国家统计局 2005 年 3 月最新发布的《2004 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公报》显示，截至 2004 年末，西部地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 1305 万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 5.7%；低收入人口为 2396 万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 10.5%。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所列的 592 个国定贫困县中，西部 12 省区总共有 375 个，占全国的 63.3%。这些国家扶贫重点县同全国农村相比，农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仅分别为 1582 元和 1392 元，占全国同一数字的 63.7%，而且差距在拉大，不仅绝对贫困的发生率高，而且相对贫困、贫困深度问题严重。

从地域上看，西部地区大多数贫困人口集中连片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贫困地区，如陕北地区、甘肃中部地区、秦岭大巴山地区、横断山区、宁夏西海固地区、桂西北地区、西藏地区等。这些地方自然环境恶劣、社会发育落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教育费过高、基础设施差，因天灾、人祸（生病）、制度（社保、教育学费过高）等因素造成的返贫率非常高，许多农村家庭长期陷入贫困或者返贫境地。

4. "三农"问题突出

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非常重视西部农业的发展。2004 年，国家以前所有未有的力度对西部农业发展提供了大力支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农业税收的大范围取消、国家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以及农产品价格的恢复性提高等有利因素；使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获得了 20.5%（未扣除物价因素）高速增长，农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保持在 19.5% 左右，高于全国 4.3 个百分点。

由于西部地区自然环境脆弱，农业发展非常困难，加之工业的落后使农



民收入渠道集中在农业上。由于农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下降，单纯依靠农业获得的收入日趋减少。2002年，东部11省市人均实现农业增加值已达14171元，中部8省为6955元，相比之下，西部11省市（未包括西藏）只有5462元，仅相当于中部的79%和东部的39%。另外，由于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在个别地区导致农民收入减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在加入WTO的背景下，西部农业将受到国际强势农业的冲击和国际化大公司的挑战，这对农业基础相对薄弱的西部地区来说，形势更为严峻，探索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的有效道路仍很漫长。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周边农村地区土地产权不断受到侵害，加之农民法治、权力、权益意识的淡薄，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不力，不少农民丧失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得不到足额的补偿，加上农村社会保障的不完善，生存问题悬而未解。另外，由于在思想观念、体制方面也存在着差别，西部农村地区的保守观念、官本位意识和计划经济思想仍很严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西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5. 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但仍存在许多不足

2005年以来，西部各省区市继续高度重视投资环境的改善，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大了软环境的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效果。但总体看来，西部的投资环境还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软环境方面，与沿海地区的差距还比较大，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人文环境方面显著落后。

西部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还不能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要。客观而言，近年来西部交通、通讯条件和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均有很大改善，投资者经营成本大为降低。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铁路运输网络尚未形成，运力和运量仍有较大不足；大中城市的交通拥堵现象比较严重，地上地下交通不够发达，高级公路比重低，县乡公路通达程度差；民航运输落后，机场设施有待完善；通讯网络覆盖面积小，信号传输速度慢，传输质量不高；缺少为外商及其子女服务的住宅、托儿所、中小学、文化娱乐等公共设施，部分地区水电暖等供应不够稳定。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十分明显。除了基本硬件设施落后外，管理水平不高，环境卫生、水质、空气质量欠佳，市容市貌脏乱差，沙尘暴等自然灾害不时发生，商务办公环境和产业发展环境与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法制环境、政策环境、政务环境、市场环境和人文环境方面也存在不少

问题。由于缺乏地方性法规，一些经济活动处在无法可依的状态；与此同时，尽管有不少政策优惠，但难以落到实处。行政管理部门服务意识差，办事效率不高，“三乱”问题屡禁不止。市场开放程度较低，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地区封锁、行业垄断现象仍比较严重。制假售假、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此外，由于地处偏僻，信息不畅，加之投资不足和运行经费困难，许多地区在网络建设方面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要求，信息渠道不通，联络梗塞，失去了不少贸易与投资机会。此外，金融、保险、会计、律师等中介服务范围狭小、水平较低、电子商务尚处于起步阶段。生产性项目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建立，配套能力较差。人才成长和发展的环境恶劣，大量优秀高校毕业生纷纷离开西部，去沿海和国外发展。职业教育发展缓慢，企业所需要的初中级技术人员匮乏。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政府信用、企事业单位信用、个人信用方面都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人文环境不佳，小农意识较强，思想观念封闭落后、因循守旧、排外心强、缺乏创新，都构成了制约改善投资环境的基本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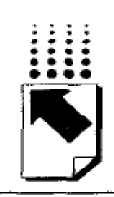
6. 教育问题突出

西部大开发五年以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科技教育发展规划和政策，加大了对教育事业的投资，各地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纵向来看，随着西部地区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为人力资本积累奠定了较好基础。但是，从横向来看，西部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地区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导致教育资源依然薄弱，教育发展速度、程度仍然很低。

（1）高等教育发展停滞。尽管 2002 年与 2000 年相比，西部地区教育经费增长幅度达到 72.33%，高于全国 1.1 个百分比，但是教育投资结构中，财政性教育经费比重仍然偏大，急需吸引更多民间投资。高等学校数虽然近年增幅较高，但仍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与毛入学率 2004 年已达到 19%，进入大众化阶段，但西部地区仍然徘徊在 10% 左右。

（2）普通高中教育稳步发展，中等职业和中等专业教育发展缓慢。在全国中低级技术工人普遍缺乏的情况下，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对提高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和人口素质具有很大的意义。但是，西部地区 2003 年职业中学数比 2000 年减少 436 所，减幅为 18.58%，导致西部地区劳动力输出层次低。

（3）农村义务教育总体状况薄弱。2003 年，西部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98.09%，比 2000 年的 97.25% 略有上升，但仍低于全国 98.65% 的水平，



小学辍学率为1.91%，高于全国水平1.57个百分点。2003年，西部初中入学率为95.5%，较2000年提高了8.1个百分点，仍低于全国97.9%的水平。令人不安的是，尽管西部地区的中小学生的辍学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还在上升，长此以往，必将严重制约着今后中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

三　西部经济发展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在西部经济发展中，除了上面提到的旧情况、旧问题外，还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国家战略与政策变化

2004年以来，国家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刚刚出台的“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客观而言，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对西部开发的支持力度降低（比如从银行业的开放看，国家仍然重点支持外资银行向中西部发展，优先受理外资银行在这些地区开设分行和参股中资银行的申请），但西部地区的发展的确面对着新的形势，必须更好地把握新的机遇和应对新的挑战。另一方面，着眼于全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大局，中央又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由于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圈地热、开发区热以及各种违规乱建投资等问题具有普遍性，在西部地区同样突出，宏观调控政策的紧缩效应也不应低估。同时，由于西部地区的市场限制仍然过多、投资成本高、服务质量差、商业运作模式不灵活，一些投资者对西部地区的投资热情开始逐年下降。因此，西部地区正面临着新的形势和复杂的问题，必须大力解决。

2. 生态环境问题

从生态环境的现状来看，发达地区转移环境成本的问题开始凸显，以至于有学者提出了“生态侵略”的激进指责（指经济发达的地区，在利用不发达地区资源的同时，向该地区转移污染和危害环境的工业、设备、产品和有害废物）。由于西部地区生态结构较为单一和生态脆弱，加上矿产资源的开发、传统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带来的冲击，使得脆弱的生态受到很大冲击，调节能力下降，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环境灾害，西部环境安全的问题日益突出。

3. 和谐社会建设

国家最近提出的和谐社会命题，对西部地区具有特殊含义。西部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中不和谐的突出问题很多，失业问题、政府社会保障能力有限问题、土地征用带来的失地农民问题等都值得大力关注，而又以经济发展落后、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平最为显著。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西部地区先后发生多起矿难和群众聚集事件，社会发展失序和经济失衡的苗头和趋势都值得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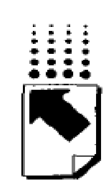
4. 资源开发

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自然资源，目前除少数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的品种外，大部分价格已经放开，资源开发利用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促进就业和推动经济发展中均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国家、地方、投资者和当地居民的利益关系缺乏有效协调，大部分资源开发的收益归国家，地方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当地居民的受益有限，投资者行为扭曲，各种缺乏效率、破坏环境的小矿山、小油井屡禁不止，必须引起关注。

四 今后的展望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改善了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格局，对巩固全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从 2005 年的经济运行看，这种势头仍然得以继续保持。但是，西部开放毕竟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原来的旧问题仍未完全解决，新的矛盾又开始出现。

我们认为，无论是资金短缺、城市化问题、贫困问题、“三农”问题、投资环境等旧问题的解决，还是资源开发、和谐社会建设和环境保护中新矛盾的化解，都应该从坚持中央、地方政府和市场“三管齐下”的原则。首先，根据西部地区的实际，继续加强中央政府的支持力度。应大力帮助西部地区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阻碍公平实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等），切实加强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如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和农业资源的空间信息集成系统），在资源开采项目中建立更完善的利益分享机制等。其次，必须大力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西部地方政府要积极推进改革，健全机制，完善和贯彻政策和法规（如切实贯彻西部生态重建的各种法规）。最后，要依托西部的优势，大力改善投资，通过发挥市场作用切实实现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汪泽清：《中国西部城市化的状况、制约因素和发展》，《经济问题探索》，2004年第10期。

殷孟波、齐亚莉：《论政府行为杠杆机制的构造与西部资金问题的破解》，《西南金融》，2004年第2期。

殷孟波、魏巍：《论西部资金问题的现状及对策》，《财经科学》，2004年第6期。

殷孟波、魏巍：《拓宽资金渠道提高资金效益》，《西南金融》，2004年第12期。

傅岳瑛、高全成：《西部地区科技教育发展概况》，《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高新才、腾堂伟、童长凤：《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夏绪梅：《西部对外开放程度的变化与东中部的比较》，《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董秘刚：《中国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增长的实证》，《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施连成：《全面改善投资环境是西部大开发成功的关键所在》，《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乌（鲁木齐）昌（吉）经济区的构建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 陈栋生

新疆自治区党委2004年12月会议决定，实施《乌昌经济一体化》战略。所谓“乌昌经济一体化”，是指乌鲁木齐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在经济活动中，在不涉及各自行政区划的前提下，共同构建广泛的、统一的经济协作区—乌（鲁木齐）昌（吉）经济区，通过协作，促进两地区共同发展。实施乌昌经济一体化战略，努力实现乌昌两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不断增强乌昌实力，强力带动天山北坡经济带乃至全疆经济的快速发展，是自治区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同时，实施乌昌经济一体化战略，使乌（鲁木齐）昌（吉）经济区成为具有全国意义的、西部地区的二级经济中心和西部开发重要的战略支撑点，也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本文正是利用区域经济学的点—轴理论来研究乌（鲁木齐）昌（吉）经济区的构建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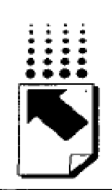
一　区域空间开发的阶段与模式

1.（增长）极点开发

在广袤的以农牧业为主的区域，近现代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最初通常是从若干个点上突破的。以上世纪50年代的新疆来说，最初发展的几个点是乌鲁木齐、石河子和克拉玛依，她们分别因为是自治区的政治中心、农垦基地和石油产地（当时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尚未被发现）而率先得到开发，成为以后带动新疆全区发展的增长极。

2. 轴线延伸、拓展

若干点的率先发展、相互间的投入产出关联，势必要求以一定的交通线



路相互串联。而交通线路的建成，特别是与国内外已有交通线的联网，扩大了市场范围，既推动原有增长极点的规模扩大、功能提升，又会依托交通网络催生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中形成产业带和城镇带。

3. 网络开发

当交通干线和相应的产业带、城镇带由原来的一两条，发展成纵横交错的多条时，区域经济就进入了网络开发阶段，带来城乡经济的普遍繁荣。在从极点开发到轴线延伸拓展、网络开发推进的过程中，初始的增长极亦会相应发展。在人口、经济总量扩张的同时，还伴有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显著变化，有的还伴随行政区域的调整、城市面积的扩大和城市形态由单极扩张向组团式方向发展。

二 西部开发和新疆发展的空间架构

1. 西部大开发的空间架构

《“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明确指出：实行重点开发，选择现有经济基础条件较好，区位优势明显，人口较为密集，沿交通干线和城市枢纽的一些地区，作为西部开发的重点区域。具体地说，西部大开发的空间架构即：以新欧亚大陆桥为依托的西陇海新线经济带、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的长江上游经济带、以西南出海通道为依托的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

2. 新疆发展的空间架构

西部开发规划中的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在新疆境内即北疆铁路和312国道沿线，特别是乌鲁木齐至乌苏和克拉玛依的天山北坡经济带。实际从上世纪80年代第7个五年计划开始，新疆历次的五年计划中，都按照“依托天北、促北扶南、有序展开”的原则，把天山北坡经济带作为率先发展和辐射、带动全疆经济发展的重心区。

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南疆铁路和314国道等的建成、塔里水油气田的开发，以及吐哈油田带动下东疆经济的发展，现已形成倒“Y”型的产业布局框架；今后随着精河—伊宁—霍尔果斯铁路、奎屯－克拉玛依－北屯铁路和其他交通干线的陆续建成，新疆的产业还将沿着新的点－轴有序的在更大的空间拓展。

三 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和城市经济区

1. 城市群、城市圈和城市带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有的欧美学者针对多个城市密集于某经济发达地区的状况，就曾提出过“城市集聚区”、“城市群”、“组合城市”等概念。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国地理学家J·戈特曼发表了《大都市带：城市化的美国东北海岸》，被称为这个领域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我国学术界对城市群问题的研究尽管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但成为社会经济生活和媒体的热门话题，也就在近三五年。而且被冠以某某城市群或都市圈的，按其城市化率、城镇密集度等衡量，与欧美学者所设定的量化指标亦有不小的差距。之所以如此，和下述背景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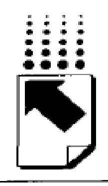
（1）“十五”时期，我国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这和各方面对我国城市化长时期滞后于工业化造成的诸多负面后果有广泛共识有关。

（2）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不时遇到种种“行政性障碍”，不仅各类市场主体深有感触，地方政府亦有同感。

（3）经济全球化使地域分工深入到产业、行业、产品内部，按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展开，城市群（城市圈）被认为构成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基本单元。我国已进入WTO的后过渡期，国内市场竞争国际化。无论从抢抓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融入国际大市场，还是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小城市都更需要依托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在完善、提升城市功能的同时有的亦需要相应扩容和功能扩散，“城市联盟”就成为广泛的普遍需求。其中明显含有体制、机制创新的因素，即以地方政府间的协议分工与合作，弥补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或市场失灵。

2. 城市经济区

如果说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是对城市地理景观客体的描述，基于其上的城市联盟则是运行主体间的合作行为，我们不妨以城市经济区标识，来与前者相区别。如以上海为中心，南北两厢15个城市构成的长三角城市圈，而其合作组织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目前国内更多的是省（自治区）内的各种城市联盟，如广东省以广州、深圳为中心包括周边7个城市的珠三角经济区；湖北省以武汉为中心包括周边8个城市的经济区；辽宁省以沈阳为中心，包括周边6个城市的沈阳经济区等等。新疆先后亦建有以乌



鲁木齐市为中心的五地州（市）经济协作组织和七城市经济圈。这些城市联盟组织，通过统一规划、加强协调，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布局、市场体系、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等方面的一体化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协作中一旦利益协调受阻，亦易陷入议而不决或决而难行的困境。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正在多方面进行探索：一种思路是，上级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参入经济区的区域规划编制，以发挥规划的指导、协调和约束作用，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相关职能部门已参入组织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编制工作；另一类探索当属乌昌经济一体化，在组织架构上，其不仅仅依靠市、州长联席会，而且有统一的党委；不仅仅统一编制规划，还将逐步实行财政统一。这种紧密型的合作，将加快市、州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实现优势要素的整合，发挥整体的累积效应，避免过度竞争与产业同构，显著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使处于全疆龙头地位的乌昌地区综合实力尽快增强，更有效的带动全疆经济发展。乌鲁木齐作为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仅辖有8万人的一个郊县，而昌吉市现有人口不足40万，要带动总人口150万左右的广袤的农牧区，恰似“小马拉大车”。通过乌昌经济一体化，长短互补有利于更好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发挥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作用。

四　围绕四大功能，提升优化经济结构

1. 枢纽功能、创新功能、孵化功能、领航功能

乌鲁木齐作为自治区的首府，是新疆目前唯一的特大城市，地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西桥头堡的区位，决定了乌市和乌昌地区居于引领全疆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这就要求其进一步完善枢纽、创新、孵化和领航四大功能。

（1）枢纽功能：使乌鲁木齐和乌昌地区成为新疆与内地，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周边国家，西来东去，东来西往的物流、客流、信息流、资金流便捷、畅通的枢纽，为建成现代国际商贸城奠定基础。

（2）创新功能：乌鲁木齐集中了新疆主要的高校，科研院所和各类人才，理应成为消化、吸收引进技术进行二次创新的基地；同时针对新疆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提出的课题，培育原创性科研开发的实力，成为全疆区域创新体系的核心，实现通过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引领全疆经济的发展。

（3）孵化功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民本经济，需依靠“一切

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现”。完善创业环境，从健全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技术支持和法律保障体系，到完善科技项目的风险投资机制，调动社会各方面创业、兴业的积极性。使乌鲁木齐和乌昌地区既成为全疆各类专门人才的培训、输送基地；更成为全疆孵化创业者、企业家的摇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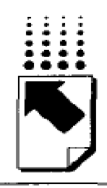
（4）领航功能：作为自治区首府的乌鲁木齐，除了区党委、政府把握指明全局战略发展方向外，还要通过发育完备的商品与要素市场及市场信息，为全疆市场主体导航；同时应重视总部经济的发展，使领航功能更加落实。一些起步于地、州、县的企业，随着规模做大，为了便于进入国内外大市场，拟将总部迁入乌鲁木齐，应积极欢迎；内地大公司为了在各地、州拓展业务，将地区总部设在乌市，亦应同样欢迎。

2. 提升三产、做强二产、转化一产

乌鲁木齐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1.6%（2004年），已形成三、二、一的结构格局；今后三产比重还会继续有所提高，而需要更加着力的是优化三产内部结构，抓紧现代物流、金融、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新疆面积广袤，远离国家经济重心区，物流费用占商品价值的份额高，积极推进专业化、社会化的第三方物流的发展，提高物流效率，挖掘“第三利润源泉”，对提高新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至关重要。

“创旅游名城”是乌鲁木齐市的又一目标，为此，要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紧密结合。因为城市的魅力最终取决于文化；从实质上看，旅游是对异质风光和异质文化的体验，而后者能更长时间的吸引游客的眼球，延长游客的逗留时间。旅游城市和城市旅游不尽相同，后者主要依靠专门的旅游景点，而前者是以具有浓郁地方特色、浸润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整个城市风貌来吸引游客，二道桥民俗一条街、新疆国际大巴扎已发挥了这样的效应，如果今后有更多的建筑、更多的社区、更多街道、体现同样的文化理念，乌鲁木齐就可以既是旅游集散地，又是旅游目的地。

近年在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快速推进或城乡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我国工业快速增长，具有明显的重化工化特征。而乌鲁木齐市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份额超过80%，石化、冶金等行业又占大头。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主导产业如果和某一时段国家高增长行业的吻合度高，该地区的“比例转移”就为正值，有更大的增长空间；从长远看，成功应对能源紧缺是保持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之一；而新疆从石油、天然气到



煤炭以至风能等多种能源都非常丰富，又邻近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亚、西亚，对保证国家能源安全有特殊重要的价值，和新疆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区位将使新疆今后的发展，特别是重化工工业的发展具有更有利的战略机遇。重化工工业资源、能源消耗高、污染较大，所以这些行业的规模扩张都应寓于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之中，采用新技术、发展市场急需的短缺品种，淘汰落后工艺和产品，降低物耗和污染排放，实行园区集聚配置、发展循环经济，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提供市场急需的短缺品种。在重视资源型产业发展的同时，亦要注意培育先进制造业，这事关地区经济发展的长远后劲；事实上，新疆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已在这方面趟出了一条成功之路。根据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趋势，有条件的企业都有必要从加工制作向研发和品牌营销两端延伸，以应对制造业通常面临的围绕价值链重构的“大洗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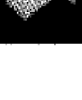
转化一产，有两层涵义：一是推进传统农牧业向市场化、现代化农牧业转变；这包括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支持农村经纪人队伍的发展，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推动城市连锁超市下乡等举措，构建农产品和农村流通体系；逐步完善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质量标准认证、检测等现代农业技术支撑体系。二是城市发展城郊型农业，除发挥其提供蔬菜副食的作用，还要重视发挥它的生态功能和旅游功能，为城郊农民增收开辟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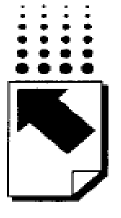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胡序威等《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
陈栋生：《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焦广辉：《新疆区域经济与投资环境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 事 记





2005年长三角区域发展大事记

○陈　维

3月5日　“中国长三角非织造产业联盟”在江苏仪征市宣告成立。

3月11日　“长三角工业与环境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3月20日　浙江、上海、江苏、辽宁、吉林和黑龙江6省（市）政府人事部门在哈尔滨共同签署了《“东三省”与“长三角”人才开发合作协议书》，全方位实施“三三合作”。

4月21日　“长三角公共管理论坛”在南京大学举行。

4月22日　成立8年之久的“长江流域产权交易共同市场”在南京举行年度会员大会。

5月10日　由江苏省工商联、浙江省工商联和上海市工商联联合主办的“后配额时代长三角纺织服装业发展论坛”在南京举行。

6月28日　江、浙、沪三省市运输管理部门召开长三角地区道路货运发展研讨会，并发布了《长三角地区道路货运一体化发展共同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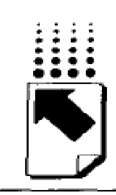
6月30日　上海与西安合作建设西安国际港务区协议签字仪式在上海外高桥集装箱港区举行。

7月10日　国家发改委有关领导和专家、江浙沪及长三角16座城市的代表聚集扬州，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中涉及的产业和布局问题进行专题研讨，并将于2005年8月拿出具体的研究报告呈报国务院。

7月13日　无锡与上海合作交流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沪举行。

7月19日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率领的上海市代表团，启程赴甘肃、青海、西藏、四川等西部四省区进行学习考察。

7月22日　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以及山东、江西、安徽等周边地



区的50多个城市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负责人齐聚上海，共同签署了《长三角地区道路货运一体化共同宣言》。

7月30日 由上海、杭州、宁波等16个城市联合组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市场信息协作网”编制的《2005长江三角洲零售市场白皮书》正式推出。

8月10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揭牌仪式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8月12日 上海与杭州市人民政府在上海市国际会议中心签署《关于进一步推进沪杭经济合作与交流的协议》。

8月30日 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会同上海市社会服务局与江苏、浙江两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首届“长三角民间组织一行业协会与区域经济发展合作交流论坛”。

9月3日 “2005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高峰论坛”在太湖明珠无锡举行，24个城市的旅游主管共同签署《无锡倡议》。

9月12～13日 “相聚长三角—海外高新技术交流合作周”上海段活动在沪举行。来自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地的40多名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参加了活动。

9月13日 长三角地区－波罗的海地区合作交流与发展论坛开幕式举办主题演讲。

9月23日 “知识产权与发展区域经济”会议上长三角地区专利网上交易视频系统正式开通，同时长三角地区27家知识产权代表在会上签署了该地区专利行政执法协议。

9月26日 首届“长三角—珠三角”旅游合作交流会在镇江举行。

10月12日 苏、浙、沪五金商会合作联盟成立。江苏省工商联五金业商会、浙江省工商联五金机电商会和上海市工商联五金商会达成协议：成立二省一市工商联五金（机电）商会合作联盟，共同打造长三角五金机电行业发展的平台。

10月24日 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六次会议在南通举行，长三角16个城市的市长参加并共同签署了《长三角地区城市合作（南通）协议》。

11月16日 中日长江中下游－阪神·神户地区区域合作第七次会议在日本神户举行。

11月18～19日 长三角地区农林渔业局长第六次联谊会在常州市召开。

11月20日 第二届“长三角法学论坛”在杭举行。沪、苏、浙三地法学法律界的专家学者和民营企业家150余人参加了本届论坛，本届论坛由沪、苏、浙两省一市的法学会共同主办。

11月24日 第五次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在南京举行。

12月6~8日 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在北京召开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研究成果协调会议。

12月10日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区开港暨洋山保税港区启用仪式在洋山深水港一期码头举行。洋山保税港区实行封闭管理，它集目前国内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三方面的政策优势于一体。

12月16日 长三角高速公路管理信息互通研讨会在上海银河宾馆召开。来自江、浙、沪三地的专家学者6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

12月17日 在南京召开“2005中国长三角物流合作高峰论坛”。

12月18日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组建的“长三角联合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在上海社科院举行。

12月22日 浦东国际机场扩建工程全面开工，这标志着上海国际航空枢纽建设迈入了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5年珠三角及泛珠三角区域发展大事记

○ 邓丽姝

1月19日 广东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2004～2020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规划》提出，珠三角将构筑以广州为中心，向南经珠江口湾区连接深圳、珠海，向北沿京广大动脉联通内陆的区域发展，通过高水平的设施建设和政府间的高效合作，形成辐射“大珠三角”的区域性服务与创新中心。

2月下旬 经海关总署批准，首次“泛珠三角区域海关关长联席例会”在广东召开，研究推动《海关积极参与和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十项措施》的实施，从而正式启动泛珠三角区域内地16个直属海关的区域合作机制。海关广东分署、泛珠三角区域内地16个直属海关关长及海关总署相关主要业务司室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还特邀了香港、澳门海关关长以及广东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十项措施》的出台，是海关系统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对于促进9省区与港澳之间的经贸合作、提高口岸通关效率、深化海关业务改革、建立健全泛珠三角区域海关合作平台和联络机制将产生积极和深远的意义。

3月1日 《泛珠三角区域信息化合作专项规划（2006～2010）》工作研讨会在广东省江门市召开。标志着“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正式启动。来自泛珠三角九省区信息产业厅（局、办）负责规划工作的二十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3月12日 以“合作发展、携手共进”为主题的首届珠三角与长三角纺织服装业合作与发展战略论坛在广东虎门举办，有关方面达成了三大战略合作协议或宣言。本次论坛由中国纺织信息中心与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

会、浙江省服装行业协会、江苏省纺织工业协会、福建省纺织行业协会联合主办，将从2005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重点探讨产业集群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创新发展，并将对生产领域、市场建设、贸易平台搭建、进出口秩序维护以及行业自律、产业链互动、区域合作等进行专题研讨，以对新时期实现全国纺织服装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起到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4月14日 由深圳等12座珠三角城市最具影响力的19家主流媒体在深圳结成新闻与广告传播的强势媒体联盟——珠三角报业广告联盟。该联盟将在平等、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强强联合，形成覆盖整个珠三角经济区域的报业广告组合优势。

5月26日 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农业厅厅长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渔农自然护理署、澳门民政总署负责人在广州正式签署了《泛珠三角农业合作协议》，各方同意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建立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农业日常工作制度和各方下属机构的对口衔接联系渠道。泛珠三角农业合作包括八方面，涉及区域内农业资源的优势互补和合理利用、开辟农产品“绿色通道”、建立区域内九省区农业龙头企业对接机制、推进区域内农业信息平台对接、加强农业环保交流合作等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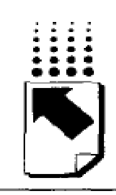
6月8日 由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主办，金融时报协办的“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金融论坛”在福州举行。各省区金融学会的领导和金融业界代表对开拓泛珠三角金融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6月14~16日 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文化合作联席会议在成都召开。与会代表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就公共图书馆网上参考、咨询、合作等三个方面达成了协议。

6月18日 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人才服务合作第三次联席会议在长沙举行，审议通过了《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人事人才服务合作联席会议章程》，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人才网站服务合作协议》，正式建立了泛珠三角区域九省区人才服务合作联席会议制度，确定了6个方面的主要合作领域和内容。

6月23~24日 由广东省半导体行业协会主办的“2005珠三角集成电路产业及市场合作论坛”在深圳举行。本次会议以“促进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与系统整机的互动发展”为宗旨，旨在搭建沟通桥梁，帮助IC设计企业全面走向市场，了解客户需求，更好地推动我国的设计成果产业化。

7月1日 由广州中医药大学组织的“泛珠三角区域（9+2）高等中医



药院校合作发展研讨会”在广州开幕。来自泛珠三角地区的13所中医药院校的专家代表共同签订了《泛珠三角区域（9+2）高等中医药院校合作发展框架协议》。

7月20日 广东等九个省区建设厅的代表在广州共同签署“泛珠三角区域房地产业合作备忘录”，这标志着泛珠三角房地产业合作走进实质化操作阶段。

7月24～27日 由泛珠三角区域11省区联合主办、四川省工商联承办的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商会联席会议在成都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建立行业商会合作机制，推动行业合作发展。

7月25日 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和首届泛珠三角区域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在成都举行。各方深化了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认识，形成了五方面的共识：以人为本，重在富民；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形成合力，扩大开放；密切合作，务实推进。论坛从国家层面深化了泛珠三角区域发展构想，绘就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十一五”蓝图，明确了近期合作重点，健全了合作机制，扩大了区域合作的影响。审议通过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规划纲要》和《务实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近期工作意见》。“9+2”各方行政首长还签署了首届泛珠三角区域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纪要》。

7月25日 全国首个跨行业、跨区域的大型综合性网站——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网（www.pprd.org.cn）正式开通。由此，一个共建共享、高效运作、务求共赢的大型网络信息平台，在区域各方之间搭起。

7月26日 由内地9省（区）与香港、澳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共同主办的“首届泛珠三角区域知识产权合作论坛”在成都举行。出席论坛的有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版权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领导，“9+2”各方知识产权、工商行政管理和版权部门的负责人，知识产权专家、学者，以及企事业单位有关人员共130多人。在论坛上，各代表围绕“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这一主题，分别从专利、商标、版权等方面作了专题演讲。

7月26～27日 作为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的分论坛之一，首届泛珠三角现代物流发展论坛在成都举行。内地9省区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现代物流发展合作协议》，就构建统一、规范、开放、高效、创新、发展的现代物流体系达成共识。

7月26~28日 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在成都举办。本届洽谈会共签订合作项目4473个，投资金额4535亿元人民币。

8月12~14日 为贯彻落实《泛珠三角区域农业合作协议》，推动区域合作、共享区域农副产品市场资源和商机，以贸易的形式带动合作区域农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届泛珠三角农副产品交易会在东莞举行。

9月30日~10月1日 第四次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联席会议在香港举行。会议通过《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合作"十一五"专项规划》，并同意共同推动《规划》报告内的建议，深化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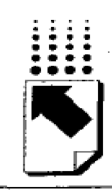
11月25日 由广东省科技厅、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香港工业总会联合主办的香港工商科技及珠三角专业镇发展交流会在广州举行，多位来自香港及珠三角的工业企业领导和专业镇政府代表，共商促进香港与珠三角两地企业经济发展，推动产业升级。会议主要分"品牌保护、纺织及成衣行业分享"、"机械、金属加工及联系产业行业分享"、"家电、玩具及灯饰行业分享"、"电子制品、材料及信息产业行业分享"四个专题。

11月26~27日 "2005泛珠三角城市旅游发展高峰论坛"在广州举行。来自泛珠三角30多个城市的代表及相关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在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合作、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整合与保护、旅游信息的交流与一体化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11月30日~12月1日 泛珠三角区域科协合作第二次联席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就如何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更好地发挥科技团体的作用等进行了商讨。

12月1~3日 由泛珠9省（区）建设厅联合指导，泛珠9省（区）房地产业协会共同主办的首届"泛珠三角区域房地产业交流促进博览会"在广州举行，主要宗旨是促进区域内产业优势互补，协作配套，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建立房地产业交易洽谈的商务大平台，打造整合上下游行业的住宅产业大链条，推介泛珠企业品牌。

12月7~10日 以"寻求合作、谋求多赢、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05泛珠三角区域软件产业合作与交易会"在珠海举行。本次活动由广东等省自治区市的信息产业厅、香港特区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澳门特区政府电信资讯科技发展办以及珠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主题是盘点区域软件产业资源、寻求合作联动，以形成区域内软件产业完整的供应链，推动整个区域软件产业的联动发展。12月9日，举行了"2005泛珠三角风险投资论



坛”，旨在为国内外风险投资家提供交流的平台，促进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12月8～10日 首届“泛珠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科技咨询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穗港澳台应用技术推介展示会”在广州举行。论坛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科技咨询合作框架协议》。《框架协议》确定了区域内各方的合作宗旨、合作原则和合作要求，明确了合作的主要领域。将充分发挥各地科技咨询的优势和特色，不断完善科技咨询服务体系，建立多种形式的咨询合作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着重建立四个平台推动合作发展：建立科技咨询合作平台、科技人才交流与共享平台、科技成果转化交易平台、继续教育合作平台，推动泛珠三角区域的科技创新。

12月18～19日 由中国自动化学会、广东省自动化学会主办，以“制造业企业产品与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应用和制造业企业自动化技术与信息化技术集成应用”为主题的“泛珠三角企业自动化与信息化技术应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加强了企业、厂商和专家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推进和帮助泛珠三角制造业企业加快企业产品与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应用及自动化技术信息化技术集成应用的步伐。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2005年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发展大事记

○ 邓丽姝

1月下旬 北京市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确定北京今后将在产业分工、交通构建、市场培育、环境改善、旅游发展等五大领域推动京津冀地区的区域合作。

3月3日 铁道部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召开了京津城际轨道交通系统建设领导小组会议，签署了《会议纪要》，定于2005年7月开工建设京津城际轨道，2007年12月建成，2008年7月投入运营。京津城际轨道交通系统是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服务的重点工程项目，将是中国最早开工建设并最先建成的第一条高标准铁路客运专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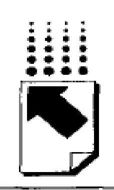
3月16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环渤海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

3月29日 国家发改委正式对曹妃甸港区矿石专用码头工程予以核准批复。至此，曹妃甸大港口、大化工、大钢铁、大电能建设全面展开。

4月3日 由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团组织和青年企业家协会共同发起的首届“京津冀青年企业家合作年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

5月17日 由博鳌亚洲论坛发起并组织的“2005东北亚暨环渤海国际合作论坛”在河北省廊坊市举行，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古、山西、山东、辽宁七省（市、自治区）再次握手廊坊。代表们围绕“寻找东北亚经济合作的突破口”这一主题，结合提高区域竞争力、城市化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和行业竞争力四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并针对环渤海地区合作的现状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与会代表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并发表了《廊坊建议》。

6月8~9日 首届京津冀人才开发一体化研讨会在河北省廊坊市召开。会议就京津冀区域人才开发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深入研讨，就推进京津



冀人才开发一体化的若干问题达成共识。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三省市共同签署了《京津冀人才开发一体化合作协议书》，标志着京津冀人才开发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6月9日 国家发改委在河北唐山市召开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工作座谈会，就做好区域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工作进行交流，听取有关省市的意见和建议。这标志着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工作由前期准备阶段进入了实质性工作阶段。

6月10日 京津冀区域票据自动清分系统在河北廊坊正式启用。“冀”（廊坊）字样支票可以在北京、天津、廊坊、唐山、沧州、涿州地区流通使用。

6月29日 “2005京津软件产业投融资论坛暨软件投融资项目洽谈会”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

6月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率国家15个部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天津考察。他指出，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环渤海区域及全国发展战略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走好这步棋，不仅对天津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施全国总体发展战略部署、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宏伟目标，都具有重大意义。

8月17日 亚洲开发银行与河北省政府公布《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战略研究》指出，河北省与京津接壤的6个设区市的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等地区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

8月24～26日 由北京市旅游局、天津市旅游局、河北省旅游局、香港旅游发展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台湾”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台湾中华两岸旅行协会”共同主办的京津冀—港澳台（3+3）旅游合作大会在河北省廊坊市举行。这次大会以“友谊、合作、发展”为主题，为两岸六地旅游业界交流与洽谈搭建了平台，是区域旅游合作方式的创新和发展，对于促进六地乃至全国旅游业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9月6日 渤海银行各方股东在北京签署《发起人协议》，其总部将落户天津滨海新区。

9月19～21日 京津冀三省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区域经济发展论坛”第二次会议在天津举行，会议围绕如何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促进京津冀共同发展进行了研讨。

10月1~2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天津市考察工作期间，专程到滨海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希望滨海新区牢牢把握难得的发展机遇，坚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开发建设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不断增强创新能力、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建设成为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的现代化新区。

10月18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公布，《建议》指出，未来5年国家将“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10月22日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在唐山市曹妃甸工业区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首钢压产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的系统工程——曹妃甸钢铁项目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这一项目是京冀跨区域合作的重要实践，对推进环渤海经济区的繁荣将发挥积极作用。

10月24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与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这意味着覆盖全国及北方的两大产权交易机构，将实现产权交易业务、信息渠道及买卖方资源的对接，有力推动国有产权及其他各类产权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规范、高效、有序流转，进而辐射全国。

11月1日 第二届“京津冀三省市信息化工作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三省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十一五”信息化发展规划进行了交流。

11月24日 由天津市金融学会发起主办，有关省市金融协会协办的首届环渤海区域金融合作发展研讨会在滨海新区举办。除天津市有关领导外，辽宁省、山东省、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大连市、青岛市等9省市自治区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会议探索和研讨了环渤海地区金融合作中的重大问题，为加强环渤海地区金融学会间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平台，对推动区域金融合作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1月29日 曹妃甸矿石码头首次靠泊巨型货轮，标志着曹妃甸港向世界级大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2005年山东半岛城市群区域发展大事记

○ 刘淑琪

1月14日 山东省发改委编制规划，今后20年内，胶东半岛的青烟威三市将建设轻轨725公里，实现三市市区内、市区至重要卫星城的快速、方便连接，使之能够在1小时内到达。按照规划，烟台和威海两市有望在2010年前实现轻轨直接相连。烟威之间的轻轨起点分别在烟台火车站和威海火车站，总长度79公里，其中烟台市域内长度为56公里，威海市域内长23公里，途经旅游胜地养马岛。2010年之后，烟、威两市将再各自增建120公里的轻轨线路。烟威轻轨将从烟、威两市沿半岛海岸线向两边延伸，最终形成连接龙口、蓬莱、烟台、威海、成山头、文登的沿海轻轨线路，总长度达319公里。按照规划，青岛2010年前也将建设中心城区连接卫星城的轻轨，长达79公里的线路，分为薛家岛－开发区－胶南（56公里）和城阳－棘洪滩－胶州两段，西海岸的开发区和胶南、城阳、胶州三大卫星城将首先连接在一起。2010年之后将是青岛市轻轨交通大发展的时期，新建总长达317公里的轻轨线路。届时，青岛市城区与主要卫星城胶南、胶州、平度、莱西、即墨，以及城区与主要风景区之间全部由轻轨线路连通，青岛1小时经济圈将打造完成。青岛的城市轻轨交通系统将与其地铁系统共同构成青岛市的快速轨道交通网。

1月17日 省长韩寓群在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山东半岛城市群规划体系编制已经完成，区域内部合作全面启动，'8+2'无障碍旅游区、胶东半岛3市人才开发一体化工作机制开始建立。"

1月18日 青岛、烟台、威海召开市长联席会议，决定建立青烟威三市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三市在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沟通协调，通力打造半岛制造业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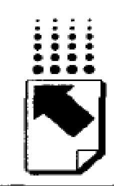
2月3日　山东省政协委员在政协第九届山东省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将滨州市纳入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建议提案。

4月12日　经省政府同意，《山东半岛城市群区域发展规划》正式出台。《规划》提出，要按照一小时通勤的要求，加紧构筑以济南、青岛为核心的两个相互联系、相互衔接、各具特色的都市圈。到2010年，基本实现100公里范围内的通勤连接；到2020年，通勤范围争取达到200公里。

5月25日　由北京大学编制的《山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评审会在济南由省政府主持召开，山东半岛城市群的规划方案通过评审。按照该规划，将打造由青岛、济南、烟台、淄博、潍坊、威海、东营和日照8个城市组成的区域综合竞争力强大的都市连绵区和城市空间联系密集区，其间将以青岛为龙头城市，以青岛、济南为区域双中心城市，以烟台为副中心城市。本次规划的期限确定为2004～2020年，其中近期为2004～2010年，远期为2004～2020年。规划范围包括济南市、青岛市、烟台市、淄博市、东营市、威海市、潍坊市、日照市等8个地级市市域和邹平县（滨州市）县域范围，主要是考虑到邹平虽然在行政上隶属滨州，但因黄河的阻隔，邹平与同在黄河一侧的济南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因此本次规划打破行政区划，将邹平也纳入规划范围。规划区土地面积约7.3万平方公里，共有8个地级市（包括一个计划单列市）、22个县级市、600个建制镇。

5月30～31日　中共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在青岛召开发挥青岛龙头带动作用工作会议。会议主要任务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进一步加快青岛的发展，发挥青岛龙头带动作用作出全面部署。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高丽指出，要抓住山东半岛城市群建设的机遇，充分认识青岛在山东半岛城市群中的重要地位，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高效能管理，高度重视加强生态保护，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再上一个新水平。

8月30日　国家发改委首次公布2005年上半年7大城市群经济运行的情况。这7个城市群包括山东半岛、中原、辽中南、关中、武汉、哈长和长株潭7个地区。根据发改委的统计，上半年，山东半岛、辽中南和哈长地区经济总量已具相当规模，经济总量分别达到珠江三角洲都市圈的78%、47%和48%。从产业结构看，今年上半年，7个城市群的第一、三产业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除哈长地区外的其他城市群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半年7个城市群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超过35%，其中山东半岛的投资总额已超过京津冀与珠三角都市圈，约为京津冀的114%、珠三角的



166%。

9月5日 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青岛、济南、淄博、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等8个城市和韩国的釜山、大邱、仁川、水原、群山、安山、龙仁、平泽等8个城市的政府代表团成员汇聚青岛，参加山东省政府与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馆主办的“第一届中国（山东省）—韩国城市经济交流会议”。与会者认为，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不断加快的需要，双方城市和政府应该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次区域”经济交流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韩国驻青岛总领事辛亨根认为，为了应对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应继续探索崭新的合作框架。这样的合作框架之一就是韩中“8＋8”城市经济交流会议，希望其成为加强地方政府力量的重要契机。

10月22日 “2005山东半岛城市群人才联盟人才交流会”在济南举办。济南、青岛、淄博、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八城市联手搭建的这一区域人才流动平台，吸引了山东省内外近300家单位参会，并带来了7000余个就业岗位。2003年山东半岛八城市首次联手共筑区域人才流动平台，目前已初步实现市场招聘、人事代理、人才开发培训、人才派遣、人才市场信息化建设等信息服务共享。

10月21日 在山东考察访问的日本关西地区经济界访问团表示，目前日本企业在华投资更青睐山东并将其视为在华投资首选地。日中经济贸易中心理事长青木俊一郎说，山东提出的半岛制造业基地和半岛城市群战略，一路考察走来，发现每个城市都有各自鲜明的特点和发展方向，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另外，投资环境呈现出卓有成效的改善，如青岛已经为日本投资商的子女开办了专门的学校，并计划在明年设立日本领事馆办事处。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成渝经济区区域发展大事记

○ 岳朝敏

1980 年代　四川提出“依靠盆地、开发两翼”的战略布局设想，1990年代，四川把这一战略设想改称为“两点”、“两线”、“两翼”战略。

2001 年 12 月 21 日　成都－重庆经济合作座谈会上，成渝两地政府达成共识，签订一系列合作协议，双方提出近期合作方向：一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二是联合开发旅游资源；三是积极推进统一市场建设；四是建立产业化分工体系；五是建立两地间信息网络通道；六是发挥两市新闻媒体作用，促进企业合作；七是建立两市间交流、沟通机制。

2003 年　“西三角”（重庆、成都和宜昌三市的腹地）经济区概念首次提出，专家预言，它将是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后，中国又一个经济增长极。

2004 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将成渝经济圈列入“十一五”前期规划。

2004 年 2 月 3 日　四川省政府和重庆市政府签订“1＋6”协议。

2004 年 2 月 5 日　签订《四川、重庆两省市道路运输发展框架协议》，川渝携手共同打造两地道路运输无障碍快速通道。

2005 年 2 月 27 日　确定实行高层联席会，川渝两地建立两省市党委、政府高层领导定期联系机制，每年定期召开两省市高层领导联席会议，就双方合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沟通。同时，建立两省市政府秘书长协调机制，两省市部门和行业对口合作机制，两省市的市、区、县对口联系机制，加强两地联系合作。

2005 年 10 月　成渝地区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成渝经济区跻身四大经济区。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